

极权主义思想丛书

汉娜 阿伦特

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

最新中译本

PART THREE 极权主义
THE ORIGIN OF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
TOTALATARIANISM [美国] 汉娜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太乙真人 校对翻译（最新中译本）

[美国]哈维斯特出版社 1985 年重印

Totalitarianism, Part Three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nnah Arendt, A Harvest Book, 1985.

哈维斯特出版社 1968 年 汉娜 阿伦特

版权更新 1951, 1948 汉娜 阿伦特

版权更新 1976 年 汉娜 阿伦特

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信息:

汉娜 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包括参考文献和索引

内容: 1. 反犹主义 2. 帝国主义 3. 极权主义

哈维斯特出版社 1985 重印

I. 标题

JC481. A62 1985 321.9 84-22579

ISBN 0-15-607810-4 (第一卷)

ISBN 0-15-644200-0 (第二卷)

ISBN 0-15-690650-3 (第三卷)

美国印刷

目 录

作者序言.....	1
本书导读.....	16
本书评介.....	28
第一章 无阶级社会	
第一节 大众.....	41
第二节 暴民与精英的暂时联盟.....	54
本章注释.....	64
第二章 极权主义运动	
第一节 极权主义宣传.....	76
第二节 极权主义组织.....	90
本章注释.....	105
第三章 极权主义掌权	
第一节 所谓的极权国家.....	124
第二节 秘密警察.....	138
第三节 绝对统治.....	150
本章注释.....	167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恐怖	
一种全新的政体.....	189
本章注释.....	205
参考文献	206
译者后记	215

作者序言¹

一

《极权主义的起源》原稿完成于 1949 年秋，此时距希特勒德国战败已逾四年，距斯大林逝世不足四年。该书首版于 1951 年问世。回望过去，自 1945 年起我投入写作的岁月，宛如历经数十年动荡、迷茫与纯粹恐怖之后迎来首个相对平静时期。回望过去，我经历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浪潮，到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与议会政府的瓦解，继而各种新暴政接踵而至：法西斯与准法西斯政权、一党专政与军事独裁，最终极权政府看似稳固地建立在群众支持之上[1]：1929 年在俄罗斯，这一年如今常被称为“第二次革命”之年，以及 1933 年的德国。

随着纳粹德国的战败，这段历史篇章告一段落。此刻似乎是首次适宜以历史学家回望的视角，结合政治学家的分析热忱，尝试阐释并理解当代事件的契机：尚未摆脱愤懑与执念，仍浸染于悲痛之中。因而倾向于哀叹，但不再是无言的愤慨与无力的恐惧。无论如何，这是首次能够清晰阐述并深入探讨问题：这些问题曾迫使我们这一代人在成年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断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会发生？这竟如何可能？因为德国战败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与历史上“零点”的民族，竟奇迹般地保存了海量文献，这是关于希特勒“千年帝国”十二年统治的方方面面，史料之丰厚堪称超乎想象。这笔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富中首批精选资料，即便在今天也远未得到充分出版和研究，这些资料始于 1946 年纽伦堡重大战犯审判期间，收录于十二卷本《纳粹阴谋与侵略》[2]。

然而，当 1958 年第二版平装本问世时，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已涌现出大量涉及纳粹政权的文献及其他资料。当时我所掌握的新信息虽颇具价值，但几乎无需对原著的分析框架或论证逻辑进行重大修改。脚注中大量引文的增补与替换显得必要，正文篇幅也显著扩展。但这些修改皆属技术性调整。1949 年时，纽伦堡文件仅有部分英文译本流传，而 1933 至 1945 年间德国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及杂志尚未面世。此外，在若干增补内容中，我把斯大林逝世后若干重大事件纳入思考中，如继任危机及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讲话，以及近期出版物中关于斯大林政权的新资料。因此我修订了第三部分及第二部分最后一章，而关于反犹主义的第一部分

¹ 该序言是阿伦特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分极权主义专门写的序言，该序言对于读者了解斯大林掌权后，在苏联推行极权主义特别有帮助。

及关于帝国主义的前四章则保持原貌。此外，在完成初稿时，我尚未形成某些与绝对统治要素分析密切相关的纯理论性洞见，导致原版以结论性不足的“结语”收尾。本次修订版以“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作为终章取代了原版结语，其中仍具价值的内容则分散至其他章节。第二版曾增补一则“后记”，简述苏联体制在卫星国的推行及匈牙利革命。这篇迟来的论述因涉及当代事件而基调迥异，且诸多细节已显过时。现已将其删除，而相较于第二版平装本，本版仅此一项重大修订。

显然，战争的结束并未宣告苏联极权统治的终结。相反，随之而来的是东欧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即极权统治的蔓延。和平时期不过是分析两种极权体制在方法与制度上异同的重要转折点。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非战争终结，而是八年后斯大林的逝世。回溯历史，斯大林之死不仅引发了继任危机和新领袖确立前的暂时“解冻”，更开启了一个真实存在但从未明朗化的去极权化进程。因此从事件发展看，本篇叙述无需追溯至当代；就该时期史实认知而言，其变化亦不足以要求大规模修订增补。希特勒曾有意识地利用战争发展并完善极权统治，而苏联战时实为极权统治暂时搁置的时期，这点德国与苏联不同。就我的研究目的而言，1929 至 1941 年及 1945 至 1953 年这两个阶段具有核心意义，而关于这些时期的史料至今仍与 1958 年乃至 1949 年时同样稀缺且性质相似。迄今未曾发生、未来亦难再现能为我们提供如纳粹德国案例般明确结局，或以同样骇人听闻的严密证据加以佐证的历史事件。

斯摩棱斯克档案（梅尔·费恩索德于 1958 年出版）作为我们知识体系中唯一重要的补充，已充分证明：最基础的文献与统计资料的匮乏，将始终成为研究苏联历史这一时期所有调查工作的决定性障碍。尽管这些档案（由德国情报部门在斯摩棱斯克党总部发现，后被驻德美军缴获）包含约 20 万页文件，且 1917 至 1938 年间的内容基本完整保存，但它们未能提供的信息量之巨，实令人瞠目。1917 至 1938 年间几乎完整无缺，但其中缺失的信息量之大令人震惊。即便关于 1929 至 1937 年间“大清洗”的史料已多到近乎难以驾驭的程度，这些文献中仍未提及受害者人数或其他关键统计数据。凡涉及数字之处皆矛盾重重，各机构数据相互矛盾。唯一确凿可知的是：许多数据若曾存在，亦因政府指令而被原始来源封存[3]。此外，这份档案也没能涵盖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的相关讯息，如“党、军方与内务人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或是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它们几乎完全没有提及沟通与命令的渠道。总之，我们对该政权的组织结构一无所知，而关于纳粹德国的这方面信息我们却了如指掌[4]。换言之，尽管人们始终知道苏联官方出版物服务于宣传目的且完全不可靠，但如今看来，可靠的史料与统计数据可能根本不曾存在过。

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研究极权主义时，我们能否忽视中国历史上发生过、

且仍在发生的事情？对此我们掌握的信息甚至比三十年代对苏联的认知更为匮乏，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革命成功后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对外隔绝政策，部分原因则在于尚未有中共高层叛逃者提供协助（当然，这一点本身就极具深意）。十七年来，我们所能确信的有限认知揭示出显著差异：经历了初期大规模流血事件，据可靠估算，独裁统治初期遇难者达一千五百万，约占 1949 年人口的 3%，其比例远低于斯大林“第二次革命”造成的人口损失，且有组织反对派消失后，恐怖行径未见升级，无辜民众未遭屠戮，既无“客观敌人”之类标签，亦无公审闹剧，尽管充斥着大量公开忏悔与“自我批判”，更无明目张胆的罪行。毛泽东 1957 年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谈话》（通常被加上了一个误导性标题“百花齐放”，并不是自由宣言，但却承认了各阶级之间非对抗性矛盾；更重要的是，在共产主义专政下，也存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处理反对派的方式是“思想改造”，这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持续重塑思想的程序，几乎全民皆受其制约。我们始终不甚清楚这种改造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机制，不知谁能豁免于此，即谁来实施“改造”），更无从知晓这种“洗脑”的实际效果：它是否持久，是否真能改变人格。若相信中国领导层当前的声明，那它制造的不外乎是一种范围巨大的伪善，而是一个“反革命温床”。若这算恐怖统治（它无疑是），那也是另一种形态的恐怖，无论其后果如何，至少未导致人口锐减。它明确承认国家利益，允许国家和平发展，善用原来治阶级后代的专业能力，并维护学术与职业标准。简言之，毛泽东的“思想”显然未沿袭斯大林（或希特勒）的路线，他并非天生的屠夫，而专注于民族主义情怀，这种在所有前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动荡，都足以限制其绝对统治。这一切似乎与本书所表达的某些担忧相矛盾。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后，就致力于“国际性的组织、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以及全球性的政治抱负”，其极权特征自始便显露无遗。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这些特征愈发凸显，尽管这场冲突本身很可能源于国家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分歧。中方坚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而且谴责俄方去极权化尝试为“修正主义”式的偏离，更糟糕的是，它们伴随着一种尚未成功的、态度极为冷酷的国际政策，旨在向所有革命运动渗透中国特工，并在北京领导下重振共产国际。当前这些事态发展难以评判，部分源于信息匮乏，部分因局势仍在剧变。除却这种情势固有的不确定性，我们更不幸地增添了自酿的困境，即冷战时期遗留的官方“反意识形态”、反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往往具有全球扩张的倾向，诱使我们构筑虚构的对立框架，从而原则性地拒绝区分现实中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共产主义一党专政，与可能在中国以不同形式发展起来的真正极权政府。当然，关键不在于共产主义在中国与俄罗斯存在差异，也不是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有所不同。在描述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时，酗酒与无能现象占据重要篇幅，时至今日仍普遍存在；而纳粹德国的历史中，这些因素则完全缺席。德国集中营与灭绝营中难以言喻的无端残暴，在俄罗斯的集中营中似乎基本不存在，那里囚犯多死于疏于照料而非酷刑折磨。腐败，这个自古以来就困扰着俄罗斯行政体系的祸患，在纳粹政权末期也存在，但在中国革命后似乎完全消失了。这类差异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它们意义重大、属于各国民族的历史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这些差异与政体形式并无直接关联。毫无疑问，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普鲁士的绝对君主制各有特色；然而它们本质上仍是同一政体形式。在当前语境下，关键在于极权政府有别于独裁政权与暴政；这种辨别能力绝非可安全交由“理论家”处理的学术问题，因为极权统治是唯一一种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的政府形式。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审慎而克制地使用“极权主义”一词。另一方面，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深感忧虑。眼下我们正目睹中国首次全国性的党内清洗运动，伴随着公开的屠杀威胁。若这些威胁付诸实施，很可能重现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恶劣境况，这种局面我们再熟悉不过。我们无从知晓这场突变的根源，但据称连资深中国官员也猝不及防（见马克斯·弗兰克尔 1966 年 6 月 26 日《纽约时报》报道），这场清洗究竟是精心掩盖的权力斗争所致，还是近期中国外交灾难性后果。但那些歇斯底里的指控，即所谓根本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修正主义者”的帮凶、党内“反党”份子、知识份子中的“毒蛇”与“毒草”，这些极易引发如同“第二次革命”般推翻列宁专政、确立斯大林极权统治的政权更迭。然而这些推测仍属臆断，现实是当今中国的神秘程度甚至超过了苏联最动荡时期的状态。若试图分析其现行政体形态，实属妄自菲薄，仅是因为该政体尚未完全确立。

在关于极权政府的事实性了解上，新的知识来源仍然匮乏且不可靠。相反，过去十五年间，针对各类新型独裁政权（无论是否极权）的研究则有了巨大进展。尤其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研究。如今已有大量著作探究该主题，成为深入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石，我亦竭力据此更新了旧版书目。（第二版平装本未附文献）我刻意排除的一种文献，就是二战后纳粹将领及高官出版的大量回忆录（这类辩护性著作缺乏诚实性，固然可以理解，也不应因此将其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但这些回忆录对历史真相及其作者自身在事件中扮演角色的认知缺失，着实令人震惊，使其除却某种心理趣味外毫无价值。）

二

就证据而言，在本书构思、撰写的早期阶段所遇到的阻碍，比合理预期的要少，

而在涉及纳粹与布尔什维克两种极权主义的材料方面亦是如此。极权主义研究文献中存在这样一种奇特现象：那些由同时代人撰写的早期“历史”著作，按学术规范本应因原始资料不完善及情感过度投入而难以成立，但它们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康拉德·海登的《希特勒传》与鲍里斯·苏瓦林的《斯大林传》这两部均创作于三十年代的传记，在某些方面比艾伦·布洛克和艾萨克·多伊彻的标准传记更为准确，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更具现实意义。这可能有多重原因，但其中一个确凿事实是：两部传记的文献资料往往印证并补充了长期以来通过重要叛逃者及其他目击者证词所知晓的内容。

说得稍微夸张些：我们并不需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可以知道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行，也知道这位据称“疯狂多疑”的人竟决定信任希特勒²。至于后一点，确实没有比这份信任更能证明斯大林并非疯癫的证据了；他对所有意图或准备除掉的人都怀有正当的猜疑，而这些人几乎涵盖了党政高层的所有成员；他自然信任希特勒，因为并不想害他。至于前一点，赫鲁晓夫那些惊人的坦白所掩盖的东西比揭露的更多（很明显，由于他本人及其听众都牵涉其中），因此不幸的结果是，在许多人眼中（当然也包括学者们，他们怀有对官方史料的专业偏爱），斯大林体制的巨大罪行被最小化。毕竟，该体制罪行不仅限于诽谤和谋杀成千上百的政界和文坛名流（这些人死后尚可“平反”），更在于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没有人，甚至斯大林本人，都不会怀疑他们有“反革命”活动。赫鲁晓夫正是通过勉强承认部分罪行，才掩盖了整个政权的罪恶本质。而当代俄罗斯知识青年几乎没有公开反抗，正是这种粉饰与现任统治者的伪善，使他们全都在斯大林治下受到训练、得到高升。因为他们对“大清洗、流放并灭绝整个民族”的真相了如指掌[5]。此外，赫鲁晓夫用斯大林的疯狂猜疑，去解释他勉强承认的那些罪行，掩盖了极权恐怖最本质的特征：一旦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全部被消灭，极权统治者确信自己再也无需惧怕，这种恐怖便会肆意蔓延。这种现象在俄罗斯的发展历程中尤为显著。斯大林发动大规模清洗并非始于1928年，那时他承认“我们有内部敌人”，且确实仍有恐惧的理由：他清楚布哈林将他比成吉思汗，并认定斯大林的政策“正把国家引向饥荒、毁灭和警察统治”[6]。事实上确实如此，在1934年当所有昔日反对者都“承认错误”后，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他称之为“胜利者的大会”）宣称：“本次大会……已无须再作证明，似乎也无人可再对抗”[7]。无论对苏联还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而言，二十大既具有轰动性，又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这点毋庸置疑。但其真正重要的仍在于政治层面；斯大林逝世后官方渠道披露先前发生的事

² 译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件，不应被误为是在揭露真相。

就我们对斯大林时期的认知而言，费因索德此前出版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至今仍是至关重要的文献。令人遗憾的是，这批最初的随机选编材料至今尚未得到更全面的出版。从费因索德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关于斯大林二十年代中期争夺权力的历史阶段仍有大量待发掘的内容：如今我们已知晓党的处境何其脆弱[8]，这不仅因为全国弥漫着公开反对的情绪，更因党内腐败与酗酒现象猖獗；几乎所有要求放宽政策的呼声都伴随着赤裸裸的反犹主义[9]；而自 1928 年起推进的集体化与打土豪运动，实际上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连同人民与政府之间初现的和解态势[10]；这些措施遭到了整个农民阶级的团结抵制，他们认定“宁愿不出生也不加入集体农庄”[11]，拒绝被划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以对抗富农[12]，坐在那儿的人比这些富农更可恶，满脑子只想着如何迫害人民[13]；城市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工人拒绝与党控制的工会合作。并称管理层为“饱食终日的恶魔”、“虚伪的斜眼鬼”之类[14]。

费因索德正确指出，这些文件不仅清晰揭示了“大众的普遍不满”，更表明当时缺乏针对整个政权的“充分组织化的反对力量”。但他未能察觉，而我在看来同样有证据支持的情况是，当时确实存在着明显替代斯大林夺权及将一党专政转化为绝对统治的可能方案，即斯大林推行的是列宁开创的新经济政策[15]。此外，1928 年斯大林在几乎完全掌控党的情况下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采取的措施，证明将阶级转化为群众并随之消除所有群体凝聚力，是实现绝对统治的必要条件。

有关斯大林自 1929 年起那段无可争议的统治时期，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记录基本印证了先前那些证据不足的史料所揭示的内容。即便档案中存在某些奇怪的缺漏，尤其是涉及统计数据的部分，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这种缺失恰恰证明，斯大林政权在这一领域与其他方面同样残酷地贯彻着一致性原则：凡是与官方虚构数据（包括粮食产量、犯罪率、真实“反革命”活动发生率，这区别于后来捏造的阴谋论）不一致的，均被视为不存在的事实。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极权主义对事实与现实的蔑视：所有此类数据并非从广袤疆域四面八方汇集至莫斯科，而是先通过真理报、消息报或其他官方媒体发布，再由各地自行解读。苏联每个地区、每个区县接收官方虚构统计数据的方式，与接收五年计划分配的虚构生产指标如出一辙[16]。

我将简要列举几个更引人注目的要点，这些要点此前只能靠猜测，如今却有文献佐证。我们始终有所怀疑，但现在确知该政权从未“铁板一块”，而是“有意识地围绕着重叠、重复和并行职能构建”，这种怪诞的无定形结构，正是依靠纳粹德国相同的元首原则（所谓的“个人崇拜”）维系着[17]；政府行政部门的实际掌权者并非政党而是警察，其“行动活动并未通过党内渠道进行规范”[18]；该政权屠

杀的数百万完全无辜者，用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正是“客观敌人”，他们深知自己实为“无辜的罪人”[19]；正是这一新类型的人，区别于早期真正的政权敌人（如谋杀政府官员者、纵火犯或土匪），他们反应模式与我们熟知的纳粹恐怖受害者行为模式中“完全被动”[20]一样。大清洗期间，“相互告发的洪流”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祉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与它强化极权统治的效力同样毋庸置疑。但直到现在我们才知晓斯大林是如何蓄意启动这“不祥的告发链条”的[21]，当他在1936年7月29日正式宣告：“在当前形势下，每个布尔什维克不可剥夺的品质就是，无论党的敌人伪装得多么巧妙，都有能力识别出来”[22]。正如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实质上是将“你应杀人”的诫命强加于纳粹党精英，而斯大林的训令则规定：“你应作伪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全体成员行为的准则³。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恐怖统治，不过是工业化与经济进步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人们会怀疑这种说法到底包含多少真相，但只需通过对某特定地区实际状况与事件进程的初步考察[23]，这些怀疑就会彻底消除。恐怖统治从未产生成果。相关文件显示，去富农化、集体化和大清洗的后果既非进步也非快速工业化，而是饥荒、粮食生产混乱和人口锐减。其后果是农业陷入永久性危机，人口增长停滞，西伯利亚腹地未能开发和殖民化。此外，正如斯摩棱斯克档案所详细阐述的，斯大林的统治手段成功摧毁了十月革命后国家积累的任何专业能力和技术知识。所有这些加起来，确实构成了难以置信的“高昂代价”，而且不仅仅是造成苦难而已，这种代价是为了给一部分连“政治文盲”都算不上的人[24]，打开在党与政府官僚系统中职业升迁的机会。事实的真相是，极权统治的代价如此高昂，无论是德国和苏联都尚未完全偿还。

三

我先前曾提到斯大林死后随之而来的去极权化进程。在1958年，我尚未确定这种局势的“解冻”是否是一种暂时的放松，是否仅是继任者危机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极权控制的大幅放松颇为相似。即便在今天，我们仍无法断言这一进程是否最终且不可逆转，但它显然已不能再被称为临时或暂时的。无论人们如何解读1953年以来苏联政策那条令人困惑的曲折轨迹，但不可否认的是：庞大的警察帝国已被瓦解，绝大多数集中营已解散，针对“客观敌人”的新清洗行动未再启动，新“集体领导层”成员间的矛盾现通过降职和驱逐出莫斯科解决，而非公审、逼供和暗杀。毋庸置疑，斯大林死后新统治者采用的手段仍紧密遵循列宁

³ 译者注：这是阿伦特对纳粹诫命和斯大林训令一种反讽的表达。

逝世后斯大林确立的模式：一个名为“集体领导”的三头政治集团再度出现，这个术语由斯大林于1925年首创。历经四年权谋角逐后，1929年斯大林政变的剧本重演：赫鲁晓夫于1957年夺取了权力。严格来说，赫鲁晓夫的政变手法与其已故且遭唾弃的导师如出一辙。他同样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才能在党内层级中夺取权力，其利用朱可夫元帅和军队支持的方式，恰似斯大林三十年前在权力继承斗争中操纵秘密警察的关系手段[25]。正如斯大林当年那样，在政变后最高权力仍掌握在党手中而非警察机构，因此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到1957年底，苏联共产党已在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占据了无可争议的至高地位”[26]；正如斯大林曾毫不犹豫地清洗警察干部并清除其首脑，赫鲁晓夫在党内斗争后，也通过将朱可夫逐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及党中央委员会来巩固权力，这是他在政变后当选的职位，以及他作为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职位。

诚然，当赫鲁晓夫向朱可夫寻求支持时，军队对警察的压倒性优势已是苏联既成事实。这是警察帝国瓦解后的必然结果，因为该帝国曾掌控苏联大部分工业、矿产及房地产，其统治权被管理集团继承，而这些管理者突然发现自己得以摆脱最严峻的经济竞争者。军队自动获得的优势更具有决定意义；它现在完全垄断了用于解决党内冲突的暴力手段。赫鲁晓夫比他的同僚们更迅速地认识到他们共同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这足见其精明之处。但无论其动机如何，权力博弈中重心从警察转向军队的转变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诚然，秘密警察凌驾于军方机构是许多暴政的标志，不仅限于极权主义政权；然而在极权政府中，警察力量的优势不仅满足了镇压国内民众的需求，更契合其全球统治的意识形态主张。因为显然，那些将整个地球视为未来领土的人，必然强化国内暴力机构，并以警察手段和人员统治征服的领土，而非依靠军队。纳粹便将其党卫军部队，本质上是警察力量，用于统治乃至征服外国领土，其终极目标是在党卫军领导下实现军队与警察的合流。

此外，这种权力平衡之转变的重要意义，早在武力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情境就已显露无遗。这场血腥镇压虽残酷而有效，却是由正规军而非警察部队实施的，因此绝非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解决方案。尽管军事行动后处决了领导人并监禁数千人，却未进行大规模驱逐民众；事实上，当局根本没有试图清空该国人口。正因这是军事行动而非警察行动，苏联得以向战败国提供足够援助，避免革命次年出现大规模饥荒和经济全面崩溃。若处在类似境况，斯大林绝不可能采取如此宽容的政策。

最明显的迹象表明，苏联已不能再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严格意义上的转折点，当然是过去十年间艺术领域惊人迅捷且丰硕的复苏。诚然，为平反斯大林、遏制学生、作家和艺术家日益高涨的言论思想自由诉求所做的努力屡屡重演，但这些举措均未取得显著成效，若不重新建立全面的恐怖统治和警察统治，它们也很难成功。

毋庸置疑，苏联人民被剥夺了所有形式的政治自由，不仅是结社自由，更包括思想、言论及公开表达的自由。表面看似万物依旧，实则一切已然改变。斯大林逝世时，作家与艺术家的抽屉里空空如也；而今却存在着整整一部以手稿形式流传的文学，以及各种现代绘画作品在画室里被反复尝试，即便未曾展出也逐渐为人所知。这并非要淡化专制审查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差异，而是要强调：地下文学与文学缺失的区别，恰如一与零的差距。

此外，知识分子反对派成员能够接受审判（尽管不是公开审判），能在法庭上发声并获得法庭外的支持，拒绝认罪而坚持无罪抗辩，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我们面对的已不再是绝对统治。1966年2月，因在国外发表无法在苏联出版的作品而受审的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苦役，无论以宪政政府的何种司法标准衡量，此事都令人发指；但他们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不可能被遗忘。他们并未消失在极权统治者反对者准备的遗忘深渊。鲜为人知却或许更具说服力的是：赫鲁晓夫本人试图逆转去极权化进程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最终彻底失败。1957年，他提出新的《反社会寄生虫法》，该法案将使政权得以重新实施大规模驱逐、恢复大规模奴役劳动，并对绝对统治而言最为关键的是，掀起新一轮大规模告发浪潮；因为“寄生虫”将由民众在群众大会上自行指认。然而该“法律”遭到苏联法学家的反对，甚至未及实施便被搁置[27]。换言之，苏联人民从极权统治的噩梦中挣脱，却陷入一党专政带来的多重苦难、危险与不公；尽管这种现代暴政确实缺乏宪政保障，“即便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苏联所有权力终究不具合法性”[28]，该国随时可能在无重大动荡的情况下重陷极权主义。但同样确凿的是：我试图剖析其构成要素与历史渊源的这种最恐怖的新型政权，随着斯大林之死在俄罗斯终结了，正如随着希特勒之死极权主义在德国终结宣告终结。

本书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构成要素，而其在德国或苏联的后续发展虽与之相关，却不构成本书核心议题。仅在有助于阐明此前事件的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因此，与我们讨论相关的并不是斯大林死后的时期，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统治时期。而这1945至1953年的八年岁月，既印证又延伸了，既未违背也未超越，在三十年代中期显现的种种迹象之上，同时又增添了新的元素。胜利后的种种事件，苏联在战争时期暂时放松管制后为重申绝对统治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在卫星国推行极权统治的种种手段，都符合我们所熟知的游戏规则。卫星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始于人民阵线策略与虚假议会制度，迅速发展为公开建立一党专政，先前被容忍的政党领袖和成员被清算，接下来进入末期阶段：莫斯科（无论理由是否正当）猜忌的本土共产党领袖们遭到残酷诬陷，并在党内最腐败卑劣的分子的统治下遭受公审、酷刑和杀害，这些坏份子本质上并非共产党员而是莫斯科代理人。莫斯科仿佛在极

度仓促中重演了十月革命直至极权独裁诞生的所有阶段。因此这段历史虽惨不忍睹，其本身却缺乏独特性且模式雷同：从波罗的海至亚得里亚海沿岸所有卫星国几乎同时上演着相同剧本。唯有未纳入卫星体系的地区才存在差异。波罗的海三国被直接并入苏联，境遇远比卫星国悲惨：超过五十万民众被驱逐出这三个小国，“大批俄罗斯移民涌入”，致使原住民在故土沦为少数族群[29]。反观东德，在柏林墙修建后才逐渐被纳入卫星国体系，此前它更像被占领区，由傀儡政权统治。

在我们的语境中，苏联的发展，特别是1948年之后的发展，当时的日丹诺夫神秘死亡与“列宁格勒事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大清洗后首次，斯大林处决了大批高级及最高级官员，我们确知此举本是新一轮全国性清洗的开端。若非斯大林之死横亘其中，这场清洗本将由“医生阴谋案”引爆。一群以犹太裔为主的医师被指控策划“消灭苏联领导干部”[30]。1948年至1949年1月间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随着“医生阴谋案”被揭露，其与三十年代大清洗前夕的准备工作有着惊人相似之处：日丹诺夫之死和列宁格勒清洗事件，恰与1934年基洛夫同样神秘的死亡相呼应，该事件立即引发了针对“所有重新活跃的旧反对派分子”的预备性清洗[31]。而且，针对医生们的荒谬指控，即声称他们蓄意杀害苏联各地的领导干部。该指控内容本身，必然令所有熟悉斯大林惯用的手法的人心生恐惧：他惯于指控虚构的敌人犯下自己即将实施的罪行。（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斯大林指控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勾结，而当时他正考虑与纳粹结盟。）显然，1952年的斯大林亲信们比三十年代更清楚其言论的真实含义，指控措辞本身就足以令政权高层官员们惊惶失措。这种恐慌或许最能合理解释斯大林之死、围绕死亡的神秘局势，以及在继任危机的头几个月中，党高层的迅速封锁，以及臭名昭著的斗争与阴谋。尽管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细节知之甚少，但现有证据已足以支撑我最初的信念：诸如大清洗这类“破坏行动”并非孤立事件，也不是特殊形势下政权的过度反应，而是恐怖统治的制度化产物，除非政权性质本身发生改变，否则这类清洗必然周期性地重演。

斯大林在生命最后几年策划的这次大清洗中，最戏剧性的新元素是意识形态的决定性转变，即引入了犹太世界阴谋论。多年来，这一转变的铺垫已在卫星国的多次审判中精心完成，如匈牙利的拉伊克审判、罗马尼亚的安娜·鲍克尔事件，以及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审判。在这些预备行动中，高级党官员因其“犹太资产阶级”而被特别指控，并被指控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指控逐渐演变为牵连那些众所周知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特别是美国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以此暗示：所有犹太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雇佣军”[32]。犹太复国主义的“罪行”本身当然并非新鲜事，但随着运动推进并开始聚焦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另一重大转变悄然发生：犹太人此时被指控的罪

名已从犹太复国主义转变为“世界主义”，而围绕这一口号形成的指控模式，愈发紧密地贴合纳粹关于犹太世界阴谋的论调，即《锡安长老会》式的阴谋论。此时人们才惊觉纳粹意识形态的这一支柱思想对斯大林产生了何等深远的影响，该影响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初便已显露端倪。这当然部分原因是该理论在苏联及所有卫星国（反犹情绪普遍蔓延之地）显而易见的宣传价值。在这些地方，反犹宣传总是会得到巨大的民意支持。但部分原因也在于这种虚构的世界阴谋论，比华尔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更契合其意识形态的背景。公开且毫不掩饰地采纳了举世皆知的最明显的纳粹标志，这是斯大林在绝对统治中对他晚期同僚兼对手的最后致敬。尽管令斯大林深感遗憾的是，双方始终未能达成持久协议。

斯大林与希特勒一样，都死于未完成的恐怖事业中途。而此事发生之后，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以及它试图理解并接受的种种事件，至少暂时告一段落。

汉娜·阿伦特

1966 年 6 月

序言注释

- [1] 毫无疑问，极权政府尽管公然犯罪，却仍能获得大众支持这一事实令人深感不安。因此，学者和政治家们常常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前者相信宣传和洗脑的魔力，后者则简单地予以否认，例如阿登纳就曾多次如此。最近由安全部发布的二战期间（1939 至 1944 年）德国公众舆论秘密报告集《党卫军情报服务》（摘自《帝国情报：1939-1944 年党卫军安全局秘密态势报告选编》，海因茨·博贝拉赫编，新维德与柏林，1965 年）对此揭示颇多。该书首先表明，民众对所有所谓秘密（波兰犹太人大屠杀、进攻俄罗斯的准备等）都了如指掌；其次，“宣传受害者仍能形成独立见解的程度”（第 8-19 页）。然而关键在于，这丝毫未削弱民众对希特勒政权的普遍支持。显然，对极权主义的群体性支持既非源于无知，亦非源于洗脑。
- [2] 自始以来，文献材料的调查与出版始终以追查犯罪活动为导向，其筛选通常旨在起诉战争罪犯。结果导致大量极具价值的材料被忽视。注 1 所提及的著作正是这一惯例中令人欣喜的例外。
- [3] 参见梅尔·费恩索德《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剑桥，1958 年，第 210、306、365 页等。

[4] 同上，73、93 页。

[5] 除第一五个五年计划（1928-1933 年）约九百万至一千二百万受害者外，还须加上大清洗的受害者（约三百万人）被处决，另有五百万至九百万被逮捕并流放。（参见罗伯特·C·塔克的重要导言《斯大林、布哈林与阴谋史观》，载于 1938 年莫斯科审判记录新编《大清洗》的引言）审判，纽约，1965 年。但所有这些估计似乎都低于实际数字。它们未列入大规模的处决事件，直到这些事件在直到德国占领军在文尼察市发现一处集体墓地埋葬着 1937 至 1938 年间被处决的数千具遗体时才为人所知。（参见约翰·A·阿姆斯特朗《极权主义的政治：1934 年至今的苏联共产党》，纽约，1961 年，第 65 页及后续内容）毋庸置疑，这最近的发现使纳粹和布尔什维克体制看起来比以往更像是同一模式的变体，斯大林时代的大规模屠杀在当前反对派中的核心地位，在辛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该案的关键内容。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中可见一斑，《纽约时报杂志》曾于 1966 年 4 月 17 日刊载该案关键部分内容，我曾援引其中段落。

[6] 塔克，同上，第 7-18 页。

[7] 引自梅尔·费因索德《俄罗斯如何被统治》，剑桥，1959 年，第 516 页。-阿布杜拉赫曼·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中，该书于 1953 年在伦敦以乌拉洛夫为笔名出版）讲述了 1936 年第一次公审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据称布哈林在会上指控斯大林将列宁的政党变成警察国家，并获得了多数支持。1936 年首次公审后召开的秘密会议，据称布哈林在会上指控斯大林将列宁的政党变成警察国家，并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同志支持，即超过了三分之一的成员。布哈林在中央委员会中据称获得强力支持，这个说法听起来不太可信；但即便属实，考虑到这次会议召开时大清洗已全面展开的事实，摇摆不定，故事并未表明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恰恰相反。正如费因索德所言，真相似乎是“广泛的群众不满”相当普遍，尤其在农民中，且直至 1928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时罢工并不罕见”，但此类“对抗情绪从未以任何形式凝聚成焦点，对政权的构成组织性挑战”，如果它们曾存在的话，到 1929 或 1930 年“所有组织性替代方案都已从舞台上消失”。（参见《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第 449 页起）

[8] 正如费因索德在同上第 38 页所言：“令人惊奇的不仅在于党最终获胜，更在于它竟能存活下来。”

[9] 同上，第 49 页及以下。一份 1929 年的报告记载了会议期间爆发的暴力反犹事件；共青团成员“在听众席保持沉默……给人的印象令人感觉他们完全认

同反犹言论”（第 445 页）。

- [10] 所有 1926 年的报告均显示“所谓反革命暴动显著减少，这标志着政权与农民阶层达成的临时休战”。相较于 1926 年，1929-1930 年的报告“读起来宛如烈火战场的战报”（第 177 页）。
- [11] 同上，第 252 页及后续。
- [12] 同上，尤其见第 240 页脚注及第 446 页脚注。
- [13] 同上。所有此类陈述均引自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参见第 248 页及后续页。但值得注意的是，自 1934 年大清洗开始后，此类言论显著减少。
- [14] 同上，第 310 页。
- [15] 这种替代方案在文献中通常被忽视，原因在于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可以理解但历史依据不足的信念，即认为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发展过程大致是平顺的。诚然，斯大林几乎总是使用列宁主义的术语，因此有时看起来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似乎在于斯大林性格的残暴或“疯狂”程度。无论这种观点是否成立，斯大林方面有意识的诡计，正如塔克在前述著作第十六页所正确指出的，事实真相是斯大林为这些古老的列宁主义概念注入了崭新的、鲜明的斯大林主义内涵……其核心特征在于对阴谋论的极度强调，这种强调完全背离了列宁主义，却被奉为当代时代的标志。
- [16] 参见费因索德，同上，尤其第 365 页及后续内容。
- [17] 同上，第 93 页及第 71 页：颇具特征的是，各级信息惯常强调的是“对斯大林同志承担的义务”，而非对政权、政党或国家。或许没有什么比伊利亚·爱伦堡等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今日为辩解过往或单纯陈述大清洗时期真实想法所言更具说服力地揭示了两种体制的相似性。“斯大林对共产党人、苏联知识分子实施的无谓暴力一无所知”他们向斯大林隐瞒了此事，但愿有人能告诉斯大林，最终罪魁祸首根本不是斯大林，而是当地警察局长。
- [18] 同上，第 166 页。
- [19] 这句话摘自 1936 年某“阶级异己分子”的申诉：“我不想成为无罪之罪人”（第 229 页）。
- [20] 一份 1931 年的古普加报告引人深思，它着重描述了这种新出现的“完全被动性”：即针对无辜民众的随机恐怖行径所催生的可怕麻木状态。报告提及与先前逮捕政权敌人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被捕者由两名民兵押解”，而大规模逮捕时“一名民兵即可押解人群，被捕者平静行走无人逃窜”（248 页）。
- [21] 同上，第 135 页。
- [22] 同上，第 57-58 页。对于这些群众性揭发中日益高涨的歇斯底里情绪，尤其

可参见第 222 页、第 229 页及后续内容，以及第 235 页那个精彩的故事：我们从中得知某位同志竟认为“斯大林同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采取了和解态度”，当时这等于直接被开除党籍。但事与愿违。下一位发言者指责这位试图超越斯大林的人“政治不忠诚”，此人随即“坦白”了自己的错误。

- [23] 奇怪的是，费恩索德本人仍从大量指向相反方向的证据中得出此类结论。参见其最后一章，尤其是第 453 页！更奇怪的是，如此多该领域的学者竟共同误读了事实证据。诚然，他们中几乎无人会在艾萨克·德斯泰尔的传记中，对斯大林的微妙辩护中已有所提及，但许多人仍坚持认为“斯大林的残酷手段是通向建立新的力量平衡”（阿姆斯特朗，同上，第 64 页），旨在提供“一种对列宁主义神话中某些基本矛盾的残酷却一贯的解决方式”（理查德·洛温塔尔在其极具价值的著作《世界共产主义：一种世俗信仰的瓦解》中指出，纽约，1964 年，第 42 页）。这种马克思主义遗毒几乎无处不在，仅有少数例外，例如理查德·C·塔克（同上，第 42 页）塔克先生明确指出，这场实质上摧毁苏联社会的浩劫，苏联若没有大清洗，其体制本会更完善，也更能应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考验。”塔克先生认为这驳斥了我对极权主义的“印象”，而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不稳定性确实是绝对统治的功能性要求，这种统治建立在意识形态虚构之上，并预设了一个运动（区别于政党）已夺取政权。该体系的标志在于：实质性权力（即国家的物质力量与福祉）始终处于为了组织力量而牺牲，正如所有事实真相都为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要求所牺牲。显然，在物质力量与组织力量的较量中，或在事实与虚构的对抗里，后者终将败北，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罗斯和德国都曾上演。但这绝非低估极权运动力量的理由。正是永久性动荡的恐怖助推了卫星国体系的建立，而苏联当前的稳定状态（其去极权化进程）一方面极大增强了其实际实力，另一方面却导致其丧失了对卫星国的控制。

- [24] 参见关于 1929 年清除“反动教授”运动的有趣细节（费恩索德，同上，第 345-355 页），该运动在党、共青团成员及学生群体的抗议下展开，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替换优秀的无党派教授；随后新成立的委员会自然迅速报告称“学生群体中存在大量阶级异己份子”。众所周知，大清洗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为年轻一代开辟职业道路。

- [25] 阿姆斯特朗在前引著作第 319 页指出，朱可夫元帅介入党内斗争的重要性已被严重夸大，并认为赫鲁晓夫无需军事干预便取得了胜利，因为其得到了党的机构支持。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准确。但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许多外国观察家因军队支持赫鲁晓夫对抗党内机构的作用，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军队

将以牺牲党的权力为代价持续扩张，仿佛苏联即将从党的专政转变为军事独裁统治。

[26] 同上，第 320 页。

[27] 同上，第 325 页。

[28] 同上，第 339 页。

[29] 参见 V·斯坦利·瓦迪斯《波罗的海诸国在苏联境内的处境》，载于《外交事务》，1966 年 4 月。

[30] 阿姆斯特朗，同上，第 235 页及后续。

[31] 费恩索德，同上，第 56 页及后续。

[32] 阿姆斯特朗，同上，第 236 页及后续。

本书导读⁴

唯有在某些无可挽回之事发生后，我们才能尝试去追溯其历史。事件照亮它自身的过去；但它绝对无法从这过去中推导出来。

——汉娜·阿伦特《理解与政治》

1945年，在逐渐消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中，古老的欧洲大陆满目疮痍、遍地尸骸，而此时的阿伦特则身处大西洋彼岸，正开始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

六年后，本书在美国正式出版，很快为阿伦特带来世界性的声誉。之后，阿伦特又写出了《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等更具理论系统性的经典著作。不过阿伦特之所以是阿伦特，更是因为《极权主义的起源》，而不是《人的条件》。

《人的条件》让阿伦特跻身现代重要思想家之列，但《极权主义的起源》才真正使阿伦特独一无二。

原因在于，虽然后世对极权不乏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性思考，可是像阿伦特这样远溯十九世纪、真正深入具体历史经验的著作，可谓绝无仅有。在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阿伦特思想中最无可撼动的洞见，也就是极权危险在种种人类实际行为（而不仅仅是观念层面）中的展现形式，而她后来的众多著作、众多重要观点，也都需要在本书中寻回真正的经验基础与问题意识。对阿伦特有兴趣的读者，会在本书中看到最具现实意义的阿伦特。

阿伦特的极权分析最终指向现代人的某种核心经验，这就是失根无依的孤弃之感，同时极权宣传所建立的无所不包的虚构世界、极权支配所制造的极端非人的集中营处境，也都会让读者震撼不已。然而，笔者认为本书更大的价值在于，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某些看起来不那么危险的现象，其实也与极权存在某种相关性。换言之，它像一口巨钟，从最深的深渊底部，敲响我们对当前平和舒适生活的警惕。

不过，《极权主义的起源》并不容易阅读，这不完全是阿伦特本人独特的论述风格所致，更是与本书所要面对的复杂历史经验、所要表达的复杂想法有关。本导读希望能为读者稍稍减轻这种不易读，因此尝试对本书的写作过程与整体结构进行分析。

⁴ 该导读由译者添加，由台湾师范大学李雨钟博士撰写，原文出自《读者导读-如何辨识我们时代的极权主义元素》，商周出版社，2022。若读者对原文感兴趣，可发电邮至 taiyizhenren2025@gmail.com

计划之外的极权主义：阿伦特的写作失误？

先必须指出，本书书名已成为一件有趣的公案，实际上它主要探讨的并非极权主义的“起源”，而是形成它的多种历史元素，甚至原本连“极权主义”这个字眼都未曾出现。

且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 1920 年代初，当时的阿伦特还是个才华横溢的哲学系大学生，她辗转于马堡大学、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德国哲学重镇，历经海德格与雅斯贝尔这两大现象学宗师的指导。当时她还沉浸在神学与哲学当中，完全对政治不感兴趣。真正使她转向政治的，是她自身犹太身份的觉醒，是对犹太人危险处境的认识，而最初启蒙她认清现实政治的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此而言，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后来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会从反犹主义写起，这是阿伦特自己的第一手经验。1933 年，纳粹上台不久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希特勒开始加紧迫害犹太人的步伐。阿伦特不像当时许多犹太人那样天真地相信事情总会好转，她毅然逃离德国，流亡到巴黎，成为一个无国籍之人。

在巴黎，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布吕歇尔，他是阿伦特得以写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最大功臣。不同于阿伦特的学院派出身，布吕歇尔是个自学成才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曾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异议份子，他对于各种政治形势与具体现象，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想法。激情四射的布吕歇尔深深影响了阿伦特对现实政治的看法，而这些养分都融入了本书细致的政治分析当中，所以阿伦特后来会称之为“我们的那本书”。

在二战爆发的最初岁月，阿伦特也曾一度进入管理还较为宽松的拘留营。所幸在形势变得更糟之前，她果断趁隙逃脱，与布吕歇尔相互扶持、共度难关，最终惊险搭上前往美国的轮船。这绝不是一场轻松的逃离，同期逃亡的班雅明，就阴差阳错地魂断比利牛斯山，而许多曾跟阿伦特同在拘留营的犹太人，后来也都被转送进了集中营。

阿伦特与布吕歇尔于 1941 年逃离欧洲，开始在新大陆的新生活。虽然艰难、不安稳，但仍大体健康、积极，直到 1943 年开始有惊人的消息从欧洲传来：“这实在就像是一个万丈深渊裂开了。因为我们总是怀抱着希望，相信其他一切事物都终究会从政治上获得改正，一切事情都会重回正轨。但这却不会。这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理解集 1930-1954》，阿伦特）

这个万丈深渊般的消息就是希特勒启动的所谓“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是大量灭绝犹太人的“死亡集中营”。虽然阿伦特在逃离欧洲前，也曾短暂在拘留营待过，并果断而幸运地趁乱逃出，但这跟后来的灭绝集中营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深渊让

阿伦特深深感受到时代的“重负”，她决心要去面对、理解这一“重负”，而分析的起点也很自然地始于犹太问题。实际上在 1940 年代早期，阿伦特已针对犹太问题写出了不少深刻、犀利的文章，如今正是把它们与时代灾难联系起来的时候了。

在阿伦特 1946 年左右提供给出版商的写作大纲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原本将本书称作《耻辱的元素：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或《地狱的三根支柱》），并认为这三种元素最后的混合体就是种族帝国主义（race-imperialism），而纳粹主义则代表着它的首个纯粹模型；换言之，这是一个最终解释纳粹主义如何发生的架构。我们今天看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由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三部分构成，其中反犹太主义的内容大体与 1946 年版相当，帝国主义则是由原本的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合并而成，但对应极权主义的却只有种族帝国主义这一个章节而已。

实际上，最晚到 1946 年，阿伦特都尚未想要写一本关于极权主义的书，书名中也根本没有“极权主义”的字眼，而当时她实际上已经写完了反犹太主义与帝国主义部分的大部分篇章。使这一想法改变的直接动因是，阿伦特约在 1947 年左右，开始考虑纳入对斯大林统治的苏联的研究，但苏联很明显不适合用种族帝国主义来描述。于是阿伦特才使用了极权主义来同时指涉纳粹德国与斯大林苏联，并大大扩增了它的篇幅，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三部分。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按照 1946 年的大纲，那么从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最终结合成种族帝国主义，这一分析线索看起来是比较顺理成章的，若称之为“种族帝国主义的起源”，也可谓恰当。然而 1947 年之后，当最后一部分转变成同时囊括纳粹德国与斯大林苏联的极权主义，这前后部分的逻辑关联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最明显的问题是，在反犹太主义与帝国主义（包括种族主义）部分，基本上是以中、西欧为核心进行探讨，而很少触及东欧，如此一来，从前两部分推导到包含了俄国的第三部分，其前提条件就不太完备。

更有甚者，虽然阿伦特自己很清楚这一问题，但她的处理方式不是重新调整前两部分，使之与第三部分的关联更为完善，反而是开始有意删去具有前后因果关系的文句，更明确地切断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

这样一来，读者将要面临的困惑也就显而易见了。冲着“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名头，读者无疑会期待本书将为我们解释极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源流，然而一进入反犹太主义部分，我们就会有点迷失，甚至到了帝国主义部分，与极权主义的关联性也仍然遮遮掩掩。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两部分要解释的原本是种族帝国主义的起源，而非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也不希望读者会认为这两部分的分析能够解释极权主义的起源。

上述问题在本书刚出版时，就引发了不少评论者的批评，其中还包括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阿伦特的回应是，这恰恰是她在思考极权现象时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方法：

于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某个我不想要保存而是相反要致力于摧毁的事物（极权主义），要如何进行历史书写。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造成了本书缺乏统一性的指责。我所做的是探索极权主义的主要元素，并在历史范畴中予以分析。因此，本书并不真的处理极权主义的“起源”（如书名不幸宣称的那样），而是对那些结晶成极权主义的元素，进行历史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之后，则是对极权运动及极权支配本身的基本结构进行分析。（《理解集 1930-1954》阿伦特）

上述解释应当作为我们理解本书整体结构的核心指引。在阿伦特看来，历史书写一般是为了保存某些经验与记忆，使之不被遗忘，而对历史上的起源因果进行分析解释，也正当化了该历史现象，使其成为某种必然出现的结果。阿伦特既不想保存极权，也不想正当化极权，将其视作客观出现的必然结果，因此她探索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起源，不是完整的因果解释链，而是在极权现象出现之前的某些元素，这些元素并不必然会造成极权，而是在某种条件下忽然结晶成了极权结构。

阿伦特在此使用了她多次援引的一个化学比喻，这其中有两个关键要素：第一，各元素不等同于它们后来结晶成的结晶体，两者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差异与断裂；第二，这些元素并不必然会同结晶成极权，仅仅是在某种条件下忽然发生结晶反应。这一比喻也呼应了本导读开头引用的那一段话：阿伦特正是在极权主义这一骇人听闻却无可挽回的事件发生之后，才开始去追溯其历史，正是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才得以看到那些后来结晶成极权的潜在元素，但同时，我们并不能从这些元素直接推导出极权现象。

实际上，阿伦特也是在进入极权部分的写作时，才真正意识到极权与前极权现象之间的根本性断裂，意识到极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体制。“极权主义”一词，本是冷战背景下的流行用语，但阿伦特为它注入了至今仍未被我们充分消化的思想深度，让它触及我们时代的核心困境。《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写作，乃是为了“理解”我们时代的重负，但阿伦特最终得到的不是一个完满解释的确定结果，而是一个向所有人提出的无止境的叩问。

我们很难说阿伦特是否一开始就自觉采取了这种结晶方法论来写这本书。或许如前面所述，阿伦特原本其实是打算按照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到种族帝国主义的历史线索，更为循序渐进地探讨纳粹的发生源流。但是后来用极权主义替换了种族帝国主义，就发生了前后部分不对称的问题。然而这一写作上的“失误”，却被阿伦特转化成思想方法论上的一项杰出成果。这种在写作过程中被迫发

明出来的方法论，实为阿伦特在理解极权这前所未有之现象的艰难中，激发出来的思想火花。

追溯极权的元素与催化剂：从帝国主义到反犹主义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既然从这些历史元素不必然会产生出极权，去探索、理解它们还有什么意义呢？阿伦特曾在一些地方暗示我们，在极权政府倒台之后，那些结晶成极权的元素本身却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我们共处的现代世界当中。因此以下两点颇为关键：第一，这些元素本身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很可能是实际存在于我们这个后极权时代的东西，我们需要学会去辨识它们；第二，极权作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灾难性现象，它与现代世界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视之为过往之物，而是要不断思考、警惕它？

首先，究竟有哪些元素呢？若结合阿伦特早期的写作大纲与英国学者卡诺凡的说法，则结晶成极权主义的元素有：民族国家的崩解、为扩张而扩张、暴民以及种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元素基本上都出现在帝国主义部分，更确切地说，前三个元素的基本形成条件已在该部分的第一章，也就是本书第五章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中具备，而接下来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则进一步引入了种族主义这一元素。

就此而言，第五章几乎可视为本书前半部分的枢纽。它首先以英、法两大殖民强权为例，为我们呈现帝国主义那种为扩张而扩张的无限制过程，如何与殖民母国本身的民族国家结构发生冲突。在阿伦特的定义中，民族国家要以限定的领土范围、以同质化的统一人口为基础，从而建立实际代表人民主权的政府；当帝国主义扩张带来广大海外殖民领土时，就会面临要如何对待异文化、异族群的殖民地人民的难题，一旦对之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就会与母国的国族原则相冲突。与此同时，海外扩张的巨大经济利益吸引到广大资产阶级的投资，而由各阶级中的多余者所组成的暴民，则成为将母国大量多余资本输出到殖民地的主要人力。

然而阿伦特认为，在从传统民族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道鸿沟，这道鸿沟需要靠种族主义来填补。阿伦特首先区分了种族思想与种族主义，认为前者仅仅是一种观念，后者则是一种实践上的意识形态。第六章为我们广泛考察了英、法、德各国的种族思想渊源，而第七章则在欧洲列强殖民非洲的实际经验中，探讨种族主义的形成机制，并汇聚了第五章已呈现的三种元素，尤其是暴民元素，最终形成某种预示了极权统治的治理体制。

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看到未来会结晶成极权主义的四种元素（民族国家崩解、扩张、暴民、种族主义）已经齐备，然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这一殖民帝国主义的主角是英国，但英国后来却并没有产生极权。在此我们必须再对元素

结晶说进行一项重要补充，就是各元素要结晶成极权，还需要一种催化剂，这种催化剂就是反犹主义，也就是本书第一部分探讨的内容。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本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笔者之所以先绕过这部分，是因为阿伦特所分析的反犹主义，与人们的直观印象有所不同。阿伦特认为与纳粹极权有关的现代反犹主义，与欧洲基督教徒千百年来仇视、排挤犹太人的宗教式冲突并无直接关联，而是与犹太人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第五章的内容反过来能够为我们理解反犹主义提供更具体的历史背景。

“反犹主义”部分主要有两条线索，分别是第二章所讨论的政治反犹主义，与第三章所讨论的社会反犹主义，第四章则是以德雷福事件这个重要案例来汇聚上述两条线索。

所谓政治反犹主义几乎就是犹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史：首先是，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一部分犹太人开始因为早期民族国家的财政需求而发迹，成为享有特殊待遇的群体；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如第五章所述，资产阶级受到海外殖民利益的吸引，就取代了犹太人原本在国家商业活动中的位置，使犹太人群体丧失原本的实际功能。更重要的是，随着民族国家因帝国主义扩张而衰落，长期依托于国家机构保护的犹太人也成为仇恨的对象，成为暴民眼中的寄生虫、阴谋家，这就是政治上的反犹主义的成因。

至于第三章的社会反犹主义，则是本书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它的深入、精彩程度，与它在本书整体架构中的地位明显不成比例。犹太人在十九世纪逐渐获得政治上的平等解放之后，为了进入（上流）社会而形塑出某种犹太特性，换言之，已获得平等解放的犹太人，为了从碌碌众生中出人头地、跻身新贵，而将自身打造成“既是犹太人又不是犹太人”的“例外犹太人”，并由此获得猎奇上流社会的特惠入场券。

在整个“反犹主义”当中，都萦绕着阿伦特一种饱含恨意的念头：（部分）犹太人在逐渐获得政治平等的情况下，不是去争取赢得充分的平等权利，而是试图通过利用、乃至杜撰犹太群体的特殊性，来享有特权。这种被编造出来的犹太性，竟然充满种族色彩与阴谋论语言，它本身构成了纳粹种族主义的先驱与效仿对象。实际上唯有通过她对自身民族的这种批判性分析，我们才有办法理解她后来报导艾希曼审判时的真正立场。

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反犹主义”向来是有点尴尬的一部分，作为探讨极权之旅的开端，它似乎迟迟无法进入正题，叙事线索又有点跳来跳去。但是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读者需要注意“反犹主义”部分的独立价值，不能仅仅将其视作通向极权的一个起头桥梁而已。

实际上，“反犹主义”中无疑蕴含着阿伦特本人最切身的经验，因此对于关注阿伦特思想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宝库，而它与极权的松散关系实则反映出，阿伦特不想将它绑定在通向极权的历史必然道路上，而是想保留犹太人更多的行动可能。其中分析社会反犹主义的那一章，实际上是以深刻而辛辣的笔法来分析犹太人自身的行为与责任，在“政治正确”的今天，这实在是本书当中极富挑战性的一个文本。

无根困境：中东欧的泛运动与无国者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将本书三部分的关系重新理解为：催化剂的调制→各元素的汇集→极权结构的出现。下面我们再对这背后的论述线索，稍微做一点整理。

可以说，贯穿“反犹主义”与“帝国主义”两部分的客观历史线索，实为欧洲民族国家系统的衰败，而在犹太人处境与四大极权元素背后的深层结构则是“无根”(rootlessness)。阿伦特式的“无根”跟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它主要指人们未能在相对固定的空间里建立起共同世界，并在其中拥有自己的位置。民族国家结构本是为“扎根”提供条件的重要基础，然而当殖民强权不安于扎根，试图利用失根而多余的暴民来向外扩张时，就跟种族主义经验一拍即合；在阿伦特的界定中，种族主义恰恰也是无根的，因为“根”不应该扎在血缘妄想之中，而是应该扎在人力构建的共同世界当中。而长期失根、没有自身国家的犹太人，则在失去民族国家保护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陷入种族幻想，甚至迎合了犹太人秘密掌控世界的阴谋论传说，因此本就无根的犹太人就这样成为了汇聚各大元素的催化剂。

不过与这种无根的种族幻想直接呼应的，不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所分析的海外帝国主义，而是第八章所讨论的大陆帝国主义。大陆帝国主义主要发生在奥地利（别忘了希特勒可是奥地利人）与俄罗斯，分别发展为泛日耳曼运动与泛斯拉夫运动，实际上，它们正是极权主义的直系先驱。

作为海外帝国主义在欧洲内陆的对应物，大陆帝国主义吸纳了全部四种极权元素，发展出所谓的部落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部落民族主义实为一种无根的种族意识形态，它以充满伪神秘主义色彩的语言，宣称本民族的神圣受选性。吊诡的是，这种以大型母国（德国与俄罗斯）为依托的部落民族主义，又恰恰是对前述犹太种族幻想的一种摹仿，只是前者更能够以现实的广大国土为基础，积极寻求向外扩张，渴望把所有被认定为血缘同胞的人民都纳入统治。

在中、东欧蔓延的大陆帝国主义的另一面，则是第九章分析的民族国家衰亡与人权终结。贯穿第一、第二部分的民族国家衰败过程，终究在第九章迎来顶点，其标志不仅仅是外在制度上的崩解，更是内在理念的挫败，这就是由难民与无国者现

象所引发的人权理念的终结，而人权终结的原因，又正是无根的彻底化。

如果说第八章的主角是中、东欧未能形成正常民族国家的大国，那么第九章的主角则是同地域中未能形成正常民族国家的小民族。从历史条件来说，第九章紧承第八章的线索，且已迈入二十世纪。正是俄罗斯（帝俄）与奥地利（奥匈）这两大传统多民族帝国在一战后的崩解，催生了其治下各少数民族独立建国的浪潮。然而由于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仍然不可能完全由单一民族构成，因此其境内少数民族裔的处境就比以往在帝国统治之下还更为艰困，因为小民族新建的民族国家具有更强烈的民族同构型要求。在此状况下，大批少数族裔流离境外，成为无国难民，但各国根本不想将他们置于国内法律保护之下，于是无国者就沦落法外，成为警察暴力的对象。

在经过上述现象分析之后，阿伦特提出了或许是本书最震撼、最影响深远的一项主张，就是导致现代难民困境的，恰恰是高举天赋人权的人权宣言。缺乏国家法律保护的难民，看起来是人权最典型的保护对象，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根本毫无权利可言。原因在于，人权宣言主张人的天赋权利只能源自于人（Man）自身，而非任何具体法律制度，然而这种过于抽象的权利来源最终滑坡为民族/国民的权利，反而剥夺了早先较有弹性的保障空间。因此，在整个世界都变成要以民族归属来确认权利主体的状况下，一个人一旦离开了家乡、祖国，就变得无家可归，不再有任何地方能够接纳他，从而实现了最彻底的无根。

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反向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亦即“拥有权利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个人唯有从属于一个共同体，从而拥有了发声与行动的位置，才能够真正拥有人权，而不是因为拥有天赋人权而有权发声。实际上，这也是对于“反犹主义”部分的一个响应，犹太人长期依附于各个国家的政治体之中，自以为可以永久享受特权，到头来却成为最典型的无权利者，成为集中营的第一批实验对象。

第九章就算不是本书最深刻的一章，也是最常被当代学界讨论的章节。因为本章分析的难民问题与人权困境，显然仍在当今世界一再重演，与阿伦特的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阿伦特所提出的“拥有权利的权利”，实际上也已经预示了她后来在《人的条件》中会予以充分论述的正面出路。

除了具有最明显当代性的第九章外，前面其余八个章节都各有其当代意义。比如，从近期发生的乌克兰战争来看，第八章分析的大陆帝国主义无疑已成为当代世界极为现实的威胁，而近年来在性别议题、种族议题上发生的“反挫”现象，似乎也能在第三章社会反犹主义所揭示的悖论结构中找到回响。甚至一些二十一世纪已再可能发生的现象，比如阿伦特在第七章分析的殖民种族经验，读起来也具有惊人的冲击性。

究其原因，阿伦特对于各种历史经验的反思，每每触碰到了人类在共同生活中无法超克、一再重复的行为结构，因此就算不会再以完全相同的具体形态发生，也能够让我们觉得醍醐灌顶、恍如今日。

极权统治与孤弃经验：我们时代的深渊

当民族国家系统最终崩解，无根之民到处流亡，通向极权的道路也就铺展开来了。今天所见的“极权主义”部分有四个章节：无阶级社会、极权运动、极权主义掌权、意识形态与恐怖。如前所述，极权主义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实际上在极权主义四章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断裂，因为本书第一版于 1951 年出版之后，阿伦特才在 1953 年左右写出了最后一章，并在 1958 年的第二版中添入。换言之，前三章已构成了《极权主义》部分的原本完整面貌，而第四章则是数年后补写增添的，可谓是对极权主义的理论性总结。

这种时间先后顺序并非无关紧要，因为阿伦特在完成本书初版之后，已开始因为苏联的缘故，开始思考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元素，进而对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进行重新思考，这些新的方向可以在新写的最后一章中看到明显迹象。

这其中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阿伦特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极权“理论”，很可能会直接阅读最后一章而后快。不过最后一章固然极具理论价值，但是只有放回到它与“极权主义”前三章的关系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其现实意义，不然的话，我们虽不至于是买椟还珠，却也只取走了一小半珍珠。下面笔者提出一个三层次的架构，来说明这种关系。

且让我们先跳过前三章，看一看最具理论性的最后一章到底讲了什么。先前说过，阿伦特在写这一章之前已开始关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因此我们在其中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她是在这一传统的架构下来重新对极权进行理论反思。最直接的迹象就是她直接参照了孟德斯鸠的政体论，来建立本章的分析架构，也就是说，阿伦特认为极权政体也跟暴政、共和制、君主制等传统政体一样，具有其政府本质、行动原则以及基本生活经验这三种要素。

必须强调的是，阿伦特一开始就提出，极权政体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因此参照传统政体的分析方式，乃是为了辨认这种全新的政体。极权政体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守法与不守法的二分架构，将政府运作原则直接诉诸于（大写）自然（Nature）或历史（History）法则。实现这种更高法则的方式就是“全面恐怖”，阿伦特认为全面恐怖就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全面恐怖的要旨在于，它要扫荡的是阻挡自然或历史法则的“客观敌人”，而非有任何具体罪行或反抗行为的敌人，它不

是有特定对象可循的恐怖威吓，而是无处不在、无人可逃的全面恐怖。通过全面恐怖，极权政府得以将具有复数多样性的众人(men)，严实捆绑成单一之人(One Man)。

与此同时，阿伦特认为在最完善的极权统治达成之前，极权政府除了全面恐怖外，还需要为被统治者提供某种行为原则，以便让他们配合极权统治，这种原则就是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不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观念内容，而是指向其中的逻辑性，是具有严密一致性的演绎过程；逻辑的强制性在此扮演的不是消极性的避免矛盾，而是积极性地消灭矛盾，是强迫极权臣民们自发性的去抹除不符合逻辑的现实，从而让逻辑的一贯性得以维持。

最终，在全面恐怖与意识形态逻辑性之下，阿伦特进一步探问极权统治背后的具体人类经验为何，她给出的答案是“孤弃”(loneliness)“孤弃”不同于“孤立”(isolation)，也不同于“孤独”(solitude)。“孤立”对应的是暴政，是众人被外力切断了相互联系的机制，无法共同行动，然而“孤弃”则是连一个人默默创作的行为都不再可能，他与整个人类世界（不单包括他人还包括物）的关系完全被切断。“孤独”对应的是哲人的思考活动，思想唯有在独处的状态下，才能藉由自我对话的方式展开，然而“孤弃”则是连可以与之对话的自我都丧失了，他完全陷入无声的原子化状态之中。

阿伦特认为，这种孤弃状态已在现代社会中，开始成为一种大众日常经验。正是在这种“孤弃”的状态下，人们才会迫不及待地要拥抱意识形态的逻辑性，以获得某种虚假的固定位置，并臣服于全面恐怖的统治，毫无抵抗意志。

顺着对极权政府本质的追问，阿伦特似乎最终触及了更为普遍的现代处境，从而也使这一极权理论有了更为宽广的理论意义。不时陷入空虚寂寞的当代人，多少都能在阿伦特的描述中找到一些与自身经验呼应的影子。然而笔者要提出的是，虽然就理论架构来看，上述三个面向似乎处于一种平行相应的关系，但是就实践层面来说，却并非如此，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在上述各面向中发现一点呼应之处，就妄称极权已经再现。实际上，我们如果将上述政府本质、行动原则、基本经验这三个面向，转换成三个更宽泛的说法，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对应着极权主义前三章，这就是：民众基础、虚构逻辑与统治方式。笔者姑且称之为极权三层次。

首先，第十章无阶级社会的核心主角正是大众，也就是孤弃经验的拥有者，它在理论探讨上是最后一个环节，而在形成极权政体的实践层次上却最为初始。大众与暴民不同，他不像后者那样具有暴力性与进取心，而是看似中立的政治冷感者。在冷感背后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原子化状态，这种状态让人对各种政党主张漠不关心，却甘心抛下一切，响应意识形态动员，成为运动的一份子。可以说，大众正是支持极权运动的最主要的民众基础。

第十一章极权运动的两大元素宣传与组织，实为一体两面，它们皆是极权运动在其支配力所未逮的地方，对民众进行动员的手段，而这两者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虚构。宣传的要点在于它总是针对某个外部世界，旨在维持极权运动内部虚构世界的一贯性。然而宣传的真正目的或实质，则是组织。阿伦特令人惊叹地将极权运动划分成由五种人组成的洋葱式结构：同路人、普通党员、精英党员、高层小圈子、领导人。这五个层次，越往里面就越远离现实世界，也越是不会轻信那些欺骗一般民众的宣传内容，而他们实际相信的内容也越是高级、越是核心。这种洋葱式组织结构的关键在于，在任意两个层次的群体中间都形成了一道保护极权世界的保护墙，于是通过这一层层深入，极权世界与非极权世界之间的鸿沟就被逐渐弭平了，极权运动的巨大虚构也得以维系。

第十二章极权主义掌权是全书最庞大的一章，它的标题直接告诉我们，它讨论的正是极权获得实际统治权力之后的运作方式。它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极权运动掌权之后，要如何在接管既有国家机器的状况下继续维持不断“运动”的激进特质。其方法是通过机构的多重迭加，让人们永远搞不清楚真正的权力中心所在，进而只能服从出自领导人意志的绝对权力。

秘密警察是极权统治的实质性权力机构，我们也可以说它正是执行全面恐怖、贯彻意识形态逻辑性的主要力量。著名的“客观敌人”概念就出自这里。所谓“客观敌人”不再是依据“犯罪嫌疑”来抓捕罪犯，而是根据逻辑推测出“犯罪可能”，而这种可能又会依据客观形势而不断产生新的类型，抓捕更多的人。秘密警察的彻底之处在于，它不仅会让被抓捕者生死不明，甚至还要彻底从幸存者世界的记忆里抹除这个人，仿佛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掌权的最后部分探讨集中营现象，并令人震惊地提出集中营才是极权支配的真正核心。这乍听起来并不容易理解，因为集中营的存在毕竟是非常秘密的事情，它似乎跟对大部分民众的支配统治并无直接关联。然而在阿伦特笔下，集中营是一种实验室，是对终极的全面支配状态的预演测验；在与世隔绝的集中营世界中，人变成活死人，不单单丧失了法律人格、道德人格，甚至连最基本的人类个体性都丧失殆尽，于是任何属于人类的自发性行为都不再可能，剩下的是一种与任何动物都毫无区别的人类物种。在此我们看到，活死人（行尸走肉）隐然呼应着最后一章的孤弃大众，所谓个体性的丧失正是丧失自我的极端化，只是两者之间仍然隔着极权从运动到掌权的一连串实践操作。

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将活死人、孤弃大众与第九章的无国籍之人联系起来，那么阿伦特的思路就更为清晰了。显然，无根、无权利且处在警察统治之下的无国籍者，正是活死人的预备，而唯有通过集中营那极端非人的实验操作，我们才真正

理解了现代大众孤弃状态的危险之处。如果再往前回溯一步的话，那么“反犹主义”部分的犹太人，正是这三者的先祖。在阿伦特看来，犹太人最大的错误，就是未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共同体，妄想以特殊、乃至特权的身份依附于主流社会。这一错误乍看起来无伤大雅，然而眨眼间的风云变幻，就会让犹太人沦落为最典型的无国籍、无权利者，最后成为集中营中最惨烈的受害者。犹太人最终几乎在欧洲灭绝，而他们的无根魔咒则回荡在现代大众的孤弃深渊之中。

不过在这一步步走向深渊的过程中，阿伦特仍为我们保留了希望的火种。阿伦特绝不是悲观主义式的现代性批判者。在本书最后一段提到的新生与新开端，实际上跟本书在追溯历史时的不连贯“缺陷”是同一件事情。极权的出现，并非必然，它是从反犹主义到帝国主义的一连串松散环节所铺成的，甚至若十九世纪犹太人的选择稍有不同，后来的情形也可能也会大不一样；而极权要维持自身，也必须不断扑灭那不断来到这世界的新生，不断维持悬浮在现实之上的庞大虚构。只要我们仍对与他人的沟通怀抱信心，爱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那么极权的火焰也并不那么容易蔓延起来。

笔者最后希望再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本书最后一章提出的“普遍理论”中，最“普遍”的可谓就是大众孤弃经验的分析。由于这种孤弃或寂寞经验，几乎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很容易让我们感同身受，因此我们也很容易将极权视为与现代社会根本共生的事物，进而将阿伦特的极权分析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更有甚者，既然极权的基本经验潜藏在现代社会本身中，那么无论是民主或非民主国家，都随时可能出现极权的危险，极权甚至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诱惑。

然而这种在当代批判理论中颇为流行的想法，恐怕偏离了阿伦特真正的立场了。阿伦特在本书中一再描述的是在实践层面真实发生的经验，而非理论上的潜在可能性。极权不是一种观念、一种学说，而是要实际经过一个个步骤才得以建立的统治体制。因此当我们将目光望向现实世界时，有些政体是否极权，或哪些政体更接近极权，都是有明确事实性依据可讨论的问题，绝非深奥吊诡的哲人玄思。

在这个理论困窘的时代，现实往往让理论错愕，让“左”、“右”判准失效，而“深刻”的理论，有时反而“深刻”地脱离了现实。因此我们不应该让理论预先为我们构造出判断对象，而是应该回到经验本身，让经验解放我们的判断能力。阿伦特这本书正是帮助我们正视自身真实经验的最佳读物。

本书评介⁵

《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于1951年，奠定了汉娜·阿伦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声誉，堪称理解其思想体系的钥匙。书中对灾难性经历的反思脉络，可追溯至她后期更具理论性的著作核心。半个世纪后，极权主义概念再度引发关注，但该概念本身仍具争议性。它远非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使用的技术术语，始终承载着对现代政治危险的诊断与阐释，兼具警示与对策功能。本章将论证阿伦特所理解的“极权主义”与主流概念存在本质差异。最后一节将尝试对她的理论进行重新评估。

极权主义的两种概念

关于“极权主义”的定义几乎与撰写该主题的学者数量一样多，但若干广泛的相似性往往掩盖了阿伦特与大多数其他理论家之间的根本差异。与其他理论家一样，她关注的是将前所未有的强制手段与包罗万象的世俗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新型政治现象；与其他理论家一样，她在二十世纪中叶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翼都找到了实例。但这些表象上的相似性掩盖了更多实质差异，而未能认识到存在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极权主义范式”，它们描述着不同现象，提出不同的理解难题，并蕴含着不同的理论与政治启示，这也是许多困惑的根源所在。

较为知名的模型（其衍生版本众多）描绘了一个完全自治的社会政治体系：一个以意识形态为蓝本建立的国家，由该意识形态赋予合法性的单一政党统治，运用无限的强制与灌输权力，以防止任何偏离正统的现象。这种政体的构建被某些人视为意识形态，由该意识形态赋予合法性的单一政党统治，运用无限的强制与灌输权力以杜绝任何偏离正统的异端。部分理论家将此类政体的构建视为乌托邦的尝试；另一些人则将其在僵化状态中的延续解读为逃避现代性焦虑的准宗教式退隐。尽管纳粹主义常被归入“极权主义”范畴，但最鲜明的实例实则存在于共产主义政权中，随之而来的便是相应的诊断与对策。从诊断角度看，极权主义被视为过度政治理想与激进行动引发的病症。治愈这种政治发热症的良方在于避免激情：降低对政治与思想的期待，回归自由政治、怀疑哲学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些虽不光鲜却弥足珍贵的福祉。

⁵ 该书评介由译者添加，由玛格丽特·卡诺凡执笔。可帮助读者了解极权主义的研究概况，原文出自《阿伦特极权主义理论：重新评估》，选自《剑桥阿伦特指南》一书，第25-44页，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除非我们首先认识到阿伦特的理论与这种主流模式截然不同，否则对其理论的重新评估便无从谈起。诚然，左翼和右翼对立的框架依然存在（尽管仅涵盖希特勒与斯大林政权，未包含法西斯意大利，亦未涉及斯大林前后时期的苏联）；对强制与意识形态的强调依然存在（尽管我们将看到阿伦特对这些关键要素有着独特的理解），但差异至关重要，且与阿伦特聚焦纳粹主义、特别是大屠杀有着密切关联。事实上，她呈现的极权主义图景与更常见的范式形成鲜明对比。若作比喻，主流图景宛如冰封湖面，它是凝固的、单一的、透明而静止的；阿伦特的理论则如山洪暴发，吞噬沿途万物；又似飓风横扫，摧毁一切人类文明的痕迹。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并非指某种精心构建的政治体系，而是指一种混乱、非功利、狂热而充满破坏力的动态运动，它侵蚀着人类本性与人类世界中所有使政治成为可能的特征。

奥斯威辛的视角

《极权主义的起源》由三卷合编而成，分别探讨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其理论体系极其复杂且素以艰深难懂著称。本节将剖析阿伦特理论模型的若干独特特征，下节则聚焦她如何尝试阐释这一新现象。或许我们可以从她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切入：她所关注的政治现象具有前所未有的新颖性。“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对极权主义的认知展现出一种可怕的原创性……其行为本身便构成对所有传统的颠覆……”换言之，极权主义彰显了人类的创生能力，即那种以新颖、偶然且不可预测的方式思考与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她成熟的政治理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极权主义新颖性的悖论在于，它恰恰是对个体独特思考与行动能力的攻击。

阿伦特认为，这一新现象揭示了所谓“现代人对非亲手创造之物根深蒂固的猜疑”所蕴含的自我毁灭性。极权统治运动信奉“万物皆有可能”，因而要求无限权力，但其结果绝非乌托邦的建立（乌托邦本身会对权力与可能性设限），而是空前绝后的毁灭。集中营作为新政权的“实验室”，其中进行的绝对统治“实验”逐渐揭示：绝对权力的代价正是扼杀人类的多样性。使我们超越动物物种成员的特征，即独特的个体性与自发思考行动的能力，这恰恰让我们难以预测，因而阻碍了将我们纳入极权运动的企图。唯有独裁者能成为全能者，而希特勒与斯大林各自发现的通往此目标的道路，分别是恐怖统治与意识形态操控。

阿伦特指出，集中营实践的“全面恐怖”正是“极权统治的本质”。它不仅杀戮生命，更首先扼杀个体的独特性与行动能力。任何自发性的残余都将阻碍绝对统

治。“唯有在条件反射的世界里，在毫无自发性痕迹的傀儡世界里，才能实现并维系绝对权力。正因人类潜能如此巨大，唯有将其降格为‘人类物种’的标本时，才能实现彻底统治。”不同于普通暴君的暴力胁迫，这种恐怖不具压制反对派等功利目的，唯有在真正反抗已被镇压后才达到顶峰；其唯一功能是通过扼杀所有人性个性来推进绝对统治计划。“常识极力抗辩说民众本就顺从，因此这庞大的恐怖机器纯属多余；倘若民众能说出真相，极权统治者必将反驳：这机器看似多余，因为恐怖主义之所以对你具有吸引力，仅仅是因为它使人类变得多余。”

意识形态通过消灭行刑者自身的独立思考与体验能力，将其捆绑进统一的毁灭运动，从而与恐怖相辅相成。这些自诩能洞悉历史的伪科学理论，赋予信徒“对过去绝对的解释、对现在的全面认知以及对未来的可靠预测。”通过使经验中的现实相形见绌于必然发生之事，他们将意识形态思想从常识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但在阿伦特看来，意识形态最危险的特性（希特勒与斯大林皆曾利用）在于其对逻辑一致性的强调。两位领袖都以冷酷的推理自诩，将种族或阶级斗争的逻辑推演至屠杀最后一个“客观敌人”。在他们手中，意识形态被抽空了所有实质内容，只剩下自动推导某个群体必须消亡的逻辑链条。意识形态的逻辑性取代了自由思想，诱使人们剥离个性直至成为单一非人格化绝对统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因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从不支持现状：它们规划的是一场毁灭性永无止境的斗争。

于是，绝对权力终究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毁灭。极权政权的职责不过是加速执行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所宣判的死刑。阿伦特指出两位领袖都强调历史必然性：要践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经济法则，或种族优越斗争的生物法则。为将极权主义与此前无数暴政区分开来，她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暴政的标志向来是不守法性：合法政府受法律约束，而暴政则意味着突破这些界限，使暴君得以肆意横行全国。但（正如其追随者所体验的）极权主义并非这种意义上的不守法，尽管它的法律并非保护权利的民事法，而是所谓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

根据这些不可抗拒的法则，人类生存本质上是集体的，属于种族或阶级的之间的生死搏斗，其运动才是历史的真正意义。对极权主义而言，“所有法则都已成为运动法则。”既不能容许稳定的制度阻碍这种狂热的动力，也不能容许个人的主动性阻碍这种狂热的动力。“全面恐怖……旨在将历史或自然的运动法则转化为现实”，更要为其扫清障碍，“使自然或历史的力量得以自由奔涌于人类之中，不受任何自发的人类行为阻碍”。人类（包括统治者本身）必须服从这些力量，“要么骑在胜利战车之上，要么被碾碎在车轮之下”，而个性则成为必须消除的障碍，因为“恐怖的铁链摧毁人的多样性，将人塑造成‘唯一者’，使其永远像历史或自然进程本身那样行动”。

阿伦特描绘的极权主义掌权图景，与人们熟悉的、拥有统一而连贯机构的全能国家形象相去甚远。相反，它是一个无形无状、喧嚣纷乱的漩涡，充斥着永无休止的革命与扩张，完全不受功利主义考量的影响。其核心机构并非文官体系或军队，而是秘密警察，即便如此，其职能仍超越常理认知范畴。早期暴政中秘密警察的职责在于搜寻暗中反对政权的势力，而极权主义继承者已不再关注个体实际行为。

“嫌疑犯”已被“客观敌人”取代，而这些人无需被怀疑有任何颠覆思想或行为。当屠杀机器运转到某个阶段时，它甚至可能要求秘密警察自己成为牺牲品；若意识形态灌输过程运作得当，他便会乖乖地自认犯下的罪行。

总而言之，阿伦特揭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某种新现象既彰显了人类的创造力，又致力于摧毁这种创造力。这一现象既是人类行动偶然性的明证，因为它能催生出完全出人意料的新事物，又同时体现了对偶然性的逃避：个体将自身与他人化作漂流物，任其在所谓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中随波逐流。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最终导致无能为力：“万物皆有可能”的信念，最终只证明了“万物皆可毁灭”。反思传统观念中“人性”对人类力量设限的假设，她以苦涩的讽刺指出：“我们已知人类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他确实能成为自己所愿成为的模样。”倘若人类决心将自身与他人降格为野兽，自然法则亦无法阻挡。

追溯极权主义的构成要素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虽源于截然不同的背景与境遇，却最终抵达相同的终点，这表明两个政权统治下的所发生的事件绝非德国与俄罗斯特定历史中的孤立现象。阿伦特认为，促成这一结局的关键因素在于普遍存在的“多余感”体验，这种体验为系统性消灭人类个体性铺平了道路。“各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事件，都在与那些旨在使人变得多余的极权工具进行着无声的勾结。”不仅失去稳定人际世界的流离失所者易沦为恐怖的牺牲品，世界观的崩塌更会削弱人们对现实的把握能力。这般处境下的人们，既会接受看似疯狂却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也会投身于提供替代现实的运动，即另一个“虚构的世界。”此外，稳定人类世界的崩塌意味着制度性与心理性屏障的丧失，而这些屏障通常为用来设定可能性边界。但这些普遍条件以及极权运动和政权所采用的具体组织方法究竟源自何处？这场虚无主义的飓风的降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释？

阿伦特那部厚重的著作中有三分之二篇幅都献给了这些问题。她并非在追寻某种意义上的“起源”，即导致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或是原则上能够预见其发生的因素。她坚持认为，任何此类决定论都与人类事务领域格格不入，因为人类

事务的舞台上充斥着新颖的行动与不可预测的事件。她真正提供的是“对最终结晶为极权主义的要素所作的历史性阐释”，而她选择的“要素”常令读者感到意外。该书第一部分探讨为何犹太人成为被灭绝的特定对象，这种优先级选择凸显了她对纳粹主义整体及死亡集中营的特别关注。但其论述核心在于第二部分“帝国主义”，她论证帝国主义为极权主义铺设了舞台，为实施者提供了有益的先决条件与历史范本（但从未暗示纳粹主义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德国复制品）。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她刻意回避解释的几个领域。我们已看到她对忽略德国与俄罗斯特殊历史的辩解，因为其他学者曾试图从中寻找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对希特勒与斯大林个人作用的漠视，以及对二人在灾难性历史进程中应承担的责任问题避而不谈。考虑到她特别强调领袖在极权运动与政权中的核心地位，这种忽略显得尤为突兀；而当她自己承认苏联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才构成极权体制时，这种矛盾更显尖锐。最后，与多数极权主义理论家不同，她并未追溯其思想渊源。即便在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后着手撰写追溯斯大林主义根源的续作时，她虽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助长了这种制度的形成，仍否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谈及纳粹种族主义的先驱时，她虽梳理了戈比诺等人的理论脉络，却指出“那些构想绚丽而浅薄的理论家与实施野蛮暴行、主动践踏人性者之间，存在着任何智识解释都无法弥合的鸿沟。”另处她写道：“极权主义的史无前例之处，首要不在其意识形态内容，而在于极权统治这一事件本身。”

然而，通过考察极权主义运动所形成的思维模式、行动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先例，以及那些通过瓦解阻碍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而为其铺平道路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这一事件。在阿伦特看来，这些先决条件和先例都存在于被称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动荡中。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扩张，欧洲征服了世界的大片土地，同时也破坏了欧洲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她叙述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结构崩解与民众流离失所的史诗，最终导致人类文明世界的巨大损失。因为要成为文明人（而非仅仅作为自然人类物种的成员），我们需要栖居于稳定结构构筑的人造世界。我们需要这些结构为我们筑起法律的屏障，赋予我们权利，使我们能在社会中立足并形成与表达观点，让我们能够接触到共享现实所带来的共通感。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大多数追随者都属于“大众”：这些被动离乡背井、迷失方向的人们，因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革命的动荡摧毁了他们原有的生存空间，已然丧失了对现实与自身利益的清晰认知。但他们的处境仅仅是更普遍的“多余感”体验的一个侧面。若说这些无助被动的群体最适合作为极权运动的群

众成员，那么领导者与行动者则源自更古老的“多余者”群体，阿伦特称他们为“暴民”：经济增长带来的动荡活力催生了这个犯罪暴力横行的地下世界。帝国主义将这类无良冒险家输出全球，为他们提供了“以游戏精神实施犯罪的无限可能”。这种虚无主义及其实践，经由效仿帝国主义的运动重新输入欧洲，成为极权暴力的源头之一。

但为何这种暴力能如此轻易地找到如此庞大的受害群体？欧洲保护个人权利的传统究竟发生了什么？阿伦特在另一种“多余性”体验中找到了部分答案：无国籍状态。纳粹在实施“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初期举措之一，便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他们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益壮大的无国籍者群体。这些人并非罪犯，却既无权利亦不受任何政府接纳。在论述“民族国家的衰落与人权的终结”的章节中，她揭示了这些事件如何暴露了经典欧洲国家的致命缺陷。这个本应致力于捍卫全体公民权利的文明法律秩序，它（在关键时刻）是一个民族国家，唯有成功宣称自己属于该民族的人才能享有权利。缺乏公民身份赋予的权利，“自然”人类不过是种麻烦，即便在自由主义国家亦是如此。“若纳粹将某人关进集中营，而他成功逃脱，比如逃往荷兰，但荷兰人也可能把他关进拘留营。”那些“多余”之人，那些在世界上无处容身之人，正是极权恐怖的理想牺牲品。

阿伦特的核心论题之一在于文明的脆弱性，当那道保护性屏障被无情的动力洪流冲垮时，文明便极易（即便在欧洲腹地）被野蛮所取代。她将这种强迫性运动溯源至资本主义市场的动态机制，如同马克思所言，这种动力性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源于固态财产向流动财富的转化。资本主义兴起前，财产曾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力量；但转化为资本后，它变得流动扩张，既无视既定疆界与制度，亦无天然边界。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时期，资本扩张的经济诉求从董事会室迸发而出，突破民族国家及其制度的桎梏，演变为“对权力的无止境追逐，这种权力能够肆意游荡并蹂躏整个地球”。其代表人物塞西尔·罗兹宣称：“扩张即一切。若能吞并行星，我亦不惜一试。”阿伦特并非暗示资本主义或其他她指出的根源导致了极权主义，仅指出在这些先例映照下，极权主义的惊人新颖性变得更易理解。

极权主义政体一个最具悖论意味的特点就是，它的领袖一边宣扬对必然性的信仰，一边颠覆世界秩序的困境。阿伦特在寻找这种行动主义与服从不可抗拒进程的奇特结合的先例时，在大英帝国的帝国官僚和秘密特工身上找到了答案。这两类人皆将自己的主动性、创造力与理想主义奉献给“历史与必然的隐秘力量”。为服从帝国的“扩张法则”，他们甘愿践踏一切常规法律，这正是帝国主义如何颠覆政治制度、瓦解政治责任的典型例证。动态扩张本身的目的性淹没了其他考量。但纳粹主义最鲜明的帝国主义先例在于种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思想为将流离失所者纳

入共同体提供了途径，且无需稳定的制度结构维系其凝聚力。在种族主义运动中，成员身份的优越性诉诸遗传本质而非个人行为。一旦此观点被确立，这种那些成功剥夺人类大部分群体人性的思想和行为，已准备好被采纳到极权恐怖的实践中。

为何犹太人尤其成为纳粹极权主义下如此突出的受害者？阿伦特强烈反对将此归因于偶然的观点。她认为在纳粹案例中，反犹主义成为极权主义其他要素凝聚的“粘合剂”，因为犹太人在其与国家及社会的特殊关系中，与这些要素形成了独特纠葛。其论述的重要脉络在于：犹太人自身（如同顺应时势的帝国仆从）缺乏政治责任感；他们被视为基于种族、秘密谋求全球霸权的无根群体。早期反犹者对此心怀恐惧，而纳粹则视其为竞争性的优等民族，既是效仿的典范，更是必须超越的对象。在纳粹眼中，“那些没有领土、没有国家的犹太人，似乎是唯一已形成种族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现代反犹主义不仅企图灭绝世界犹太人，更试图效仿其所谓的组织力量。”

极权主义的教训

重新审视阿伦特的理论，我们很难不为其怪异之处所震撼：她描绘的现象不仅令人恐惧，更显得诡异而荒谬，远比主流范式所呈现的现象难以理解。通常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固然令人不安，却也似乎是一种可行的政治体系，可能成为自由民主的实际替代方案。相形之下，阿伦特描述的现象纯粹具有破坏性与徒劳性。即便在斯大林尚在人世、纳粹主义刚遭挫败之际撰写的初版著作中，她便断言这种制度注定短命。如此政治风暴既无法建立稳定体系，又必须持续推进世界征服的势头，否则终将消亡。她曾暗示，或许她这一代人能亲眼见证极权主义的终结，它将“在人类历史中不留痕迹，只留下精疲力竭的民众、经济社会的混乱、政治真空和精神上的空白”。即便如此，出于实践与理论的双重考量，她仍认为极权主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实践层面的理由在于它可能卷土重来。“极权主义之所以成为本世纪的诅咒，恰因其以骇人手段解决了自身问题”，这预示着新一轮令人不安的困境。首要的是，所有这些无谓的破坏都与日益加剧的普遍存在的“多余感”。政治动荡、社会根基动摇、失业、人口过剩：种种因素共同催生出对极权主义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诱惑。然而这些新诱惑与机遇出现的世界里，人类的力量与人类对任何事物都无法置之不理的特性前所未有地强大，更重要的是，人类如今如此紧密相连，以致所有人的命运都紧密相系。面对全球性事件的责任，人类必须在缺乏传统权威指引的情况下独自承担。阿伦特指出：“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令人窒息，且史无前例。”

试图理解这一新现象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人类通过理解来“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的内在需求。“若想在这片土地上安身立命，即便代价是只能立足于这个世纪，我们必须尝试参与这场与极权主义本质的永无止境的对话。”但另一层原因在于，这些空前绝后的灾难性事件突显了人类境遇中重要却遭忽视的特征。贯穿全书、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诊断交织的，是一系列普遍性思考，其中许多在其后期著作中得到深化。其中一条思想脉络关乎我们与自然及文明世界的人类社会的关系。当阿伦特反思集中营中沦为牲畜一样的受害者、无国籍者发现“自然权利”空洞性、以及帝国主义在人类世界边缘对野蛮行径边界的探索时，她得出结论：“只有为所有人开启了超越其自然性的大门时，人性才是真正属于人的。”要能在人类的行动显现多样性，我们需要文明世界所提供的框架、边界与环境，因为这个世界极其脆弱。

人类世界的脆弱性及其环境丧失的危险及局限性，将这一主题与另一组思考相联结，这次涉及偶然性与新颖性、自由与必然性。极权主义本身的兴起（如同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正是人类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之明证：任何观察人类事务者都应做好迎接意外的准备，这既令人警醒又充满希望。因为人类的主动性会开启一系列难以停止的进程，这些进程可能威胁或瓦解稳定的人类世界。由于未来充满变数且人类力量难以估量，我们可能毁灭世界与自身，将人类生存条件改变到使我们沦为野兽的地步。所谓“人性”本身亦是偶然而脆弱的，而极权主义及其前身向我们昭示着：我们竟会扭曲地选择拥抱必然性，将自身我们自己和他人皆沦为所谓必要进程的奴隶。阿伦特在现代境况中看到一个恶性循环：人类世界被无意间启动的破坏性进程（尤其是资本主义扩张）所撕裂，而这种崩解本身又助长了更具破坏性的进程。一方面是因为再无坚实的制度能阻挡急剧变革的洪流，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些失去根基、丧失世界观及相关常识的人们，反而欣然沉溺于运动的漩涡之中。我们摆脱此危机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于人类诞生之初便蕴藏的开启新事物的能力。

阿伦特笔下的极权主义并非某种外部力量降临人间的瘟疫。它是人类自食其果的产物，源于人类行为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她讲述的故事中，极权主义恰似一个经典的傲慢与报应寓言，对绝对权力的追逐终将招致毁灭。尽管极权政权属于特殊事件，但在她眼中，它们却是现代世界中一种惊人普遍现象的最极端例证，人类启动破坏性进程后，非但不加以遏制，反而竭力加速其发展。最显而易见的危险案例存在于科学技术领域。乐观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这些发展所带来的收益是人类集体力量的增强。“万物皆有可能”，我们能重塑世界以适应己身。但这恰是将行动误作创造，未能洞见人类多样性的本质，这意味着不存在行使此等权力的集体主体，不存在所谓的“人类性”。当此类进程被启动并加速推进时，人类世界及其所有成

员皆陷入危机。《人的境况》主要探讨其中影响最深远的进程，即经济现代化。它在推进过程中粉碎人类的技艺，不断抛弃日益“多余的”人类。

所有极权主义理论皆具辩证性，不仅诊断出某种恶，并据此事实彰显善；但在多数情况下，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一种与它相对立的政治体系：极权主义凸显了多元民主的优点。阿伦特理论的辩证法更为激进。她的分析所凸显的是政治状态本身。在极权主义的语境下阅读她的后期著作，更凸显出她对人类境况的阐释既关注其可能性，也关注其局限性，即行动的局限与危险。在她看来，应对当代困境的唯一答案在于肯定并坚信极权主义所否认的人类境况本质：人类的多样性，即“居住于此的并非单个个体，而是人类群体”这一事实。若人类停止崇拜必然性，认识到自身建立“持久制度”有限能力，他们通过缔结并遵守承诺，便能“为世界制定法则”，并相互赋予自然未予的权利。极权主义所揭示的启示在于：政治作为多元人类主体间倡议与契约的竞技场，以及极权主义所扼杀的独特个体性得以显现的空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回望极权主义

无人能否认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辨孕育了丰硕的政治思想成果，但历经半个世纪的争议与历史研究，她的理论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那些泛泛而论“极权主义范式”缺陷的评论往往避重就轻。然而该范式仍可在多个层面展开探讨。回望历史，我们可将阿伦特的学术事业划分为三个维度：其一，她致力于识别并描述那些因新颖、骇人且令人困惑而亟待理解的事件；其二，她通过阐释“极权主义”这一普遍现象来把握这些事件的本质；其三，她追溯了可能解释极权主义兴起根源的渊源与先例。

她理论的首要方面，在于聚焦于对政治理解构成关键难题的事件：两个对立政权下以意识形态为正当理由实施的大规模屠杀。与普遍认知相反，她并未声称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存在压倒性的相似性。真正令她震惊的是：尽管两者存在诸多实质差异，这两个政权却犯下了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罪行。就这一点而言，她的论点似乎站得住脚。回望历史，这两个政权的行径如今看来依然令人毛骨悚然且难以理解，正如1951年那般，共产主义崩溃确实让人们重新注意两种政体间的异同。二者相似性的关注。

有趣的是，历史学家近期提出的若干论述与阿伦特的阐释惊人地相似。她对极权主义的独特描绘，那种怪诞特质似乎比其他多数理论更能准确诠释她关注的事件，尤其在纳粹主义的语境下。该领域权威学者指出：“她强调纳粹主义具有激进

化、动态化及破坏结构的内在特性，这一观点已被后续研究充分验证。”她对人类为无意义运动而被当作消耗品的描述，似乎贴近了那些被卷入政权疯狂动能中的人们的体验。汉斯·蒙森谈到“累积的激进化与渐进正是纳粹独裁决定性的结构特征。”他还观察到，“纳粹政治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破坏能量，形成肆无忌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动能，却始终无法建立持久的政治结构”。在迈克尔·曼看来，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同属罕见的“持续革命政权”范例，其特征不在于极端恐怖统治与“对制度妥协的顽固拒绝”。因此，若仅将其视为历史描述，阿伦特描绘那场政治风暴为狂乱、非理性、虚无主义的运动，无形无状且除了破坏别之外不能带来任何东西。她的观点似乎获得了其他学者支持，这强化了她的核心论断：所发生的一切挑战着我们对政治及人类潜能的认知。

第二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分析作为普遍现象的“极权主义”来把握这些事件的本质，这引发了更多争议。《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那些包含她最明确理论阐述的论文中，她明确表示自己是在有意识地追随孟德斯鸠的脚步，在孟德斯鸠两百年前提出的共和、君主制和专制的类型学基础上，添加了对一种新型政体的概括性描述。孟德斯鸠通过分析每种政体的“本质”及其驱动的指导性“原则”，区分了常见的政府形式，阿伦特认为他由此揭示了这些古老政体如何植根于人类多元性体验的不同维度，而政治正是由这些体验中诞生的。她的主张是：极权主义同样必须被视为具有特定本质与运作模式的独立现象。尽管它具有新颖性，却同样植根于人类根本经验，即现代性特有的“孤弃”体验。换言之，当她使用“极权主义”这一概括性术语时，并非指韦伯式理想类型，即那种仅为研究个案而设的抽象模型。相反，她正明确试图识别并理解一种崭新现象：这种现象已然显现于世，具体体现在纳粹与斯大林政权的某些特征及活动之中。

尽管她的叙述生动而令人难忘，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她有时似乎将“极权主义”实体化，将其视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主体。正如她所言：“极权主义追求的并非对人的专制统治，而是建立一个人类变得多余的体系。”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表述？此处不可否认地存在解读困难，我只能给出推测性的说明。但我认为，或许存在一种解读方式能契合阿伦特始终强调的事件的偶然性与人类为其行为所担负的责任。这种解读将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分析视为一种情境逻辑的阐释，现代人（尤其但不限于身陷希特勒与斯大林政权者）极易陷入此类情境中。按照这种逻辑，当特定目标、经历与缺陷交织时，人们往往会在无意识中陷入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既非主动选择，亦非被“理性的狡黠”所驱使。阿伦特通过以下论述为该解读增添了色彩：她指出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权竟在实施同样荒谬的恐怖统治上达成一致，实属惊人；她将集中营称为实施统治可能性实验

的“实验室”；并指出极权主义领袖们只是在逐步探索他们所踏上的道路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此解读，极权主义与其说是某种有意识的工程，不如说是当人们带着某些特定目标、经历和缺陷。这些皆为现代性特征，即投身政治时，极易滑入的既定轨道。首要目标是追求全能，这种追求源于“万物皆有可能”的信念，以及“现代人对非亲手创造之物的根深蒂固的猜疑”。核心体验是孤弃（loneliness），即那种“失根感与多余感”的体验，促使人们依附于运动和意识形态逻辑，以此替代丧失的常识与现实世界。关键缺陷在于世界本身的丧失，即文明构建的稳定人类世界，它曾将人类锚定于共同的现实体验，并以必要的界限与法则为自由行动划定边界。

以这种方式解读阿伦特的理论，或许能让我们看到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既非外来势力的化身，亦非“极权主义”怪兽施展神秘意志的载体，更非超凡领袖恶魔意志刻意构筑的体系，而是与其实行者的人性尺度极不相称的恐怖产物，这源于无数人选择最轻松的道路，顺应所处境遇的逻辑而为。在这些特殊案例中（因战争与革命余波引发的偶然因素），世界秩序及其约束机制的崩解，使人们极易滑入极权主义的惯性轨道，这种轨道终将收束于消灭人类的多样性。希特勒与斯大林各自发现了通过组织流离失所的群众所能产生的力量，同时又触及了意识形态核心中那种盲目逻辑的本质。他们确信万事皆有可能，最终统治着将人类降格为野兽的恐怖政权。

这种解读方式也有助于回应对其研究第三个方面的批评，该方面涉及极权主义的来源与先例（而非成因）。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其明显缺陷在于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缺乏对称性。虽然她指出纳粹汲取了欧洲海外帝国的先例是正确的，但就斯大林主义而言，这些先例相较于更具体的因素，如从俄罗斯政治传统和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到斯大林的偏执狂及内战遗留问题，便显得微不足道。但若阿伦特讨论的不是成因而是对现代情境逻辑的偶然性回应，此类异议便不那么重要。尽管她的理论最初是针对纳粹主义经验提出的，但从这种观点看，斯大林主义的相似经验只会进一步印证其论点。在革命时期的俄罗斯与纳粹德国中，对全能的追求、根基动摇的体验、以及支离破碎世界的缺失感同样普遍存在，这使得斯大林（如同希特勒）得以跌入极权主义的深渊。

半个世纪后，类似的目标、经历与缺陷依然存在。我们是否应将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论述视为对持续危险的诊断？抑或她对二十世纪中叶欧洲灾难的亲历扭曲了她的视角？尽管经历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柬埔寨的“零年”以及从卢旺达到波斯尼亚的种种惨剧，过去半个世纪的阴霾仍不及阿伦特预见的深重，尤其在欧洲。其中部分原因（再次强调，尤其在欧洲）在于：某些人确实善用了政治能力，既能

宽恕与承诺，又能建立阿伦特所强调的“持久制度”。但这些努力成功的另一关键因素，无疑是战后漫长的经济繁荣，当人们摆脱生存压力后，重建人性世界便变得容易得多。基于这些发展重新审视阿伦特对资本主义的敌意评价，我们或许会发现：资本主义通过催生经济增长，可能阻碍而非助长了政治灾难。她或许会反驳：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永不停歇，在无数甘愿为生存需求效力的仆从推动下，它沿着看似不可阻挡的轨迹持续推进，直至摧毁传统世界，使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既制造“多余人口”，又为另一些人带来空前财富。尽管为纳粹主义提供温床的帝国主义政治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为斯大林提供机会的列宁主义计划都已失败，但一场规模远超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使得认为类似当年政治灾难不会重演的假设显得不明智。

当意识形态政治声名狼藉，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融化了僵化的政治体系并使其运转起来之际，环顾四周，我们或许会认为（遵循更正统的极权主义理论），二十一世纪的前景令人鼓舞。但阿伦特的理论提醒我们不可对此太过自信。它既璀璨夺目又令人费解，现在还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候。（该文章有 72 条注释，限于篇幅，相关书目不在此处列出，读者可参看原文）。

第一章

无阶级社会

正常人都不知道万事皆有可能。

---大卫·鲁塞尔

第一节

大众

极权主义运动，尤其在其领袖的声望上，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令人诧异地被快速遗忘，而且他们也惊人地容易被他人所取代。多年来斯大林经历了艰苦的派系斗争，以及对前任至少在名义上的巨大让步，最终确立自己作为列宁政治继承人的合法性，才艰难地获得成就，但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试图不再做出如此让步。尽管斯大林拥有三十年时间，并能操控列宁时代未曾有过的宣传机器来使自己永垂不朽，也无济于事。希特勒亦是如此[1]。他在世时散发着据称无人能抗拒的魅力，战败身亡后的他如今已被彻底遗忘，即便在战后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团体中，他也几乎不再扮演任何角色。这种短暂性无疑与众所周知的民众善变性及其名声息息相关；更可能的是，它可追溯至极权主义运动永动机般的狂热，这类运动唯有持续运转并带动周遭万物动荡，方能维持统治。某种意义上，这种短暂性恰恰是对逝去领袖的溢美之词，但它却成功地将特有的极权病毒植入民众体内。倘若存在所谓极权人格或思维模式，这种非凡的适应性与断裂性无疑是其显著特征。由此，我们若假设民众的善变与健忘代表他们已摆脱极权主义的幻想，而这种幻不过刚好是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崇拜而已，则恐怕会是个错误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更严重的错误在于，我们若是因为这种非持久性，而忘记只要极权体制仍在掌权，只要极权领袖仍在世，他们就始终“依靠群众支持来统治并维系政权”，直至终结[2]。希特勒的掌权在多数统治原则下具有合法性[3]，无论是他还是斯大林，若没有获得民众信任，就不可能领导庞大人口、度过诸多内外危机、在党内斗争的重重险境中屹立不倒。若没有民众支持希特勒和斯大林，莫斯科审判和罗姆派系的清算都无从实现。人们普遍认为希特勒只是德国工业家的代理人，而斯大林则是在列宁死后权力斗争中仅凭阴险的阴谋获胜，但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被许多事实所

驳斥的传说。但最重要的是，这些领导人的受欢迎程度是无可争辩的[4]。他们的受欢迎程度也不能归因于精明而虚伪的宣传战胜了无知和愚昧。

极权主义运动在极权政权建立之前及伴随其发展的宣传，总是坦率而虚伪的，那些企图成为极权统治者的人，通常以吹嘘过去的罪行和精心规划未来的罪行来开启他们的政治生涯。“纳粹分子深信当代恶行具有病态的吸引力”[5]，无论在俄国境内还是境外，布尔什维克宣称自己不承认普通道德标准的言论已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支柱。经验一再证明，恶行的宣传价值以及对道德标准的普遍蔑视，其影响力独立于纯粹的自利动机，这种动机被认为是政治中最强大的心理因素。

暴民心理对邪恶与罪行的迷恋并非新鲜事。暴民向来会对暴力行径赞叹道：“这手段虽卑劣，却相当高明”[6]。极权主义得以成功的真正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其追随者表现出的纯粹无私：纳粹分子或布尔什维克对非运动成员甚至敌对者的暴行不为所动，这或许尚可理解；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当怪物开始吞噬自己的儿女时，当他自己成为迫害对象时，无论是被诬陷定罪，还是被开除党籍送往劳改营或集中营，他依然不会动摇。相反，令整个文明世界震惊的是，只要其运动成员身份不受触动，他甚至可能主动协助迫害自己，亲手编写自己的死刑判决书[7]。若将这种超越所有现实经历、摒弃眼前利益的信念顽固性，简单归结为炽热理想主义的体现，未免太过天真。理想主义，无论愚蠢或英勇，总源于个体的抉择与信念，并受制于经验与辩证[8]。而极权主义运动的狂热运动一旦抛弃其狂热追随者，便会瓦解。这与所有形式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彻底扼杀了那些在运动崩溃后仍存留的信念[9]。但在运动的组织框架内，只要其结构尚存，狂热分子既无法通过经验也无法通过辩论被感化；对运动的认同与彻底的从众主义，似乎已摧毁了体验的能力，即便这种体验极端如酷刑或死亡恐惧。

极权主义运动旨在组织群众并成功实现，它即不同于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中那些代表特定利益的传统政党，其组织对象并非阶级；也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政党所代表的、对公共事务处理持有意见和利益诉求的公民群体。尽管所有政治团体都依赖于力量的均衡，但极权主义运动对数量优势的依赖程度之深，使得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即使其他条件有利，极权政权也似乎难以建立[10]。一战后，一股深具反民主、亲独裁性质的半极权与极权主义浪潮席卷欧洲；法西斯运动从意大利蔓延至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是显著的例外）；然而，就连“酷爱极权国家”这一术语的墨索里尼，也未曾试图建立完整的极权政权[11]，而是满足于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类似的非极权独裁政权在战前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葡萄牙以及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相继出现。纳粹党人对这类差异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常对法西斯盟友的缺陷嗤之以鼻，而他们对俄国布尔什维

克政权（及德国共产党）的真正钦佩，唯有通过对东欧民族的鄙夷才能得到平衡与制约[12]。希特勒唯一给予“毫无保留的敬意”之人是“天才斯大林”[13]，而对于斯大林和俄罗斯尽管我们没有（而且大概永远不会有）像德国那样丰富的文献资料，但自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讲话以来，我们便知道斯大林只信任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14]。

关键在于，在所有这些较小的欧洲国家中，非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之前都存在过极权主义运动，这使得极权主义显得过于雄心勃勃，尽管它在运动夺取政权前足以有效组织群众，但国家的绝对规模最终迫使那些企图统治全民族的极权主义者，转而采用更为熟悉的阶级或政党专制模式。真相在于这些国家根本无法掌控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实现绝对统治及其必然带来的人口巨大损失[15]。由于征服人口更密集领土的希望渺茫，这些小国的暴君们被迫采取某种老派的克制手段，以免失去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这也解释了为何纳粹主义在战争爆发及席卷欧洲前，其一致性和残酷性远逊于苏联模式；即便德国人口规模，也无法支撑这种新型政权的完全发展。唯有德国若赢得战争，才能见证极权统治的完全形态。而这种统治不仅将使“劣等种族”付出代价，更将使德国人自身承受牺牲。从希特勒计划的遗留痕迹中，我们得以窥见并评估这种代价[16]。无论如何，这种极权统治的真正显现，仅发生在战争期间，随着征服领土的不断扩张。在东方，庞大的人口群体为灭绝营提供了可能，使德国得以建立真正的极权统治。（反之，在印度和中国这些传统东方专制主义的土地上，极权统治的可能性令人毛骨悚然地高，那里有几乎取之不尽的资源足以喂养权力积累与人道毁灭的统治机器，更何况，大众普遍存在的被动感，这种源于过去一百五十年大规模失业与人口增长的欧洲新现象，在数世纪前便已通过对于生命的轻蔑根深蒂固。）统治手段的温和或相对非暴力，绝非源于政府对民众起义的恐惧；本国人口过剩才是更严峻的威胁。唯有当庞大人群既属冗余，又可被牺牲而不致引发灾难性人口锐减时，区别于极权运动的极权统治才具有实现可能。

极权主义运动在任何存在这样一群人的地方都可能发生：他们因种种原因对政治组织产生了渴望。这群人并非由共同利益意识维系，也缺乏那种能通过明确、有限且可实现的目标来表达的特定阶级表达能力。所谓“群众”一词仅适用于这样的人群：他们或因数量庞大，或因漠不关心，或兼而有之，无法融入任何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无论是政党、市政机构、专业团体还是工会，皆是如此。这类群体潜藏于每个国家，构成政治中立者的主体，他们既不加入政党，也鲜少参与投票。

纳粹运动在德国的崛起以及 1930 年代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7]，其特征在于它们从这群看似冷漠的人群中招募成员，而其他的政党或团体都因其过于麻木或愚昧而放弃关注这群人。结果是，他们的成员大多来自那些从未在政治舞台

露面的人们。这使得政治宣传得以引入全新手法，并对政敌的论点漠不关心；这些运动不仅将自身置于整个政党体系之外并与之对抗，更吸纳了从未被触及、未被政党体系“腐蚀”的成员。因此他们无需驳斥反对意见，始终偏好诉诸死亡而非说服、制造恐怖而非说服的方法。他们将分歧归因于深层的自然、社会或心理根源，这些根源超出个人控制范围，因而也超出了理性的力量。这种做法若真要成为缺陷，也仅限于他们真心与其他政党竞争之时；但当他们确信面对的是同样对所有政党怀有敌意的人群时，这种缺陷便不复存在。

极权主义运动在大众中的成功，意味着民主国家普遍存在的两种幻想破灭，尤其是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政党体系的幻想破灭。其一是认为多数民众积极参与政府事务，且每个人都认同自身所属或他人的政党。相反，这些运动表明：在民主国家中，政治中立且漠不关心的群众极易成为多数派，因此民主制度可能依据仅被少数人积极认可的规则运转。极权运动粉碎的第二个民主幻象是：这些政治冷漠的群众无关紧要，他们真正保持中立，仅构成国家政治生活中沉默无声的落后背景。如今它们揭示了其他任何舆论机构都未能展现的事实：民主政体不仅依赖于国家中能言善辩、显赫的组织机构，而且建立在沉默民众的默许与容忍之上，那些漠然无声、缺乏表达能力的群体。因此当极权主义运动带着对议会政府的蔑视入侵议会时，它们看似自相矛盾：实际上，它们成功说服了广大民众相信议会多数派是虚假的，尽管未必反映国家现实，但却动摇了那些同样支持多数统治而非宪政政府的人们自尊与信心。

人们常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利用并滥用民主自由以达到废除民主的目的。这既非领导者的狡黠，亦非民众的愚昧。民主自由虽以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但唯有当公民隶属特定群体并受其代表，或形成社会政治等级体系时，这些自由才具有有机意义与功能。在欧洲民族国家唯一的社会政治分层体系中，德国阶级制度的瓦解，无疑是“德国近代史上最戏剧性的事件之一”[18]，其对纳粹主义崛起的助推作用，恰如俄罗斯广袤农村人口中社会分层的缺失（这具“缺乏政治教育、几乎无法接受能使行动崇高的思想的巨大松弛躯体”[19]），对布尔什维克推翻民主的克伦斯基政府所起的作用。希特勒统治前的德国状况揭示了西方世界发展的潜在危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重演了阶级体系崩溃的戏剧性事件；而俄罗斯的局势则清晰预示着亚洲不可避免的革命变革可能走向何方。实际上，极权主义运动无论采取纳粹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模式，无论以种族或阶级之名组织群众，无论假装遵循生命与自然法则还是辩证法与经济学法则，都不会产生实质差异。

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对政治问题的保持中立，本身并不足以成为极权主义

运动兴起的充分原因。热衷竞争、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社会已制造出对公共生活的冷漠乃至敌意。这种心态并非发生在那些被剥削、被排挤出积极参与国家统治的社会阶层中，而首先发生在资产阶级内部。在漫长的伪谦逊时期，资产阶级满足于成为社会统治阶级而不企图政治统治，甘愿将此权柄让予贵族阶层。随后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里，资产阶级对现有国家体制日益敌视，开始要求并组织自身以行使政治权力。无论是早期的冷漠，还是后来对垄断性独裁外交的诉求，其根源都在于一种生活方式和哲学，这种哲学执着而排他地聚焦于个体在残酷竞争中的成败，以致公民的义务与责任被视为对其有限时间和精力之无谓消耗。这些资产阶级式态度对某些独裁形式非常有用，在其中会产生一位“强人”主动承担公共事务的繁琐责任；但它们对于不是很能忍受资产阶级式个人主义的极权运动来说，则是一种明确的阻碍。在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中，无论那些冷漠的群体多么不愿承担公民责任，他们仍能保持完整人格，因为如果连人格都失去了，他们便难以在生存竞争中存活。

十九世纪暴民组织与二十世纪群众运动之间的决定性差异很难被人察觉，因为现代极权主义领袖在心理和思维方式上与早期暴民领袖并无太大区别，而后者之道德标准与政治手段与资产阶级极为相似。然而，只要个人主义仍是构成资产阶级和暴民的生活态度，那么极权主义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是第一个真正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在十九世纪先辈中，无论是协助路易·拿破仑掌权的十二月十日社，还是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屠夫团伙，俄国屠杀事件中的黑百人团，抑或泛运动，都从未使成员完全陷入到彻底丧失个人诉求与抱负的境地，也从未意识到组织竟能永久性地湮灭个体身份，而非仅在集体英雄行动的瞬间消弭。

资产阶级主导的阶级社会与其崩溃中涌现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资产阶级与暴民的关系，后者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副产品。群众与暴民仅有一点相似，即两者都游离于所有社会分支和正常政治代表体系之外。群众并没有像暴民那样继承了统治阶级的标准和态度（尽管以扭曲的形式），而是反映和扭曲了所有阶级对待公共事务的标准与态度。大众人的标准不仅仅取决于其曾经所属的特定阶级，而是更多取决于遍及各阶层、被社会各阶层默契共享却难以言表的影响力与信念。

阶级归属虽不如封建社会等级制度那般严格，也并非完全由社会出身决定，但通常仍以血统为基础，唯有非凡才华或运气才能改变。社会地位在个人参与政治中至关重要，多数人从未直接面对公共事务，也从未对公共事务的处理承担直接责任。唯一例外的就是国家危急时刻，此时他只作为一个国民身份参与行动，阶级或政党成员身份都不重要。当一个阶级在社会中上升至更重要地位时，通常会有一定数量的成员以政治为职业，他们接受教育和职业训练，以从事政府有偿（或无偿）服务，并在议会中代表该阶级。多数民众游离于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之外，这在任何阶级

中都司空见惯，且无人视其为重要问题。换言之，阶级归属、有限的群体义务以及对政府的传统态度，共同阻碍了公民意识的成长，这种意识要求个人对国家治理承担直接责任。民族国家民众的这种非政治性特征，唯有在阶级制度瓦解时才显露真容，而伴随瓦解的，正是维系民众与政治共同体那张由有形与无形纽带编织的整体结构。

阶级制度的瓦解必然导致政党制度的瓦解，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政党作为利益集团，已无法再代表阶级利益。旧的政党制度延续对旧阶级成员尚有一定意义，这些人仍抱有恢复昔日社会地位的侥幸心理，他们抱团取暖并非因为他们拥有共同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这些利益。因此，各党派在宣传中日益强调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在政治策略上愈发充满辩解和怀旧情绪。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不觉间失去了那些中立支持者，这些民众原本对政治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任何政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大陆政党体系崩溃的最初征兆并非老党员的流失，而是无法从年轻一代中招募新成员，以及失去了无组织群众的默许与支持，这些沉默的群体突然摆脱冷漠，追随任何能表达激烈新反对意见的机会四处奔走。

阶级壁垒的崩溃，将所有政党背后沉睡的多数人转化为一股庞大而无组织的、无结构的一大群狂躁个体。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模糊地意识到政党成员的希望注定要破灭，因为共同体中那些最受尊敬、最善言辞、最具代表性的成员不过是些蠢货，所有当权者的邪恶加起来，也远远不及他们的愚蠢和欺诈。失业工人憎恨现状与以社会民主党形式存在的当权者，被剥夺的小业主憎恨以中间派或右翼政党形式存在的当权者，中上层阶级旧成员憎恨以传统极右翼形式存在的当权者，这些仇恨的交织对这种新生的、令人恐惧的消极团结的诞生，其实并无太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与失业加剧了军事失败的破坏性后果，德国和奥地利境内这群普遍不满且绝望的群体迅速膨胀；他们在所有继承国中占比极高，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支持着法国和意大利的极端运动。

在阶级社会瓦解的氛围中，欧洲大众的心理逐渐发展起来。虽然成千上万个体遭遇了单调却抽象的相同命运，他们仍以个人失败的标准审视自身，以特定不公的尺度评判世界。然而这种自我中心的愤懑，尽管在个体孤立中反复上演，却未能形成共同纽带（尽管它倾向于消解个体差异），这是因为它缺乏任何共同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利益基础。因此，自我中心主义与自我保存本能的显著削弱相伴而生。这种自我无关紧要的无私，这种个人可被牺牲的感受，不再是个体理想主义的表达，而成为群体现象。那句“穷人和受压迫者除了锁链一无所有”的古老箴言，已不再适用于大众：当他们对自身福祉丧失兴趣时，失去的远不止是苦难的枷锁，所有使人生困顿痛苦的忧虑根源，都随之消逝了。相比之下在非物质主义的背景下，基督

教修士看起来像个沉溺于世俗事务的人。希姆莱深谙其组织成员的思维模式，当他描述党卫军成员时，实际上道出了整个招募阶层的特征：这些人对“日常琐事”毫无兴趣，只关注“关乎数十年乃至数世纪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因此，每个人都深知自己正为两千年一遇的伟大使命而奋斗”[20]。这种庞大个体群体的聚集催生一种思维模式，它如同四十年前的塞西尔·罗德斯一样：志存各大洲，思虑数百年。

自十九世纪初以来，欧洲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就预言了大众人的崛起与大众时代的来临。关于大众行为与大众心理的整套文献，已阐明并普及了古人熟知的智慧，即民主与独裁、暴民统治与暴政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这些论述使西方受过教育的世界中某些具有政治意识乃至过度政治意识的群体，为煽动者的出现、为轻信、迷信与暴行做好了准备。然而，尽管这些预言在某种意义上都应验了，但面对诸如自我利益的彻底丧失、面对死亡或其他个人灾难时表现出的愤世嫉俗或厌倦的冷漠、热衷于以最抽象的概念作为人生指南的倾向，以及普遍蔑视最基本常识等出人意料且无法预见的现象，这些预言的意义已大打折扣。

与预测相反，大众的形成并非源于社会地位日益平等，也非源于普及教育及其导致的标准降低与内容通俗化。（美国作为社会地位平等与普及教育的典型国家，尽管它存在各种缺陷，却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少孕育出大众的心理。）很快便显而易见的是：高素质人群尤其容易被群众运动吸引，而高度差异化的个人主义与世故精明，非但未能阻止，有时反而助长了这种投身于群体的自我放逐，而群体运动恰恰正是这种放逐的终点。由于个体化与自我修养显然无法阻止大众态度的形成这一事实出人意料，人们常将其归咎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病态或虚无主义，归咎于所谓典型的知识分子自我憎恨，归咎于精神对“生命的敌意”及其与生命力的对立。然而，备受诋毁的知识分子不过是更普遍现象的典型例证与最善言辞的代言人。社会原子化与极端个体化早在群众运动之前便已存在相较于传统政党中注重社交、非个人主义的成员，这种特质更早更轻易地吸引了那些未经组织的“非参与者”。他们因个人主义原因始终拒绝承认社会联系或义务。

事实的真相是，大众群体正是从高度原子化社会的碎片中发展而来的。这种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竞争性结构与个体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唯有通过阶级归属才能得以抑制。大众人的主要特征并非野蛮与落后，而是其孤立状态与正常社会关系的缺失。这些大众源自民族国家这种阶级分化的社会，其裂痕曾被民族主义情感所弥合。因此当他们在新环境中初感无助时，自然倾向于形成极端暴力的民族主义。而大众领袖们出于纯粹煽动目的，违背自身本能与目标迎合了这种倾向[22]。

部落民族主义与叛逆虚无主义，既非群众的本质特征，亦非其意识形态的适配

物，它们却更符合暴民的属性。然而当代最具天赋的群众领袖，仍多出自暴民而非群众[23]。希特勒的生平堪称此类典型范例，而斯大林的特殊性则在于他源自布尔什维克党的阴谋机构，该机构恰恰由被社会排斥者与革命者构成独特混合体。希特勒早期的政党几乎完全由不合群者、失败者和冒险家组成，确实代表了“武装的波希米亚人”[24]。他们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另一面，因此德国资产阶级本应该能成功把他们为己所用。实际上，资产阶级被纳粹所蒙蔽的程度，与德意志国防军中的罗姆-施莱歇尔派别无异，后者曾将希特勒当作线人利用，将冲锋队用于军国主义宣传和准军事训练，以为他们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协助建立军事独裁政权[25]。这两派都认为纳粹运动在他们以暴民政治哲学的术语来定义暴民[26]，却忽视了民众自发给予新暴民领袖的支持，以及这些领袖创造新型组织形式的真实才能。作为民众领袖的暴民，已不再是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代理人，而仅代表民众本身。

极权主义运动之所以更依赖于原子化、个体化的群众群体，而非依赖于大众社会的无组织性，这一点在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比中最为明显，因为两种主义在各自国家萌发时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为将列宁的革命专政转变为全面极权统治，斯大林首先必须人为制造出那种原子化社会，而德国的历史环境早已为纳粹预备好了这样的社会土壤。

十月革命的胜利来得如此轻易，发生在一个由专制集权官僚统治的国家，那里的人口结构松散，既未被残存的农村封建秩序所组织，也未被脆弱的新兴城市资本家阶级所整合。当列宁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夺取政权如此容易，却又如此难以维持时，他不仅洞悉了俄罗斯工人阶级的脆弱性，更深刻认识到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社会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催生了剧变的土壤。尽管缺乏群众领袖的天赋，他既非雄辩家，又热衷于公开承认并剖析自身错误，这甚至违背了普通煽动家的惯例，但列宁却敏锐捕捉到所有可能的差异性：社会阶层、民族、职业等差异，试图借此为民众注入某种结构性。他似乎坚信，唯有在这种分层中才能找到革命的救赎之道。他将农村群众对地主的无政府式剥夺合法化，并首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在俄罗斯建立了解放的农民阶级。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个阶级始终处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最杰出支持者。他试图通过鼓励独立工会来壮大工人阶级。他容忍内战结束后新经济政策催生的新中产阶级怯生生的出现。他通过组织甚至创造尽可能多的民族群体，进一步强化了民族意识，促进了对历史文化差异的认知，即便在苏联最原始的部落中亦是如此。显然，在这些纯粹务实的政治事务中，列宁遵循的是其卓越的政治家直觉而非马克思主义信念；无论如何，他的政策证明他更担忧社会结构的缺失，而非新解放民族可能出现的离心倾向，甚至比担忧新兴中产阶级和农民阶层中滋生

的新资产阶级更为忧虑。毫无疑问，列宁遭遇的最大挫败在于内战爆发后，他原本计划集中于苏维埃的最高权力最终落入党官僚机构之手；但即便这一发展对革命进程而言是悲剧性的，也未必会导致极权主义。一党专政仅在该国已然形成的社会分层中增添了一个新阶级，即官僚阶层。据革命的社会主义批评者所言，该阶层“将国家占据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马克思）[27]。列宁逝世时，道路依然敞开。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未必会导致欧洲资本主义特有的阶级斗争。农业仍可沿集体化、合作化或私有化路径发展，国民经济亦可自由选择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模式。这些选择均不会自动摧毁国家的新结构。

当斯大林着手为极权统治整顿国家时，所有这些新兴阶级和民族都成了他的绊脚石。为制造出原子化、无结构的群众，他首先必须清除苏维埃中残存的权力，但作为国家首要机构的代表，苏维埃仍发挥着一定作用，阻碍着党内等级制度的绝对统治。因此，他首先通过引入布尔什维克党小组来瓦解地方苏维埃，只有这些小组才能推选出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28]。到 1930 年，昔日公社制度的最后痕迹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党官僚机构。其推行俄化的倾向与沙皇统治时期并无本质差异，只不过新官僚们不再畏惧知识分子了。

布尔什维克政府随后着手消灭阶级，出于意识形态和宣传目的，首先从拥有财产的阶级、城市新中产阶级以及乡村农民下手。由于人数众多且拥有财产，农民阶层此前在联盟中具有潜在的最大力量；因此，对农民的消灭比对任何其他群体的都更为彻底和残酷，其手段是借口没收富农财产和集体化，制造人为饥荒并实施流放。三十年代初，对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清算宣告完成；那些未被列入数百万死者名单或数百万被流放的奴工行列的人，都明白了“谁才是真正的主人”，意识到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并非取决于同胞，而完全系于政府的意愿。面对政府时他们孤立无援，所属群体毫无助益。集体化何时催生出利益共同体的新农民阶层，这个群体因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人数与经济关键地位，再度对极权统治构成潜在威胁，即无法通过统计数据也无法依据文献资料确切判定。但对懂得解读极权“原始材料”的人而言，这个转折点出现在斯大林去世前两年：当时他提议解散集体农庄并将其重组为更大单位。他未能亲手实施这一计划，若此计划付诸行动，其代价将远超消灭第一代农民阶层，对整体经济的破坏性后果更为灾难性。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可能成功：只要杀戮人数足够多，任何阶级都难逃覆灭命运。

接下来被整体消灭的阶级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远比农民弱小，抵抗力度也小得多因为他们在革命期间对工厂主进行的自发性剥夺，不同于农民对地主的剥夺，最终未能实现。政府随即以“国家终归属于无产阶级”为借口，将工厂没收为国有财产。1930 年代初推行的斯达汉诺夫制，彻底打破了工人阶级的团

结意识与阶级觉悟。通过残酷的竞争手段，这些精英工人暂时固化，比起工人与管理层的差距，这些精英工人与普通工人之间的隔阂更为尖锐。这一进程于 1938 年随着劳动证的推行而完成，该制度将整个俄罗斯工人阶级正式转化为庞大的强制劳动队伍。

紧接着这些措施之后，斯大林又着手清算曾协助执行先前清算措施的官僚阶级。从 1936 年至 1938 年，斯大林耗时约两年彻底清除整个行政管理层。苏联社会的行政与军事贵族阶层；几乎所有办公室、工厂、经济文化机构、政府、党务及军事部门都转手于新人，“近半数行政人员（无论党员非党员）被清除”，超过 50% 的党员及“至少八百万人”遭到清除[29]。随后又推行了内政通行证制度，要求所有跨城出行均须登记备案并获得批准。这一法令彻底完成了摧毁党官僚阶级的任务。在法律地位上，官僚阶级、党务人员如今与工人处于同一等级；同样成为俄罗斯庞大强制劳动者群体的一部分，其在苏维埃社会中作为特权阶级的地位已成为历史。由于这场大清洗以清除最高警察首脑们（他们最初策划了这场大清洗）而告终，就连执行恐怖统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们，也再无法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个群体还代表着任何东西，更不用说代表权力了。

所有这些巨大的人命牺牲，没有一个有旧式意义上的国家理性来驱动。在被清算的社会阶层中，没有一个对政权怀有敌意，或在可预见未来的可能变得有敌意。到 1930 年，一切活跃的组织性反抗都不复存在了。当时斯大林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剥夺了党内右倾和左倾分子的法律地位，甚至连弱小的反对力量也几乎无法立足于任何现存阶级[30]。独裁恐怖与极权恐怖的区别在于，它只威胁真正的反对者，而不威胁无政治立场的无害公民。早在列宁去世前就已足够严酷，足以扼杀一切公开或秘密的政治活动。到 1930 年，当苏联政权获得多数国家承认，并与多国缔结商业及其他国际协议时，外国干预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自此以后，与会国内某一不满群体联盟的国外干涉就不再构成威胁了。（斯大林政府也未曾排除民众自身参与干预的可能性：如今我们已知，倘若希特勒只是普通征服者，而非与斯大林匹敌的极权统治者，他至少有非凡的机会赢得乌克兰民众对其事业的支持。）

如果阶级消灭在政治上毫无意义，那么它对苏联经济而言简直是灾难性的。1933 年人为制造的饥荒在全国各地造成了长达数年的影响；1935 年引入的斯达汉诺夫制，通过任意提高个人产量且完全无视工业生产中团队协作的必要性，导致年轻的工业陷入“混乱失衡状态”的境地[31]。官僚阶级的清除，即对工厂经理和工程师阶层的清算，最终剥夺了工业企业所能获得的、由新俄罗斯技术知识分子积累的有限经验和专业技能。

自古以来，维持臣民彼此间的条件平等被专制与暴政视为首要关切之一，然而

这种平等化对极权统治并不足够，因为它仍多少在臣民之间保留了某些非政治性的共同纽带，诸如血缘关系与共同文化利益。如果极权主义认真对待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达到“一劳永逸地结束中立棋局”的地步，即终结任何活动的自主存在。那些热爱“为下棋而下棋”的人，被清算他们的人恰当地比作“为艺术而艺术”的爱好者[32]，但他们还不是大众社会中绝对原子化的个体。而这种完全异质性的统一性，恰是极权主义的首要条件之一。在极权统治者眼中，沉溺于为棋而棋的社会，与沉溺于为农而农的农民阶级相比，仅是程度上的差异且危害较小。希姆莱曾精辟地将党卫军成员定义为新型人类，他们绝不会为任何事物本身而行事。

苏联社会实现大规模原子化，是通过巧妙运用反复清洗手段达成的，这些清洗总在实际消灭特定群体之前展开。为彻底摧毁所有社会关系与家庭纽带，清洗行动采取的策略是：让被告及其所有普通关系人（从泛泛之交到至亲密友）都面临同样的命运威胁。这种简单而精妙的“连坐”机制造成的结果是，一旦某人被指控，昔日朋友立刻化身为死敌；为保全自身，他们主动提供情报，争相揭发以佐证针对该人的虚假罪证，因为这显然是证明自身可靠性的唯一途径。事后他们会竭力证明：与被告的交往不过是监视其行踪的幌子，旨在揭露对方是破坏分子、托派分子、外国间谍或法西斯分子。由于你的价值是根据“告发亲密战友的数量”[34]来决定的，因此会明显产生一个最基本的警告，要求是尽可能避免一切亲密接触，这并不是为了防止秘密思想暴露，而是为了在几乎必然到来的未来风波中，清除所有可能不仅怀有廉价的告发动机，更因自身性命危在旦夕而迫切需要毁灭你的人。归根结底，只有通过将这种手段发展到极致且荒诞的境地，布尔什维克统治者才成功塑造出一个原子化、个体化的社会，其形态我们前所未见，光凭事件或灾难几乎不可能让其产生。

极权主义运动是由原子化、孤立的个体组成的群众组织。相较于其他所有政党与运动，其最显著的外部特征在于要求个体成员绝对、无限制、无条件且不可动摇的忠诚。极权运动的领导者甚至在夺取政权前便提出此要求。这种要求通常先于国家在其实际统治下的全面组织化，并源于其意识形态宣称该组织终将涵盖全人类。然而，当极权统治未由极权运动铺垫（与纳粹德国相反，俄国即属此类）时，运动便需事后组织，其成长条件须人为创造，方能使绝对忠诚（绝对统治的心理基础）成为可能。唯有彻底孤立的个体才能产生此类忠诚，这样的人与家庭、朋友、战友乃至普通熟人都不存在任何社会纽带时，仅凭着对运动的归属感、对党的成员身份，才获得自己在世界上的立足感。

要想让绝对忠诚成为可能，就必须把忠诚所有具体内容掏空，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思想转变。各种极权主义运动都以各自的方式竭力摒弃了具体内容的党纲，这

些纲领是它们从早期非极权主义发展阶段继承而来的。无论措辞多么激进，任何不单纯宣称或界定世界统治权的政治目标，任何涉及“比关乎数世纪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更具体议题的政治纲领，都将成为极权主义的绊脚石。希特勒将这个由身份低微的疯子组成的民族主义小党，逐渐发展成为纳粹运动，他在这一组织过程中的最大成就，就是让该党摆脱早期的纲领。他并非通过修改或正式废除纲领，而是简单地拒绝谈论或讨论其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在相对温和的内容和措辞上很快便过时了[35]。斯大林在此方面的任务远比希特勒艰巨得多；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比业余经济学家兼怪诞政客的二十五条纲领要棘手得多。但在斯大林消灭了俄国党内派系之后，他通过不断改变共产党路线，不断重新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达成了同样的成果，因为他取消了这个学说的全部内容，人们再也无法预测它会激发何种方针或行动。事实上，一个人就算接受了最完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也不能对其政治行为带来任何指导作用。相反，唯有每日清晨复诵斯大林前夜的指示才能遵循党派路线。这种现象自然催生出与希姆莱为党卫军制定的精妙口号所体现的相同心态：高度集中服从，毫无理解自身行为的意图，“我的荣誉就是我的忠诚”[38]。

缺乏或忽视政党纲领本身未必是极权主义的标志。最先将纲领和政纲视为多余的废纸和尴尬的承诺，且认为它们与运动的风格动能毫不搭调的人是墨索里尼。他奉行法西斯主义的行动主义哲学，主张通过历史时刻本身来激发人们的热情[39]。纯粹的权力欲，加上对“夸夸其谈”阐述其权力意图的蔑视，是所有暴民领袖的特征，但这并不符合极权主义的标准。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目标仅在于夺取权力，确立法西斯“精英”对国家的绝对统治。极权主义永不满足于外部统治手段，即通过国家机器与暴力装置施政；凭借其特殊意识形态及其在强制体系中的定位，极权主义开创了从内而外支配、恐吓人类的统治方式。在此意义上，它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距离并达成了一种状态。在其中，权力及其意志（按我们的理解）彻底失效，或至多扮演次要角色。本质上，极权领袖不过是其所统御群众的执行官；他并非将暴虐意志强加于臣民的权力狂人。作为纯粹的执行者，他随时可能被替换，其存在对所代表的群众意志的依赖程度，恰如群众对他自身的依赖。没有领袖，群众便失去外部代表而沦为无形的乌合之众；没有群众，领袖则形同虚设。希特勒深谙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曾在对冲锋队的演讲中如此表述：“你们的一切成就皆因我而存在；我的全部力量唯凭你们而存在”[40]。我们往往倾向于贬低此类言论，或将其曲解为仅指代命令的发布与执行，这种误解在西方政治传统与历史中屡见不鲜[41]。但这种观念始终预设有某位进行思考、产生意志的命令发布者，通过说服、权威或暴力，将自身思想意志强加于丧失思考与意志的群体。希特勒却认为，甚至

连“思考本身也仅仅是因下达或执行命令而存在”[42]。由此，在理论上消除了思考与行动之间的区别，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

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布尔什维主义，都从未宣称建立新的政府形式，也从未声称其目标已通过夺取权力和控制国家机器而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统治形态，绝非任何国家或单纯暴力机器所能实现，唯有持续运转的运动方能达成，即对每个个体在生活所有领域的永久性统治[43]。暴力夺权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在任何特定国家夺取政权，也只是运动中值得欢迎的过渡阶段，绝非终点。该运动的实际目标是在其框架内组织尽可能多的人，并使他们保持运动状态；构成运动目的的政治目标根本就不存在。

第二节

暴民与精英的临时联盟

比极权运动成员的绝对忠诚、极权政权的民众支持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运动不仅吸引了社会中的暴民份子，而且对精英分子具有不可否认的吸引力。若只因艺术家的任性或学者的天真，就忽视这份列满卓越人士的骇人名册，无疑是鲁莽之举。极权主义可把他们视为同情者、同路人，乃至记名的正式党员。

在理解极权运动（虽然不包括极权政体）这件事上，极权主义对精英的这种吸引力，跟极权主义运动与暴民之间明显的联系，是同样重要的线索。这揭示了极权主义兴起所处的特定氛围与普遍环境。我们不应该忘记，极权运动的领袖及同情者，在某种意义上比他们所组织的大众更早出现。从时间顺序上讲，这些大众无需在衰败的阶级社会中无助地等待领袖诞生（他们本身正是这种社会的最杰出产物）。那些在阶级崩溃之前主动脱离社会的人，连同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早期副产品的暴民，早已蓄势待发迎接他们。当今的极权统治者与极权运动领袖仍保留着暴民的特征，其心理本质和政治哲学已相当为人所知；至于真正的群众领袖一旦掌权会发生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但仍可合理推测：他与希姆莱那种精于算计的严谨正确性相比，会更接近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狂热；与斯大林感官的报复性残酷相比，则更像莫洛托夫固执的迟钝。

从这个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局势与第一次大战后并无本质区别；正如二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运动由所谓的前线世代(front generation)领导，他们成长于战前时代并对此记忆犹新。同样地，当前战后极权主义普遍的政治与思想氛围，则是由亲历过战前岁月与生活的先辈所塑造的。这在法国尤为如此，该国阶级系统的崩溃发生于二战而非一战后。如同帝国主义时代的暴徒与冒险家一样，极权运动的领袖与其知识分子同路人有

着共同点，即早在欧洲体面社会的阶级与民族体系崩溃之前，他们便已游离于该体系之外。

当虚伪体面的自满让位于无政府式的绝望时，这种崩溃似乎为精英和暴民首次提供了重大机遇。很明显，新兴群众领袖的人生经历再现了早期暴民领袖的特征：职业与社会生活的失败，私生活的堕落与灾难。他们从政前的人生充满失败，这是被旧政党那些更体面的领导人拿来攻击他们的事实，但这恰恰成为他们赢得群众最强大的因素。这似乎证明了他们以个体姿态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大众命运，证明他们渴望为运动牺牲一切，向遭受灾难的人们保证忠诚，决心永不被诱惑回到安稳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他们对体面生活的鄙夷。这一切都显得无比真诚，而非昙花一现的野心所致。

另一方面，战后精英阶层不过比被帝国主义利用、滥用的世代稍为年轻一点，他们为追求体面社会之外的辉煌事业甘愿沦为赌徒、间谍与冒险家，化身闪亮盔甲的骑士与屠龙勇士。他们与阿拉伯的劳伦斯共享着“迷失自我”的渴望，对所有现存准则、所有当权者怀有同样的激烈厌恶。若他们仍记得“安稳的黄金时代”，也同样记得自己曾如何憎恶那个时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那份真实的热忱。1914年动员令席卷欧洲时，跪地感谢上帝的不仅是希特勒和失败者[44]。他们甚至不必自责曾轻易沦为沙文主义宣传的猎物，或是被关于纯粹防御性战争的谎言所蒙蔽。精英阶层怀着狂喜的希望奔赴战场，期待他们所熟知的一切，包括整个文化与生活的结构，都将在战争的“钢铁风暴”（恩斯特·荣格语）中沉淀。用托马斯·曼精心斟酌的措辞来说，战争是“惩戒”与“净化”；“战争本身，而非胜利，激发了诗人的灵感。”亦如当时某个学生所言：“关键永远在于牺牲的觉悟，而非牺牲的对象”；又如某青年工人所言：“是否能多活几年并不重要。人总希望生命能留下些什么印记”[45]。早在纳粹思想同情者宣称“每当听到文化二字，我便拔出左轮手枪”之前，诗人们早已痛斥为“垃圾文化”，并以诗歌呼吁“蛮族、斯基泰人、黑人、印第安人，践踏它吧”。

将这种对战前时代的激烈不满及其后续的复辟企图（从尼采、索雷尔到帕累托，从兰波、劳伦斯到荣格、布莱希特、马尔罗，从巴枯宁、涅恰耶夫到亚山大·布洛克）简单地贴上虚无主义爆发标签的做法，无异于忽视了在完全渗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的社会中，这种厌恶感何其合理。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与他们自选的精神导师截然不同，“前线世代”完全沉溺于某种渴望，他们渴望摧毁这个充斥着虚假安全、虚假文化与虚假生活的世界。这种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冲击力与表达力都超过了以往一切“价值观重新评价”的尝试，无论是尼采的做法，还是索雷尔著作中揭示的政治生活重组，或者巴枯宁倡导的人类本真性复兴，抑或兰波在

异域冒险的纯粹性中展现的炽热爱生情怀，都相形见绌。唯有不加缓和的毁灭、混乱与毁灭本身，才被赋予了最高价值的尊严[47]。

这些情感的真实性的确可从以下事实中窥见：极少有人因亲历战争的恐怖而消解了对战争的热忱。壕沟中的幸存者并未成为和平主义者。他们珍视着这段经历，认为它能使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他们坚决逃离可憎的体面社会环境，执着地紧抓着四年战壕生活的记忆，仿佛这些记忆能成为建立新精英阶层的客观标准。他们并未屈从于美化过往的诱惑；相反，这些战争崇拜者率先承认：机械化时代的战争不可能孕育骑士精神、勇气、荣誉与男子气概等美德[48]，它强加给人类的唯有赤裸裸的毁灭体验，以及沦为屠杀巨轮中微不足道齿轮的屈辱。

这一代人将战争视为阶级瓦解与民众转化的伟大序曲。战争以其永无休止的杀戮与专横，成为死亡的象征，成为“伟大的平等者”[49]，因而也是新世界秩序的真正缔造者。对平等与正义的热忱，对超越狭隘而无意义的阶级界限的渴望，对抛弃愚昧特权与偏见的追求，似乎在战争找到了出路，借此得以摆脱那种对受压迫者和被剥夺者施舍怜悯的陈腐态度。在苦难日益加深、个体日益无助的时代，当怜悯演变为吞噬一切的激情时，抵抗它似乎与不憎恶其无限性同样困难。它似乎会以一种比苦难本身更致命的确定性摧毁着人的尊严。

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当欧洲现状的恢复重建仍对暴民野心构成最严重的威胁时，希特勒几乎对前线世代的这些情绪特别有号召力。大众独特的无私性，在此表现为对匿名状态的渴求，他们只渴望成为一个数字，一个运转的齿轮；简言之，他们渴望任何转变，只要能扫除社会中特定类型或预定职能的虚假认同都行。由此，战争被体验为“所有群体行动中最宏大的存在”，它可以抹除个体差异，甚至连苦难这种传统上通过独特不可替代的命运来标记个体的因素，如今也能被诠释为“历史进步的工具”[51]。民族差异同样无法限制战后精英阶层渴望投身于大众群体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悖论性地几乎消灭了欧洲的真实民族情感，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无论属于哪一方，属于战壕一代的身份远比身为德国人或法国人更为重要[52]。纳粹正是基于此关于这种模糊的同志情谊、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整套宣传，成功赢得了欧洲各国众多老兵组织的拥护，由此证明了民族主义口号在所谓右翼阵营中已变得多么空洞，这些右翼势力不过是利用这些口号为其暴力背书，而不是为了实现具体的民族目标。

战后欧洲的整体思想氛围中，没有任何单一元素是真正新颖的。巴枯宁早已坦承：“我不愿成为‘我’，而愿成为‘我们’”[53]；涅恰耶夫则宣扬“绝望者”的福音，主张“无个人利益、无私事、无情感、无依恋、无财产，甚至不留姓名”。这种反人道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反文化的本能存在于前线世代人心中，

他们对暴力、权力与残酷的犀利讥讽，皆源于帝国主义精英提出的那笨拙而浮夸的“科学”论证，他们试图证明万物相争乃宇宙法则，扩张首先是心理必需而后才是政治手段，人类必须遵循此类普世法则”[55]。前线世代作家作品的新意在于其高超的文学水准与深邃的激情。战后作家不再需要遗传学的科学论证，几乎不再援引戈比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这些早已沦为庸俗之辈的文化家当。他们不读达尔文，只读萨德侯爵[56]。若他们尚存对普遍法则的信仰，也绝无意愿遵循。对他们而言，暴力、权力、残酷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能力，而人早已丧失他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他们因骄傲至极而早就厌弃任何能安全回归并将他们融入这个世界的政治理论，他们满足于对任何被体面社会所禁止的事物抱持盲目党派之见，无论其理论或内容如何，并将残酷奉为主要美德，只因它与社会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伪善相悖。

若将这一世代与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家相比较（前者的理论有时似乎与后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前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拥有更强烈的真诚和激情。他们深陷于苦难之中，比起所有宣扬善意与博爱的使徒，他们对苦难的感触更深，更容易受到伪善伤害。他们再也无法逃往异域，再也无力扮演异族世界里斩杀恶龙的英雄。在虚伪知识分子话语包装下，苦难、屈从、挫败与怨愤的日常循环无路可逃；即便效仿童话王国的习俗，也无法抵御这种组合不断激发的恶心感。

这种无法逃向广阔世界，被社会桎梏反复困住的感觉，与塑造帝国主义性格的环境格格不入。除了对匿名与自我消融的旧有激情之外，这种感觉更增添了持续的压抑与对暴力的渴求。由于无法进行角色与身份的彻底底改变下，就像认同阿拉伯民族运动或印度村庄的仪式，自愿沉浸于超人般的毁灭力量之中，似乎成为一种拯救，它可以将人从社会预置的机械认同功能及其彻底的庸俗中解脱出来，也可以帮助人推摧毁这种功能运作本身。这些人被极权运动鲜明的行动主义所吸引，被其看似矛盾却又奇特地坚持的双重主张所吸引，因为它既强调纯粹行动的至高性，又强调纯粹必然性的压倒性力量。这种混合恰恰对应着“前线世代”的战争体验，即在压倒性宿命框架中持续活动的体验。

行动主义似乎还为“我是谁？”这个古老而烦人的问题提供了新答案。这个疑问在危机时期总会以加倍的执着浮现。倘若社会坚持宣称：“你就是你所呈现的模样”，战后行动主义则回应道：“你就是你所做之事”，就像首次驾机横渡大西洋的林德伯格（如布莱希特《林德伯格的飞行》所示）。这一答案在二战后被萨特稍作变体地重复于《禁闭》中：“你就是你的人生”。这些回答的意义，与其说是重新定义个人身份的有效性，不如说它们为逃离社会强加于人的那些可互换的多重角色与功能提供了可能性。关键在于做出某种行为，无论是英雄壮举还是滔天罪行，这

种行为必须是不可预测的，且不受任何人左右。

与其他所有政治活动形式相比，极权主义运动以其鲜明行动主义及其对恐怖的偏好吸引了同类的知识精英与暴民，恰恰是因为这种恐怖主义的做法完全与早期革命社团截然不同。这不再是关乎深思熟虑的政策问题，那种政策将恐怖主义行为视为消除某些杰出人物的唯一手段，这些人因其政策或地位已成为压迫的象征。真正具有诱惑力的在于：恐怖主义已演变为一种宣泄挫折、怨恨与盲目仇恨的哲学体系，成为一种以炸弹为画笔的政治表现主义。它欣喜于轰动性行动引发的舆论关注，更甘愿为迫使社会主流阶层承认自身存在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与戈培尔的精神本质如出一辙。戈培尔当年宣称纳粹德国若出现战败的可能，必将背水一战，以确保其数百年间不被世人遗忘，尽管当时距离纳粹德国最终覆灭尚有漫长岁月。

然而，若要在前极权主义氛围中找到区分精英与暴民的有效标准，此处或许正是所在。暴民所渴求的，正如戈培尔曾精准表达过，乃是即便要以破坏为代价，也要接近历史。戈培尔真诚地认为“当代人能体验到的最大幸福要么是成为天才，要么是侍奉天才的人”[57]，这种观点典型地反映了暴民的特征，却既不属于大众，也不属于精英。相反，后者对匿名性极为重视，甚至严重否认天才的存在；二十年代的所有艺术理论都竭力证明卓越是技艺、工艺、逻辑以及材料潜能实现的产物[58]。真正被“名声的耀眼力量”（斯蒂芬·茨威格语）所吸引并狂热接受晚期资产阶级世界天才崇拜的，恰恰是平民而非精英阶层。二十世纪的暴民在此忠实地再现了早期暴发户的模式，后者同样发现资产阶级社会宁可敞开大门接纳迷人的“异常者”、天才、同性恋者或犹太人，也不愿接纳单纯有才华的人。精英阶层对天才的鄙视及其对匿名的渴求，依然见证着一种既非大众亦非暴民所能理解的精神，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言，这种精神竭力维护伟人的崇高，以对抗大人物的猥琐狭隘。

尽管精英与暴民之间存在差异，但每当地下世界令体面社会心生恐惧而被迫接纳其平等地位时，精英阶层无疑会感到欣喜。为了见证那些曾被不公排除在外的人是如何开辟道路的乐趣，精英阶层份子完全不介意付出破坏文明的代价。他们对所有极权政权都难辞其咎的史学伪造行为也未曾表示出特别的愤怒，这些伪造在极权宣传中早已昭然若揭。他们已深信传统史学是伪造之物，因为历史已将弱势群体和受压迫者排除在人类记忆之外。那些被所处时代排除的人们，往往也会被历史遗忘；而雪上加霜的是，而自从会让后者成为前者⁶的来世信仰消失之后，所有敏感的良知便始终为此困扰不已。当人们不再期待正义的天平终将复衡，无论过去还是当下的不公都变得难以忍受。马克思以阶级斗争重写世界史的宏伟尝试，即便令

⁶ 译者注：马太福音 20 章 16 节内容，意思是上帝的国度不按照世俗的先后顺序或者功劳大小来评估人的价值，而是基于恩典。

那些质疑其理论正确性的人也为之着迷，因为他最初的意图，正是要寻找一种手段，将那些被官方历史排除在外的命运，强行铭刻于后世的记忆之中。

精英与暴民之间的临时联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前者目睹后者摧毁体面时所流露的真实欢愉之上。当德国钢铁巨头被迫接纳并接待油漆工出身、自称堕落分子的希特勒时，精英们感受到的是这种欢喜。同样地，只要极权主义运动能将欧洲历史上所有地下、不体面的元素汇聚成一幅连贯的图景，精英们就会容忍极权主义在知识生活各个领域进行粗鲁而庸俗的造假。就这种立场而言，当布尔什维克与纳粹甚至开始清除那些已在学术界或其他官方领域获得一定认可的自身意识形态来源时，这就显得格外令人愉悦。重塑历史的灵感不再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源于“三百家族阴谋论”；不再源于戈比诺和张伯伦的浮夸科学论调，而是源于《锡安长老会纪要》；不再源于天主教会可追溯的影响力及拉丁国家反教权主义的作用，而是源于关于耶稣会和共济会的地下文学。这些千变万化的构想始终指向同一目标：揭露官方历史不过是场闹剧，证明存在着隐秘影响的领域，而那些可见的、可追溯的、为人所知的历史现实，不过是为欺骗民众而刻意搭建的表象外壳。

知识精英厌恶官方史学，他们坚信历史本就是伪造之物，不过是疯子的游乐场而已。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有一种可怕的、去道德化的魅力，这种魅力存在于下列可能性中：巨大的谎言和巨量的荒谬最终可能被确立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人可能随意改写自身过往，以及真相与虚妄的区别不再具有客观性，而可能取决于权力与才智、取决于压制与无限重复。使这种魅力得以发挥影响的关键，并非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谎言技巧，而是他们有能力把民众组织成集体单元，以令人震撼的宏伟气势为谎言背书。当整个运动前进的现实站在伪造史料背后，佯装从中汲取行动所需的灵感时，这些在学术视角下纯粹的伪造品，竟仿佛获得了历史本身的背书。

无论极权主义身在何处，只要它尚未完全掌权，它对精英阶层的影响力始终令人困惑，因为在外人和旁观者眼中极权主义那些粗鄙、专横、积极的教条，比起弥漫于前极权主义氛围中的普遍情绪都更显眼。这些教条与普遍认可的智识、文化及道德标准相违背，以至于人们会推断：唯有知识分子天生具备根本性人格缺陷，即雅尔曼·本达所言的“知识分子背叛”，或是精神层面的病态自厌，才能解释精英阶层为何欣然接受暴民的“思想”。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常常感到深切的失望和对同时代的普遍经验感到陌生，但他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所有传统价值与命题都已消散（在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相互驳斥并耗尽其生命力之后），某种意义上反而更容易接受明显荒谬的命题，而非那些沦为陈词滥调的旧真理，因为不再有人会认真对待荒谬之言。粗鄙之气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摒弃公认标准与主流理论，这种坦率承认最糟糕的倾向，以及对所有伪装的漠视，这些行为常被误解为

勇气和新生活风范。在日益盛行的暴民心态与信念中（它们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伪善的资产阶级态度与信念），那些传统上憎恶资产阶级并主动脱离体面社会的人们，只看到了伪善与体面一扫而空，却未曾审视其内容本身[59]。

既然资产阶级自诩为西方传统的守护者，却在公开场合炫耀那些在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中不仅不具备、甚至深恶痛绝的美德，从而混淆了所有道德问题，那么承认残酷、漠视人道价值和普遍的非道德性似乎就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这至少摧毁了现有社会赖以维系的虚伪基础。在虚伪的双重道德标准的暮色中，炫耀极端态度何等诱人！当人人都公然冷漠却假装温和时，公然戴上残酷的面具是何等的诱人！在一个并非邪恶而是卑鄙的世界里，公然炫耀邪恶是何等的诱人！二十年代的知识精英们对暴民与资产阶级早先的联系知之甚少，他们确信只要用一种讽刺性地夸张的画面来冲击社会，就能完美地玩转“打倒资产阶级”的旧把戏。

当时，无人预料到这场讽刺的真正受害者竟会是成为精英而非资产阶级。先锋派并不知道他们撞的不是墙而是敞开的门，不知道众口一词的成功会令他们革命少数派的身份名不副实，反而证明他们即将表达一种新的群众精神或时代精神。布莱希特《三便士歌剧》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所获得的反响，对此尤其深意。该剧将黑帮分子塑造成体面商人，又将体面商人描绘成黑帮分子。当观众席上的体面商人将其视为洞悉世道的深刻见解，当暴民将其视为对黑帮行为的艺术性认可时，这种讽刺意味便大打折扣。剧中主题曲《先有饭吃，后有道德》引发全场疯狂鼓掌，尽管掌声背后各怀心事。暴民鼓掌是因为他们字面理解了这句话；资产阶级鼓掌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虚伪欺骗太久，早已厌倦了这种紧张感，反而在这句表达他们生存准则的陈词滥调中发现了深刻智慧；精英阶层鼓掌则是因为揭露虚伪的过程如此高明又妙趣横生。这部作品的效果恰恰与布莱希特追求的背道而驰。资产阶级早已麻木不仁，反而欣然接受其隐秘哲学的曝光，这种哲学的流行恰恰证明他们始终正确。于是布莱希特这场“革命”的唯一政治后果，竟是鼓动众人抛弃令人不适的伪善面具，公然接受暴民的道德标准。

大约十年后，塞利纳的《屠杀小品》在法国引发了同样模棱两可的反应，他在书中提议屠杀所有犹太人。安德烈·纪德在《新法国评论》上公开表示欣喜，当然并非因为他想杀害法国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欣喜于这种欲望的直白坦承，以及塞利纳的直率与所有体面阶层围绕犹太问题所表现出的虚伪礼貌之间形成的迷人矛盾。精英阶层揭穿伪善的渴望何其强烈，甚至在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已全面展开之后，这种愉悦的态度却丝毫未减。不过，这种反应更多源于对自由派亲犹太主义的厌恶，而非对犹太人的仇恨。类似心态解释了这样一个惊人现象：希特勒和斯大林关于艺术及迫害现代艺术家的公开言论，始终未能削弱极权主义运动对先锋派艺术

家的吸引力。这暴露了精英阶层的现实感缺失及其扭曲的无私精神，二者与大众虚幻世界及利他主义的特征惊人相似。极权主义运动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机遇，知识精英与暴民得以形成短暂联盟，正是因为两者的问题在最基本层面已趋同化，它们以原始而未分化的方式预示了大众的问题与心理状态。

暴民不带伪善的特质和大众泯除自我利益的特质，对精英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与这种吸引力密切相关的，则是极权主义运动虚假的主张同样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极权运动宣称它们消除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界限，并恢复了人类神秘的非理性完整性。自巴尔扎克揭露法国社会名流的私生活，易卜生《社会支柱》的戏剧化呈现征服欧洲大陆剧场以来，双重道德便成为悲剧、喜剧与小说的核心命题。资产阶级奉行的双重道德，恰是那种永远浮夸却从不真诚的“严肃精神”最鲜明的标记。这种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割裂，与正当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分毫无关联，而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与公民之间心理斗争的反映，即前者以私利为尺斟酌所有公共机构，后者则以全民利益为重参与公共事务。由此看来，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哲学，即主张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便能创造公共利益奇迹，不过是为肆意追求私利而漠视公共利益的鲁莽行径所做的合理化辩护。

针对大陆各政党始终承认代表特定利益的阶级精神，以及源于其自视为整体组成部分的“机会主义”，极权主义运动宣称自身“优越性”在于其秉持的世界观将全面掌控人类[80]。在这种对整体性的主张中，运动的暴民领袖们再次阐述了资产阶级自身的政治哲学，只是将其彻底颠倒。资产阶级在社会压力下，甚至通过对政治机构的经济胁迫，始终坚信公开可见的权力机构受其隐秘的非公共利益与影响力支配。就此而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本质上具有极权主义特征，因为它始终假定政治、经济与社会具有同一性，政治机构不过是私利的外衣。资产阶级的双重标准，以及他们对公私生活的区分，不过是对民族国家的让步，后者曾竭力将这两大领域割裂开来。

对精英产生吸引力就是诸如此类的激进主义。马克思满怀希望地预言国家将会消亡、无阶级社会将会出现，这种预言已变得不够激进、不够弥赛亚。如果别尔嘉耶夫有关“俄罗斯革命份子…通常都是极权主义者”的说法无误，则苏联俄罗斯之所以会对纳粹与知识界共产主义同路人产生同等吸引力，就恰恰在于如下事实：在俄罗斯“革命是一种宗教和哲学，而不仅仅是关乎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冲突”[61]。事实上，阶级向群众的转化以及政治机构威望与权威的瓦解，已在西欧国家催生出与俄国相似的社会环境。因此，这些国家的革命者开始染上典型的俄式革命狂热绝非偶然，这种狂热不再期待社会政治条件的变革，而是企图彻底摧毁所有现存的信仰、价值与制度。暴民仅仅是利用了这种新情绪，促成了革命者与罪犯之间短暂的

联盟，这种联盟在沙皇俄国的许多革命派别中也曾存在，但在欧洲舞台上却明显缺席。

暴民与精英之间令人不安的联盟，以及他们诉求的奇妙契合，其根源在于这两个阶层最先被排除在民族国家结构和阶级社会框架之外。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轻易地相互认同（即便只是暂时的），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自己代表着时代的命运，身后的追随者是浩如烟海的大众，迟早欧洲多数民族都可能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正是这样想的，随时准备发动革命。

结果证明他们都错了。来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底层暴民们，曾寄望于无助的群众能助其夺权，在他们谋求私利时予以支持，以为自己只需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旧有阶层，便能将其底层社会更具进取精神的本质灌输其中。然而掌权的极权主义很快意识到，这种进取精神并非暴民阶层所独有，而且无论如何，这种主动性只会威胁到对人的绝对统治。另一方面，毫无顾忌的行径同样不限于暴民阶层，而且无论如何都能在相对短时间内加以教化。对于那些冷酷的统治与灭绝机器而言，协调一致的庸人群众提供了更优质的素材，只要犯罪行为组织严密且披着常规工作的外衣，他们甚至能犯下比所谓职业罪犯更骇人听闻的罪行。

因此，针对纳粹对犹太人和东欧人民实施的大规模暴行，少数抗议之声并非来自军人，也非来自那些协调一致的体面庸人团体，而是恰恰来自希特勒那些早期的同志，他们是暴民的代表[62]。提出抗议的同样会不是希姆莱这个权力 1936 年后德国最有权势的人，希姆莱是“武装波希米亚人”（海登）成员之一，其特征与知识精英阶层惊人地相似。希姆莱本人比纳粹运动的任何原始领导者都“更正常”，即更像一个庸人[63]。他不像戈培尔那样是个波希米亚人，不像施特莱歇尔那样是个性犯罪者，不像罗森堡那样是个疯子，不像希特勒那样是个狂热分子，也不像戈林那样是个冒险家。他证明了自己将大众组织成绝对统治力量的卓越能力，因为他认定大多数人既非波希米亚人、狂热分子、冒险家、性变态、疯子，也非社会失败者，而首先是职业工作者和好丈夫好父亲。

庸人的退隐私生活，全心全意投身于家庭与事业，这种行为是资产阶级信奉私利至上观念的最后产物，且早已堕落变质。庸人是与自身阶级隔绝的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自身瓦解所催生的原子化个体。希姆莱组织起来实施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群体化罪行的群众，其特征更接近于庸人而非暴民。虽然身处世界崩塌废墟中，资产阶级最担心的莫过于自身私利的安全；而且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即使面对最轻微的煽动性言辞，他们甘愿牺牲一切，包括信仰、荣誉与尊严。没有什么比摧毁那些只顾守护私生活的民众的隐私与私德更容易了。在经历数年的掌权和系统性协调，纳粹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在德国，只有那些睡着的人才能拥有私人性的个

体” [64]。

公平地说，对于那些精英阶层中曾一度被极权主义运动所迷惑的人，甚至因其智力能力而被指控为极权主义的启蒙者，必须指出：这些二十世纪绝望者的所作所为，对极权主义毫无影响。尽管他们在早期运动试图迫使外界认真对待其理论时，确实发挥过某种作用。当极权主义运动夺取政权时，这群同情者早在政权走向最严重罪行之前就被抛弃了。知识、精神和艺术领域的自主性对极权主义而言，如同暴民的流氓行径般危险，而这两者都比单纯的政治反对更具威胁性。新任大众领袖对所有高级智力活动的持续迫害，其根源不仅在于他们对无法理解事物的本能敌意。绝对统治不容许任何生活领域存在自由主动性，不容许任何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在极权主义掌权之后，所有的顶尖人才，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必然被替换为那些愚蠢之辈，这些蠢材的愚昧恰恰构成了极权主义的基石[65]。

本章注释

- [1] 希特勒对听众施展的“魔咒”已被多次证实，最近一次是由《希特勒餐桌谈话录》的出版方所确认（波恩，1951年；美国版《希特勒餐桌谈话录》，纽约，1953年；引文均出自德文原版）。这种魅力，这种“希特勒身上散发出的奇异磁性”，依赖于“这个男人对自己狂热的信仰”（格哈德·里特尔序言，第14页），依赖于他对天下万物所作的伪权威性评判，也依赖于如下事实：无论其观点涉及吸烟的危害还是拿破仑的政策，总能被纳入某种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体系。

迷恋是一种社会现象，希特勒对其周围环境施加的迷恋效应，必须从他所处的特殊社交圈来理解。社会总是倾向于轻信他人伪装的形象，因此一个冒充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获得信任。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缺乏明辨判断力的特征强化了此种倾向，以致于那些不仅持有观点，更能以坚定不移的语气宣扬观念之人，即便屡屡被证明错误，其威望也难以轻易丧失。希特勒基于亲身经历深知现代社会的混乱本质，他发现只要以“毫不动摇”的态度坚持某一观点，就能避免在各种观点之间无助地摇摆不定的困境，以及陷入“一切皆是胡说八道”的信念（第281页），但这种这种狂热的毛骨悚然之任意性对社会具有巨大吸引力，因为在社会聚会期间，它得以摆脱自身不断制造的意见混乱。然而这种“魅力天赋”仅具社会意义；它在《提施埃斯普里奇》中尤为突出，因为希特勒在此遵循社会游戏规则：他并非对同类讲话，而是对国防军将领们发表演说，而这些将领或多或少都属于“社会”阶层。若认为希特勒的成功源于其“魅力天赋”则大谬不然；仅凭此等特质，他终究难逃沙龙名流的局限。

- [2] 参见卡尔顿·J·H·海斯在《极权主义在西方文明史中的新颖性》一文中所作的精辟论述，该文收录于《极权主义国家研讨会论文集》（1939年），见《美国哲学学会会议录》，费城，1940年，第八十二卷。
- [3] 这确实是“历史上首次通过在夺权时刻运用现行正式法律条文来实施的大规模革命”（汉斯·弗兰克，《记录与遗嘱》，1939年，第8页）。
- [4] 关于希特勒及其生涯的最佳研究当属艾伦·布洛克的新传记《希特勒：暴政研究》（伦敦，1952年）。这部著作秉承英国政治传记的严谨传统，对所有可获取的原始资料进行了细致考证，并全面呈现了当时的政治背景。该著作在细节层面已超越康拉德·海登的杰作《元首：希特勒的崛起》（波士顿，1944年

版），尽管后者对事件的整体解读仍具重要价值。关于斯大林的生涯，鲍里斯·苏瓦林的《斯大林：布尔什维主义批判性考察》（纽约，1939 年版）至今仍是权威典籍。艾萨克·德斯蒂尔所著《斯大林：政治传记》（纽约与伦敦，1949 年）因其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深刻洞察而不可或缺；但该书将斯大林类比为克伦威尔、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的解读方式存在缺陷。

[5] 弗朗茨·博尔克瑙，《托图利图里恩的敌人》，伦敦，1940 年，第 231 页。

[6] 引自德文版《锡安长老议定书》，1924 年，第 29 页。

[7] 这无疑是俄罗斯式极权主义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早期审判外国工程师的案件中，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已被用作自我指控的论据：“当局始终坚持要我承认从未实施的破坏行为，我拒绝了。对方警告道：“既然你自称支持苏维埃政府，就用行动证明；政府需要你的供词。”引自安东·西利加《俄罗斯敌人》伦敦 1940 年版，第 153 页。

托洛斯基对此行为给出了理论性辩解：“我们唯有与党同在、依靠党才能正确，因为历史未曾提供其他正确的途径。英国人有句谚语：“我的国家，对错或错……而我们拥有更卓越的历史依据，也就是在具体个案中，无论是非对错，我的党就是真理”（苏瓦林，同上，第 361 页）。

另一方面，那些不属于该运动的红军军官则必须在闭门审判中受审。

[8] 纳粹作家安德烈亚斯·普芬宁明确驳斥了冲锋队为某种理想而战或受理想主义体验驱使的说法，他们的基本经验是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载于《国家科学杂志》第 96 卷。引文翻译自恩斯特·弗兰克尔《双重国家》，纽约与伦敦，1941 年，第 192 页。摘自主要意识形态机构以小册子形式发行的大量文献。党卫军党校的培训手册中，“唯心主义”一词显然被刻意回避。党卫军成员被要求的不在于唯心主义，而在于“在所有意识形态问题上保持绝对的逻辑一致性，并无情地推进政治斗争”（维尔纳·贝斯特，《德国政治》，1941 年，第 99 页）。

[9] 在这方面，战后德国提供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实例。尽管纳粹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主义灌输，但美国黑人部队竟未遭遇敌意，这本身已令人震惊。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德国抵抗盟军作战的最后阶段，武装党卫队并未战斗到最后一人，这个纳粹特种作战部队在经历了远超国防军比例损失的巨大牺牲后，却在最后几周表现得如同普通民兵部队，最终屈服于绝望的局势（卡尔·奥·佩特尔，《党卫军》，载于《历史季刊》，1954 年 1 月）。

[10] 受莫斯科控制的东欧各国政府为莫斯科利益而统治，充当共产国际的代理人；

它们是莫斯科主导的极权主义运动蔓延的例证，而非本土发展的产物。唯一的例外似乎是南斯拉夫的铁托，他可能因意识到俄式极权手段将导致南斯拉夫人口大量流失而与莫斯科决裂。

- [11] 法西斯独裁政权非极权性质的明证，在于其对政治犯判处的刑罚数量出人意料地少，且刑期相对较轻。在 1926 至 1932 年特别活跃的时期，政治罪犯特别法庭共判处 7 人死刑，257 人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360 人被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判处更多人流放；被捕后被判无罪多达 1200 人，这种程序在纳粹或布尔什维克恐怖统治下是难以想象的。参见 E. 科恩-布拉姆施泰特《独裁统治与政治警察：恐惧控制技术》，伦敦，1945 年，第 51 页起。
- [12] 纳粹政治理论家始终强调：墨索里尼的“道德国家”与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国家”不可相提并论（戈特弗里德·内塞，《一党制宪政架构》，载《宪政学杂志》，1938 年，第 98 卷）。

戈培尔论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区别：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后者根基深厚，前者却仅是肤浅之物（《戈培尔日记》J942-1943，路易斯·洛克纳编，纽约，1948 年，第 71 页）。[墨索里尼]并非如元首或斯大林那样的革命者。他与意大利民族的羁绊如此之深，以致缺乏世界性革命者与起义者的广阔胸襟（同上，第 468 页）。

希姆莱在 1943 年指挥官会议上的演讲中表达了相同观点：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事物。作为精神与意识形态运动，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参见科恩-布拉姆施泰特，同上，附录 A。

特勒在二十年代初就认识到纳粹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亲和性：在我们的运动中，两个极端汇聚在一起：左派的共产主义者与右派的军官和学生。这两派始终是最活跃的分子，共产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见海登前引书第 147 页）。二十年代末，冲锋队领袖罗姆在著作中写道时，不过是重复当时的普遍观点：我们与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我们尊重他们信念的真诚性及其为自身事业甘愿牺牲的精神，这使我们与他们团结一致（恩斯特·罗姆《叛国者的历史》1933 年平装本第 273 页）。

在上一场战争中，纳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轻易地将俄罗斯人视为他们的敌人。希特勒在 1943 年 5 月于帝国领袖和党区领袖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场战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与革命国家之间的对决。击溃资产阶级国家对我们而言轻而易举，因为他们在思想培养和态度上都远逊于我们。拥有意识形态的国家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具优势……[在东方]我们遇到了同样奉行意

意识形态的对手，尽管那是错误的意识形态。（《戈培尔日记》第 355 页），此判断基于意识形态而非军事实力。戈特弗里德·内塞在 1936 年出版的《政党与国家》一书中，当为该运动争夺权力的斗争提供了官方版本，他写道：对我们而言，体制统一战线涵盖从德国国家人民党（即极右翼）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力量。共产党则是体制外的敌人。因此，在 1933 年的头几个月里，当整个体制的覆灭已成定局时，我们仍不得不与共产党人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斗（第 76 页）。

- [13] 《希特勒的餐桌谈话录》，第 113 页。书中提供大量例证表明，与某些战后传说相反，希特勒从未打算抵御布尔什维主义以保卫“西方”，而始终准备与“红军”联手摧毁西方，即便在对抗苏联的斗争中亦是如此。参见尤其第 95、108、113 以后、158、385 页。
- [14] 我们现在知道，斯大林曾多次接到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警告。即便驻柏林的苏联军事代表向他通报了纳粹进攻的具体日期，斯大林仍拒绝相信希特勒会违背条约。（参见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讲话》文本，由美国国务院发布，《纽约时报》1956 年 6 月 5 日）
- [15] 苏瓦林在《共产主义在行动》一书第 669 页所载的以下信息堪称绝佳例证：据克里维茨基称，其卓越的情报来源正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37 年实际人口仅为 1450 万，远低于核算的 1.71 亿；由此可见苏联境内竟有近 3000 万人失踪。需特别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发生在三十年代初的“非富农化”运动之后，该运动据估造成约 800 万人丧生。参见《共产主义在行动》，美国政府出版，华盛顿，1946 年，第 140 页。
- [16] 这些基于原始文件的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可参见利昂·波利亚科夫的《仇恨简编》。巴黎，1951 年，第八章（美国版）在题为《锡拉库扎仇恨的收获》的著作中（1954 年版，引自法文原版），我们仅援引其中涉及消灭非日耳曼民族，尤其是消灭斯拉夫族群的内容。希特勒亲笔起草的帝国卫生法案已明确表明，纳粹毁灭机器甚至不会在德意志民族面前停下脚步。其中他提议将所有患有心脏或肺部疾病的家庭隔离于普通民众之外，而这些人肉体消灭自然是该计划的下一步。这份发给黑森-拿骚地区领袖的通告，以元首总部讨论“战争结束前后”应采取何种措施的报告形式发布，该报告还包含了其他若干关于战后胜利德国的灭绝计划。参见《纳粹阴谋与侵略》文件集，华盛顿，1946 年，第七卷，第 175 页及后续。同类计划还包括拟议颁布的“外国人全面法案”，该法案会使警方的“制度性权力”合法化并扩大化，即警方把未犯任何罪行的人送往集中营的权威。（参见保罗·维尔纳，党卫军标准旗队长，

载于《德国青年法》第4期，1944年。）

关于这项旨在灭绝的“人口消灭政策”，其手段之残酷堪比布尔什维克党的清洗运动，必须谨记：“筛选进程永无停滞之时”（希姆莱，《党卫军》载于《国家建设与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第7b期）。“元首及其政党的斗争是前所未有的筛选……这场筛选与斗争表面上于完成于1933年3月30日……元首及其元老们深知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罗伯特·莱伊，《通往秩序堡垒之路》，德国劳动阵线出版社出版。“目前没有销售”）。

- [17] F. 博尔克瑙对此情况的描述是准确的：“当共产党人试图在工人阶级群众中争取影响力时，他们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因此，他们的大众基础，如果他们确实拥有的话，正日益远离无产阶级。（《新共产国际》，载于《月刊》，柏林，1949年，第4期）。
- [18] 威廉·埃本斯坦，《纳粹国家》，纽约，1943年，第247页。
- [19] 正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所描述的。参见苏瓦林，同上，第290页。
- [20] 海因里希·希姆莱关于《组织与义务：论党卫军与警察》的演讲，发表于《国防军政治教义》1937年1月15-23日刊，翻译引自《纳粹阴谋与侵略》，美国政府轴心国罪行起诉委员会办公室，华盛顿，1946年，第四卷，第616页。
- [21] 古斯塔夫·勒庞《群众心理学》（1895年）提及群众特有的无私性。参见第二章第5节。
- [22] 纳粹党的创始人甚至在希特勒掌权前就偶尔将其称为“左翼政党”。1932年议会选举后发生的一件事也颇有意思：“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向领袖愤慨指出，选举前国家社会主义者本可与中央党在帝国议会中组成多数派；如今这一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两党议席合计不足半数；……但希特勒回应道：与共产党结盟仍可掌控多数席位，无人能与我们对抗”（海登，同上，第94及495页）。
- [23] 参见卡尔顿·J·H·海耶斯，前引书，他未区分暴民与群众，认为极权独裁者“来自于群众而非阶级”。
- [24] 这是海登的核心理论，他对纳粹运动的分析至今仍具卓越价值。“从消亡阶级的废墟中，新生知识分子阶级应运而生，其先锋正是最冷酷无情者，那些失去最少的，因而最强大的群体：武装的波希米亚人，对他们而言战争即家园，内战即祖国”（同上，第100页）。
- [25] 帝国国防军将军施莱歇尔与党卫军领袖罗姆之间的密谋一项计划，旨在将所有准军事组织纳入国防军的军事管辖之下，此举将立即为德国军队。这当然必然导致军事独裁统治。1934年6月，希特勒清除了罗姆和施莱歇尔。最初的谈判是在希特勒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展开的，他利用罗姆与国防军的联系，

欺骗德国军界对其真实意图。1932 年 4 月，罗姆在希特勒的一场诉讼中作证称，冲锋队的军事地位已获得国防军全面认可。（关于罗姆-施莱歇尔计划的文献证据，参见《纳粹阴谋》第五卷第 456 页起。另见海登著作第 450 页）罗姆本人曾自豪地记载其与施莱歇尔的谈判始于 1931 年。施莱歇尔承诺在紧急状态下将冲锋队置于国防军军官指挥之下。（参见《冲锋队领袖罗姆回忆录》，萨尔布吕肯，1934 年，第 170 页）由罗姆塑造、遭希特勒持续对抗的冲锋队军国主义特征，即便在里希姆派系被清算后仍主导着其话语体系。与党卫队不同，冲锋队成员始终自诩为“德国军事意志的代表”，对他们而言第三帝国是“由党与国防军两大支柱支撑的军事共同体”（参见《冲锋队的手册》，柏林，1939 年；维克多·吕策《冲锋队》载于《基础文献》、《国家建设》第 7a）。

[26] 罗姆的自传尤其堪称此类文学作品中的真正经典。

[27] 众所周知，反斯大林主义的分裂派系正是基于这一马克思主义论断来批判苏联的发展，且实际上从未超越这一框架。苏联官僚机构经历的反复“清洗”，实质上等同于消灭官僚阶级，却从未阻止他们将该机构视为苏联的统治阶级。以下是拉科夫斯基 1930 年流放西伯利亚时所作的评述：“在我们眼前，一个庞大的管理者阶级正在形成并持续壮大，它具有内部分层结构，通过精心策划的吸纳机制及直接或间接任命不断扩张……维系这个原始阶级的纽带，是一种同样原始的私有制形式，即国家权力。”（引自苏瓦林《托洛茨基传》第 564 页）。这一分析对斯大林主义时代前的发展确实相当精辟。关于党与苏维埃关系的发展，这对十月革命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详见伊·德斯泰尔《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1921》，1954 年版。

[28] 1927 年，90%的村苏维埃及其 75%的主席为无党派人士；县执行委员会由 50%党员和 50%无党派人士组成；而中央委员会中 75%的代表为党员。参见莫里斯·多布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撰写的“布尔什维主义”条目。

苏维埃的党员们如何通过投票“遵照他们从党的常任官员那里收到的指示”，从内部摧毁了苏维埃制度，详见 A·罗森伯格《布尔什维克主义史》（伦敦，1934 年，第六章）。

[29] 这些数据引自维克多·克拉夫琴科的著作《我选择了自由：一位苏联官员的个人与政治生涯》，纽约，1946 年，第 278 页和第 300 页。当然，这显然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来源。但鉴于在苏联俄罗斯的问题上，我们基本上只能依赖这类可疑来源，这意味着我们所能获取的完全依赖各种新闻报道、调查报告和评估，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采用那些至少看似具有较高可信度的信息。某些历史学家似乎认为相反的方法，即仅使用俄罗斯政府提供的材料，这似

乎更可靠，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是这些官方材料，本质上充斥着宣传。

- [30] 斯大林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报告谴责这些偏差反映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党内抵抗。（参见《列宁主义》，1933年，第二卷，第三章。）面对这种攻击，反对派却奇怪地毫无招架之力，因为他们，尤其是托洛茨基，也“总是急于在派系斗争背后发现阶级斗争”（苏瓦林，同上，第440页）。
- [31] 克拉夫琴科，同上，第187页。
- [32] 苏瓦林，同上，第575页。
- [33] 希姆莱亲自制定的党卫军口号开篇即言：“世间不存在为自身而存在的任务。”参见冈特·达伊肯《党卫军》一文，载于《高等院校政治学文集》，1939年。党卫军发布的宣传册仅为内部使用反复强调“必须彻底认识到一切以自身为目的之物的徒劳性”（见《帝国党卫队领袖兼德国政治首脑》未注明日期，仅限警察内部使用）。
- [34] 该做法本身已有大量文献记载。W·克里维茨基在其著作《斯大林的秘密机构》（纽约，1939年）中，将此做法直接追溯至斯大林本人。
- [35]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共两卷，德文首版分别于1925年和1927年出版。未删节译本，纽约，1939年）中指出，与其允许对纲领进行讨论，不如拥有一个过时的纲领（第二卷，第五章）。不久他便公开宣称：“一旦我们夺取政权，纲领自会水到渠成……首要之务是掀起一场空前绝后的宣传浪潮。这才是真正的政治行动，与当下其他问题毫无关联。”参见海登前引书第203页。
- [36] 苏瓦林提出列宁早已废除了政党纲领的作用，我们认为此说有误：“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仅存于列宁脑海之中；每个被放任自流的布尔什维克都会偏离其派系的路线……因为使这些人团结在一起的不是思想，而是他们的气质和列宁的统治地位”（同上，第85页）。
- [37] 戈尔弗里德·费德的《纳粹党纲领》及其著名的二十五点主张发挥了在关于该运动的文献中扮演的角色，比在运动本身中更为突出。
- [38] 希姆莱亲手制定的这句口号所产生的影响难以言表。其德语原文意为“为荣誉而战！为使命而战”，所昭示的绝对忠诚与服从，早已超越了单纯纪律或个人奉献的范畴。《纳粹阴谋》一书虽收录了德文文献与纳粹文献的译本，这些译本作为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可惜质量参差不齐，其中译出了党卫军的座右铭：“我的荣誉即忠诚”（第五卷，第346页）。
- [39] 墨索里尼可能是首位自觉摒弃正式纲领的政党领袖，转而仅凭鼓舞人心的领导与行动取而代之。此举背后蕴含着这样的理念：当下现实本身才是主要灵感源泉，而政党纲领只会阻碍这种灵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思想，与

其说体现于索雷尔的“神话”，不如说体现在詹蒂莱的“现实主义”中。另可参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法西斯主义”条目。1921年纲领制定时该运动已存在两年，其内容主要体现了民族主义哲学。

- [40] 恩斯特·拜尔，《冲锋队》，柏林，1938，出自《纳粹阴谋》，第4卷，783页。
- [41] 首次见于柏拉图《理想国》，第305页，其中将行动解释为 *archein* 与 *prattein*，即命令行动的启动与执行该命令。
- [42] 见《希特勒餐桌谈话录》第198页。
- [43] 参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第十一章。另见，例如，迪特尔·施瓦茨《对纳粹主义的批判》，该文回应了显而易见的批评，即纳粹党上台后国家社会主义者将继续斗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永不放弃斗争，直至每个德国人的生活方式都由其根本价值观所塑造，而这些价值观每天都在重新实现。
- [44] 参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第五章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自身反应的描述。
- [45] 参见汉娜·哈夫克斯布林克所著《未知德国》中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内部编年史的文献汇编，纽黑文，1948，第43、45、81页。该汇编对历史氛围中难以捉摸的要素具有重大价值，这使得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缺乏类似研究显得尤为遗憾。
- [46] 同上，第20-21页。
- [47] 这始于对正常生活的彻底疏离感。鲁道夫·宾丁曾写道：“我们越来越被归入死者之列，归入疏离者之列，因为事件的宏大性使我们疏离隔绝，而非归入流放者之列，后者尚有归返可能”（同上，第160页）。在希姆莱关于如何最终确定其“筛选模式”以重组党卫军的叙述中，仍可窥见对前线将领精英主张的奇特追忆：“最严酷的筛选程序源于战争，源于生死搏斗在此程序中血统价值通过战功得以彰显。”然而战争是特殊状态，必须找到在和平时期进行筛选的途径（同上）。
- [48] 参见恩斯特·荣格《钢铁风暴》，伦敦，1929年。
- [49] 哈夫克斯布林克，同上，第156页。
- [50] 海登，同上著作，揭示了希特勒在运动初期如何始终站在灾难一边，如何畏惧德国可能复苏。他曾多次（即鲁尔政变期间）用不同措辞向冲锋队宣告德国正在沉沦。我们的使命是确保行动成功（第167页），这一成功当时取决于鲁尔地区战斗的瓦解。
- [51] 哈夫克斯布林克，前引书，第156-157页。

- [52] 这种情绪早在战争期间就已普遍存在，鲁道夫·宾丁曾写道：“（这场战争）不能与一场战役相提并论。因为战役中，一位指挥官将他的意志对抗另一意志。但在这场战争中，双方敌人都倒卧在地，唯有战争本身拥有意志（同上，第 67 页）。
- [53] 巴枯宁于 1870 年 2 月 7 日 所写信函，参见马克斯·诺马德《革命的使徒》，波士顿，1939 年，第 180 页。
- [54]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或是巴枯宁本人，或是其门徒涅恰耶夫。关于作者归属及全文译本问题，参见诺玛德著作，同上，第 227 页译文。无论如何，革命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中那种彻底漠视体面与公正准则的体系……在俄国革命史上被冠以“涅恰耶夫主义”之名（同上，第 224 页）。
- [55] 在这些帝国主义政治理论家中尤为突出的是欧内斯特·塞利耶，其著作《神秘主义与统治：帝国主义批判随笔》（1913 年）堪称典范。另可参阅卡吉尔·斯普里茨马《我们帝国主义者：论欧内斯特·塞利耶帝国主义哲学札记》，纽约，1931 年；G·德·蒙福在《历史评论》1912 年 1 月号；以及路易·埃斯特韦《帝国主义的心理学理论：欧内斯特·塞利耶》，1913 年。
- [56] 自 1930 年以来，萨德侯爵在法国已成为文学先锋派最青睐的作家之一。让·波尔汉在萨德《论美德的无知》新版本序言（巴黎，1946 年）中指出：“当我目睹当今众多作家刻意否定艺术技巧与文学游戏，只为追求不可言说之物肮脏中寻找崇高，在颠覆性事物中发掘伟大无阶级社会我不禁自问：我们现代文学那些看似最具生命力，或至少最具攻击性的部分，是否已全然转向过去？而正是萨德本人，是否恰恰决定了这种转向。”另见乔治·巴塔耶《萨德之秘》，载于《批判》第三卷第一册第 15-16、17 期，1947 年。
- [57] 戈培尔，同上，第 139 页。
- [58] 包豪斯的美学理论在此方面具有典型性。另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关于戏剧的论述，见《作品集》，伦敦，1938 年。
- [59] 以下罗姆撰写的话典型反映几乎整个年轻一代（而非精英）的感受：“伪善与法利赛人的统治。他们是当今最显著的特征……再没有比什么东西回避所谓社会道德更会说谎了”。这些男孩“并没有在资产阶级的市侩世界中找到双重道德，再也无法分辨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界限”。这些圈子的同性恋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偏见的抗议。
- [60] 瓦尔特·冯·克普夫在纳粹运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希特勒本人多次强调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斗争》一书中，希特勒佯装理解了建立政党必须立足于世界观的必要性，这源于对民族主义政党的优越性认知。第二卷第一章

《世界观与政党》。

[61]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宗教的起源》，1937年，第124-125页。

[62] 例如，明斯克总政委、党内资深成员威廉·库贝曾有过耐人寻味的干预。1941年，即大规模屠杀伊始之际，他致函其上级写道：“我固然意志坚定，愿全力协助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毕竟在我们自身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人，与当地那些野蛮暴徒截然不同。难道要把屠杀任务交给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吗？甚至遭到当地居民的歧视我无法执行。恳请您给予明确指示，以最人道的方式处理此事，维护我们帝国与党的威信。”此信载于马克斯·温赖希《希特勒的教授们》（纽约，1946年），第153-154页。库贝的干预很快被否决，但丹麦全权代表、纳粹知名分子W·贝斯特为拯救丹麦犹太人生命所作的几乎相同尝试却更为成功。参见《纳粹阴谋》第五卷第二册。

同样，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曾鼓吹斯拉夫民族的劣等性，显然从未到他的理论终将导致这些民族的灭绝。1942年秋季，这位负责乌克兰行政事务的官员在多次试图直接向希特勒求援未果后，写下了关于当地状况的愤怒报告。参见《纳粹阴谋》，第三卷第83页起及第四卷第62页。

当然，这条规则也有例外。那位拯救巴黎免遭毁灭的冯·霍尔蒂茨将军，尽管深知“战争早在数年前便已败局已定”，却仍“担心自己因未执行命令而被解除指挥权”。根据他在巴黎阿贝茨审判期间的证词，若非老牌纳粹份子、驻法大使奥托·阿贝茨的鼎力支持，他是否真有勇气抗拒“将巴黎化为一片废墟”的命令，实属存疑。详见1949年7月21日《纽约时报》。

[63] 一位英国人。斯蒂芬·H·罗伯茨在《希特勒建造的帝国》（伦敦，1939年）中描述希姆莱是“一位彬彬有礼之人，对生活中的简单事物兴趣寥寥。他完全不具备那些自诩为半神的纳粹分子所具有的狂妄之态无人德国这个警察独裁者与他职务的反差堪称绝配，而我确信在德国遇到的所有人中，再没有比他更平凡的了……（第89-90页），这令人想起斯大林母亲的评论颇耐人寻味，据布尔什维克宣传所言，她曾这样评价儿子：“一个模范儿子。但愿人人都像他这样”（苏瓦林，同上，第656页）。

[64] 此言出自罗伯特·莱伊。参见科恩-布拉姆施泰特，前引书，第178页。

[65] 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在此方面出人意料地保持着一致性，其立场众所周知，无需赘言。以最著名的例子毕加索而言，即便他已加入共产党，在俄罗斯依然不受欢迎。安德烈·纪德1936年亲历苏联现实后态度骤变（见《重访苏联》），很可能彻底让斯大林确信：艺术家即便作为同路人亦毫无用处。纳粹政策与布尔什维克措施的区别仅在于：纳粹尚未杀害顶尖人才。

值得深入研究的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德国学者，他们不仅参与了纳粹合作，更因深信纳粹理念而主动效忠。（魏因赖希，同上著作，此为唯一可得的研究，但因其未区分采纳纳粹信条的教授与仅凭政权庇护获得职位者，且忽略相关学者早期经历，致使杰出成就者与狂人被混为一谈，故具误导性。）最引人入胜的是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案例。他关于民主终结与法治终结的精妙理论至今仍具震撼力；然而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就已被纳粹党内部的政治法律理论家取代，例如后来担任波兰总督的汉斯·弗兰克、古弗里德·内塞以及莱因哈德·霍恩等人。最后失势的是历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他在纳粹党上台前就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和党员。1933年，他成为新成立的新“德国历史帝国研究所”所长，该机构下设著名的“犹太问题研究部”，并担任九卷本《新德国研究》（1937-1944）的编辑。四十年代初，弗兰克不得不将职位与影响力让给臭名昭著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所著《二十世纪的迷思》显然毫无“学术”追求可言。弗兰克遭到怀疑的唯一原因，或许仅仅在于他并非一个骗子。

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那些以如此狂热拥抱国家社会主义的暴民，他能理解的唯一热忱在于：“人不可能偶然地拥抱这个秩序，在意愿之上毫不妥协的筛选机制，因为它既不承认情有可原，也不施予宽恕”（党卫军总部训练处颁布的《党卫军手册》，无日期，第4页）。换言之，纳粹在筛选成员时意图自主决策，绝不因任何观点的“偶然性”而动摇。秘密警察遴选布尔什维克成员的情况似乎亦是如此。F·贝克与W·戈丁在《俄罗斯大清洗与供词榨取》（1951年）第160页中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均从党员队伍中征召而来，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自愿选择这份“职业”。

第二章

极权主义运动

第一节

极权主义宣传

只有暴民与精英阶层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运动能量所吸引；而民众则需要通过宣传来争取。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极权主义运动只能有限度地使用恐怖，且必须与其他政党共同争取支持者，并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合乎情理。此时的大众向尚未与其他信息来源相隔绝。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并反复强调：在极权国家里，宣传与恐怖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1]。然而这只是部分真相，一旦极权主义取得绝对控制权，它便以灌输和暴力取代宣传，其目的并非恐吓民众（这种手段仅在政治反对派尚存的初始阶段使用），而是为了持续推行其意识形态教条与实用谎言。极权主义不会满足于在事实相悖时宣称失业不存在，它会废除失业救济金作为宣传手段[2]。同等重要的是，尽管废除的方式出乎意料，但这种对失业现象的否认实现了古老的社会主义教条：不劳动者不得食。再举一例：当斯大林决定改写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其新版本的宣传手段在于连同旧书旧文献一并摧毁其作者与读者：1938年出版的《共产党新官方史》标志着这场摧毁整整一代苏联知识分子的超级清洗终于告终。同样，纳粹在东欧占领区初期主要依靠反犹宣传来巩固对民众的控制。他们既不需要也不使用恐怖手段来支撑这种宣传。当他们消灭大部分波兰知识分子时，并非因为这些人的反对，而是基于其理论认为波兰人没有智慧，而当他们计划绑架蓝眼睛金发的孩子，并非意图恐吓民众，而是为了拯救“日耳曼血统”[3]。

由于极权主义运动身处于一个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迫采用我们通常所说的宣传手段。无论面对国内非极权主义阶层，还是国外非极权主义国家，此类宣传始终是指向外部领域。极权主义宣传所针对的外部领域可能千差万别；即便夺

取政权后，其宣传仍可能指向本国那些尚未经过充分思想灌输的民众群体。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在战争期间对将领们的演讲堪称宣传典范，其主要特征在于元首用荒诞的谎言取悦宾客，企图赢得他们的支持[4]。外部领域也可由极权主义同情者群体代表构成，即使他们尚未准备好接受该运动的真正目标；最后，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即使是党员也被元首的亲信或精英部队成员视为属于这样的外部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样仍需接受宣传，因为他们尚未能被可靠地掌控。为避免高估宣传谎言的重要性，须铭记更多实例：希特勒在阐明运动真实目标时曾展现完全真诚与残酷的直白，但公众因未准备好接受如此彻底的立场而拒绝承认[5]。从根本上说，极权统治力图将宣传手段局限于外交政策或海外运动分支，仅为向其提供适宜素材。每当国内的极权主义灌输与面向海外的宣传路线发生冲突时（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的俄罗斯确实发生过，这并非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同盟之时，而是与希特勒开战后他加入民主阵营之际），国内便会将宣传解释为“临时战术性策略”[6]。这种区分，即对运动内部成员（他们已无需宣传）的意识形态进行教条宣传，与对外部世界进行纯粹宣传，这种区分在运动尚未掌权时便已确立。宣传与灌输的关系通常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运动规模，另一方面是外部是外部压力。运动规模越小，越倾向于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纯粹宣传；而当极权政权面临外部世界压力时，即便在铁幕之后也无法完全忽视这种压力时，极权独裁者便会越发积极地从事宣传活动。关键在于，宣传的必要性始终由外部世界所决定，而这些运动本身并非真正传播思想，而是灌输思想。相反，灌输思想必然伴随着恐怖手段，其强度会随着运动势力的增强或极权政府隔绝外界干扰的程度而加剧。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恐怖手段更胜一筹。即便其心理目标已然达成，极权政权仍持续运用恐怖手段：其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它统治着完全屈服的民众。当恐怖统治臻于极致（如集中营所示），宣传便彻底消失；在纳粹德国，宣传甚至被明令禁止[7]。换言之，宣传是极权主义应对非极权世界的工具之一，或许是最重要的工具；而恐怖，恰恰是其统治形态的本质所在。它的存在与心理或其他主观因素无关，正如宪政国家法律的存在与违反法律的人数无关。

作为宣传的对立面，恐怖在纳粹主义中扮演的角色比在共产主义中更为重要。纳粹分子并未像德国早期政治犯罪浪潮中那样（如拉滕瑙和埃尔茨贝格遇刺案）针对显赫人物下手；相反，他们通过杀害基层社会主义官员或反对党有影响力成员，企图向民众证明仅仅加入这些组织就意味着危险。这种大规模恐怖活动虽仍处于相对小规模运作阶段，却因警方和法院对所谓右翼政治罪犯的追责不力而持续升级。正如某纳粹宣传家精辟指出的，这种手段具有“权力宣传”的价值：它向大众昭示纳粹势力凌驾于官方之上，加入纳粹准军事组织比效忠共和派更为安全。这种

印象因纳粹对利用政治犯罪的特殊处理方式而大大增强。他们通常公开承认这些罪行，但从不为“基层人员的暴行”道歉（只有纳粹同情者才做这种道歉），并以此向民众彰显自身与其他政党“空谈家”的本质差异。

此类恐怖行径与赤裸裸的黑帮暴行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点不言而喻。这并非意味着纳粹主义就是我们有时所说的黑社会，实际情况是，虽然纳粹没有承认，但他们却从美国黑帮组织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正如他们的宣传活动公认地借鉴了美国商业宣传手法。

然而，在极权主义宣传中，比直接威胁和针对个人的罪行更具针对性的，是对所有不听从其教义者施加的间接、隐晦而充满威胁的暗示，以及后来对“有罪者”与“无辜者”一视同仁的大规模屠杀。共产主义宣传威胁人们将错过历史列车，永落后于时代，虚度一生；正如纳粹曾威胁人们违背自然与生命的永恒法则，导致血统遭受不可逆转且神秘的退化。极权宣传对自身主张“科学性”的过度强调，常被比作某些面向大众的广告技法。诚然，每份报纸的广告版都展现着这种“科学性”：制造商借助数据图表和“研究部门”佐证，宣称自家产品是“世界最佳香皂”[11]。同样真实的是，广告人的夸张想象中存在某种暴力元素，当广告宣称“不用本品牌香皂的女孩将终生长痘且嫁不出去”时，背后隐藏着垄断的狂妄幻想：终有一日，“唯一防痘香皂”的制造商将有权剥夺所有拒用其产品的女孩获得丈夫的权利。无论是商业宣传还是极权主义宣传，科学在此类案例中显然只是权力的替代品。极权运动对“科学”证明的痴迷一旦掌权便烟消云散。纳粹甚至抛弃了那些愿意效忠的学者，布尔什维克则将科学家的声誉用于完全非科学的目的，强迫他们扮演江湖骗子的角色。

但大众广告与大众宣传之间常被夸大的相似性仅止于此。商人通常不自诩为先知，也不不断证明其预言的正确性。极权宣传的科学性特征，在于其几乎排他性地坚持科学预言，有别于更传统的诉诸历史的做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种族主义，其意识形态根源在两类情形下都昭然若揭：当其代言人佯称已发现命运链条中蕴藏的隐秘力量，这些力量将为他们带来好运。当然，那些“将所有历史事件都归因于宿命链条所联结的伟大第一因，从而将人类从人类历史中抹去”（托克维尔语）的绝对主义体系，对大众具有巨大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终究无法让纳粹领导层确实信奉以下教条，而非仅将其作为宣传工具，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越是准确地认识和遵循自然与生命的法则……就越能顺应全能者的意志。我们对全能者意志的洞察越深刻，我们的成功就越辉煌”[10]。显然，只需稍作改动，斯大林的信条便可浓缩为两句话：“我们对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与遵循越精确，就越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深刻，我们的成功就越大”[11]。

斯大林关于“正确领导”的观念，至少在此得到了最恰当的诠释。

极权主义宣传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及其以预言形式发表声明，这推向方法上有效、内容上荒谬的地步，因为从煽动性的效果而言，避免争议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掌控当前的条件下提出一种主张，同时宣称唯有未来才能揭示其价值。然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非此手法的发明者，亦非唯一使用者。大众宣传的科学性在现代政治中确已普遍运用，以至于被解读为西方世界自十六世纪数学物理兴起以来对科学痴迷的普遍征兆；由此极权主义似乎只是某个进程的终极阶段，而在此进程中“科学已成为能神奇治愈存在之恶、改造人性本质的偶像”[12]。事实上，科学性与群众兴起之间确有早期关联。那些期盼“历史发展的自然法则”显现的人们，曾对群众的“集体主义”表示欢迎，因为这种法则将消除个体行为的不可预测性[13]。有人援引昂凡坦的预言为例，他早已预见“调动群众的艺术将臻于完美之时，届时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将拥有取悦与感动众生的能力，其精准度恰如数学家解几何题或化学家分析物质般确凿无疑”。并由此得出结论：现代宣传正是诞生于此[14]。

然而，无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存在何种缺陷，也无论它们对十九世纪常识的形成产生了多大影响，也绝不会导致“人类生活中功利主义部分无可救药式的增长”[15]，后者乃是极权主义宣传科学性所迎合的大众特征。正如我们从孔德那里所知，实证主义者坚信未来终将可被科学预测，这种信念建立在将利益视为历史中无所不在的力量，也建立在客观的权利法则最终会被发现这一假设之上。侯昂提出的政治理论：“君王统御民众，利益统御君王”，主张客观利益是“唯一永恒不变的法则”，“无论理解正确与否，利益决定政权存亡”，这些观点构成了现代功利主义、实证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传统核心。但这些理论没有一个像极权主义所尝试的那样，去假设“改造人性”的可能性，而这恰是极权主义的真实企图。相反，这些理论或明或暗地预设：人类本性恒常不变，历史不过是客观环境变迁与人类反应所构成的故事，而正确的理解方式是，利益会改变环境，却无法改变人性。政治中的“科学主义”依然预设认为人类福祉乃其宗旨，此概念与极权主义完全格格不入。

正是由于人们理所应当地把功利主义视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极权政府反功利主义的行为，以及对大众利益的完全漠视，才会造成如此大的震撼。这将一种前所未闻的不可预测性引入当代政治。然而极权主义在它掌权之前，极权宣传就展示出常常转移重心的形式，并早已表现出对民众利益不再关心的样子。因此，盟军怀疑希特勒在战争初期下令屠杀精神病患者是为了消除多余的口粮负担，这种猜疑完全站不住脚[17]。希特勒并非受战争所迫抛弃一切道德考量，而是将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视为启动谋杀计划的绝佳契机，这一点跟计划中的其他要点一样，都是以

千年为单位精心谋划的[18]。由于数个世纪以来欧洲历史几乎教会人们以“谁受益”来评判每项政治行动，以特定利益动机来解读所有政治事件，他们突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可预测性。由于其煽动性特征，极权主义宣传早在夺权前就已昭示：民众受所谓自我保存本能驱使的程度何其微薄，因而未被严肃对待。然而极权主义宣传的成功，与其说依赖煽动性，不如说源于这样的认知：唯有稳定的社会团体能充当个体与群体间的必要传导带，集体利益的力量才得以显现；而单纯基于利益的宣传无法在大众中展开，因为是大众的主要特征是其游离于任何社会政治团体之外，不折不扣代表了一种个体利益的混沌状态。极权运动成员的狂热，在性质上明显不同于普通政党成员的最高忠诚，这种狂热源头在于大众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已做好牺牲自我的准备。纳粹证明了仅凭“否则我们将灭亡”的口号就能将整个民族拖入战争（1914年的战争宣传会刻意回避这种表述），而这并非发生在饥荒、失业或民族抱负受挫的时期。在战争明显败局已定的最后几个月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精神，此时纳粹宣传用一种承诺来安慰惊恐的民众——即使战败，元首“以英明智慧为德意志民族准备好了毒气室内的安乐死”[19]。

极权主义运动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方式，把其中功利主义内涵以及阶级或民族的利益掏空。这些概念被呈现为无懈可击的预言形式，其形式已比内容更具重要性[20]。群众领袖的首要资质在于他是永远正确的；他绝不会承认错误[21]。此外，一贯正确的假设不是建立在其才智高超，而是基于对历史或自然中本质上可靠力量的正确解读，失败和毁灭都不能证明这些力量的错误，因为它们坚称：从长远看，就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掌权的群众领袖有一项凌驾于所有功利考量之上的诉求，就是让自己的预言成真。纳粹在战争末期毫不犹豫地动用其尚存的组织力量，竭力将德国摧毁得一干二净，只为验证他们预言的真实性，即德国人民若战败必遭灭顶之灾。

一贯正确的宣传效果，以及假装成可预测力量的单纯诠释型代理人的惊人成功，都鼓励极权独裁者养成一个习惯——以预言形式宣布政治意图。最著名的例子是希特勒 1939 年 1 月在德国国会发表的宣言：“今日我再次作出预言：倘若犹太金融家……再度成功将各国人民卷入世界大战，其结果将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23]。用非极权主义语言表述即：我意图发动战争，并意图屠杀欧洲犹太人。同样，斯大林在 1930 年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为清除党内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时，将他们描述为“垂死阶级”的代表[24]。这一形容方式不仅赋予其特有的严酷性，更以极权主义风格宣告了那些被预言“消亡”者的肉体毁灭。两者皆达成相同目的：根据不可改变的必然法则，清算行为将被嵌入历史进程，人只能去做或者承受那些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待受害者被处决后，“预言”便成为事

后开脱的借口：除了已经被预言的，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无论是“历史法则”预示着各阶级及其代表者的“灭亡”，还是“自然法则”消除所有那些本就“不适于生存”的一切成分，包括民主政体、犹太人、东方次等人种以及无法治愈的患者，这些都不重要。顺带一提，希特勒也曾宣称以“不太费事的方式”清除“垂死阶级”[26]。

这种方法与其他极权主义宣传手段一样，唯有在运动夺取政权后才万无一失。届时，关于极权独裁者预言真假的争论，便如同与潜在凶手争辩其未来受害者生死存亡般荒诞，因为凶手只需杀害当事人，便能立即证明自己言论的正确性。在这种条件下，唯一有效的论据就是立即拯救被预言将死之人。在大众领袖夺取权力、将现实强行扭曲成其谎言之前，其宣传的特征是对事实本身的极端蔑视[27]，因为在他们看来，事实完全取决于能够捏造事实的人的权力。所谓“莫斯科地铁是世界上唯一的地铁”这一断言，在布尔什维克尚未拥有摧毁其他所有地铁的能力之前，仅仅是一个谎言。换言之，比起其他极权主义宣传手段，这种一贯正确的预言方法更能暴露极权主义领袖征服世界最终目标。因为唯有在完全受其掌控的世界里，极权统治者才能实现所有谎言，使所有预言成真。

预言式的科学语言满足了那些在世间失去归属感的民众的需求，他们此刻已准备好重新融入永恒而主宰一切的力量，这些力量自会将人类这艘在逆境波涛中挣扎的船只，托向安全的彼岸。“我们依据遗传学的判决塑造民族生活与立法体系”[28]纳粹分子如是宣称，正如布尔什维克向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具有历史判决的效力一样，他们由此承诺的胜利是不受特定事业中“暂时性”的挫败与失败所左右。大众与阶级相反，他们渴求的是以最抽象的形式取得胜利与成功；他们并非因特定集体利益而捆绑在一起，不认为这些利益是群体存活的必要条件，也不认为在压倒性的胜算之下还要坚持这些利益。比起可能获胜的事业或可能成功的具体事业，他们更看重这些：无论基于何种动机都会胜利，无论从事何种事业都会成功。

极权主义宣传完善了大众宣传的技术手段，但既非其发明者，亦非其主题的开创者。随着五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崛起与民族国家的解体，暴民登上欧洲政治舞台时，这些手段与主题早已就绪了。如同早期的暴民领袖，极权运动的代言人对那些普通党派宣传或公众舆论不愿或不敢触及的事物，怀有无懈可击的敏锐直觉。一切隐秘之事、一切被刻意沉默之事，无论其本身重要性如何，都变得意义重大。暴民们真心相信：所谓真相，正是体面社会虚伪地回避或用腐败掩盖的一切。

神秘性本身便成为选题的首要标准。神秘的来源并不重要；它可能源于合理且具有政治可理解性的保密需求，如英国秘密情报局或法国第二局的情况；亦可源于革命团体的阴谋需求，如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恐怖组织；或存在于某些社团结构中。

这些原始秘密早已广为人知，唯剩形式化的仪式仍保留着昔日的神秘感，如共济会；抑或植根于古老迷信，使特定群体被传奇所笼罩，如耶稣会与犹太人。纳粹在选择此类主题进行大众宣传方面无疑更胜一筹；但布尔什维克也逐渐掌握了这门技巧，尽管他们较少依赖传统认可的神秘元素，更偏好自创的阴谋论。自三十年代中期起，布尔什维克宣传中便接连出现各种神秘世界阴谋论：从托洛茨基分子的密谋，到三百家族的统治，再到英美情报机构阴险的帝国主义（即全球主义）图谋。

此类宣传的有效性揭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不相信任何可见之物，不信任自身经验的真实性；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往往会被那些既普遍又和谐的事物所俘获。能打动群众的并非事实，甚至不是虚构的事实，而是他们自认所属体系的内在一致性。重复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为普遍认为大众理解记忆能力低下，其实它之所以重要仅在于能使大众确信某种持久的连贯性。

一般认为，大众拒绝承认偶然性无处不在现实。他们对所有意识形态都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将事实解释为规律的例证，并通过虚构一种包罗万象的全能力量来消除偶然性，这种力量被认为是所有意外事件的根源。极权主义宣传正是利用这种逃离现实、沉溺虚构，逃离偶然、追求一致性的心理而蓬勃发展。

极权主义宣传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在不与常识发生严重冲突的前提下，满足大众对完全一致、可理解且可预测世界的渴望。例如，当苏联所有政治对手的“供词”都采用相同措辞、承认相同动机时，渴求一致性的群众会将这种虚构视为其真实性的终极证明；而常识却告诉我们，正是这种一致性超乎寻常，恰恰证明了它们是捏造的产物。形象地说，这如同大众要求不断重现《七十士译本》的奇迹：据古代传说，七十位互不相识的译者竟产出完全相同的希腊文旧约译本。常识只能将此视为传说或奇迹；但它同样可被引用为译文每个字都绝对忠实于原文的铁证。

换言之，大众痴迷于逃离现实的渴望，因为在本质上他们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他们无法承受现实中偶然且不可理解的层面。而同样的事实是，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与人类心智的某些能力有关，这些心智能力所具有的结构一致性，无疑比现实的单纯偶发事件更优越。大众逃离现实的举动，是对他们被迫生存却无法真正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判决，因为偶然性已成为世界的至高主宰，而人类需要将混沌偶然的境况持续转化为具有相对一致性的人工模式。大众对“现实主义”、常识及所有“世间合理性”（伯克语）的反抗，源于其原子化状态：他们丧失社会地位的同时，更失去了整个共同关系领域，唯有在此领域的框架内，常识才能发挥作用。在精神与社会双重无根的境遇中，对任意性与规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依存关系的理性洞察已然失效。极权主义宣传唯有在常识丧失效力时，才能肆意践踏常识。

当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面对无政府状态的蔓延与彻底的任意性衰败，要么屈服于意识形态最僵化、最虚幻的逻辑一致性，而大众往往会选择后者，并甘愿以个人牺牲为代价。这并非源于愚昧或邪恶，而是在普遍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能为他们保留最低程度的自尊。

纳粹宣传的专长在于利用大众对一致性的渴求，而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则是在实验室般操作展示了这种渴求对孤立个体的影响。苏联秘密警察竭力让受害者相信自己有罪，而且都是他们从未犯过，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无从犯下的罪行；这种彻底隔绝与消除所有真实因素的做法，使得预先准备好的供词中的那种逻辑，那种“故事”一致性，变得势不可挡。在虚构与现实的界限中，被指控的荒诞性与内在一致性变得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抵御持续威胁不仅需要坚韧的意志，更需要对同胞（如亲朋好友和邻居）的坚定信念：他们绝不会轻信“故事”的真实性。唯有如此，才能抵抗住诱惑，不屈服于那单纯空想的犯罪可能性。

诚然，这种人为制造的精神错乱极端状态仅可能存在于极权世界。然而在极权体制中，招供并非惩罚的必要条件，它实为宣传机器的组成部分。招供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一项特色，正如奇特执着于通过追溯性、回溯性立法将罪行合法化的做法，也构成了纳粹宣传的特色。在这两种情形中，目标都是要达成一致性。

在夺取政权并建立符合其教条的世界之前，极权主义运动会营造出一个虚假的、一致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比现实本身更能满足人类心灵的需求；在纯粹的想象中，被剥离根基的群众感觉如家般的自在，免受现实生活与真实经历对人类及其期望造成的无休止冲击。在它尚未掌权之前，极权主义宣传的力量无法拉下铁幕，阻止任何人用最微小的现实打破完全虚构世界中恐怖般的宁静。而当它掌权之后，极权主义有能力将大众与现实世界隔绝。对于那些尚未整合、正在瓦解的群众而言，每次新的厄运打击都会使他们变得更容易受骗；而他们能理解来自真实世界所能提供的唯一讯号，就是其存在的裂隙，也就是这个世界不愿公开讨论的问题，或是那些不敢反驳的谣言，因为这些谣言即使有些夸张、扭曲，都会触及某个伤疤。

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正是从这些痛处汲取了真实性与真实体验的元素，以此弥合现实与虚构之间的鸿沟。唯有恐怖统治才能依赖纯粹虚构，即便极权政权靠恐怖维系的谎言虚构也尚未完全恣意妄为。尽管这些宣传通常比组织运动的谎言更粗鄙、更厚颜无耻，甚至可以说更具原创性。（要传播经篡改的俄国革命史，宣称红军从未出现过名为托洛茨基的总司令，需要的不是宣传技巧而是权力。）另一方面，运动的谎言则精妙得多，它们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每个隐秘角落，尤其在官方当局营造的秘密氛围中最为得心应手。在大众眼中，这些谎言反而因触及被掩盖的真实状况而获得高级“现实主义”的声望。无论是上流社会的丑闻曝光，还是政

客腐败的揭露，所有这些属于黄色新闻的东西，在他们手中却成了不只是耸人听闻的重要武器。

纳粹宣传最有效的虚构故事莫过于犹太世界阴谋论。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煽动者便惯用反犹宣传手段，这种手法在二十年代的德国和奥地利尤为盛行。所有政党和舆论机构越是回避讨论犹太问题，暴民就越坚信犹太人是当权势力的真正代表，犹太问题正是整个体制虚伪与不诚实的象征。

战后反犹宣传的实质内容既非纳粹所独有，也非新颖独创。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关于犹太世界阴谋的谎言便已盛行，其根基在于散居全球的犹太民族所形成的既有国际关联与相互依存关系。关于犹太世界霸权的夸大观念历史更为悠久，可追溯至十八世纪末，当时犹太商业与民族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已然显现。将犹太人塑造成邪恶化身的形象，通常被归咎于中世纪残余的迷信记忆，但实际上与犹太人自解放后在欧洲社会扮演的模糊角色密切相关。有一点无可否认：战后时期犹太人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

犹太人自身的关键在于，他们越是显赫突出，其实际影响力与权力地位就越是相形见绌。民族国家稳定性与力量的每一次削弱，都直接冲击着犹太人的地位。民族对国家的部分成功征服，使政府机器无法维持其凌驾于所有阶级和党派之的地位，从而使与犹太人口阶层结盟的价值归于无效，而该阶层本应该置身于社会阶层之外，对党派政治保持中立。随着帝国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日益关注外交政策并增强对国家机器的影响力，犹太财富的主体却始终拒绝投身工业企业，固守资本贸易的传统。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几乎使犹太群体作为整体对国家的经济价值归零，同时也消解了社会隔离对他们自身的优势。一战后，中欧犹太社群的同化程度与民族化程度，已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法国犹太社群的状态不相上下。

相关国家对局势变化的认知程度，在 1917 年得以显现：当时德国政府遵循长期以来的传统，试图利用其境内的犹太人作为与协约国进行初步和平谈判的筹码。然而，德国政府并未直接与德国犹太社群的既定领袖接触，而是试图绕过这些领袖，直接与德国犹太人社区的非正式代表进行接触。犹太人社群中，权力落入了规模较小且相对缺乏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少数派手中。他们之所以仍能获得传统信任，恰恰因为坚持主张犹太民族独立于公民身份之外，因而被期待能凭借国际人脉与全球视野提供特殊服务。然而这一措施最终被证明为德国政府的失策之举。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出了犹太银行家从未做过的事：他们提出自己的条件，并告知政府唯有在不涉及领土兼并和战争赔款的前提下才接受和平谈判[30]。昔日犹太人对政治议题的漠然态度已不复存在；多数派因不再与民族保持距离而失去利用价值，而犹太复国主义少数派则因持有独立政治主张而变得毫无用处。

中欧君主制政府被共和政体取代，标志着中欧犹太社群的彻底瓦解，此情形正如五十年前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建立所引发的后果。当新政府在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保护犹太人的环境中建立时，犹太人早已丧失了大部分影响力。凡尔赛和谈期间，犹太人主要以专家身份参与，就连反犹主义者也承认：战后那些猖獗的小偷小摸的犹太骗子多为新移民（其欺诈行为与本土教友截然不同，背后潜藏着一种奇特心态，恰似昔日对社会规范的漠视），他们与所谓犹太国际组织的代表毫无瓜葛[31]。

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反犹团体中，且在反犹主义盛行的氛围里，纳粹宣传发展出一套处理该议题的方法，既区别于其他所有方法，又优于它们。然而，没有一条纳粹口号是创新之作，就连希特勒那套精明的阶级斗争图景也不例外。该图景描绘犹太商人剥削工人，而与此同时，他的兄弟却在工厂院子里煽动工人罢工[32]。唯一的新意在于纳粹党要求成员提供非犹太血统证明，且尽管有费德尔纲领存在，该党对掌权后具体针对犹太人的措施始终含糊其辞[33]。纳粹将犹太问题置于核心地位，其宣传的标准宣称反犹主义不再是关于少数群体观点的议题，也不是国家的关注点[34]，而是每个个体存在中至关重要的私密问题；任何家族谱系不纯者皆不得加入，且在纳粹等级体系中地位越高，追溯家族谱系的年代就需越久[35]。同样地，尽管逻辑稍显松散，布尔什维克主义通过将成员组织为“天生的无产阶级”，并将其其他阶级出身视为耻辱与丑闻，从而扭曲了马克思主义于无产阶级最终必然胜利的教义[36]。

纳粹宣传极具巧思，将反犹主义转化为自我定义的原则，从而使其摆脱单纯意见阶段的起伏不定。它仅将群众煽动作为预备步骤，而且从未高估其影响力的持久性[37]，无论是演讲还是出版物。这为原子化、无定形、不稳定且微不足道的个体所组成的大众，提供了一种自我界定与认同的途径，不仅恢复了他们曾从社会功能中获得的部分自尊，更营造出一种虚假的稳定感，使其更易成为组织招募的对象。通过这种宣传，该运动得以将自身塑造成群众集会的延伸，并合理化了本质上徒劳的自我重要感与神经质的安全感。

纳粹党在处理其他相关议题时，同样巧妙运用了由他人创造并经实践检验的口号。当公众注意力同时聚焦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极，当二者被视为水火不容且实际构成左右派意识形态分水岭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提出了一种旨在实现民族统一的综合方案，这个解决方案以“德国”与“工人”双重标识，将民族主义与工人阶级诉求相联结。纳粹运动以左派的国际主义为幌子。其名称本身便暗含此意。运动的名称本身就窃取了其他所有政党的政治内容，并暗中声称要将它们全部纳入其中。所谓对立的政治学说（如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的组合在历史上曾被尝试过，且取得过成功；但纳粹实现自身融合的方式，使议会

社会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自称工人至上者与德国至上者之间的斗争，都像是掩盖险恶动机的伪装，难道纳粹运动的成员不正是同时具备所有这些身份吗？

有趣的是，纳粹党在创党初期就足够谨慎，从不使用诸如民主、共和、独裁或君主制等暗示特定政体的口号[39]。仿佛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始终深知自己将开创完全崭新的政体。任何关于未来政体形态的讨论，都可被斥为空谈形式主义，正如希特勒所言，国家不过是维护种族的“手段”；正如布尔什维克宣传所宣称，国家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40]。

然而，纳粹党以另一种奇特而曲折的方式，为其未来角色提供了宣传性质的答案，即他们将《锡安长老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作为未来组织德意志民众建立“世界帝国”的蓝本。利用《议定书》并非纳粹所独有；战后德国售出数万册，甚至将其公然奉为政治手册的做法也非首创[41]。然而这份伪造文献主要用于诋毁犹太人，煽动暴民警惕犹太统治的危险[42]。在纯粹的宣传层面，纳粹的发现在于：民众并非因犹太人统治世界而恐惧，而是对实现方式充满兴趣；《议定书》的流行根源于崇拜与求知欲而非仇恨；尽可能贴近其中某些精妙惯用语，是聪明的做法。例如“对德国人民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就抄袭《议定书》中的“凡利于犹太民族者皆属道德正义与神圣之举”[43]。

《议定书》在诸多方面都是份极具趣味且值得关注的文献。抛开其廉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谈，其核心政治特征在于以荒诞不经的方式触及了当时所有重大政治议题。该文献在原则上反民族国家，将民族国家描绘成脚踏泥土的巨人。它摒弃国家主权，相信要建立一个以民族为基础的世界帝国[41]，正如希特勒所提出的构想。他们不满足于在某个特定国家进行革命，而是旨在征服和统治世界。他们向人民承诺，无论对方在人数、领土和国家力量上占优势，他们仅凭组织就能实现世界征服。诚然，他们说服力的部分来源是源远流长的迷信因素。自古以来便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某个国际教派自远古时代起便持续追求相同的革命目标，这一观念由来已久[45]，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便在政治幕后文献中扮演着角色，尽管十八世纪末的撰写者们从未想到，这个“革命教派”，这个“文明国度中的异类民族”可能是犹太人[46]。

《议定书》中全球阴谋的主旨最能吸引大众，因为它与当时的新权力格局高度契合。（希特勒很早就承诺纳粹运动将“超越现代民族主义的狭隘界限”[47]，并在战争期间试图……在党内采取行动，旨在彻底从国家社会主义词汇中抹去“民族”一词。）唯有世界强权似乎仍存独立生存的可能，唯有全球政治方能成就持久成果。这种局面令非世界强权的小国心生恐惧，实属情理之中。《议定书》似乎展示了一条出路，它不依靠不可改变的客观条件，仅凭组织力量即可实现。

换言之，纳粹宣传在“因强烈民族性而超国家的犹太人”身上，发现了主宰世界的德国人先驱，并向大众宣称：“率先识破犹太人阴谋、率先将其驱逐的民族，终将取代其统治世界的地位[49]”！犹太人统治世界的幻觉，构成了未来德国称霸世界的妄想基础。希姆莱宣称“我们欠犹太人治国之道”时，正是指“元首已将其背得滚瓜烂熟”。《议定书》将世界征服描绘成切实可行的目标，暗示整个计划仅需灵感或精明的诀窍即可实现。它宣称阻碍德国征服世界的唯一障碍，是那个显然微不足道的犹太民族。因此他们宣称不靠暴力手段统治世界，一旦揭穿其秘密并大规模效仿其方法，便将成为轻松战胜的对手。

纳粹宣传将所有这些崭新而充满希望的前景全部集中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上。这种新共同体在纳粹运动中于准极权主义氛围下初步实现，其基础在于全体德国人的绝对平等，这种平等并非权利平等而是本质平等，以及他们与其他所有民族的绝对差异[51]。纳粹上台后，该理念逐渐失势，取而代之的是：一方面是对德意志民族普遍的鄙夷（纳粹党虽向来怀有此念，但此前不便公然示人）[52]，另一方面则是极度渴望扩大自身队伍，尽量包括其他民族的“雅利安人”，这一概念在纳粹宣传的权力扩张前期仅扮演了次要角色[53]。民族共同体不过是为建立“雅利安”种族社会所做的宣传铺垫，而这种社会终将使所有民族（包括德国人）陷入毁灭。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共同体是纳粹党对共产主义者承诺的无阶级社会所作的回应。若抛开所有意识形态含义，两者宣传号召力的差异显而易见。尽管都承诺消除所有社会与财产差异，无阶级社会显然意味着所有人将沦为工厂工人的地位；而带有世界征服阴谋论色彩的“人民共同体”，却为每个德国人提供了成为工厂主的美好愿景。然而“人民共同体”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其建立无需等待未来时日，也不依赖客观条件，它能在运动的虚构世界中立刻实现。

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并非说服，而是在于组织力量，即“在不掌握暴力手段的情况下积累权力”[54]。为此，意识形态内容的原创性只能被视为多余的障碍。当代两大极权运动在统治手段上如此骇人地“新颖”，在组织形式上如此巧妙，却从未宣扬过新学说，也从未创造过未曾流行的意识形态，这绝非偶然。赢得群众的并非煽动性言论的短暂成功，而是“活的组织”的可见现实与力量[56]。希特勒作为群众演说家的卓越天赋并未助其赢得运动地位，反而误导对手将其轻视为简单煽动家；而斯大林则成功击败了俄国革命中更杰出的演说家[57]。究竟何种特质能区分极权主义领袖与独裁者？关键在于他们以何种程度的天真和执着的专注力，从现有意识形态中撷取最适合作为全新虚构世界根基的元素。《议定书》的虚构性与托洛茨基阴谋论同样成立，因为两者都包含可信靠的要素，即使是极权主义的虚构世界也无法安全地忽略这些要素。这些要素包括犹太人在过去的非公开影响力；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他们的手法在于：在选定的虚构中运用现实元素与可验证经验，同时超越这些元素，将其概括为超越个体经验控制范畴的领域。凭借此类概括，极权主义宣传构建出足以与现实世界抗衡的虚构体系，而现实世界的致命缺陷在于其缺乏逻辑性、一致性与组织性。虚构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与严密组织性，使概括化表述得以在具体谎言的崩解中存续，这也是犹太人势力在惨遭屠戮后依然存在，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被清算、托洛茨基本人遇害后，其全球阴谋论仍持续发酵的原因。

极权独裁者面对荒谬时仍顽固坚持原始谎言的执念，绝非对造就其权势之物的迷信感恩。至少就斯大林而言，这无法用说谎者心理来解释，毕竟其成功本身可能使其沦为最终牺牲品。一旦这些宣传口号融入“活的组织”，若要安全清除它们，就必须摧毁整个结构。犹太世界阴谋论在极权宣传中，从客观可辩论的事实被扭曲为纳粹现实的核心要素；关键在于纳粹分子行事时，仿佛世界已被犹太人掌控，必须发动反阴谋来捍卫自身。种族主义对他们而言，已不再是科学价值存在质疑的可辩性理论，而是在政治组织的运作等级中每日得以实现，因为在其框架内质疑种族主义将显得极其“不切实际”。同样，布尔什维主义也不再需要在阶级斗争、国际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福祉完全取决于苏联福祉等议题上争辩胜负；共产国际的运作机制比任何或单纯意识形态都更具说服力。

极权主义宣传之所以优于其他政党和运动的宣传，根本原因在于：至少对运动成员而言，其宣传内容已不再是人们可以持不同意见的客观议题，而是如同算术规则般成为他们生活中真实而不可触碰的要素。唯有在极权体制下，才能彻底实现依据意识形态组织整个生活结构的任务。在纳粹德国，当种族血统成为唯一标准时，质疑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的正当性，无异于质疑世界的存在，因为那时职业生涯取决于“雅利安”相貌（希姆莱曾通过照片甄选党卫军候选人），食物配给则取决于个人拥有多少犹太祖父母。

若有一种宣传持续在不断为论辩那微弱而不可靠的声音“注入组织的力量”，进而不假思索地去实现它所说的任何事情，那么它的优势无疑就会不证自明的。它对基于现实的论辩具有绝对免疫力，因为毕竟运动承诺的正是这个要改变的现实；它对反宣传也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反宣传仅针对属于或捍卫一群走投无路的大众不能所不能接受的世界。极权主义宣传胜券在握，唯有另一种更强大或更美好的现实，才能推翻这种宣传。

正是失败的瞬间，极权主义宣传的内在脆弱性才得以显现。一旦失去运动的推动力，其成员便立即放弃了昨日还愿为之献身的教条信仰。当运动崩塌之际（即庇护他们的虚构世界瓦解之时），大众便回归孤立个体的旧态：或欣然接受变迁世界

中的新角色，或再度沉沦于绝望的冗余境地。极权运动的成员在运动存续期间极端狂热，却不会效仿宗教狂热分子殉道而亡（尽管他们甘愿如机器人般赴死）[51]。相反，他们会悄然放弃这场失败的赌注，转而寻找更具前景的虚构体系，或静待旧体系重振旗鼓，再度掀起群众运动。

盟军曾徒劳地试图在德国民众中找出一个自认且坚定的纳粹分子，而 90%的德国人很可能都曾在某个时期真诚地同情过纳粹，但这一经历，不应简单地视为人性软弱或粗鄙投机主义的标志。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被如此彻底地“实现”，以至于其内容已然消亡。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它可以说丧失了智识存在；现实的毁灭几乎未留存任何痕迹，更别提信徒的狂热了。

第二节

极权主义组织

有别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与宣传口号，它的组织形态具有完全新颖的特征[60]。这些形态旨在将运动的宣传谎言转化为现实运作机制，这些谎言围绕着核心虚构的叙事编织而成，诸如犹太人阴谋、托洛茨基分子阴谋、或三百家族阴谋等。而组织形式设置的目的，正是将这些谎言转化为正常运作的现实。即使在非极权主义环境下，也能构建出一个成员行为与反应皆遵循虚构世界规则的社会。相较于法西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等看似相似的政党与运动，这些组织一旦达到某种极端主义阶段（通常取决于成员绝望程度），便会以恐怖主义为其宣传背书，但极权主义运动却对宣传抱有真正热忱，这种热忱骇人地体现在如何组织追随者，而非在肉体上消灭对手。组织与宣传（而非恐怖与宣传）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61]。

在夺权之前的阶段里，极权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以全新的组织手段建立各种外围组织，并区分党员与同情者。就这个创新而言，其他典型的极权特征都显得次要得多，如自上而下任命官员，以及最终由一人垄断任命权。所谓“领袖原则”本身并非极权主义特征；它从威权主义和军事独裁中借用了某些元素，这些元素极大模糊并贬低了极权主义现象的本质。倘若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员拥有真实的权力与责任，我们面对的将是权力通过法律授权与约束的等级结构。军队组织及其仿效模式建立的军事独裁亦是如此：自上而下的绝对指挥权与自下而上的绝对服从，恰恰对应战斗中的极端危急状态，正因如此才不具极权性质。等级化的指挥链意味着指挥官的权力依赖于其运作的整个等级体系。任何等级制度（无论其领导方式何其专制），以及该等级制度的指挥链（无论命令内容多么武断或独裁）都具有稳定性，它们本来都可以限制极权运动领袖的绝对权力[62]。在纳粹的语境中，并不是元首

的命令（通常暗示着固定且有限的权威），而是永不停歇的、动态的“元首意志”成为极权国家的“最高法则”[63]。唯有当极权运动凭借其独特组织架构将领袖置于特殊地位（因其对运动的功能性重要性），领袖原则才发展出极权特征。这一观点也得到证实：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实际的领袖原则都只是随着运动逐步“极权化”而缓慢形成[64]。

一种匿名性使整个现象显得诡异，也使这种新组织结构的起源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无从知晓究竟是谁率先将同路人组织成外围组织，又是谁最先在那些模糊认同的群众中，发现了不仅是党员储备库，更是独立决定性力量的潜力。这些群体虽被各政党视为选举日的重要依靠，却因立场摇摆而被拒于正式成员之外。早期受共产主义启发的组织...诸如“苏联之友”或“红军救济协会”等同情者组织，后来发展成掩护组织，但最初不过是其名称所示：聚集同情者提供资金或其他（例如法律）援助的团体。希特勒率先提出，每个运动都应将通过宣传赢得的群众分为两类：同情者与成员。这一观点本身已颇具深意；更具意义的是，他将这种划分建立在更普遍的哲学基础上，即多数人因惰性与怯懦仅止于理论认知，唯少数人愿为信念而战[65]。因此希特勒率先制定了有意识的策略：持续扩大同情者队伍的同时，严格限制党员数量[66]。这种由少数党员为核心、多数同情者为外围构成的组织模式，与后来外围组织的运作实际形态高度契合，因为“外围组织”一词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其最终功能，并揭示了运动内部成员与同情者之间的关系。对运动而言，由同情者组成的外围组织与正式成员体系同等重要。

这些外围组织在运动成员周围筑起一道保护墙，将他们与外部的正常世界隔绝；同时，它们又构筑起通往正常世界的桥梁。若无此桥，处于权力争夺阶段的成员将过于尖锐地感受到自身信念与常人观念的差异，感受到自身虚妄的虚构性与正常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鸿沟。这种机制在运动夺权期间的精妙之处在于：外围组织不仅隔离成员，更提供一种外部常态的假象，其抵御真实现实冲击的效果远胜单纯的意识灌输。正是成员与同路人态度的差异，使纳粹分子或布尔什维克坚信其虚构的世界观。毕竟同路人持有相同信念，只是以更“正常”即更少狂热、更显迷茫的形态；因此在党员眼中，凡运动未明确指认的敌人（犹太人、资本家等）皆属盟友，世间遍布隐秘同路人，只是尚未凝聚足够的意志与品格力量，将自身信念推向逻辑终点[67]。

另一方面，外界通常是通过极权主义运动的前线组织首次窥见其真面目。这些同情者在非极权社会中表面仍是无害的公民，很难称其为单一思想的狂热分子；通过他们，极权运动使其荒诞谎言更易被接受，能以温和体面形式传播宣传，直至整个社会氛围被极权元素毒化，而这些元素难以被识别为极权特征，反而看似正常的

政治反应或观点。这些同路人组织为极权运动披上正常体面的外衣，既蒙蔽了成员对外部世界的真实认知，也欺骗了外部世界对该运动本质的判断。外围组织具有双重功能：既是极权运动向非极权世界展示的门面，也是非极权世界向该运动内部等级体系展示的门面。

比这种关系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现象在运动内部的不同层级不断重演。正如党员与同路人既存在关联又相互分离，运动中的精英群体与普通成员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联与分离。同路人看似仍是外部世界的普通居民，只是像加入普通政党那样采纳了极权主义信条；而纳粹或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普通成员，在诸多方面仍属于周围世界：其职业与社会关系尚未完全由党籍决定，虽然他与单纯的同情者不同，因为他或许意识到当党派忠诚与私人生活发生冲突时，前者会是更具决定性的一方。而激进组织的成员则完全与运动同化，既无独立于运动之外的职业，亦无独立于运动之外的私人生活。正如同情者在运动成员周围构筑保护屏障并向其展现外部世界，普通成员群体同样环绕着激进团体，向其呈现正常外部世界的面貌。

这种结构的明显优势在于，它削弱了极权主义一项基本信条所带来的冲击力，该信条把世界划分为两个巨大的敌对阵营，其中一方是运动，而运动能够也必须对抗整个世界，这种主张为执政的极权政权铺平了肆意侵略的道路。极权运动小心翼翼地按照战斗性高低进行层级划分，即每个层级以更低的战斗性和更全面的组织性，而构成上一层级非极权世界的图景。在这样的手法下，这种恐怖可怕的极权二元法所造成的冲击被削弱了，而且从未完全出现过；此类组织结构使成员永远不会直接面对外部世界，外界的敌意对他们而言始终只是意识形态假设。他们被如此严密地隔绝于非极权世界的现实之外，以致持续低估极权政治的巨大风险。

毋庸置疑，极权运动正对现状发起猛烈冲击，这种冲击比任何早期的革命政党都更为彻底。他们之所以能承担这种看似与群众组织格格不入的激进主义，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实际上要废除普通的非政治性生活，提供了暂时的替代。由非政治性的联结组成的社会关系网，尽管以较低战斗性的形式存在于极权运动之中；却是“职业革命家”不得不与之切割的，否则就被迫接受世界的本来面貌，而在等级森严的极权运动世界中，为了征服世界与发动世界革命而战斗的人们永远不会暴露于“革命”信念与“正常”世界之间必然产生的冲突。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在掌权的革命阶段吸引众多普通庸人，是因为其成员生活在正常化的愚人天堂里：党员们被同情者的正常世界所环绕，精英组织则被普通成员的正常世界所包围。

极权模式的另一优势在于它可以被无限重复，使组织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从而不断嵌入新层级并界定新的激进程度。整个纳粹党的历史，皆可通过纳粹运动内部的新组织形态来诠释。冲锋队（1922 年成立）作为首个纳粹组织，其战斗性被设

定为超越党本身[68]；1926年，党卫军作为冲锋队的精锐部队成立；三年后，党卫军脱离冲锋队并置于希姆莱指挥之下；希姆莱仅用数年便在党卫军内部重演了相同模式。这些组织接连诞生，层层递进，每个都比前一个更具战斗性：先是冲击部队，接着是骷髅头部队（集中营警卫部队），后者后来与武装党卫队合并；最终形成党卫军武装部队；随后又诞生了党卫军安全局（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情报机构及执行消极人口政策的执行机构）与种族及移民事务局，后者则承担“积极性”任务，所有这些组织都是从普通党卫军发展而来的，其成员除高级领袖团外均保留平民身份。对于所有这些新组织，普通党卫军的成员现在与冲锋队队员之于党卫队员的关系相同，或与党员之于冲锋队队员的关系相同，或与外围组织成员之于党员的关系相同[70]。现在，普通党卫军要负责“安全”，还要“守护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更要“防止所有特殊党卫军干部脱离运动本身”[71]。

这种动态的层级结构，以及它不断增添新层级、不断转移权威中心的模式，在秘密监控团体、秘密警察或情报部门中司空见惯。这些机构永远需要新的控制手段来约束控制者。在运动的权力酝酿阶段，全面间谍活动尚不可行；但类似情报机构的动态层级体系，即便在尚未掌握实际权力时，也能通过插入更激进的新层级，使任何动摇或显露战斗性减弱的等级或团体遭到排挤，从而自动将旧有团体推向前线组织，使其远离运动核心。因此，纳粹精英组织本质上是党内派系：一旦党的战斗性减弱，冲锋队便崛起为凌驾于党的超级组织，随后又因类似原因被党卫军取代。

极权精英组织（尤其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军事价值常被高估，而其纯粹的党内意义却往往被忽视[72]。尽管保卫领袖或普通党员通常被作为理由，但没有任何法西斯党卫队组织是为特定防御或进攻目的而建立的[73]。纳粹和法西斯精英组织采取准军事形式，源于其作为“运动意识形态斗争工具”[74]。创立的初衷旨在对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盛行的绥靖主义。就极权主义目的而言，建立一支冒牌军队作为其“侵略性立场的表达”，并有可能接近绥靖主义的伪军队（绥靖主义者军队由于未能理解军队在政治体制中的宪法地位，而将所有军事机构斥为蓄意杀戮的暴徒团伙），这远比拥有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更为重要。冲锋队和党卫队无疑是任意施暴与杀戮的典范组织；它们的训练水平远不及帝国国防军，更不具备对抗正规军的作战能力。战后德国盛行军国主义宣传而非军事训练，制服虽能彰显准军事部队废除平民标准与道德的本质，却无助于提升其军事价值；某种程度上，这些制服极大缓解了杀人者的良知负担，更使他们对盲从服从与绝对权威愈发顺从。尽管披着军国主义外衣，纳粹党内以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为主的派系，他们却是最先被清理掉的一批；他们视准军事部队不仅是党内组织，而且将它视为国防军的非法扩充（这是被《凡尔赛和约》所限制的措施）。冲锋队领袖罗姆确实曾梦想并试

图谈判，希望在纳粹夺权后将冲锋队并入国防军。他最终被希特勒处决，正是因为他试图将新纳粹政权转变为军事独裁政权[76]。希特勒在数年前曾多次明确表示，纳粹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发展方向，当时他解除了罗姆冲锋队首领的职位，并选择莱西姆重新组建党卫军，罗姆是一位战争中历练、在黑衫党组织中经验丰富的真正军人（其资历本应使其成为严肃军事训练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但莱西姆则是一个没有任何军事相关知识的人。

精英组织在运动组织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它们构成了不断变化的激进主义核心。除此之外，他们的准军事性质还必须与其他专业党派组织（如教师、律师、医师、学生、大学教授、技术人员和工人组织）相联系来理解。所有这些组织首先都是现有非极权职业团体的复制品，其准专业程度正如冲锋队的准专业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共产党越是明确成为莫斯科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分支，就越倾向于利用其外围组织与现有的纯职业团体展开竞争。纳粹与布尔什维克在此方面的区别仅在于：纳粹明显倾向于将这些准专业组织视为党内精英阶层，而共产党则更倾向于从这些组织中招募其外围组织的成员。对这些运动而言，关键在于它们在夺取政权前就营造出社会所有阶层皆在其阵营中的假象。（纳粹宣传的终极目标是将全体德国民众组织成同情者[77]）纳粹在这场游戏中更进一步，仿照正规国家行政体系设立了一系列虚假部门，如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体育部等。这些机构的专业价值都不如冲锋队所代表的仿制军队，但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完美的表象世界，其中非极权世界的一切现实都被奴性地复制成虚伪的幻象。

这种复制技术，虽然对直接推翻政府毫无用处，却在瓦解现存制度和“瓦解现状”方面成效显著[78]。极权组织向来更倾向于这种方式，而非公开武力展示。倘若运动的使命在于“如水螅般钻入所有权力位置”[79]，那么它们就必须为任何具体的社会政治立场做好准备。基于其绝对统治的诉求，非极权社会中每个有组织的群体都被视为对运动的具体挑战，亟待摧毁；可以说，每个群体都需要特定的毁灭工具。当纳粹夺取政权并准备就绪时，这些伪组织的实际价值便显现出来，他们能够一夜之间颠覆德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不仅是政治生活），正是因为他们早已在其内部构筑了精确对应的替代体系。他们立即以另一教师组织取缔现有教师团体，以纳粹资助的律师俱乐部取代既有律师协会等等。在这方面，一旦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正规军事指挥系统能够在党卫军统御之下被取代，那么准军事组织的任务也就结束了。这种“整合”手法别出心裁、不可抗拒，同时专业水准的堕落则迅速、彻底，即使与其他领域相比，在高度技术化与专业化的军事领域这些成果更显著。

准军事组织对极权运动的重要性，既不在于其可疑的军事价值，也不完全在于其对正规军的伪装模仿。作为精英组织，它们与外界的隔绝程度远超其他任何群体。

纳粹很早就意识到全面军事化与彻底脱离常态之间的密切联系；冲锋队成员从未被派往家乡社区执行任务，而纳粹掌权前期的冲锋队骨干及执政后期的党卫军成员，因频繁调动与轮换，根本不可能适应并扎根于普通世界的任何角落[80]。这些组织仿照犯罪团伙模式运作，专门从事有组织的谋杀活动[81]。这些谋杀行为由纳粹高层公开展示并获官方确认，公开的共谋关系使得成员即便在非极权政府统治下，即便没有遭受前战友的实际威胁，也几乎不可能脱离该组织。就此而言，精英组织的功能与前线组织截然相反：后者为运动披上体面外衣并建立信任，前者则通过扩大共谋关系，使每位党员都意识到自己已永久脱离禁止杀戮的正常世界，并将为精英组织所犯的一切罪行承担责任[82]。这种效果甚至在掌权前夕，领导层系统性地为所有罪行承担责任，并毫不含糊地宣称这些罪行皆为运动的终极利益所为。

纳粹通过人为制造内战局势来勒索夺权，其优势不仅在于煽动动乱。对该运动而言，有组织的暴力是守护其虚构世界最有效的屏障。对他们而言，当成员对脱离组织的恐惧超过对参与非法行动后果的恐惧时，当成员身份带来的安全感超越反对者身份时，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便得以确证。这种安全感源于精英组织以暴力手段将党员隔绝于外部世界，其对虚构组织世界的维系作用，与成员对恐怖统治的恐惧同样重要。

运动的核心，如同驱动其运转的引擎，坐落着领袖的身影。他与精英集团之间隔着一层核心圈，而那些知情者围绕着他，散发出不可穿透的神秘光环，这恰恰映衬着他“无形却压倒性的优势”[83]。他在这个核心圈层的地位，取决于操纵成员间权谋的能力，以及不断更迭成员的手段。其领导地位的建立，源于驾驭党内权力斗争的超凡才能，而非煽动家或官僚组织者的特质。与早期独裁者不同，他几乎不依靠简单暴力取胜。希特勒既不需要冲锋队也不需要党卫队来巩固其纳粹运动领袖地位；相反，冲锋队首领罗姆虽能依靠该组织对其个人的忠诚，却成为希特勒党内政敌之一。败在斯大林手下的托洛茨基不仅拥有更强大的群众基础，更作为红军总司令掌握着当时苏俄最大的权力资源[84]。更有甚者，最伟大的组织天才、俄国革命中最有能力的官僚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85]。另一方面，希特勒与斯大林都精于细节掌控，在早期阶段他们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人事安排，以至于数年后，重要职位上几乎无人不是通过他们获得的[86]。

然而，这类个人能力虽是此类职业生涯初期的绝对必要条件，甚至在后期也绝非无关紧要，但当极权主义运动建立起来，确立了“元首意志即党之法则”的原则，且其整个等级体系都经过高效训练以实现单一目标（即迅速将领袖意志传达至各级人员），这些个人能力便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这一目标实现时，领袖便不可替代，因为若缺少他的命令整个复杂的运动结构便会丧失存在的理由。如今，尽管

内部派系永无休止地暗中勾结，人员更迭不断，积怨深重，充满怨恨与个人恩怨，但领袖的地位仍能免于宫廷内乱的动摇，这并非源于他超凡的才能，身边亲信也对此不抱幻想，而是因为这些人真诚而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他，一切都将立即崩溃。

领袖的最高使命在于体现运动各层级的双重职能特征：既要作为运动抵御外部世界的魔法防御屏障，同时又成为运动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结的桥梁。领袖代表运动的方式与所有普通党领袖截然不同：他为任何成员或官员在职务范围内所作所为（包括善行与恶行）承担个人责任。这种全权负责制是所谓领袖原则最重要的组织特征，依据该原则，每位官员不仅由领袖任命，更是其行走的化身，所有指令皆源自这个无处不在的唯一源头。这种将领袖与每位下属领导者彻底等同，并对所有行为垄断责任的做法，亦是极权领袖与普通独裁者或暴君之间决定性差异的最显著标志。暴君绝不会将自身与下属等同，更遑论认同其每项行为[87]；他或许会利用下属作为替罪羊，因为领袖甘愿让下属承担责任，乐于接受批评以避免民众的愤怒，但他始终与所有下属及臣民保持绝对距离。领袖则截然相反，他无法容忍下属受到批评，因为下属的一切行动都代表着他；若想纠正自身错误，就必须清除执行者；若想将过失推诿给他人，就必须处决他们。因为在这个组织框架内，错误只能是欺诈：冒名顶替者伪装成领袖的行径。

该运动对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但并不与其每位下属完全认同，这种做法的实际后果是：无人曾经历过必须为自身行为负责或解释行为动机的处境。由于领袖垄断了解释的权利与可能，在外界看来他似乎是唯一知晓自身所为之人，他是运动中唯一可与非极权主义世界对话的代表。当遭受指责或反对时，他不会说：“别问我，去问领袖。”身处运动核心的领袖，能表现得仿佛凌驾于运动之上。因此外界在面对极权运动或政府时，屡屡将希望寄托于与领袖本人私下交谈，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徒劳）。极权领袖真正的奥秘，在于其背后的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使领袖承担运动中精英组织所犯一切罪行的全部责任，又同时要求组织中天真的同路人展示出诚实无辜的可敬气质。

极权主义运动被称为“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社团”[90]。诚然，尽管我们对秘密社团的社会结构及其近代历史所知甚少，但与其他政党及派系相比，极权运动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结构，这些结构最令人联想到的是秘密社团某些显著特征[91]。秘密社团同样依据“入会”程度来构成等级制度，依据隐秘虚构的假设规范成员生活，使万物皆具表象之姿；它采取持续欺骗策略，来蒙蔽未入会的外部大众；它要求成员不容置疑地服从，并通过效忠一个无人知晓且神秘莫测的领袖而将他们凝聚起来；该领袖通常被一个创始元老组成的小团体所围绕，这个小团体又被半入会者所包围，形成抵御敌对俗世的“缓冲区”[92]。极权主义运动与秘密社团同

样具有二元世界观，将世界划分为“歃血为盟的兄弟”和由死敌组成的无差别的模糊群众[93]。这种基于对周遭世界绝对敌意的区分，与普通政党将人划分为所属者与非所属者的倾向截然不同。政党及开放社会通常仅将公开反对者视为敌人，而秘密社团始终奉行“凡未明确纳入者皆被排除在外”的原则[94]。这种神秘主义原则看似与大众组织格格不入；但纳粹党至少为成员提供了与秘密社团入会仪式同样的心理机制，这不是简单地将犹太人排除在成员资格之外，还要求他们提供非犹太血统证明，并建立起一套复杂机制来揭开约八千万德国人模糊的家世背景。当八千万德国人开始寻找犹太祖先时，这毫无疑问是一场闹剧，甚至是一场代价高昂的闹剧；然而每个通过这场考试的人，在审查后都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属于一个合格者的群体，与虚构的众多不合格者相对立。布尔什维克运动通过重复进行党内清洗，巩固了同样的原则。这种清洗在每一个未被排除的人身上，激起一种重新确认自己被接纳的感觉。

秘密社团与极权主义运动之间最显著的相似之处，或许在于仪式所扮演的角色。莫斯科红场周围的游行，其特征性丝毫不亚于纽伦堡党代会的浮夸仪式。纳粹仪式的核心是所谓的“血旗”，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中心则是列宁的木乃伊遗体，这两者都为仪式注入了强烈的偶像崇拜色彩。正如某些人所断言，这种偶像崇拜绝非证据，而具有伪宗教或异端倾向。所谓“偶像”不过是组织手段，其形式源于秘密社团的仪式传统，这种社团借助骇人听闻的威严符号来震慑成员，迫使其保守秘密。显然，通过共同参与秘密仪式所建立的凝聚力，远比共享秘密本身更为牢固。极权运动的秘密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却未必改变这种体验的本质[95]。

这些相似之处当然并非偶然；它们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成为极权主义领袖之前都曾是现代秘密社团的成员，即便希特勒曾在德国国防军的秘密情报部门工作，斯大林曾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间谍部门工作。这些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极权主义阴谋论的自然产物，因为这些组织宣称他们是为了对抗秘密社团而建立的，无论是犹太人的秘密社团还是托洛茨基派的阴谋团体。极权组织真正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们能如此广泛地采用秘密社团的组织手段，却从未试图隐瞒自身目标。纳粹企图征服世界、驱逐“种族异类”并灭绝“劣等生物遗传者”，布尔什维克致力于世界革命，这些目标从未成为秘密，始终是其宣传的核心内容。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模仿了秘密社团的所有外在形式，却掏空了唯一可用来（或者被认为可用来）为其运作方式辩护的东西：即保守秘密的必要性。

在这方面，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截然不同的历史起点出发，最终形成了相同的组织形态。纳粹党以阴谋论为虚构起点，或多或少自觉地效仿犹太复国主义秘密社团“锡安长老会”的模式；而布尔什维克则源于

一个以建立一党专政为目标的革命政党，经历了“完全独立于一切之上”的阶段，直至该党政治局最终成为“完全独立于一切之上”的权力中枢[96]；最终斯大林将阴谋集团的严苛极权规则强加于此种党制，此时才意识到：要在群众组织条件下维持秘密社团的铁律，必须构建核心虚构体系。纳粹的发展或许更具逻辑性、自洽性，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则更能揭示极权主义本质上的虚构性，恰恰是因那些虚构的全球阴谋（据称布尔什维克阴谋据此组织并对抗之）从未被意识形态固化。这些阴谋论不断变换，从托洛茨基分子到三百个家族，再到各种“帝国主义”，近期又演变为“无根的国际主义”，这些阴谋随着临时的需求进行调整；然而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布尔什维主义都不可能没有诸如此类的虚构叙事。

斯大林将俄罗斯的一党专制转变为极权统治，并将全球革命性共产党转变为极权运动的手段，在于消灭党内派系、废除党内民主，并将各国共产党改造为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指挥下的分支机构。秘密社团普遍存在，革命政党的阴谋机构尤甚，其特征始终是：不存在派系斗争、压制异见、实行绝对集权。所有这些措施都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保护成员免遭迫害，防止组织遭受背叛；要求每个成员绝对服从、将绝对权力集中于首领之手，不过是实际需求下必然产生的副产品。然而问题在于，阴谋家们往往倾向于认为：阴谋组织的方法是政治领域最高效的手段，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运用这些手段，并借助整个国家的暴力工具加以支撑，那么权力积累的可能性将变得无限广阔[97]。革命党内的阴谋派系，只要该党本身尚未瓦解，其作用便可比作完整政治体制中的军队：尽管其行为准则与文职机构截然不同，但它仍服务于该体制，受其管辖并受其控制。正如军队不再服从而企图统治政治体制时便滋生军事独裁的危险，革命党内阴谋集团一旦摆脱党内控制并谋求领导权，极权主义的危险便随之降临。斯大林统治下的共产党正是如此。斯大林的行事方式始终体现着党内秘密活动派系出身者的典型特征：对细节的执着、对政治个人化的强调、在利用和清除同志及友人时的冷酷无情。列宁逝世后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主要依靠秘密警察机构，因为当时该机构已发展为党内最具影响力的核心部门[99]。契卡倾向于支持阴谋派代表实属必然，毕竟此人早已将该机构视为作为一种秘密组织，它极可能延续并扩张自身特权。

然而，共产党被其阴谋集团接管，仅仅是其向极权运动转型的第一步。仅靠俄国秘密警察及其在海外共产党中的代理人，在运动中扮演与纳粹以准军事部队形式组建的精英组织相同的角色，还远远不够。若要维持秘密警察统治的稳定性，必须对政党本身进行改造。因此，在消灭党内派系和内部民主的同时，苏联采取了吸纳大量政治素养薄弱的“中立”群众入党的策略，这一政策在人民阵线政策启动后，国外共产党也迅速效仿。

纳粹极权主义始于群众组织，后逐步由精英组织所主导；而布尔什维克则以精英组织为起点，以此来组织群众。两者结果相同。此外，纳粹因其军国主义传统与偏见，最初以军队为模板构建精英组织；布尔什维克则自始赋予秘密警察行使最高权力。然而数年后，这种差异已经不复存在：党卫军首领成了秘密警察头子，而党卫军则逐步整合、取代了盖世太保原班人马，即便后者已是由可靠的纳粹党人组成。

阴谋家的秘密社团的运作机制与秘密警察为之竞争而建立起来的机制，在本质上具有亲缘性，正由于这种关系，建立在全球阴谋虚构、企图统治世界的极权政权，最终将所有权力集中于秘密警察手中。然而在掌权前夕，这些“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团”还在组织上的具有其他优势。在大众组织和排他性社团（唯有后者能确保秘密不泄露）之间的明显矛盾，若与下述事实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二元论，也就是大众对现存世界各种歧视、差异抱有的盲目敌意，秘密阴谋社团可以将这种敌意转化为组织原则。若一个组织的运作的原则是任何不被纳入者就被排除在外，任何不与我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对我，那么从这个组织的视角来看，大千世界就丧失了所有的差异、区别与多元性，而正是这些东西无论如何都让大众觉得困惑、难以忍受，还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方向[101]。真正激发秘密社团成员毫不动摇的忠诚，与其说是秘密本身，不如说是“我们”与“所有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可通过模仿秘密社团的组织结构来维持，同时剥离其守护秘密的理性目的。无论这种发展源于阴谋论意识形态（如纳粹）还是源于革命党内阴谋派系的寄生性扩张（如布尔什维克），都无关紧要。极权组织固有的一个论点就是，运动之外的一切都在“消亡”。这一论点后来在极权统治下凶残的条件下以激烈的方式得以实现，但对于那些从分崩离析、无所适从之中逃入极权运动的虚构家园的大众来说，甚至在极权掌权之前，他们就已经把这个论点视为理所应当而自然接受了。

极权主义运动一再证明，它们可以在生死中同样要求绝对的忠诚，这种忠诚曾是秘密和阴谋组织的专属特权[102]。当像冲锋队这样训练有素、武装精良的部队面对心爱领袖（罗姆）及数百名亲密战友被谋杀时，竟毫无抵抗，这堪称奇观。那一刻，或许是罗姆而非希特勒掌控着国防军的实权。但纳粹运动中的这些事件，如今已被布尔什维克党内屡见不鲜的自我坦白的“罪犯”的闹剧所掩盖。基于荒谬供词的审判，已演变为党内至关重要、对外却令人费解的仪式。然而无论今日如何炮制牺牲品，此种仪式之存在，实际上源自于1936年老布尔什维克卫队那份或许并非捏造的供词。早在莫斯科审判之前，被判死刑者便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判决，这种心态“在契卡成员中尤其普遍”[103]。只要该组织存在，其独特的运作模式便确保精英阶层永远无法想象脱离这个紧密团体之外的生活，即便身陷囹圄，他们仍自

视高于未参加组织的普通人。而这个组织的唯一宗旨始终是欺骗、对抗、乃至最终征服外部世界；因此只要这能再次欺骗世界，其成员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104]。

然而，无论秘密社团或阴谋组织社团的组织结构，还是大众组织的道德标准，其主要价值都不在于获得无条件归属与忠诚的内在保障，也不在于其对外界展示毫不动摇的敌意，而在于他们无可超越的能力，能够通过首尾一致的谎言来建立并守护虚构世界的。极权运动的这种等级结构，即从天真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核心圈乃至领袖本人，皆可被描述为一种奇特混合体，即成员们根据自身在运动中的地位与等级，以轻信（gullibility）或犬儒（cynicism）的态度，应对着领袖们时时变化的谎言陈述，以及运动核心永恒不变的意识形态。

在成为大众日常现象之前，这种轻信与犬儒的混合体早已是暴民心态的突出特征。在这个瞬息万变、令人费解的世界里，大众已然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他们既相信一切又怀疑一切，既认为万事皆有可能又认定万物皆虚妄。这种混合本身就足够惊人，因为它宣告了某种幻灭的终结。即轻信被视为毫无防备的原始心灵弱点，而犬儒则被当作高贵精致心灵的恶习。大众宣传发现，其受众随时准备相信最恶劣的谎言，无论多么荒谬，且并不特别抗拒被欺骗，因为他们本就认定所有言论皆为谎言。极权主义领袖们基于正确的心理假设开展宣传：在这种环境下，今日可使人相信最荒诞的言论，明日即便提供无可辩驳的反证，民众也可以逃到犬儒的态度中，但他们不会抛弃欺骗自己的领袖，反而会声称早已熟知其言论的虚妄，并赏识领袖的高超谋略。

大众明确无误的反应方式，就这样成为大众组织的重要等级原则。极权运动中各阶层普遍存在着轻信与犬儒的混合心态，而地位越高，犬儒的比重就压过轻信的比重。从同路人到领袖，所有阶层共享的核心信念是：政治本质上是场欺骗游戏，而运动的“第一戒律”，即“元首永远正确”，对于实现世界政治目标（即全球性欺骗）而言，正如军事纪律规则对于战争目的一样不可或缺。

制造、组织并传播极权主义运动中那些骇人听闻谎言的机器，其运作机制仍取决于领袖的地位。面对宣传机器宣称所有事件皆可依据自然法则或经济规律进行科学预测的说辞，极权组织体系赋予了某个人垄断这种知识的特殊地位：其核心特质在于他“永远正确且永远正确” [106]。对极权运动的成员而言，这种知识与真相无关，领袖言论的正确性也与客观真实性无关，因为这些言论无法被事实证明，唯有未来的成败方能验证。领袖的行动永远正确的，因为这些行动是未来数百年精心规划的，最终他对自身行为的检验，已超越其同时代人的经验范畴 [107]。

唯一被要求对领袖言论绝对忠诚、字面信奉的群体，是那些怀有同情心的追随者。他们的信任为运动营造出诚实单纯的氛围，并助领袖完成其任务的一半，

即激发人们对运动的信心。党员们从不相信公开声明，也不被允许相信，但极权主义宣传却以他们优越的智慧为荣，这种智慧据称使他们区别于非极权主义的外部世界，而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仅限于同情者们异常轻信的表象。唯有纳粹同情者相信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最高法院宣誓效忠法律时的誓言；运动成员深知他在说谎，却因其竟能欺骗公众舆论和当局而更加信任他。当希特勒后来向全世界重演这一幕，他宣称善意的同时公然筹备罪行，但纳粹成员对其崇拜自然达到顶峰。同样地，唯有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人相信共产国际会解散，而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民主宣言，也只打算让未组织起来的俄国民众和国外同路人信以为真。布尔什维克党员们被明确警告不要被战术性举动所迷惑，并被要求领袖背叛盟友时的灵巧表示赞赏[108]。

如果极权运动不区分精英组织、正式成员与同情者，领袖的谎言便无法发挥作用。面对持续不断的反驳，与轻蔑等级相对应的、表现出来的犬儒态度，至少与单纯的轻信态度同样必要。关键在于外围组织的同情者鄙视同胞们完全缺乏入门知识，普通党员鄙视同路人的轻信与缺乏激进精神，精英组织出于类似原因鄙视普通党员，而在精英组织内部，每项新创立与发展都伴随着对应的鄙视等级态度[109]。这种体系的后果是：同情者的轻信使谎言对外界具有可信度，而成员与精英组织层层递进的冷嘲热讽则消除了领袖因自身宣传的沉重负担而被迫兑现承诺、掩饰伪善的风险。外部世界应对极权体制时遭遇的主要困境之一，在于忽视了这种机制，无论其初衷如何，他们既误判极权谎言的荒谬性终将自取灭亡，又妄想能迫使领袖兑现承诺。不幸的是，极权体制对此类常规后果具有绝对免疫力；其精妙之处恰恰在于消除了两种现实：既不会揭穿说谎者的真面目，也不会迫使他兑现虚伪承诺。

尽管成员们并不相信那些面向公众的言论，却对意识形态解释的标准套话抱有更炽热的信仰，这些信仰是解锁过去与未来历史的关键，它们来源于极权运动从十九世纪意识形态中汲取的精髓，并通过组织力量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这些意识形态元素本就大众信奉，尽管认知模糊而抽象，如今却被塑造成包罗万象的事实性谎言（以犹太人统治世界取代种族普遍理论，以华尔街阴谋取代阶级普遍理论），并融入整体行动纲领，而纲领中那些“垂死者”（资本主义国家的衰亡阶级或没落民族）被视为极权运动的障碍。与该运动那些字面意义上日新月异的战术谎言不同，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被要求像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般被信奉。它们被精心构筑的“科学”证明体系所环绕，而这些证明无需说服完全“未入门者”，却仍通过“证明”犹太人的劣等性或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众的悲惨境遇，迎合某种庸俗化的求知渴求。

精英组织与普通党员的区别在于，他们无需此类证明，甚至不被要求相信那些意识形态中陈词滥调的字面真谛。这些陈词滥调不过是被粗制滥造用来回应大众

对真理的渴求而杜撰的，大众坚持要求解释与证明。精英不是由空想家组成的，针对精英的全部教育旨在消解他们辨别真伪、区分现实与虚构的能力。他们的优越性在于能将任何事实陈述瞬间转化为目的宣言。例如，普通党员需要先看到犹太种族劣等的证据，才能被安全地要求去杀害犹太人，而精英组织明白“所有犹太人都是劣等的”这句话意味着“所有犹太人都应该被杀害”；他们知道当被告知“只有莫斯科有地铁”时，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所有地铁都应该被摧毁”，因此当他们在巴黎发现地铁时，他们并不感到过度惊讶。红军在征服欧洲的征途中遭受的巨大幻灭冲击，唯有通过将占领军大部分人员送入集中营或强制流放才能治愈；但随军警察部队之所以能承受冲击，并非源于更准确的情报，而是因为苏联境内根本不存在提供国外真实情况的秘密培训学校，更是因为他们接受过系统训练，学会了对所有事实与现实抱持至高无上的蔑视。

精英组织这种思维模式绝非单纯的大众现象，也非社会根基动摇、经济灾难和政治乱序的后果；这需要精心训练与培养，在极权主义领袖学院（纳粹党卫军的奥登斯堡学院，以及为共产国际代理人设立的布尔什维克训练中心）课程中，这是比种族思想灌输或内战技术更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精英，如果他们被没有人特地诱导出认知障碍（无法分辨事实为事实，无法区别真理与谬误），那么该运动便永远无法朝着实现其虚构目标的方向前进。极权精英最突出的负面特质在于，他们永不思索世界的真实面貌，永不将谎言与现实对照。相应地，他们最珍视的美德便是对领袖的忠诚，领袖如同护身符，确保谎言与虚构终将战胜真理与现实。

极权主义运动组织结构的顶层是围绕领袖的核心圈层，它可以像布尔什维克政治局那样的正式机构，也可以像希特勒随从那样不断更迭的非正式集团。对他们而言，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不过是组织群众的工具，只要组织原则得以维持，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根据形势需要随意更改这些说辞。就此而言，希姆莱重组党卫军的最大功绩在于，他找到了一种极其简便的“以行动解决血统问题”的方法，他依据“优良血统”来挑选精英成员，并训练他们准备好去“执行一场毫不手软的种族斗争”，去对抗那些无法追溯至 1750 年的“雅利安”血统者，或身高不足 5 英尺 8 英寸（相当 1.72 米）、或没有金发碧眼的人（“我深知达到特定身高者必然具备某种程度的理想血统”）[110]。在行动上，这种种族主义重要性在于，它使组织几乎摆脱了所有具体种族“科学”教条的影响，也摆脱了反犹主义的影响；而后者只是作为针对犹太人本质与角色的特定学说，其存在价值本应随着犹太人灭绝而终结[111]。一旦“种族委员会”对精英阶层的选拔置于特殊“婚姻法”管辖之下[112]，种族主义就是安全的，且完全不受宣传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影响。而另一端则导出相反的结果：根据这种“种族精英”统治，纳粹集中营的存在是为了“更充分展示遗传与种

族法则”的目的[113]。凭借这套“生机勃勃的组织”，纳粹组织可以摒弃教条主义，向阿拉伯人等闪米特民族伸出友谊之手，甚至与黄祸的代表（日本人）缔结同盟。种族社会的现实存在，即从所谓种族视角选拔精英阶层的形成，确实比最精妙的科学或伪科学论证更能为种族主义学说提供保障。

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制定者同样凌驾于其公开宣扬的教条之上。他们完全能够通过 与资本主义突然结盟来中断所有现存阶级斗争，既不损害干部的可靠性，也不背叛其对阶级斗争的信念。阶级斗争的二元原则已沦为组织工具，通过俄国秘密警察干部体系，它仿佛石化成对整个世界的毫不妥协的敌意。而海外共产国际特工的活动，使布尔什维克政策已显著摆脱了“偏见”。

正是这种摆脱自身意识形态束缚的自由，构成了极权主义等级制度的最高层级特征。这些人从组织角度出发看待所有食物、人，其中也包括领袖。对他们来说，领袖既不是神圣的护身符，也不是无所不胜的权威，而仅仅是作为组织形态的必然产物而存在；领袖之所以被需要，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功能，就此而言，他对运动是不可或缺的。其他专制政体往往是由一个小集团统治，专制君主在其中仅代表一个傀儡统治者，但极权主义领袖真正享有绝对自由，可为所欲为，即便决定杀掉身边的亲信，仍能确保其他随从的绝对忠诚。

这种自杀式忠诚更深层的技术性原因在于：最高职位的继承既不受世袭法约束，也不受其他法律规范。宫廷政变若成功，对整个运动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将不亚于军事溃败。该运动的本质在于：一旦领袖就职，整个组织便与其彻底同化，任何承认错误或罢免行为都将打破笼罩在领袖职位上的无谬性魔咒，并预示着所有运动参与者的灭亡。支撑整个结构的并非领袖言论的真实性，而是其行动的无误性。一旦失去这种特质，在假定领袖可能犯错的激烈辩论中，极权主义的虚构世界便会分崩离析，瞬间被现实世界的客观性所淹没，唯有领袖以绝对正确的航向引领运动，才能抵御这种现实冲击。

然而，那些既不信奉意识形态陈词滥调，也不相信领袖无所不能的人们的忠诚，还存在着更深层的非技术性原因。将这些人凝聚在一起的，是对人类全能的坚定而真诚的信念。他们的道德犬儒主义，他们认为一切皆被准许的信念，都建立在万事皆有可能的确信之上。诚然，这些为数不多的家伙不易被其特定谎言所困，他们未必信奉种族主义或经济阴谋论，亦不必然相信犹太人或华尔街的密谋。但他们同样被欺骗了，被他们厚颜无耻地自吹自擂信念所蒙蔽，他们自认为先前的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障碍，终将被更卓越的组织力量摧毁，他们确信组织的力量必能摧毁物质力量，正如组织严密的暴徒团伙能劫掠守卫松懈的富人财富，这是由于对这点深信不疑，他们才总会低估稳定社群的实质性力量，同时高估了极权运动的驱动力。此

外，由于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存在针对自身的世界阴谋，不过将这种阴谋当作一种组织工具而已，因此他们未能意识到自身的阴谋终将激起全世界联合对抗他们。

然而无论人类通过组织化手段追求全能的妄想如何被击败，它在运动内部的实际后果就是，领袖周围的人就算对他抱持异议，他们也不会去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些分歧其实并不重要；只要组织得当，即便是最疯狂的计划也可能成功。他们效忠的本质并非认定领袖无所不能，而是深信任何掌握暴力工具并运用极权组织手段者皆可变得无所不能。一旦极权政权能证明成败具有相对性，并展示实质损失如何转化为组织收益时，这种错觉就被极大地强化。（苏联工业企业荒诞的管理导致工人阶级瓦解，纳粹占领区对平民囚犯的恐怖虐待，尽管造成“可悲的劳动损失”，但从世代角度考量，却不值得惋惜[114]。）更甚者，极权体制下成败的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操控被组织化、被胁迫的公众舆论的问题。在完全虚构的世界里，失败无需被记录、承认或铭记。事实本身的存在延续，依赖于非极权世界的存续。

本章注释

- [1] 参见 E. 科恩-布拉姆施泰特《独裁统治与政治警察：恐怖控制技术》，伦敦，1945 年，第 164 页及以下。其解释是：“没有宣传的恐怖将丧失大部分心理威慑力，而没有恐怖的宣传则无法发挥全部威力”（第 175 页）。此类论述往往陷入循环论证，却忽略了关键事实：不仅政治宣传，整个现代大众传播都蕴含威胁性；而恐怖手段若仅限于常规政治暴政范畴，即便缺乏宣传也能充分奏效。唯有当恐怖手段旨在实施非外部而是内部的强制时，即当政治体制追求的不仅是权力时，恐怖才需要宣传的支撑。正因如此，纳粹理论家欧根·哈达莫夫斯基在 1933 年《宣传与国家权力》中宣称：“宣传与暴力永不矛盾，暴力手段本身即可成为宣传手段”（第 22 页）。
- [2] 当时，苏联官方宣布失业现象已被消除。这一声明的结果是，所有失业救济金同样被消除。（安东·西利加，《俄罗斯联盟：国际劳工组织》，伦敦，1940 年，第 109 页）
- [3] 所谓“行动·海”始于 1942 年 2 月 16 日希姆莱“关于波兰境内德国血统个体的处理”的法令，规定其子女应被送往“出于对他们优良血统的热爱而无条件接纳”的收容所（纽伦堡档案 R 135 号，由巴黎犹太文献中心影印）。文件编号 R 135，由巴黎犹太文献中心影印）。据记载，1944 年 6 月，第九集团军实际绑架了 4 万至 5 万名儿童，随后将其运往德国。一份由布兰登堡提交柏林陆军总参谋部的报告提及针对乌克兰的类似计划（文件 PS031 见列昂·波利亚科夫《布列塔尼的犹太人》第 317 页）。希姆莱本人也多次提及该计划。（参见《国家阴谋与侵略》，美国轴心国战犯起诉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美国政府，华盛顿，1946 年，第三卷，第 640 页，其中收录了希姆莱 1943 年 3 月在克拉科夫演讲的节选；另见科恩-布拉姆《纳粹德国的死亡工厂》第 244 页。这些儿童的筛选依据可从 1942 年 8 月 10 日华沙第二医疗科出具的体检证明中窥见：“纳塔莉·哈普夫种族鉴定报告，生于 1942 年 8 月 14 日。显示其为发育正常的女孩，以东”，“阿诺德·科尼茨体检报告（1910 年 2 月 19 日出生），显示其为发欧类型为主，具北欧特征。育正常的 12 岁男孩，以东欧类型为主，具北欧特征。”签名：N. W.（档案编号：纽约意第绪语科学期刊档案馆，Occ E 3a-17 号）

为消灭波兰知识分子，希特勒认为他们可“毫不犹豫地清除”，参见波兰问题文件第 21 页及第 2472 号文件。

- [4] 参见希特勒《我的奋斗》第 194 页。他在 1942 年夏天仍在表示：“要将最后的犹太人踢出欧洲”（第 113 页），以及要将犹太人驱逐到西伯利亚或非洲马达加斯加（第 311 页）。而实际上，早在苏联入侵之前（大概在 1940 年），他就已决定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并下令建造毒气炉。该计划于 1941 年秋季制定（参见《纳粹阴谋与侵略》第二卷第 265 页及后续；第三卷第 783 页及后续，文件 PS 1104；第五卷第 322 页及后续，文件 PS 2605）。希姆莱早在 1941 年春季便知晓“战争结束前必须将犹太人灭绝殆尽。这是元首明确无误的意愿与命令”（犹太文献中心克尔斯滕档案卷宗）。
- [5] 有一份 1940 年 7 月 16 日的报告颇为耐人寻味。该报告记载了在元首总部举行的一次讨论会，罗森堡、拉默斯和凯特尔均在场。希特勒在会议伊始阐述了以下基本原则：“当前至关重要的是，切勿向全世界昭示我们的最终目标；…… 因此（维持占领区和平秩序的法令）绝不能明显指向最终解决。所有必要措施（如处决、迁徙），尽管如此，仍将付诸实施。”随后展开的讨论完全未提及希特勒的发言，且希特勒本人亦未再参与其中。显然，他的话语并未被“理解”（犹太文献中心 L 221 号文件）。
- [6] 关于斯大林确信希特勒不会进攻苏联的依据，参见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纽约与伦敦，1949 年），第 454 页及第 458 页脚注：“直至 1948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总理沃兹涅先斯基才披露：1941 年第三季度的经济计划是基于和平状态制定的，而适应战争的新计划仅在战事爆发后才草拟完成。”德意志对斯大林反应的评估现已得到赫鲁晓夫报告的有力佐证。参见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关于斯大林的讲话》，载于 1956 年 6 月 5 日《纽约时报》。
- [7] 集中营的教育仅限于纪律训练，绝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指导，因为囚犯大多是奴隶般的灵魂（海因里希·希姆莱，纳粹党主席，回忆录卷四，616 页）。
- [8] 欧根·哈达莫夫斯基，同上著作，在极权主义宣传研究领域堪称杰作。哈达莫夫斯基虽未明言，却以睿智而深刻的笔触，对希特勒本人在《宣传与组织》第二卷第十一章中关于该主题的阐述作出了支持纳粹的解读，或称之为揭示性解读。组织”一章中，对希特勒本人关于该主题的阐述（见《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十一章，德文版 1925 年及 1927 年出版）作出了精辟而富有洞见的亲纳粹式解读。1925 年与 1927 年分别出版。未删节译本，纽约，1939 年）。另见 F. A. 赛克斯，《纳粹党在掌权期间的政治宣传》，1936 年，第 21 页。
- [9] 希特勒对《战争宣传》（《我的奋斗》第一卷第六章）的分析着重强调了宣传的商业角度，并以肥皂广告为例加以说明。其重要性普遍被高估，而他后来关于

《宣传与组织》的积极见解却遭到忽视。

- [10] 参见马林·博尔曼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的重要备忘录，载于《纳粹阴谋》（第六卷，第 1036 页）。类似表述在党卫军为其党徒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而发行的宣传册中屡见不鲜。“自然法则服从于不可改变且不受影响的意志。因此必须承认这些法则”（《党卫军·人种与血统问题》，1942 年党卫军组织政策文献集）。《组织政策纲领》，1942 年）。所有这些不过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中某些句子的变体，其中以下内容被引为前述小册子的核心论述：“当人类试图抗拒自然的铁律时，便与维系其人类本质的根本原则产生冲突。”
- [11] J. 斯大林，《列宁主义》（1933 年），第二卷，第二章。
- [12] 埃里克·福格林，《科学主义的起源》，载于《社会研究》，1948 年 12 月。
- [13] 参见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载于《经济学》第第八卷（1941 年 2 月、5 月、8 月合刊），第 13 页。
- [14] 同上，第 137 页。引文出自圣西门主义杂志《先驱者》第 1 卷第 399 页。
- [15] 沃格林，同上。
- [16] 威廉·爱因斯坦，《纳粹国家》。纽约，1943 年。在论述纳粹国家的“永久战争经济”时，他几乎是唯一意识到“关于德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无休止”争论”的批评家。纳粹统治下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因为它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与西方福利经济学相关的范畴（第 239 页）。
- [17] 在此背景下，受希特勒指派执行安乐死计划的医生之一卡尔·布兰特的证词具有代表性（见《美国对卡尔·布兰特审判记录》1947 年 5 月 14 日卷宗）。布兰特激烈抗辩项目旨在清除多余食物消耗者的嫌疑，强调党内提出此类论调者均遭严厉斥责。在他看来，这些措施纯粹源于“伦理考量”。当然，针对被驱逐者的处理亦是如此。档案中充满了军方所写的绝望的记录，数百万犹太人和波兰人的行动完全无视所有“军事和经济必要性。”参见以及该书所刊载的文献资料。
- [18] 1939 年 9 月 1 日（即战争爆发之日），希特勒签署了开启后续所有种族灭绝行动的决定性法令。该法令不仅针对精神病患者（如常被误解的那样），更涵盖所有“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只是首批受害者。
- [19] 见弗里德里希·珀西瓦尔·雷德-马莱采文《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斯图加特，1947 年，第 190 页。
- [20] 特勒将意识形态运动凌驾于政党之上的优越性，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

意识形态总是“宣称其不可动摇性”（《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五章与组织）。希特勒青年团官方手册《我的国家入门》（纽约，1938年）开篇即强调：所有曾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国家问题，如今都已变得如此珍贵。简单而精炼（我加粗），以致每位同志都能理解，并在他们解决道路上通力合作。

- [21] 纳粹党《组织法》中列举的党员誓言之首为：“元首永远正确。”（1936年版，第8页）但1932年版《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规》第38页则表述为：“希特勒的决定即为最终决定！”请注意措辞间的显著差异。他们自诩无误，即从未真诚承认过错误，这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决定性的差异所在。列宁则持相反观点。参见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概览》，纽约，1939年，第583页。
- [22] 黑格尔辩证法能成为永远正确的绝佳工具，这显而易见，因为它允许将所有失败都诠释为胜利的开端。此类诡辩最精彩的范例之一发生在1933年之后：德国共产党人近两年拒绝承认希特勒的胜利实为德国共产党遭受的挫败。
- [23] 引自戈培尔：《戈培尔日记（1942-1943）》，路易斯·洛克纳编，纽约1948年，第141页。
- [24] 斯大林，同上，前引。
- [25] 1942年9月，当犹太人大屠杀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希特勒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及他1939年1月30日的演讲（发表于一本名为《领袖的艺术》的小册子（格罗特利特沙尔德出版社，1939年）。并在1939年9月1日帝国议会会议上，他曾宣布：“倘若犹太人煽动一场旨在灭绝欧洲雅利安民族的国际战争，那么倒不是雅利安民族，而是犹太人将（此处句子被掌声淹没）”（参《元首的批判》第14期，第33页）。《党内文献》，第14期，第33页）。
- [26] 见上文引述的1939年1月30日演讲，第19页。
- [27] 康拉德·海登，《元首：希特勒的崛起》，波士顿，1944年。书中强调希特勒“惊人的不诚实他的言论”，他“对事实漠不关心，他并不认为这些事实至关重要性”（第368、374页）。赫鲁晓夫用几乎相同的措辞描述了“斯大林不愿考虑现实情况”以及他对“实际状况”的漠视，见前引文献。斯大林对事实重要性的看法，在其对俄罗斯历史的周期性重构中得到最充分体现。俄罗斯历史的定期修订。
- [28] 纳粹总理。
- [29] 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大林时代，诺列维奇家族不知何故积累了阴谋论：建立新阴谋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抛弃旧阴谋。托洛茨基阴谋始于1930年前后，三百个家族在人民阵线时期加入，自1935年起持续扩张，英国帝国主义在斯大林

-希特勒同盟时期成为现实阴谋；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紧随其后；最后出现的犹太世界主义，则明显令人不安地呼应了纳粹宣传。

- [30] 参见海姆·维兹曼自传《试错之路》，纽约，1949年，第185页。
- [31] 例如。奥利奥·博恩哈德，《犹太人与金钱世界霸权》，1926年，第57页。
- [32] 希特勒于1922年首次使用此图：一侧是莫西斯·科恩鼓励其组织削弱工人的诉求，而其兄长艾萨克在工厂中则号召群众罢工（《希特勒演讲集：1922-1939》，贝恩斯编，伦敦：1922年，第29页。）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的演讲集在纳粹德国时期从未完整出版，因此人们不得不借助致英文版。从菲利普·布克（编撰的书目《菲希勒的演讲集（根据马丁·马丁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这绝非偶然：只有公开演讲被《维尔基克拉布罗赫特》逐字刊载；至于对元首团和其他党内组织的演讲，该报仅作“提及”处理。这些讲话从未被视为出版物。
- [33] 费勒的二十五条纲领仅包含所有反犹主义宣传所采用的标准手段，纳粹的反犹政策分为两类：驱逐归化犹太人，并将本土犹太人视为外国人对待。纳粹的反犹言论总是比其政策纲领更为激进。瓦尔德马·古里安在《现代德国的反犹主义》一文中强调纳粹反犹主义缺乏原创性，该文收录于科佩尔·S·平森编《反犹主义研究文集》（纽约，1946年），第243页：“所有这些主张与观点本身并不新颖，因为它们在所有民族主义圈子里都是不言而喻的；真正引人注目目的是它们被呈现时的煽动性与演说技巧。”
- [34] 纳粹运动内部纯粹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典型代表当属罗姆，他写道：“在此问题上，我的观点与民族庸人的看法截然不同。绝非：犹太人该为一切负责！我们才该为犹太人今日得以统治的事实负责”（恩斯特·罗姆，《民族意志》，1933年，大众版，第284页）。
- [35] 党卫军申请者必须追溯其祖先至1750年。申请党内要职者仅需回答三问：1. 你为党做了什么？2. 你是否在身体、精神、道德上绝对健全？3. 你的家谱是否完整？参见两个体系亲和性的特征在于，布尔什维克的精英与警察组织，即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样要求其成员提供血统证明。参见F. Beck与W. Godin合著《俄罗斯大清洗和提取供词》，1951年。
- [36] 由此可见，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极权倾向最赤裸裸地体现在：其不仅企图迫害共产党员，更强迫每位公民证明自己非共产党员。
- [37] 不应高估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总体而言其影响力正在减弱，而组织的影响力则在增强（哈达莫夫斯基，同上，第64页）。“当报纸被要求对抗活体组织的激进力量时便束手无策”（同上，第65页）。“那些起源于纯属宣传手段

的实权具有波动性，若无组织暴力作为支撑，便可能迅速消亡（引自第 21 页）。

- [38] 群众集会是最有力的宣传形式……[因为]每个个体在集体的团结中会感到更加自信，也更具力量（同上，第 47 页）。通过组织、系统训练和纪律约束，当下的热情会升华为原则与精神状态（同上，第 21-22 页）。
- [39] 在希特勒偶尔关注此问题时，他惯常强调：“顺便说一句，我并非独裁者或君主意义上的国家元首，而是德国人民的领袖”（见《精选演说集》，1939 年，第 114 页）。——汉斯·弗兰克亦持相同观点：“国家社会主义帝国并非独裁政权，更非专制统治。相反，国家社会主义帝国建立在元首与人民相互忠诚的基础上”（引自《元首演讲集》，慕尼黑，1939 年，第 15 页）。
- [40] 希特勒多次重申：“国家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目标是：种族的保存”（见里登，1939 年，125 页）。他还强调，他的运动“并非建立在国家理念之上，而是主要基于紧密的民族共同体”（见里登，1933 年，125 页；以及 1937 年面向新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演讲，该演讲作为附录刊载）。以及 1937 年面向新生代政治领袖的演讲，该演讲作为附录刊载于《希特勒的餐桌谈话》）。这也是斯大林所谓“国家理论”中复杂双重话语的核心：“我们主张国家消亡，同时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代表着所有国家形式中最强大的权威力量。国家力量最高程度的发展，其目的在于为民族消亡创造条件，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 [41] 亚历山大·施莱因，阿道夫·希特勒，卡尔斯巴德，1936 年出版的《希特勒与〈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书，首次通过文献学比较分析了纳粹思想与《锡安长老会纪要》思想的本质同一性。另见 R·M·布兰克《阿道夫·希特勒与〈锡安长老会纪要〉》，1938 年。最先承认《犹太人议定书》教义的十人之一是西奥多·弗里施，这位德国战后反犹主义的“元老级人物”在其所编《议定书》的后记中写道：1924 年：“我们的未来商人和外交官们，甚至要向东方阴谋大师们学习执政的入门知识，《犹太复国主义议定书》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预备课程。”
- [42] 关于《锡安长老议定书》的历史，参见约翰·S·柯利斯所著《对锡安长老议定书的评估》，1942 年出版。《议定书》系伪造之事实，对宣传目的而言无关紧要。1905 年出版俄文第二版的俄国出版商 S·A·尼卢斯早已深知这份“文件”的可疑性质，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但倘若能通过文件或可信证人的证词证明其真实性，倘若能揭露操纵全球阴谋的核心人物……那么……秘密罪恶便会被瓦解……”（引自库里斯著作，同上）希特勒认为尼禄无需使用相同的伪造手段：这些文书最充分的真实性证明，恰恰在于它们已被证实为伪造品。

他还补充了关于其可信度的论点：“许多犹太人可能无意识的行为，在此处却被有意识地阐明，而这正是关键所在。”（见《犹太人》第一卷，第 10 章）

- [43] 弗里施，同上著作，《犹太人》基本原则是：“一切属于这个犹太民族有益者皆为善，有害者皆为恶。”
- [44] 世界帝国虽以民族为基础，但其扩张很快便远超此界限（里登演讲集）。
- [45] 亨利·罗兰在《我们时代的启示录》（巴黎，1939 年）中指出，《犹太人议定书》的流程度仅次于《圣经》（第 40 页），并揭示了该书与《秘密武器》的相似性。该书初版于 1612 年 1939 年仍在巴黎街头兜售，宣称揭露耶稣会阴谋“为一切恶行与暴力行径开脱，实为颠覆既有秩序的真实行动”（第 32 页）。
- [46] 这整套文献以奇士德·马莱的《政治研究》（1817 年）为代表，该书大量援引早期作者观点，旨在证明存在一个宗教秘密社团。法国革命的英雄们在他眼中不过是秘密力量的傀儡，是共济会的代理人。但共济会不过是其同时代人赋予“革命教派”的名称，该教派自古存在，其策略始终是“隐于幕后操纵傀儡，将认为合适的傀儡推上舞台”。他开篇便指出：“或许人们难以相信，竟存在一个自古形成且始终如一执行的计划：……革命的策划者既非法国人，亦非德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等等。他们构成一个特殊民族，诞生于黑暗之中，在所有文明国家之间悄然壮大，其目标正是将所有文明国家征服于其统治之下。”

关于这方面文献的详尽讨论，可参见 E. 莱苏尔所著《革命时期的工匠共济会》，载于《革命史图书馆》丛书，1914 年版。这些阴谋论本身具有何等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亦可见一斑，如法国反共济会狂热文献的浩瀚程度，几乎不逊于其反犹主义对应物。G. Bord《1815 年之前的共济会起源》一书，堪称将法国大革命视为秘密阴谋社团产物的所有理论的汇编，1908。

- [47] 里登——参见 1943 年 1 月 12 日于柏林党卫军总部召开的党卫军劳工问题委员会会议记录，其中建议应废除“民族”一词，因为该概念承载自由主义内涵，也因其无法准确表述日耳曼民族的内涵而备受诟病（见《纳粹阴谋与侵略》第五卷第 705-PS 号文件，第 515 页）。
- [48] 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第 6 页。
- [49] 戈培尔，同上，第 377 页。这一承诺隐含于所有反犹宣传之中。该承诺由希特勒《雅利安人与犹太人的极端对比》（《我的奋斗》第一卷第十一章）阐述。
- [50] 凯尔档案，存于犹太文献中心。
- [51] 希特勒早年的宣言：“我绝不承认其他民族享有与德国人同等的权利”，这最终成为官方教条：“国家社会主义人生观的基础，在于认识到人类的差异性”

（《纳粹入门》第 5 页）。

- [52] 例如，1923 年希特勒宣称：“德意志民族三分之一是英雄，三分之一是懦夫，其余尽是叛徒”（《希特勒演说集》，贝恩斯编，第 76 页）。

夺权后，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残酷地蔓延开来。例如，戈培尔在 1934 年曾说：“谁敢批评？党员？不。其余德国民众？他们该庆幸自己还活着。”若任凭那些仰仗我们生存人妄加批评，那可就过犹不及了。”引自科恩·布拉姆斯特德特，同上著作，178-179 页。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宣称：“我不过是一块永不停歇的磁铁，在德国民族中不断移动，并从这个民族中淬炼出钢铁般的意志。我曾多次声明：终有一日，德国所有有价值的人都将站在我的阵营中。那些不愿加入我阵营的人，反正都是些废物。”即便在当时，希特勒身边的人也清楚那些“反正毫无价值”者将遭遇何种命运（参见《大德意志自由联盟》1939 年 9 月 11 日-1940 年 10 月 3 日希特勒演讲集，第 174 页）。希姆莱所言亦是此表达此意：“元首思考的不是德语，而是日耳曼语”（克斯特恩档案，参见前文），但从希特勒的《每日谈话录》（第 315 页）中得知，彼时他甚至已开始嘲弄日耳曼人的“喧嚣”，转而用“雅利安思维”进行思考。

- [53] 希姆莱 1943 年 4 月在哈尔科夫对党卫军领袖的讲话（《纳粹阴谋》，第四卷，572 页及后续）：“我很快就在各国组建了日耳曼化党卫军”希特勒早年就透露过这种非民族政策的迹象（《演讲集》）：“我们当然也会接纳其他民族的代表加入新的统治阶级，即那些因参与我们的斗争而值得此殊荣者。”

- [54] 哈达莫夫斯基，同上。

- [55] 海登，同上，第 139 页：宣传并非“向大众灌输观点的艺术。实际上它是从大众中获取观点的艺术。”

- [56] 哈达莫夫斯基，同上，第 139 页。该术语引自希特勒《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十一章），其中将运动的“鲜活组织”与官僚机构的“僵化机制”相对比。

- [57] 将极权主义领袖解读为马克斯·韦伯所指的“精明算计者”实属重大谬误。韦伯提出的“魅力型领导”范畴。参见汉斯·格特《纳粹党》一文，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40 年卷四十五期。（海登传记中也存在类似误解。该书作者将希特勒描述为官僚政党的魅力型领袖。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解释“无论言行矛盾多么赤裸裸，都无法动摇严密纪律的组织体系”（顺带一提，这种矛盾在斯大林身上更为典型，他“总是刻意言行相悖，所作所为与所言所语背道而驰”。苏瓦林，同上著作第 431 页。）

关于此误解的根源，可参见阿尔弗雷德·冯·马丁《论当代社会学》，载于《社会学杂志》第 27 卷，以及阿诺德·科克特根《领袖国中行政管理的规

律性》，载于《帝国行政学杂志》。以及阿德·科克特根在《帝国行政》期刊（1936年）发表的《领袖国家中行政管理的规律性》一文。这两位学者均将纳粹国家描述为具有魅力型领导的官僚体制。

[58] 哈达莫夫斯基，同上，第21页。为实现极权主义目的，通过教育或说服传播其意识形态实属谬误。用罗伯特·莱伊的话说，这种意识形态既不能教导也不能学习，只能践行与实践（参见《通往东方之路》，无日期）。

[59] R. 霍恩作为杰出的纳粹政治理论家之一，在其著作《帝国共同体与意志》中阐释了该运动缺乏理论体系乃至共同理想信念的现象。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极权主义运动看，任何价值观共同体都是破坏性的（第113页）。

[60] 希特勒在论述威权统治与组织的关系时指出：纳粹党理所当然地从其他团体和政党手中接管了种族理念，并自诩为该理念唯一代表者，因他们率先以此为基础建立战斗组织并将其付诸实践。同上，第二卷第五章。

[61] 参见希勒《宣传与组织》，载于前引著作第二卷第十一章。

[62] 希姆莱极力敦促“切勿颁布任何关于‘犹太人’定义的法令”便是明证；因“这些愚蠢的承诺只会束缚我们的手脚”（纽伦堡文件第626号，1942年7月28日致伯格信函，犹太文献中心存有影印副本）。

[63] “元首意志即最高法律”的表述见于所有规范党与党卫军行为的官方规章。此主题的最佳文献来源为奥托·高韦勒所著《党规与党规执行细则》，1939年。

[64] 海登在《我的奋斗》德文版第292页指出该书初版与后续版本存在以下差异：初版主张选举党内官员，仅在当选后方赋予其无限权力与权；而所有后续版本均规定由上级领导自上而下任命党内官员。显然，对极权政权的稳定而言，自上而下的任命原则远比被任命者的“无限权力”更为关键。实际上，通过领袖的绝对主权，下属的权力受到决定性限制。详见下文。

斯大林出身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秘密组织机构，可能从未想过此问题。对他而言，党内职务的任命本质上是个人权力的积累。（不过直到三十年代，在研究了希特勒的案例后，他才允许别人称呼自己为“领袖”。）必须承认，他完全能援引列宁的理论为这些手段辩护，列宁曾指出“各国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仅凭自身努力只能发展工会意识”，因此领导权必然来自外部。（参见《怎么办》，初版于1902年，收录于《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二册。）关键在于列宁将共产党视为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部分，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的杠杆”，能够“引导整个无产阶级群众”，即一个超越阶级之外的组织。（参见W. H. 张博林《俄罗斯革命，1907-1911》，纽约，1935年，第二卷，第361页。）尽管如此，列宁并未质疑党内民主的有效性，尽管他倾向于将民主限制在工

人阶级内部。

- [65] 希特勒，同上，第二卷，第十一章。
- [66] 同上，该原则在纳粹夺权后立即得到严格执行。1937 年，七百万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中仅有五万人获准加入党籍。参见 H. L. 柴尔德斯为《纳粹总理》所作序言。另可对照《一党制的违宪性》一文，载于《国家法杂志》1931 年卷 98，第 678 页“即便是单一政党也绝不能!!其势力范围扩展到足以覆盖全体国民的程度。我之所以称其为‘全面’，是因为它对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影响。”
- [67] 参见希特勒对“激进民众”的区分，唯有此类人准备加入党派，而成千上万的同情者因‘怯懦’而无法作出必要牺牲。见前引文献，乔·德特著。
- [68] 希特勒：关于冲锋队的章节见于《我的奋斗》，第二卷，第九章，第二部分。
- [69] 作为装甲部队，这些原本应由希特勒特别调遣的党卫军特种部队，我遵循 O. C. Giles 在《盖世太保》中的说法。牛津世界博览会小册子第 36 号，1940 年。
- [70] 关于党卫军的组织架构与历史，最重要的文献是希姆莱的《党卫军的起源与发展》，载于《党卫军历史》特刊，1939 年：战争期间，当武装党卫军的兵力因前线伤亡而需补充新兵时，武装党卫军便丧失了其精锐特质。党卫军内部的权力集中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此时党卫军总部，即高级领袖团，已然成为该运动真正的核心精英。

关于党卫军此阶段的极具揭示性的文献资料，可参见胡佛图书馆档案库的希姆莱档案第 278 号文件夹中，可找到揭示这一阶段党卫军的极具启示性的文献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党卫军该部队在招募外国劳工和本土居民时，刻意模仿法国外籍军团的招募方式和规则。根据希特勒 1942 年 12 月签署（但从未公开）的命令，德国人的征召依据是“1925 年出生者应被征召入武装党卫队”（希姆莱致博尔曼的信函）。征兵与入伍表面上以自愿为原则。其真实情况可从众多受命执行此任务的党卫军领导人的报告中窥见一斑。一份 1943 年 7 月 21 日的报告描述了警察如何包围征召法国工人的大厅，法国人先是高唱《马赛曲》，随后试图从窗户跳出。德国青年的响应同样乏善可陈。尽管他们承受着巨大压力，被告知绝不愿加入军队那“肮脏的灰色大军”，但 220 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中仅 18 人报到服役（据 1943 年 4 月 30 日西南征兵中心主任豪斯勒提交的报告）；其余人员均选择加入国防军。与国防军相比，党卫军的伤亡更为惨重，这或许影响了他们的决定（参见卡尔·O·佩特尔《党卫军之死》载于《当代史季刊》1954 年 1 月刊）。但仅凭此因素不足以成为决定性原因，以下事实可佐证：早在 1940 年 1 月，希特勒就下令征召冲锋队成员加入武装党卫军，根据现存报告记载，柯尼斯堡地区的征召结果如下：

希特勒便下令将冲锋队成员征召入武装党卫队，根据现存报告记载，柯尼斯堡地区的征召结果如下：1807 名冲锋队员被征召“从事警务工作”；其中 1094 人未报到；63 人被判定不适任；82 人被认定适合在党卫军服役。

[71] 韦尔纳·贝斯特，同上著作，1941 年，第 99 页。

[72] 然而，这并非希特勒的过错。他始终坚持认为，冲锋队这个名称本身就表明它只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宣传部、报纸、科研机构等其他党内组织并无二致。他还试图破除人们对准军事组织可能具有军事价值的幻想，并要求训练必须贯彻到底。根据党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军队原则。同上，前引。

[73] 冲锋队成立的官方理由是保护纳粹集会，而党卫军的原始任务则是保护纳粹领导人。

[74] 希特勒，同上。

[75] 恩斯特·拜尔。柏林，J9J8。引文出自《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70 页。

[76] 罗姆的自传清楚地表明，他的政治信念与纳粹的理念有多么格格不入。他始终渴望建立一个“社会国家”，并始终坚持“原始的德意志人及其政治家”（原著德文版第 349 页）。尤其能体现其非极权主义态度，或者说他甚至无法理解极权主义及其“绝对统治”主张，他的态度以下段落可以说明：“我看不出来以下三者为何不能兼容：我对威尔斯巴赫世袭亲王，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的忠诚；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参谋长（即鲁登道夫）的敬仰，他今日正是德国民族良知的化身；以及我与政治变革先驱者阿道夫·希特勒”的战情谊（第 348 页）。最终导致罗姆丧命的根源在于，夺权后他设想建立一个仿照意大利政权的法西斯独裁体制，其中纳粹党将“打破党的枷锁”并“自身成为国家”，这恰恰是希特勒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局面。参见恩斯特·罗姆《冲锋队万岁》，1933 年 12 月于柏林向外交使团发表的演讲（无日期）。

在纳粹党内部，冲锋队与国防军密谋推翻党卫军和警察统治的可能性显然从未被完全排除。1942 年，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即罗姆和施莱歇尔将军遇害八年后，被怀疑企图“在战后借助武装部队和冲锋队的协助，为正义点燃最炽烈的火焰（以对抗党卫军）”（《纳粹阴谋》，第六卷，第 747 页）。

[77] 希特勒，同上著作。第二卷第 111 章指出，宣传试图将某种学说强加于全体人民，而组织则仅吸纳其中较小比例的激进成员。另见 G. 内斯克，同上著作。

[78] 希特勒，同上，第二卷，第九章。

[79] H·哈达莫夫斯基，同上著作，第 28 页。

[80] 党卫军骷髅部队须遵守下列规定：1. 任何旅团不得在本籍地区服役。2. 所有部队服役三周后必须调离。3. 成员严禁单独上街，亦不得在公共场合展示骷

髅徽。参见：希姆莱 1938 年在古曼陆军年度大会上的演讲（该演讲实为 1937 年发表，详见《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616 页，该处仅刊载节选）。由美国反纳粹文献委员会出版。

[81] 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党卫队领袖！反布尔什维克战斗组织：《黑衫军》第 3 期，1936 年。公开宣称：“我深知德国国内有人看到这身黑制服就反胃。我们理解这种情绪，也不指望能赢得太多人的喜爱。”

[82] 在对党卫军的演讲中，希姆莱总是强调已犯下的罪行，并着重指出其严重性。例如谈及犹太人的灭绝行动时，他会说：“我还想就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务与诸位坦诚相谈。在我们内部应当直言不讳，但此事绝不可公之于众。”波兰知识分子的清算：“你应该听听这个，但也要立刻忘记它”（《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558 页和第 553 页）。

戈培尔，同上，第 266 页，以类似口吻注记道：“关于犹太问题，尤其如此，我们已采取了无路可退的立场。经验经验表明，烧毁退路者比尚有退路者更具决绝斗志。”

[83] 苏瓦兰，同上，第 648 页。极权主义运动对其领导人（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私生活严加保密的做法，与所有民主国家热衷于向公众展示总统、国王、首相等人的私生活的宣传价值形成鲜明对比。极权主义手段不允许基于这样的信念建立认同：即便是我们之中地位最高者，终究不过是凡人。

苏瓦林在《斯大林：克里姆林宫的神秘主人》一书第 13 页中，列举了描述斯大林最常用的标签：“斯大林，克里姆林宫的神秘主人”；“斯大林，不可捉摸的人物”；“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斯芬克斯”；“斯大林，谜团”，“不可解之谜”等。

[84] 倘若（托洛茨基）选择发动军事政变，或许能击败三头政治集团。但他离任时，竟未作丝毫努力去动员那支他创建并统领七年的军队为自己辩护”（艾萨克·德斯蒂尔，同上，第 297 页）。

[85] 托洛茨基领导的战争人民委员部是“模范机构”基出面处理。参见苏瓦林，同上，第 288 页。

[86] 斯大林死亡的种种情况似乎与这些方法的万无一失相矛盾。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斯大林在死前无疑还计划进行另一次全面清洗，却被身边的人所杀，因为再也没有人感到安全了。尽管存在大量间接证据，但这点无法证实。

[87] 因此希特勒于 1932 年亲自电报通知冲锋队刺客们，将波滕帕谋杀案的责任归咎于他们，尽管他本人很可能与此毫无瓜葛。关键在于确立认同原则，用纳粹术语说，即“领袖与人民的相互忠诚”，因为“帝国赖此而立”（汉斯·弗

兰克，前引书）。

- [88] 斯大林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系统性地将自己的恶行、罪行以及政治错误推卸给那些被他蓄意诋毁和毁灭的人”（苏维林，同上，第 655 页）。显然，极权统治者可以随意选择替罪羊来承担其错误，因为下属的一切行为都被假定源于他的授意，因此任何人都可能被强行塑造成替罪羊。
- [89] 希特勒本人（而非希姆莱、博尔曼或戈培尔）始终是真正“激进”措施的发起者；这些措施永远比其亲信提出的方案更为极端；就连希姆莱在受命执行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时也深感震惊，这一切如今已被无数文献所证实。至于斯大林比布尔什维克党左派更温和的童话故事，如今同样无人信服。更需铭记的是：**极权领袖总试图向外界展现温和形象，而其真实角色，即不惜一切代价推动运动前进，甚至加速其进程，该形象始终被严密掩盖。**例如参见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我与阿道夫·希特勒及党的关系》备忘录（载于《纳粹阴谋》第八卷第 707 页起）。“当党与盖世太保采取激进措施的消息或传闻出现时，通过元首的行为可推断这些措施并非元首本人所下令，此后数年间，我逐渐确信元首本人始终倾向于更激进的解决方案，只是未曾表露于外。”

在斯大林登上绝对权力宝座之前的党内斗争中，他始终谨慎地扮演着“中庸之道者”的角色（参见德斯蒂尔，同上，第 29.5 页及后续）；尽管他绝非“妥协之人”，却从未彻底放弃这个形象。例如 1936 年，当外国记者问及该运动的世界革命目标时，他回答道：“我们从未怀有此类计划和意图。”这是误解的产物；一种滑稽的误解，或者说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悲喜交加的误解。（德斯泰尔，同上，第 422 页）

- [90] 参见亚历山大·科伊雷《现代谎言的政治功能》，载《当代哲学评论》，1945 年 6 月。

希特勒，同上，第二卷，第三章，详尽探讨了秘密社团作为极权运动范本的利弊。其考量实则引向了科伊雷的结论，即采纳秘密社团的原则却摒弃其隐秘性，在“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组织。在运动的掌权前阶段，纳粹几乎没有坚持保密之事。直到战争期间，当纳粹政权完全走向极权化，且党内领导层发现自己被赖以指挥战争的军事等级制度所包围时，精英组织才被明确要求将一切与“最终解决方案”（驱逐和大规模灭绝）相关的事务绝对保密。此时希特勒开始扮演阴谋集团首脑的角色，但他并未回避亲自宣布并传播这一事实。1939 年 5 月与总参谋部讨论时，希特勒制定了以下规则，其措辞听起来仿佛是从某个秘密社团的入门手册中抄录而来：1. 任何人无需知晓超出

其职责范围的信息。2. 任何人无需知晓他不该知道的信息。3. 任何人不得提前知晓其职责所需的信息（引自海因茨·霍尔达克《我们真正的秘密》，1949年，第378页）。

- [91] 以下分析紧密遵循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秘密与秘密社团的社会学》，该文刊载于《社会学月刊》第十一卷第四期（1906年1月），构成其《社会学》第五章（莱比锡，1908年），其中部分内容由库尔特·H·沃尔夫译出。
- [92] 正因为社会底层阶层构成了通往秘密核心的中介过渡，它们促使围绕核心的逐渐压缩的排斥场，比起全然自外而内或自内而外那种激进的突兀立场，它提供了更安全的保障（同上，第489页）。
- [93] 纳粹文献中反复出现“结义兄弟”、“誓死战友”、“誓死共同体”等术语，令人厌烦，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词汇迎合了德国青年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幼稚浪漫主义情怀。希姆莱尤其以更明确的含义使用这些术语，将其引入党卫军的“核心口号”（“我们已列队前行，遵循永恒法则，作为北欧民族的国家社会主义秩序，作为其氏族的誓约共同体，迈向遥远的未来”，参见D.艾肯著作，并赋予其明确的含义，即对所有其他人的“绝对敌意”（参见西梅尔，同上，第489页）：“当十亿人类大军与我们日耳曼民族为敌时……”参见希姆莱在波兹南召开的党卫军少将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10月4日），《纳粹阴谋》，第四卷，第558页。
- [94] 西美尔，同上著作，第490页。这一原则与许多其他原则一样，在纳粹党人对《锡安长老会纪要》的深思熟虑后被采纳。希特勒早在1922年就说过：“右翼绅士们至今仍不明白，要遭受某一天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根本无需成为犹太人的敌人，只需效仿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段即可。”在当时没有人猜到，这种独特的宣传方式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有朝一日，被送上断头台不必然就是我们的敌人，只要是犹太人，或是某个健康委员会宣布为“彻底不合格者”，就已经足够。希姆莱相信并宣扬整个党卫军原则是：“我们必定会对血缘同胞诚实、郑重、忠诚并充满同志情谊”。
- [95] 参见西梅尔，前引书，第480-481页。
- [96] 苏瓦林，同上，第319页，沿袭布哈林的表述。
- [97] 苏瓦林在前引著作第113页指出，斯大林“向来对能搞定‘一桩交易’的人印象深刻。他视政治为需要技巧的‘交易’”。
- [98] 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右派的狂热反对者和斯大林的追随者。当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构正是斯大林主义的堡垒。”（西利加，同上，第48页）。——苏瓦林在同上著作第289页指出，

斯大林甚至此前就“延续了内战期间启动的警察活动”，并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中央政治局的代表。

- [99] 俄国内战结束后不久，普鲁东便指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已被“一切权力归契卡”所取代……武装冲突的终结削弱了军事控制……却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契卡，它通过简化运作机制实现了自我完善”（苏瓦林，同上，第 251 页）。
- [100] 1933 年，戈林创立了盖世太保：1934 年希姆莱被任命为盖世太保首脑，随即着手用党卫军成员替换其人员；到战争结束时，75%的盖世太保特工均为党卫军成员。还需注意的是，党卫军部队尤其适合承担此项任务，因为希姆莱早在掌权前就已组织他们执行针对党员的间谍活动（海登，同上，第 308 页）。关于盖世太保的历史，参见贾尔斯，同上，以及《纳粹阴谋》第二卷，第 11 章。
- [101] 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神话》承认种族多元主义，唯独将犹太人排除在外，这很可能是他犯下的决定性意识形态错误之一。正是这个错误导致他失宠于元首，并在运动中逐渐被希姆莱、鲍曼乃至施特莱歇尔等人取代。此举违背了“凡未被纳入者（日耳曼民族）即属排除者（人类大众）”的原则。参见注释 87。
- [102] 西美尔，前引书，第 492 页，列举了若干秘密犯罪组织，其成员自愿推举一名指挥官，此后对其绝对服从，不作任何批评且不受任何限制。
- [103] 希利加，同上，第 96-97 页。他还描述了二十年代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中，就连被判处死刑的普通囚犯也甘愿被押赴刑场“一言不发，没有对处决他们的政府发出反抗的呐喊”（第 183 页）。
- [104] 希利加记载了那些被判处死刑的党员如何认为：“如果这些处决能保全官僚独裁统治的整体，如果能平息叛乱的农民（或者说能误导他们），那么牺牲自己的生命就不会白费”（同上，第 96-97 页）。
- [105] 戈培尔关于外交在政治中作用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外交官们不了解政治背景，无疑最好的做法是……在扮演绥靖角色时展现出真诚，有时恰恰是最有力的政治可信度证明。”（同上，第 87 页）
- [106] 鲁道夫·赫斯 1934 年广播讲话。《纳粹阴谋》，第一卷，第 193 页。
- [107] 沃纳·贝斯特，前引书，解释道：“将来政府的制定‘正确’的规则……已不再是法律问题，而是命运问题。因为真正的滥用行为……在违背“生命法则”的情况下，终将被命运本身以不幸、覆灭与毁灭进行惩罚，这种惩罚不是由国家法院来执行，因为它冒犯了生命法则。”引自《纳粹阴谋》，第四卷，

第 490 页。

- [108] 参见克拉夫琴科，前引书，第 422 页。“任何受过正规思想灌输的共产党员都不会认为，党在公开宣称一套政策、私下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时是在说谎”。
- [109] “国家社会主义者鄙视同胞，冲锋队队员鄙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党卫军队员鄙视冲锋队队员”（海登，同上，第 308 页）。
- [110] 希姆莱最初通过照片筛选党卫军候选人。后来设立种族委员会，申请人须亲自接受审查，由其判定种族特征是否合格。参见希姆莱论《党卫军与警察的组织与义务》，载《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616 页起。
- [111] 希姆莱深知，他将种族问题从“基于惯常反犹太主义的消极概念”转化为“建设党卫军的组织任务”，堪称其“最重要且持久的成就”（杜赖希特/其党卫军及德国警察首脑，“仅限警察内部使用”；无日期）。因此，“种族问题首次被置于，或者更确切地说，已成为焦点所在，其意义远超出自然仇视犹太人背后的消极概念。元首的革命思想已被注入温暖的鲜血”（《党卫军之路》帝国党卫军总署培训处，书封面：“禁止出版”，无日期。第 25 页）。
- [112] 希姆莱于 1929 年被任命为党卫军首领后，立即推行种族甄选原则与婚姻法，并补充道：“党卫军深知此项命令意义重大。嘲讽、冷笑或误解皆不足为惧；未来属于我们。”引自达伊肯，同上。十四年后，希姆莱在哈尔科夫的演讲中（《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572 页起）再次提醒党卫军领袖：“我们是首个真正通过行动解决血统问题的人……所谓血统问题，我们当然指的并非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主义恰如除虱。清除虱子无关意识形态，纯属卫生问题。但对我们而言，血统问题时刻提醒着我们的自身的价值，这提醒着我们，究竟是什么真正维系着这个德意志民族的团结。”
- [113] 希姆莱，同上，《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616 页译文。
- [114] 希姆莱在波森南的演讲，纽伦堡审判记录，第四卷，第 558 页。

第三章

极权主义掌权

如果一个运动拥有国际性组织，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以及全球性政治抱负，那么一旦它夺取某个国家的政权，它就显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幸免于这场危机，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奇怪地忽视民族问题，这是关乎革命的战略问题；其次，则是因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剥夺了第二国际对各国成员的权威后，社会主义运动首次面临政府管理问题，而各成员国均已接受民族情感优先于国际团结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换言之，当社会主义运动在各自国家夺取政权之时，它们已经转变为民族政党。

这种转变从未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和纳粹这两个极权运动身上。当它们夺取政权之际，运动所面临的危险性在于以下两方面事实：一方面，接管国家机器可能导致运动“僵化”，凝固成绝对统治的形式[1]；另一方面，它所掌控的领土疆界可能会限制它的行动自由。对极权主义运动而言，这两种危险同样致命：走向专制主义将扼杀运动的内在驱动力，而走向民族主义则会阻碍其外部扩张；可是若没有这两种扩张，运动便无法存续。这两种运动所形成的政府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绝对统治与全球统治这种双重主张自动衍生的产物，最贴切的表述莫过于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口号。即便托洛茨基的理论不过是社会主义对一系列革命的预言，预告了从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革命将从一个国家传播至另外一个国家[2]。这个口号带着半吊子无政府主义的意味，只在字面措辞上提到“不断”，严格来说，它名不符实。然而就连列宁也更欣赏这个口号，而非其理论内容。在苏联，革命以全面清洗的形式，自1934年起成为斯大林政权的永久性制度[3]。正如其他案例所示，斯大林之所以集中攻击托洛茨基这个半被遗忘的口号，恰恰是因为他决定采用这种手段[4]。在纳粹德国，尽管纳粹党未能将其发展到同等程度，但类似的永久革命倾向已清晰可辨。很典型的是，他们的“永久革命”从清算党内敢于公开宣扬“革命下一阶段”的派系开始。正因为“元首及其元老们深知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6]。此刻，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永久革命理论，而是种族的“永不停歇的筛选”理念，这要求不断将筛选标准彻底化，即持续淘汰不合格者的灭绝措施[7]。关键在于希特勒与斯大林都以稳定承诺为幌子，掩盖其制造永久性动荡的真实意图。

政府与运动共存显然有不小的困境，它们体现在极权主义的不断扩张的要求与有限领土内行使有限权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作为相互尊重他国主权的国际联盟名义成员与企图支配世界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样的困境，再没有比剥离其原本内容更好的解决方案了。因为极权统治者面临着看似荒谬的双重任务：既要使运动虚构的世界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切实运作现实，又必须阻止这个新世

界形成新的稳定性，因为一旦法律制度稳定下来，必然瓦解运动本身，连同终征服世界的希望一同消亡。极权统治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常态化进程发展到足以催生新生活方式的程度，这种新生活方式经过时日沉淀，可能摆脱其私生子的烙印，跻身于地球上各国差异巨大、深刻对立的生活方式之列。一旦革命制度成为民族生活方式（即希特勒宣称纳粹主义并非出口商品、斯大林声称社会主义可在单一国家建设的论断，不再只是欺骗非极权世界的把戏），极权主义便会丧失其“极权”属性，受制于民族法则。每个国家都拥有特定的领土、人民和历史传统，这些特质使其与其他国家产生关联：这种多元性本身就反驳了任何特定政体具有绝对正当性的主张。

在实践上，极权主义掌权的悖论在于：拥有一个国家的所有政府权力与暴力工具，对于极权运动并不是完全是一件好事。它罔顾事实、对虚构世界规则严格遵循，都会使它变得日益难以维系，更难以像之前表现得那么彻底。权力意味着与现实直接对抗，而掌权的极权主义始终致力于克服这一挑战。宣传与组织手段已不足以支撑不可能之事的实现，荒诞之事确为真实，疯狂的逻辑统治着世界；极权主义虚构体系的主要心理支柱也不复存在，这就是民众拒绝接受现实为唯一可能的世界，始终充满强烈愤懑；从铁幕之外，从非极权世界那一头泄露出来的任何一点事实信息，都会引发现实的洪流，这对极权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堪比反制宣传极权运动的威胁更严重。

为了对地球上所有人口实施绝对统治而斗争，为消灭所有非极权现实而与之竞争，是极权政权自身固有的属性；若它们不以全球统治作为终极目标，便极易丧失已夺取的权力。即便对单个个体而言，唯有在全球极权条件下才能实现绝对而可靠的统治。因此，掌权首要意味着为运动建立官方认可的总部（或者是卫星国的分部），来执行针对现实（更准确地说，是对抗现实）的实验，以及为了最终目标而创建一个民族的实验（不考虑个性与民族身份）；即使实验条件不完美，但足以取得重要的部分成果。掌权的极权主义利用国家行政机构实现其征服世界的长远目标并指挥运动分支；它建立秘密警察作为国内实验的執行者与守护者，持续将现实扭曲为虚构；最终它设立集中营作为特殊实验室，以完成其绝对统治的实验。

第一节

所谓的极权国家

历史表明，掌握权力、承担责任会深刻改变革命政党的本质。下述期待若是实现，就能完美印证我们的经验与常识：掌权的极权主义会逐渐丧失其革命动能与乌托邦特质；一旦接管了政府的日常事务、掌握了真实的权力，极权运动掌权前的激进主张会变得温和，它虚构的世界也逐渐被瓦解。毕竟任何极端诉求和目标，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都要经受客观条件的检验。就现实整体而言，它有非常小的可能性，朝向原子化个体组成的大众社会的虚构形态发展。

极权政府在非极权世界处理外交事务所犯下的诸多错误（最显著的莫过于对希特勒慕尼黑协定和与斯大林的雅尔塔协定的信任），显然可追溯至某种经验与常识，这就是它们突然间发现自己无法掌控现实。与原本的期待相反，无论是重大让步，或是大幅提升其国际声望，都无法将极权国家重新整合到国际社会，也未能诱使其放弃所谓“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谎言。更有甚者，外交上的胜利反而明显加速他们诉诸暴力手段，并对各方面展现妥协意愿的政权更具敌意。

政治家和外交官们遭受的这些挫折，与早期对新革命政府抱有善意观察者和同情者们的幻灭感如出一辙。他们曾殷切期盼新政权建立全新体制、制定新法律典章。无论其内容多么具有革命性，都将带来局势稳定，从而至少在极权主义运动夺权的国家里遏制其发展势头。然而现实却是：随着内部政治反对派的消亡，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恐怖统治反而呈反比增长。这表明消除政治反对派并不是实行恐怖统治的借口（正如自由派政权批判者惯常宣称的那样），而是阻碍恐怖统治全面肆虐的最后屏障[8]。

更令人不安的是极权政权处理宪法问题的方式。纳粹掌权初期便颁布了大量

法律和法令，却从未费心废除官方，特别是魏玛宪法；纳粹掌权后甚至基本保留了原有公务员体系，这一事实曾使许多国内外观察家寄望于该党会有所克制，希望新政权能迅速回归常态。然而当《纽伦堡法案》颁布标志着这一进程终结时，事实证明纳粹分子自身对本党立法毫无顾忌。相反，他们“只顾着不断向新的领域推进”，以致最终“秘密国家警察的宗旨和职权范围”以及纳粹建立的所有其他国家或党派机构，都“无法通过为其颁布的法律法规来涵盖”。实践上，这种永久性不守法状态的体现是“若干有效条例不再公布于众”[10]。理论上，这符合希特勒的箴言：“国家整体不应区分法律与道德”[11]；因为若假定有效法律等同于源于全民良知的共同道德，则确实无需再颁布公法。苏联在革命中消灭了旧时文官体系，且在革命变革时期对宪法问题漠不关心，却于1936年费心颁布了一部全新且极其复杂的宪法（“在断头台背景上披挂自由主义的辞藻与前提”[12]），这一事件在国内外被视为革命时期的终结。然而宪法的颁布，却成了一场浩大的超级清洗运动，在近两年时间里斯大林清除了现存的行政机构，抹去了自富农清算后四年间发展起来的正常生活和经济复苏的所有痕迹，并对农村人口实施强制集体化[13]。从那时起，1936年宪法在斯大林统治下扮演的角色与魏玛宪法在纳粹统治下的角色完全相同：法律被彻底搁置却从未废除；唯一的区别在于斯大林还能承受多一桩荒诞之事，那就是除维辛斯基之外，所有参与起草这部从未被废止的宪法的人员均以叛国罪名被处决。

观察极权国家时，最令人震惊的绝非其单一结构。恰恰相反，所有严肃的研究者至少都认同党与国家双重权威并存（或冲突）的事实。许多学者更强调极权政府特有的“无形性”。托马斯·马萨里克早有洞见：“所谓布尔什维克体系，本质上始终是体系的彻底缺失”[15]；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即便专家若试图厘清党与国家的关系也会发疯”[16]。学者们还普遍观察到，国家与政党两大权力源泉的关系本质上是表面权力与实质权力的关系，因此政府机器通常被描绘成无力的外壳，用来掩护并守护政党的实际权力[17]。

第三帝国各级行政机构都存在着奇特的职能重复现象。纳粹以惊人的彻底性确保国家行政的每一项职能都由某个党务机构对应[18]：魏玛时期德国的邦与省划分，被纳粹的盖乌区划所复制，但其边界并不重合，致使每个特定地域在地理上都隶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行政单位[19]。1933年后，当杰出纳粹分子占据国家官方部委时，职能重复现象并未终止，例如弗里克出任内政部长，格特纳担任司法部长。这些资深可靠的党内成员一旦踏上官方非党派职业道路，便丧失权力，沦为与普通公务员同样无足轻重的存在。两者都实际受警察系统新晋首脑希姆莱管辖，但按常规他本应隶属内政部[20]。国外更广为人知的是威廉大街旧外交部机构的命

运。纳粹几乎未动其人事编制，自然也未废除该机构；但与此同时，他们保留了由罗森堡领导的党内外交事务局，该局专司与东欧及巴尔干地区法西斯组织的联络事务，故另设该机构旨在与威廉大街的办公室（即所谓的里宾特洛普局）竞争，后者负责处理西方国家事务，并在其负责人出任英国大使后仍得以存续。换言之，该机构被纳入威廉大街的官方体系。最后，除这些党内机构外，外交部还面临着另一个职能重叠的机构——党卫军办公室，该机构负责“与丹麦、挪威、比利时和荷兰境内所有日耳曼种族团体进行谈判”[22]。这些实例证明，对纳粹而言，机构职能重叠是原则性安排，而非仅仅为党成员提供职位的权宜之计。

在苏维埃俄罗斯，真实政府与表面政府的分裂同样源于截然不同的起点[23]。表面政府最初诞生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但在内战期间其影响力与权力被布尔什维克党夺取。这一进程始于红军获得自治权，以及秘密政治警察机构重新确立为党的附属机构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组成部分[24]；这一过程于1923年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首年完成[25]。自此，苏维埃沦为影子政府，其内部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员组建的党内组织，运作着由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对其负责的实际权力代表。后期发展的关键点并非党对苏维埃的征服，而在于“尽管毫无困难，布尔什维克却未废除苏维埃，反而将其作为其权威装饰性的外在象征”[26]。

因此，表面政府与实质政府的并存状态，就有一部分是革命本身的产物，且早于斯大林的极权统治。而纳粹仅保留原有行政机构并剥夺其权力，斯大林却不得不重启其影子政府，因为这些机构在三十年代初已丧失所有职能，几近被遗忘在俄罗斯，他将苏联宪法作为苏维埃存在的象征，同时也昭示着其无能为力。（该宪法条款对俄罗斯的实际生活和司法管辖从未产生过丝毫影响。）这个表面上的俄罗斯政府，完全缺乏维持虚伪表象所必需的传统魅力，显然需要成文法的圣洁光环。极权主义对法律合法性的彻底蔑视（尽管经历剧变……仍始终是永久渴求秩序的表达）[27]，就现在成文的苏联宪法，如同从未被废弃的魏玛宪法一样，宪法的本身构成了无法律状态的永恒背景。这种无法律状态构成了对非极权世界及其标准的永恒挑战，也导致极权国家的无助无能，这在每日都得到验证[28]。

职权机构的重复设置与权力划分，实质权力与名义权力的并存，足以造成混乱，却无法解释整个结构的“无形无状”。我们不应该忘记，只有建筑物才具备结构，而若要像纳粹那样严肃而字面地理解这个词，运动只拥有方向而非结构。任何形式的法律或政府结构，对正以加速态势朝特定方向推进的运动而言，终将成为桎梏。即便在掌权前夕，极权主义运动所代表的群众已不再愿受任何形式的结构约束；无论其性质如何，这些开始行动的群众旨在冲破政府牢牢划定的法律与地理边界。因此，若以我们对政府与国家结构的认知来衡量，这些运动只要在物理上仍受限于特

定疆域，就必然试图摧毁所有结构。而这种蓄意破坏，仅靠将所有官职复制为党政机构是远远不够的。由于这种复制涉及国家表面权力与政党实质权力关系的调整，最终形成某种结构，以至于党与国家的关系终将演变为限制并稳定双方权力的法律规范[29]。

事实上，机构的重复设置看似所有一党专制国家中党国问题导致的产物，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征兆而已，它昭示着更为复杂的现象，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机构重复，不如说是机构的倍增。纳粹不仅在原有省份基础上设立行政区（Gau），还根据不同党务组织划分出大量其他地域单元：冲锋队（SA）的辖区既不同于行政区也不同于省份；它们与党卫军的辖区也存在差异，且均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分区制度不相吻合[30]。这种地域混乱还伴随着另一重矛盾：表面权力与实际权力的原始关系始终在不断变幻中重演。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居民不仅同时受制于相互竞争的权力机构（如行政部门、党部、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管辖，且这些权力常相互冲突；他们永远无法确知、也从未被告知究竟该将何种权威置于首位。民众不得不培养出某种第六感，才能在特定时刻辨别该服从谁、该无视谁。

另一方面，领导层基于运动考量而视为真正必要的命令（此类命令自然只是委托给党的精英组织），他们作为执行者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命令都是“意图十分模糊，而且预期接收者能领会下达者的意图并据此行动”[31]；因为精英组织绝非仅仅要求服从元首的命令（这本就是所有现有组织的强制性要求），更要求“执行领导层的意志”[32]。而从党内法庭审理“过度行为”的冗长记录中不难看出，这两者绝非等同。唯一的区别在于，精英组织因接受过特殊思想灌输，被训练成理解某些“暗含着超越字面内容的深刻含义”[33]。

从技术层面而言，极权统治机器内部的运作机制之所以具有流动性，在于领导层不断转移实际权力核心：通常权力被转移到其他组织，却不解散甚至不公开揭露那些被剥夺权力的组织。纳粹政权初期，即国会纵火案后，冲锋队是实际掌权者，而党只是表面上的掌权者；随后权力从冲锋队转移到党卫军，最后又从党卫军转移到安全局[34]。关键在于，所有权力机构始终保留着宣称代表领袖意志的权利[35]。但领袖意志之飘忽不定，甚至令东方暴君的专断暴政都显得坚定如磐石；真实的秘密权力与公开的表面代表之间持续变幻的界限，使权力核心本质上成为不可知的秘密在于，它被掩盖得如此神秘以至于那些统治集团成员都无法知道自己在秘密权力阶层中的确切位置。例如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尽管他在党内资历深厚，在党内等级体系中积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面权力和职位，仍谈论着建立一系列东欧国家的计划，作为抵御莫斯科的安全屏障，当时掌握实权者已认定苏联战败后不会有任何国家结构得以延续，且东部被占领土上的居民已彻底沦为无国籍者，因而可

以予以灭绝[36]。换言之，由于明确服从对象及相对稳定的等级制度会引入极权统治中本不存在的稳定要素，纳粹分子每当真实权力显现时便予以否认，并建立新的政府机构，使旧体制沦为影子政府，这种权力的游戏显然可以无限延续。苏联与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之间最重要的技术性差异之一在于：斯大林在自身运动内部转移权力重心时，往往倾向于连同人员一起清算原有机构；而希特勒尽管对那些“无法跨越自身阴影”的人嗤之以鼻[37]，却完全愿意继续利用这些影子人物，即便他们处于不同职能岗位上。

官僚机构的膨胀对权力不断转移极为便利；况且极权政权执政时间越长，官职数量就越庞大，完全依赖于运动的职位就越多，因为即使某个机构的权力被取消，其设立的职位也不会随之废除。纳粹政权通过整合所有现有协会、社团及机构开启了这一扩张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全国性操纵中的“整合”并非指并入现有的党派组织。其结果是直到政权覆灭之时，仍并存着两个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组织、两个纳粹妇女组织、两个纳粹大学教授组织、两个纳粹律师组织……医师等[38]。然而，绝不能断言在所有情况下原有的政党组织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比其合作组织更强大[39]。同样无人能确切预言哪个党内机构将在党内等级体系中崛起[40]。

这种计划的无定形的典型例证，体现在科学反犹主义的组织架构中。1933年，慕尼黑成立了犹太问题研究所。鉴于犹太问题据称决定了整个德国历史，该机构迅速扩展为现代德国历史研究所。在著名历史学家瓦尔特·弗兰克领导下，它将传统大学转变为表面学府或门面。1940年，法兰克福另设犹太问题研究所，由党内地位更高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执掌。慕尼黑研究所遂沦为边缘机构；被掠夺的欧洲犹太藏品本应移交法兰克福而非慕尼黑，后者更被指定为犹太教综合图书馆所在地。然而数年后当藏品运抵德国时，最珍贵的部分并未送往法兰克福，而是转交柏林，由艾希曼领导的希姆莱特别盖世太保部门接收，该部门的职能是彻底解决（而非单纯研究）犹太问题。所有旧有机构均未被废除，至1944年形成这样的局面：大学历史系的门面背后，是慕尼黑研究所更具威胁性的实际权力；其后方矗立着法兰克福的罗森堡研究所；唯有在这三道门面之后，被它们遮蔽庇护之处，才隐藏着真正的权力中心，这就是帝国安全总局，它是盖世太保的特别部门。

苏联政府的门面，尽管拥有成文宪法，却更显寒酸，因为其设立目的甚至比纳粹继承自魏玛共和国的国家行政体系更纯粹地面向外国观察。由于缺乏纳粹协调时期积累的原始机构体系，苏联政权更依赖不断创设新机构来掩盖旧有权力中心。这种运作方式必然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而反复的清洗运动则抑制了这种扩张。尽管如此，在俄罗斯我们仍能辨识出至少三个严格分离的组织体系：苏维埃或国家机构、党务机构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每个体系都拥有独立的经济部门、政治部

门、教育部、文化部、军事部门等[41]。

在俄罗斯，党官僚机构表面上的权力与秘密警察的实际权力是相对应，这与纳粹德国时期党与国家最初的双重结构相呼应，而这种多重化仅在秘密警察内部得以显现，因为其情报网络极其复杂且分支广泛，每个部门都负责监督和监视其他部门。苏联境内每家企业都设有秘密警察特部门，对党员和普通职员实施双重监控。与该部门并存的还有党内另一警察机构，其成员身份不为竞争机构所知，同样监视所有人，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除这两大间谍组织外，工厂工会还必须确保工人完成规定配额。然而比这些机构更重要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特别部门”，它堪称“内务部中的内务部”，即秘密警察中的秘密警察[42]。所有竞争性警察机构的报告最终都汇集到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此决定哪些报告具有决定性，以及哪个警察部门有权执行相应的警察措施。当然，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各警察部门都无从知晓最终裁决，这种裁决可能今日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门，明日来自党的特工网络，后天或许来自地方委员会或某区域机构。所有部门之间既无法律确立的权力等级，亦无明确的职权划分；唯一确定的是，最终必将由其中一方被选中来体现“领导层的意志”。

在极权国家中，人们唯一能确信的法则是：政府机构越显眼，其权力就越微弱；而一个机构的存在越不为人知，它最终展现的权力就越强大。根据这条法则，被成文宪法确认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苏维埃，其权力不及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招募成员并被承认为统治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权力又不及秘密警察。真正的权力始于秘密的开始。在这方面，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国家极为相似；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方面希姆莱垄断并集中了秘密警察机构，另一方面俄罗斯则存在着看似无关联的复杂警察活动网络。

如果我们将极权国家纯粹视为权力工具，暂且搁置行政效率、工业产能和经济生产力等问题，那么其无形状的特性恰恰成为实现所谓领袖原则的理想载体。各部门之间存在持续的竞争，尽管它们职能相互重叠，但却被赋予了相同任务[43]，这几乎使反对或破坏活动难以奏效；通过迅速调整权重，将某部门贬为配角，同时提升另一部门的权威，便能解决所有问题，且无人察觉这种转变或曾存在过反对。该体系的额外优势在于：被削弱的部门往往永远不会知晓自己的失败，因为它们要么根本不被废除（如纳粹政权时期），要么在事后很久才被清算，且与具体事件毫无关联。这种操作之所以更易实施，正是因为除少数知情者外，无人知晓各权力机构间的精确关系。非极权世界偶尔能窥见这种状况，例如某国高官坦承驻外使馆某名不见经传的文员曾是其直接上司。事后常能推断出权力骤然更迭的原因，或者说这种更迭为何发生。例如，如今不难理解为何战争爆发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或汉

斯·弗兰克之流被调离核心权力中心（元首亲信圈），转任其他国家职位[44]。关键在于，他们不仅不知道调动的原因，甚至可能从未察觉到，诸如波兰总督或东部领土帝国部长这类看似显赫的职位，实则标志着他们国家社会主义生涯的高潮，但也是终结。

领袖原则在极权国家中建立的等级制度，与极权运动中建立的等级制度并没有多大差别；其权威并非像威权体制那样，从顶层经由层层中介向政治体制底层渗透。其本质原因在于：没有权威便无等级可言。尽管关于所谓“权威人格”存在诸多误解，但权威原则在所有关键层面都与极权统治原则截然相反。且不论其起源在罗马历史上，权威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其目的始终是限制或约束自由，而非彻底废除自由。然而极权统治的目标在于消灭自由，甚至要扼杀人类的自然本性，绝非仅仅限制自由（无论这种限制多么暴虐）。从技术层面看，极权体系中权威与等级的缺失体现在：最高权力（元首）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可靠的中介层级，即那些本应承接相应权力与服从的环节的权力部门。元首的意志可随时随地得到贯彻，他本人亦不受任何等级制约，甚至不受其亲手建立的等级体系束缚。因此，断言该运动夺权后建立多个诸侯国，让小头目们在各自领地恣意妄为并效仿顶端大头目，这种说法实属谬误[45]。纳粹宣称“党即领袖秩序”不过是寻常谎言[46]。正如官职无限膨胀与权力混乱导致每位公民都直接面对元首意志，因为元首可任意选择执行机构。同样地，遍布第三帝国一百五十万的头目们[47]深知，他们的权威直接源自希特勒，其间不存在有效运作的等级制度[48]。这种直接依赖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而中间的等级制度，尽管具有社会意义，不过是威权国家虚伪的表面模仿。

领袖对权力和权威的绝对垄断在其与警察首长的关系中最为显著。在极权国家里，警察首长占据着最有权势的职位。然而尽管作为真正警察军队和精锐部队的统帅，他手握巨大的物质与组织力量，警察首长显然永远没有机会夺取权力成为国家统治者。因此在希特勒垮台前，希姆莱从未妄想染指希特勒的领导权[40]，也从未被提议作为希特勒的继任者。更耐人寻味的是，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发动的夺权企图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斯大林从未允许任何警察首长享有与之相当的地位，但贝利亚却凭借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即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绝对权威，在斯大林死后发动的夺权行动从来无法与纳粹统治最后几年的希姆莱相提并论，但贝利亚掌握了足够的部队，他在斯大林死后只要占领整个莫斯科、占领通往克里姆林宫的所有道路，就足以挑战党的统治地位；没人知道红军是否会阻断他的权力野心，毕竟会引发一场血腥内战。关键在于，贝利亚仅仅在几天后就自愿放弃他所有的职位，即使他必定知道自己会因为胆敢用警察权力来与党的权力对抗而丢掉性命[50]。

当然，这种绝对权力的缺失并未阻止警察首长按照极权主义原则来组织其庞

大的机构体系。因此，希姆莱就任后着手重组德国警察体系的做法尤为引人注目：他将多个部门引入此前高度集中的秘密警察机构，即采取了所有极权政权前任权力专家都担忧的事，也就是会导致权力削弱的去中央集权化措施。希姆莱首先将安全局纳入盖世太保体系，该机构原属党卫军下属部门，最初作为党内警察机构设立。尽管盖世太保与安全局的核心机构最终集中于柏林，但这两个庞大秘密机构的地区分支仍保持独立身份，各自直接向柏林的希姆莱办公室汇报。战争期间，希姆莱又增设两支情报机构：其一是所谓督察队，负责协调安全局与警察系统，隶属党卫军管辖；另一则是独立于帝国武装力量运作的军事情报局，最终成功吞并了陆军原有的军事情报机构[52]。

没有完全发生的宫廷政变（无论成功与否），是极权独裁政权最显著的特征之一。（1944年7月那场反希特勒的军事阴谋参与人员当中，没有任何心怀不满的纳粹党人，只有一人例外）。表面看来，领袖原则似乎会引发不改变政权的个人权力血腥更迭。这仅仅是众多征兆之一，它们反映出极权形式的政府与权力欲，甚至与权力生成机制的渴求无，更与帝国主义统治末期那种为权力而权力的游戏毫无关联。然而从技术层面看，这恰恰是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极权政府无论表面如何伪装，绝非小集团或帮派统治[53]。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都清晰表明，原子化个体的孤立化不仅构成极权统治的群众基础，更贯穿于整个权力结构的顶端。斯大林几乎枪杀了所有自称属于统治集团的人，每当某个集团即将巩固时，他就将政治局成员调来调去。希特勒在纳粹德国摧毁派系的手法不是很极端，唯一的例外就是对罗姆派系的血腥清洗，该派系实际上因为核心成员同性恋关系而紧密团结；他通过不断调动权力与职权、频繁更换身边亲信来阻止派系形成，致使与他共同掌权者的旧有团结迅速瓦解。此外显然，在希特勒与斯大林性格中，严重的背信弃义是突出的特质，注定了他们无法掌控任何持久稳定的派系。无论如何，关键在于现存官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他们既非政治等级体系中的平等地位所维系，亦非上下级关系所约束，甚至不具备黑帮分子那种摇摆不定的忠诚。在苏联，众所周知大型工业集团的最高管理者与外交部长一样，随时可能被贬至最低社会政治地位，而某个无名之辈却可能取而代之。另一方面，虽然黑帮共谋关系在纳粹独裁统治早期曾发挥一定作用，但它已丧失了全部凝聚力，因为极权主义正运用其权力将这种共谋关系延伸至民众之中，直至它将整个民族的罪责都纳入其统治之下[54]。

统治集团的缺失使得极权独裁者的继任问题尤为棘手。诚然，这一难题困扰着所有篡位者，而极权独裁者从未尝试建立王朝、指定子嗣的传统方式，恰恰印证了这种困境的特殊性。与希特勒大量任命继任者（反而自取灭亡）的做法相反，斯大林的方法使继任成为苏联最危险的荣誉之一。在极权条件下，了解权力传递的迷宫

就等于掌握最高权力，而每个真正了解情况的继任者，在一段时间后都会自动被清除。要实现有效且相对持久的任命，必然需要存在一个核心集团，其成员共享领袖对局势的垄断性认知，而领袖必须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希特勒曾以自己的方式向国防军最高指挥官阐释过这一点，而那些深陷战争泥潭的将领们想必正为此问题绞尽脑汁：“作为最终决定因素，我必须谦逊地指出：我本人是不可替代的……帝国的命运唯系于我一人”[55]。“谦逊”一词中无需寻找任何反讽意味；这位极权领袖与历代篡位者、暴君截然不同，他似乎相信自己的继任问题并不紧要，认为该职位无需特殊资质或训练，坚信国家终将服从在其死亡之后的偶然掌权者，没有任何权力渴求者会挑战这个人的合法性。

作为统治手段，极权主义的装置看似简单巧妙而有效。它们不仅确保了绝对的权力垄断，更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确定性，即所有的命令必将得到执行；多重传令系统与混乱的等级结构，使独裁者完全独立于所有下属，从而能够实施极权主义闻名于世的迅捷而出人意料的政策转变。国家政治体制因其无定形而具备抗冲击能力。

之所以先前从未有人尝试过如此高效的方法，是因为其原因与手法一样简单。机构的多重性摧毁了所有责任感与胜任力；这不仅造成了行政负担过大与效率低下，更阻碍了生产力。因为相互冲突的指令延误了工作，直到领袖的命令最终决定。精英干部对运动的狂热运作绝对起到了根本作用，它系统性地消除了人们对具体工作的真实兴趣，催生出一种思维模式，即把人们所想象到的每一种行动都视为工具，藉着成就某个截然不同的事物[57]。这种心态不仅限于精英阶层，更逐渐渗透到全体民众之中，因为所有人生死存亡的细微末节皆取决于政治决策，即那些与实际绩效毫无关联的动机与深层意图。频繁的人事调动、降职与晋升使可靠的团队协作成为奢望，更阻碍经验的积累。从经济角度看，奴役性劳动是俄罗斯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在技术人才严重短缺的时期，劳改营却充斥着“高素质工程师们争夺修理管道、钟表、电灯和电话的权利”[58]。但若完全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考虑，1930年代的清洗运动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它中断了俄国期待已久的经济复苏；同样不该发生的还有红军总参谋部的物理性毁灭，这场浩劫几乎导致俄罗斯对芬兰战争的惨败。

德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最初，纳粹表现出某种保留技术和行政技能的倾向，允许企业盈利，并在经济上保持主导地位而不作过多干预。战争爆发时，德国尚未完全走向极权统治。若将备战视为合理动机，则必须承认其经济直至1942年前后仍被允许功能或多或少地合理运作。尽管备战本身代价高昂[59]，但它并非反功利性质的，因为“通过征服夺取他国财富资源，可能确实比从外国购买或国内生产更为廉价”[60]。倘若一国打算通过掠夺他国战利品来补充本国经济的消耗，那么投

资与生产、收益与利润稳定化、资源枯竭等经济规律便不再适用；纳粹著名的“枪炮还是黄油”口号实则意指“通过枪炮获取黄油”，这一真相早已为德国民众所熟知。直到1942年，极权统治的法则才开始凌驾于其他一切考量之上。

战争爆发之际，极端化进程便立即启动；人们甚至会猜测，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使他得以推动和平时无法想象的发展进程加速这种发展态势。然而这一进程的非凡之处在于，它并未因斯大林格勒那般毁灭性的挫败而受阻，而全面战败的危机反而成为另一个煽动借口，它抛弃一切功利考量，不惜代价通过残酷的全面组织来实现极权种族意识形态的目标，哪怕时间再短暂[63]。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那些与民众严格隔绝的精锐部队扩大了；取消了武装部队成员的党籍限制，军事指挥权被置于党卫军指挥官之下。党卫军严密守卫的犯罪垄断权被放弃，士兵们被随意指派执行大规模屠杀任务[64]。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政治考量，都不允许干扰这项代价高昂且麻烦重重的群体灭绝与驱逐计划。

若审视纳粹统治末期所谓的“五年计划”，我们可以看到纳粹虽无暇实施，但其目标在于灭绝波兰和乌克兰人民，以及1.7亿俄罗斯人（某计划中提及），还包括西欧知识分子阶层，如荷兰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民众，以及那些在未来帝国健康法案或已规划的“外籍社群法”之下，不符合资格的德国人。该“五年计划”与1929年布尔什维克的“五年计划”相似性几乎无可回避，那正是俄罗斯明确建立极权统治的第一年。前者以粗鄙的优生学口号为幌子，后者则披着高调的经济措辞，这两者都不过是那“异常精神错乱的”前奏，在这种精神错乱中，“一切逻辑法则与经济原理完全被颠覆”[65]。

诚然，极权独裁者并非自觉踏上疯狂之路。关键在于，我们对极权国家结构反功利性质的困惑，是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正常国家：它是一个官僚体制、一个暴政或独裁统治。而且我们忽视了极权统治者反复强调的立场：他们视其夺权之地仅为世界征服运动的临时据点，以世纪乃至千年的尺度衡量胜败，且全球利益永远凌驾于本土利益之上[66]。著名的“对德国民族有利的就是正确的”仅是大众宣传的口号；纳粹分子被告知“对运动有利的就是正确的”[67]，而这两种利益并不是总相符的。纳粹党人并不认为德国人是统治世界的主宰种族，而是认为他们应该像其他所有民族一样被主宰种族领导，而这个种族才刚刚诞生[68]。主宰种族的曙光不是德国人，而是党卫军[69]。希姆莱所说的“日耳曼世界帝国”，或希特勒所称的“雅利安”世界帝国，无论如何都尚需数百年才能实现[70]。对“运动”而言，通过消灭其他“种族”来制造新种族的可能性，远比赢得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更为重要。在外部观察者眼中堪称惊“惊天疯狂之举”的行径，不过是该运动绝对优先地位的必然结果，因为其凌驾于国家之上，更凌驾民族、人民乃至统治

者自身权力地位之上。极权统治的这种精妙装置之所以从未被尝试过（即将绝对且无与伦比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是因为没有哪个普通暴君疯狂到足以抛弃所有有限的局部利益（如经济、民族、人道、军事等方面的），去追求那个在未来中遥不可及的、纯粹虚构的图景。

既然掌权的极权主义始终忠于该运动的原始信条，那么该运动的组织机制与所谓极权国家的惊人相似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外围组织中的党员与同路人之间的区别远未消失，而且还延伸到对全体民众形成“协调整合”之中，这些人如今被发动为同情者群体。同情者数量大幅增加，会被两种因素制约：一个是由党内数百万人组成的特权“阶级”，另一个是由数十万“精英”组成的超级政党。机构的扩张、职能的重复、以及党派与同情者关系在新形势下的调整，本质上意味着运动特有的洋葱式结构得以保留，却让每一层都变成更具战斗性的外围组织。国家机器被转化为由同情官僚组成的外围组织，它的国内职能是向被协调管理的公民群体灌输信心，对外事务则致力于欺骗外部非极权世界。领袖以国家元首与运动领袖的双重身份，再度将极端残酷的战斗意志与令人信服的常态气质融于一身。

极权主义运动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极权独裁者能够且必须比运动领袖更系统、更大规模地践行极权主义的谎言艺术。这既是同路人队伍不断壮大的必然结果，也源于政治家的失言不像煽动性政党领袖的言论那样轻易撤回。为此，希特勒毫不迂回地回到了他掌权前多次谴责的旧式民族主义；通过扮演暴力民族主义者的角色，声称国家社会主义并非“出口商品”，他同时安抚了德国人和非德国人，暗示只要实现民族主义德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诉求，纳粹的野心便会得到满足，这意味着收回《凡尔赛条约》割让的领土、吞并奥地利、兼并波希米亚德语区。斯大林同样兼顾俄国舆论与非俄世界，他炮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世界革命的责任甩给托洛茨基[71]。

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才能安全地对全世界进行系统性欺骗，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日常现实的虚构性使宣传变得多余。极权主义在掌权前阶段，各种运动永远无法达到同样程度地隐藏其真实目标。毕竟，这些宣传本就旨在鼓动群众组织。然而，一旦可以用毒气将犹太人像臭虫一样消灭，就没有必要宣传犹太人是臭虫[72]；一旦掌握了向整个民族灌输俄国革命历史，就没有必要提及托洛茨基之名，更无需再针对托洛茨基进行宣传。不过，若要让人实现意识形态目标（就算这些目标仍旧公开）而采用这些办法，就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在意识形态上绝对坚定”的人，无论他在共产国际学校还是纳粹特别教化中心，获得此等坚定程度。此类场合总会揭示：单纯的同情者永远无法洞悉真相[73]。这导致了这样一个悖论：“光天化日的秘密社团”，在被承认为国际社会正式成员之后，其阴谋性质与运作手段

反而更甚从前。希特勒在夺权前抵制所有试图以阴谋形式组织党派乃至精英组织的企图，这完全合乎逻辑；然而 1933 年后，他却极力推动将党卫军改造为某种秘密组织[74]。同样，受莫斯科指挥的共产党与前辈截然不同，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倾向：即便完全合法的条件具备，仍偏好秘密运作[75]。极权主义的权力越显赫，其真实目标就越隐秘。要洞悉希特勒统治德国的终极目标，依靠其宣传演说和《我的奋斗》远比依赖第三帝国总理的官样文章更为明智；正如我们必须对斯大林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言论保持警惕更为明智，因为该理论本是列宁逝世后为夺权而临时炮制的，但该言论反复表现出的对民主国家的敌意才值得认真对待。极权独裁者们早已证明，他们对伪装正常状态所蕴含的危险再清楚不过了，即推行真正民族主义政策的危险，或在单一国家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危险。对此，他们试图让安抚性言辞与统治现实之间永久且持续地存在矛盾，通过有意识地发展一种言行相悖的方法来克服这种矛盾[76]。斯大林将这种平衡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它比外交的常规操作需要更多的技巧，以至于外交政策或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温和化，几乎总是伴随着俄罗斯党内的激进清洗。在执行人民阵线政策、起草有自由色彩的苏联宪法的同时，恰好也在进行莫斯科审判，这当然不仅仅是个巧合。

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文献中屡屡可见极权政府企图征服全球、将地球上所有国家置于其统治之下的证据。这些意识形态纲领，尽管源于前极权运动时期，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如纳粹继承了超民族主义的反犹政党与泛日耳曼帝国梦想，布尔什维克则继承了国际性的革命社会主义理念。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极权政权始终基于“终将实现此终极目标”的假设开展外交政策，无论目标看似多么遥远，无论其“理想”要求与当下现实需求存在多大冲突，都从未偏离这一目标。因此它们不将任何国家视为永久的异邦，反而视所有国家为潜在领土。当运动的虚构世界在某国成为现实，其掌权后与他国的关系便类似极权政党在非极权体制下的处境：在国际认可的国家权力背书之下，极权国家得以向非极权国家输出有形的虚构现实，其方式类似于极权运动在非极权的议会中，输入对议会的蔑视。在这方面，战前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成为纳粹德国最杰出的出口商品：驱逐犹太人的举措将一部分重要纳粹主义带入其他国家；通过强迫犹太人无护照且身无分文地离开帝国，流浪犹太人的传说得以实现了；通过将犹太人逼入与所有国家势不两立的境地，纳粹也就制造了干涉各国内政的借口[77]。

至于纳粹党人对其阴谋论虚构的重视程度，即他们自诩为未来世界统治者这一虚构幻想，我们可以在 1940 年的情形中一窥究竟：当时尽管有时势之所需，尽管拥有被占领区欧洲人民真实支持的机会，他们仍然罔顾人力损失与严重军事后果，也要在东部占领区推行人口清除政策；并在西部占领区颁布具有追溯效力的法

律，将第三帝国刑法典的部分内容强行移植到西部占领区[78]。要推广纳粹统治世界的主张，他们最有效的方法是把反对第三帝国言论或行为，都列为高危叛国罪，无论何时何地由何人实施。纳粹法律将整个世界视为潜在管辖范围，因此军队不再是落实征服者新法律的征服工具，而是用来执行那早已适用于所有人而存在的法律执法机构。

那种认为纳粹法律超越德国边境具有约束力、并惩罚非德国人的做法，不仅仅是压迫手段。极权政权从不畏惧征服世界的逻辑推演，即使这些推演反噬本国民众利益。从逻辑上讲，征服世界的计划必然要消除征服国与被征服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外国与本国政治的差异，现有的非极权制度与国际交往皆莫基于此。若极权征服者在本国各地恣意妄为，则必然以外族征服者的姿态对待本国民众[79]。极权运动夺权的本质，恰如外族征服者占领他国，其统治并非为该国本身，而是为其他事物或势力谋利。纳粹在德国的行为如同外国征服者，他们违背国家利益，试图将战败转化为整个德国民族的最终灾难，且部分得逞；同样地，如果大获全胜，他们打算将灭绝政策延伸至政治犯，把他们归入“种族上不合格”的德国人之列[80]。

战后苏联外交政策似乎也秉持类似态度。它的侵略行径给俄罗斯人民造成的高昂代价：它拒绝了战后美国的巨额贷款，这本可以使俄罗斯重建被战争蹂躏的地区，并以合理高效的方式实现国家工业化。共产国际扩展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甚至占领了东欧广袤的土地，但都没有带来什么切实利益，反而进一步消耗了俄罗斯资源。但这项政策当然符合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利益，如今该运动已蔓延至全球近半数有人居住的地区。

如同外国征服者，极权独裁者将各国（包括本国）的自然与工业财富视为掠夺之源，并以此筹备侵略扩张的下一步行动。由于这种系统性掠夺的经济模式，其实施目的正是为了运动本身而非国家，没有任何人民或领土作为潜在受益者，并为此过程设定饱和点。极权独裁者如同凭空出现的外国征服者，他所掠夺的战利品往往无人受益。战利品的分配并非为了增强本国经济实力，而仅仅是一种临时的战术部署。就经济目的而言，极权政权在其本国境内的肆虐程度，如同臭名昭著的蝗虫过境。极权独裁者统治本国的方式竟如外国征服者般行事，使情况更糟的是，这种残暴冷酷的行径在异域暴政中尤为猖獗，但却明显缺乏效率。斯大林三十年代初对乌克兰的战争，其血腥程度是入侵并占领德国的两倍[81]。这正是极权主义宁可选择傀儡政权而非直接统治的原因，尽管此类政权显然暗藏危机。

极权体制的问题不在于它们以特别残酷的方式玩弄权力政治，而在于其政治背后隐藏着一种全新且前所未有的权力概念，正如其现实政治背后隐藏着一种全新且前所未有的现实概念。这种概念是极端漠视眼前后果而非冷酷无情；是无根可

扎切且忽视国家利益而非民族主义；是蔑视功利动机而非不加思索的自利追求；是所谓“理想主义”，即对意识形态虚构世界的坚定信仰而非权力贪欲。这些特点在国际政治中引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全新因素，它远非单纯侵略行径所做能办到的。

极权主义所构想的权力，完全源于通过组织产生的力量。正如斯大林将所有机构，无论其实际职能如何，都视为“连接党和人民的传动带”[82]，并真诚地认为苏联最珍贵的财富并非其土地的富饶或庞大人口的生产力，而是党的“干部”（即警察），希特勒早在1929年就洞悉运动的“伟大之处”：六万名成员“外在几乎成为整体，不仅思想统一，连面部表情都近乎相同”。“看看这些笑咪咪的眼神，这种狂热的激情，你就会发现……一个运动中的十万人民是如何合而为一的。”[84]在西方人心中，无论权力与世俗财富、珍宝和宝藏有何种联系，这些联系都已消解在一种非物质的机械结构中，其每个动作就如同摩擦或电击产生电流般产生权力。国家被划分为“有产国”与“无产国”的极权主义划分，绝非煽动性手段；那些做出区分的人深信物质财富的力量微不足道，只会阻碍组织力量的发展。对斯大林而言，警察干部队伍的持续扩张远比巴库的石油、乌拉尔的煤炭矿藏、乌克兰的粮仓，乃至西伯利亚的潜在宝藏更为重要。简言之，斯大林相信警察队伍所蕴含的组织力量比俄罗斯全部自然资源的储备都更为关键。同样的思维模式促使希特勒将整个德国献祭给党卫军干部；当德国城市化为废墟、工业能力被摧毁时，他并未视战争为败局，唯有当得知党卫军部队不再可靠时，他才认定战局已定[85]。对一个坚信组织力量能战胜一切物质因素（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且以世纪为单位计算事业最终胜利的人而言，失败并非军事灾难或民众饥荒的威胁，而只会是精英组织的覆灭。因为这些组织本应通过一条路线将统治世界的阴谋推向终极，历经数代直至最终消亡。

极权国家的结构性瓦解，其对物质利益诉求、摆脱利润驱动的束缚，以及普遍的非功利主义态度，这些因素比其他因素都更深刻地造就了当代政治近乎不可预测的特性。非极权世界无法理解一种独立于人力物力可计算行动之外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对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完全漠不关心，这种认知困境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判断悖论：那些正确理解极权组织与警察体系可怕效率的人，往往会高估极权国家的物质力量，而那些理解极权经济浪费无能的人，往往会低估在无视所有物质因素的情况下所能创造的力量潜力。

第二节

秘密警察

迄今为止，我们仅知两种确切的极权统治形式：1938 年后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独裁统治，以及 1930 年以来的苏联布尔什维克独裁专政。这两种统治形态在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形式的独裁、专制或暴政统治；尽管它们具有某种延续性从一党独裁中发展出来，但其本质上的极权特征却是全新的，无法从一党专制中推导出来。一党专制的目标不仅在于夺取政府行政权，更通过让所有职位由党员担任，实现党与国家的完全融合，使执政党在夺权后成为政府的宣传机器。这种制度的“全面性”仅具消极意义，即执政党绝不容忍其他政党、反对派及政治言论自由。一旦政党独裁掌权，原有的党国权力关系便维持不变：政府与军队行使着与往昔相同的权力，所谓“革命”仅在于所有政府职位现由党员占据。在上述情况下，党的权力都建立在国家保障的垄断地位之上，而党本身已不再拥有自己的权力中心。

极权主义运动夺取政权后所发动的革命具有更为激进的性质。从一开始，它们就自觉努力维持国家与运动之间的本质差异，防止运动的“革命性”机构被政府所吞并[86]。对于如何夺取国家政权又同时与运动不融合，极权运动的解决方法是，只允许那些在运动中属于次要地位的党员进入国家统治集团。而真正的权力，全部掌控在运动各个机构手中，也就是在国家或军事机构之外被授予的。该运动始终是国家的行动核心，所有的决定都是在运动之内做出的；官方行政机构通常不会告知正发生了什么事，而那些觊觎部长职位的党员，无一例外都因这种“资产阶级”野心付出了代价：他们丧失对运动的影响力，并失去运动领袖的信任。

掌权的极权主义将国家机构作为对外的遮羞布，代表该国在非极权世界中亮相。因此，极权国家是极权运动的逻辑继承者，其组织架构正是源自该运动。极权统治者对待非极权政府的手段，与他们掌权前对待议会政党或党内派系如出一辙。

尽管舞台扩大至国际层面，他们仍面临双重困境：既要保护运动虚构世界（或极权国家）免受现实冲击，又要展现正常秩序与普遍价值的假象。对正常外界而言毫无意义。

在国家之上，在表面权力的幕后，在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迷宫中，在权力更迭的暗流之下，在效率低下的混乱之中，潜伏着这个国家的权力核心，这就是秘密警察，它是那超高效、超专业的特勤机构[86]。将警察视为唯一权力机构的强调，以及相应地忽视军队看似更强大的武力储备，这正是所有极权政权的特征。这其中的原因可部分归结于极权主义对统治世界的渴望及其有意识地消除外国与本国、外交与内政的界限。训练有素的军队本为对抗外国侵略者而存在，在内战中始终是值得怀疑的工具；即便在极权条件下，军队也难以用外邦征服者的眼光看待本国人民[87]。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战争时期，军队价值也变得可疑。由于极权统治者推行政策时预设终将建立世界政府，他将侵略受害者视为叛乱分子，视其为叛国罪犯，因此更倾向于用警察而非军队统治被占领土。

该运动在夺取政权前就已建立遍布多国的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后来其特工获得的资金和权力甚至超过正规军事情报部门，并被外交使团和领事机构中常有秘密头目潜伏[88]。其主要任务在于组建第五纵队、指挥运动分支机构、影响所在国国内政策，并为极权统治者推翻政府或取得军事胜利后能公开掌控局势的时刻做全面准备。换言之，秘密警察的国际分支同传动带，持续将极权国家表面上的外交政策转化为潜在的国内事务，成为极权运动的延伸。

然而，相比那些为在一国之内实现极权虚构而要求具备的功能，秘密警察为实现统治世界的极权乌托邦而履行的这些功能，显得次要得多。秘密警察在极权国家国内政治中的主导作用，自然助长了人们对极权主义的普遍误解。所有专制政权都高度依赖秘密机构，且更畏惧本国人民而非外国人的威胁。然而这种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类比仅适用于极权统治初期，当时政治反对派尚被允许存在。在此及诸多方面，极权主义都利用并刻意强化非极权主义的误解，无论这些误解多么有损其形象。希姆莱在1937年对国防军参谋部的著名演讲中，扮演了普通暴君的角色。他为警察力量的持续扩张辩护时，假设了“战争中的第四战场”（德国内部）的存在[89]。同样，几乎在同一时期，斯大林也半成功地迫使老布尔什维克卫队相信苏联面临战争威胁，因为这些人的“供词”可以制造出紧急状态，迫使国家在暴君统治下保持团结。这些言论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两者皆发生在所有政治反对派已被铲除之后，情报机构的扩张实则发生在已无反对者可监视之时。战争爆发后，除了管理集中营和监管外国奴工之外，希姆莱在德国本土既不需要也不使用党卫军部队；武装党卫军主力部署在东线战场，执行“特殊任务”（通常是群体灭绝）以及推行

常与军方及纳粹文官体系相悖的政策。如同苏联的秘密警察，党卫军部队通常在军队平定被占领土、处理完公开的政治反对派之后才抵达。

然而在极权统治的初始阶段，秘密警察与党的精英组织仍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其他独裁政权及历史上著名恐怖统治的角色；其手段的残酷程度之极，在现代西方国家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在初期阶段，他们搜寻秘密敌人、追捕昔日对手的，通常伴随着将全体民众征召到外围组织中，并对老党员进行再教育以招募自愿间谍。这样警察系统中受过特殊训练的干部就无需怀疑那些被征召的同情者。正是在这个阶段，对于那些怀有“危险思想”的人来说，邻居逐渐成为比官方任命的警察代理人更危险的敌人。第一阶段的结束标志着任何有组织的公开或秘密抵抗都被消灭；在德国大约是 1935 年，在苏联大约是 1930 年。

唯有在彻底消灭真实敌人之后，当对“客观敌人”的追捕开始时，恐怖便成为极权政权的实质内容。例如以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为借口，或将特定领土作为革命实验的试验场，或实现民族共同体，这是极权主义的常见第二项主张，只有实现该主张，绝对统治的诉求才得以实施。尽管理论上绝对统治仅能在世界霸权条件下实现，但极权政权证明了极权主义乌托邦的这一部分几乎能完美实现，因为它暂时不受战败或胜利的影响。因此希特勒即便在军事受挫之际，仍能为灭绝犹太人与建立死亡工厂而欢欣鼓舞；无论最终结局如何，若无战争便永远无法“焚桥断路”，更不可能实现极权运动的部分目标[90]。

纳粹运动的精英组织与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干部”体系，其服务目标在于实现绝对统治而非保障执政政权的安全。因为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诉求在表面上与帝国主义扩张的诉求相似，所以专制研究者对极权主义绝对统治的诉求也并不感到奇怪。极权主义秘密警察与帝国主义秘密警察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无视本国与外国的差别，但后者既不追查隐秘思想，也不实施秘密监禁，更不沿用旧式情报机构的挑拨手段。⁷

由于极权秘密警察在国内平定之后才开始启动，因此在外部观察者来看，它始终显得完全多余，或者相反，它会误导人们以为有某种秘密抵抗力量存在[92]。情报机构的冗余性并非新鲜事；它们始终被一种需求所困扰，即在完成原本任务后仍需证明自身价值以保住饭碗。基于这种意图而出现的操作方式，使后人学习革命史变得格外困难。例如，路易·拿破仑统治期间似乎没有一次反政府行动不是由警方自身煽动的[93]。同样地，秘密特工在沙皇俄国所有革命党派中所扮演的角色表明，若没有他们“鼓动性”挑衅行动，俄国革命运动恐怕远不如实际那般成功。换言之，

⁷ 译者注：阿伦特在此认为极权主义警察的特征在于，他们逮捕的对象不区分国内还是国外敌人，他们追查秘密思想、进行秘密监禁、沿用旧式情报机构的挑拨手段。这是帝国主义警察所不能做的。

挑衅煽动行为既维持了传统的延续，又屡次破坏革命组织的运作。

挑拨煽动的双重角色或许正是极权统治者讨厌它的一个原因。更何况，只有在逮捕和惩罚还不够充分的前提下，挑拨煽动才显得有必要。当然，没有任何极权统治者曾设想过这样的境况：他得通过挑拨煽动来陷害自己认定的敌人。比上述技术性考量更重要的是，极权主义在夺权前就已通过意识形态界定了敌人范畴，因此“嫌犯”的范围不是根据警方资讯来建立的。无论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还是苏联统治阶级的后代，都没有真正被怀疑为有任何敌对行动。他们是依据政权意识形态被宣布为“客观”敌人。

专制秘密警察与极权秘密警察的核心差异，在于“嫌犯”与“客观敌人”的本质区别。后者由政府政策界定，而非其推翻政权的意愿[95]。这种人从来不是引爆危险思想的人，也不是个人历史有问题而引发怀疑的人，而是如同疾病携带者般的“倾向性载体”。从实际操作看，极权统治者所采取的方式，如同持续辱骂他人直至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他的敌人，从而能以自卫之名合理化杀戮。这种手段固然粗鄙，却行之有效，凡目睹某些成功投机者如何清除竞争对手者皆知此理。

“客观敌人”概念的引入，对极权政权的运作具有远比意识形态范畴划分更为决定性的意义。倘若仅仅是憎恨犹太人或资产阶级的问題，极权政权在犯下滔天罪行后，本可看似回归正常生活与正常政府。然而我们所知，现实恰恰相反。客观敌人的范畴超过了运动最初意识形态确定的敌人；随着形势变化，新的客观敌人不断被发现：纳粹预见到犹太人灭绝计划即将完成时，已着手为消灭波兰民族采取必要准备措施，希特勒甚至计划对某些类别的德国人实施屠杀[97]；布尔什维克最初针对旧统治阶级后裔，随后将恐怖手段全面转向富农（1930年代初），继而锁定波兰裔俄罗斯人（1936至1938年间），战争期间鞑靼人和伏尔加德意志人，战后红军战俘及占领部队成员，犹太国建立后的俄罗斯犹太人。此类群体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意；因为这些“客观敌人”会被公布并用于境外运动宣传，必须显得像是可能的敌人；特定类别的选择甚至取决于极权运动的某种宣传需要。例如，苏联政府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反犹主义的紧急措施，这或许是为了让苏联赢得欧洲卫星国的同情支持。要求那些被“客观”认定的敌人进行主观招供的作秀公审，正是基于这些意图。最适合参与此类公审的是那些接受过极权主义思想灌输的人，他们能够“主观”理解自身“客观”的危害性，并“为事业”而认罪[98]。“客观敌人”的概念，其身份随形势变化而变，当某类敌人被清除后，战争便会转向另一类敌人，这与极权统治者反复强调的事实状况完全吻合：即他们的政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不断前进的运动，其前进道路上总会出现必须清除的新障碍。若说极权体系内存在任何法律思维，那么“客观对手”便是其核心理念。

与这种将嫌疑犯转化为客观敌人的转变密切相关的是，秘密警察在极权国家中的地位变化。情报机构被恰当地称为国中之国，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专制政体，在宪政或半宪政政府下同样如此。秘密情报的垄断使该部门始终凌驾于其他行政部门之上，构成对政府成员的公开威胁[99]。反之，极权警察则完全服从领袖意志，唯有领袖能决定下一个潜在敌人是谁，也像斯大林那样可随意指定秘密警察干部进行清除。由于警察不再被允许使用挑拨煽动手段，他们丧失了维持自身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唯一手段，完全依赖上级当局保障其职位。如同非极权国家中的军队，极权国家的警察仅执行政治指令，丧失了专制官僚体制下曾享有的所有特权[100]。

极权警察的任务并非侦破罪案，而是在政府决定逮捕特定人群时随时待命。其首要的政治特质在于：唯有他们深得最高权力的信任，深谙即将执行的政治方针。这不仅适用于高层政策方面，例如清算整个阶级或民族群体（1930年代初，只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知道苏联政府的真实目标，而在1940年代初，只有党卫军知道犹太人将被灭绝）；关于极权体制下的日常生活，要点是在一个企业内部，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知晓其真实意图。比如当莫斯科命令要加速管道生产时，究竟是单纯需要更多管道，还是要摧毁厂长，或是清算整个管理层，抑或废除这家特定工厂，甚至要在全国内重复此类命令以开启新一轮清洗？

情报机构相互独立、彼此不知对方特工身份的原因之一在于：绝对统治需要极致的灵活性。以管道订单为例，莫斯科下达指令时，可能尚未确定究竟需要管道（这种物资始终紧缺）还是要进行人员清除。情报机构的多元性使得任何临时变化都可成为可能：当某部门正筹备授予工厂厂长列宁勋章时，另一部门却在安排逮捕行动。秘密警察的高效性恰恰体现在它能同时推进此类相互矛盾的指令。

在极权统治下，如同其他政权一样，秘密警察垄断着某些关键情报。但秘密警察掌握的知识类型已发生重大转变：他们不再关注未来受害者心中的想法（多数时候他们根本不知这些受害者是谁），而是成为了最高国家机密的保管者。这自然意味着其威望与地位的显著提升，尽管伴随着实际权力的明显削弱。秘密机构所掌握的一切，领袖皆了如指掌；就权力而言，他们已沦为行刑者的角色。

从法律角度看，从“嫌犯”向“客观敌人”转变更耐人寻味的是，极权主义用可能罪行彻底取代嫌疑罪行。可能罪行与客观敌人同样缺乏主观性。嫌犯因被认为具备实施某种与其人格（或其被怀疑的人格）大致吻合的犯罪能力而遭逮捕[101]，而极权主义版本的可能罪行是基于对客观发展的逻辑预判。莫斯科审判中对老布尔什维克卫队及红军首脑的判决，正是惩罚可能罪行的经典范例。在那些荒诞捏造的罪名背后，人们不难窥见这样的逻辑推演：苏联国内局势引发危机，这种危机可能导致斯大林独裁政权被推翻，这将削弱国家军事力量，甚至可能迫使新政府被迫

与希特勒签订停战协议或缔结同盟[102]。于是斯大林宣称存在推翻政府的阴谋及与希特勒勾结的密谋。面对这些“客观”，尽管完全不可能，仅有“主观”因素支撑，如被告的可信度、疲惫状态、对局势的认知障碍、坚信没有斯大林一切将毁灭的信念、对法西斯主义的真诚憎恨；这些事实细节自然缺乏虚构犯罪逻辑推演的连贯性。极权主义的核心假设，即万事皆有可能，是通过持续消除所有事实约束，最终导致荒谬而可怕的结论。统治者能构想出的任何罪行都必须受到惩罚，无论其是否真实发生。正如客观敌人一样，可能罪行自然超出了警方的能力范围，他们既无法发现、也无法捏造、更无法诱发此类罪行。在此情境下，秘密警察机构完全依赖于政治当局。其作为国中之国的独立性已荡然无存。

只有在一个方面，极权主义秘密警察仍与非极权国家的秘密机构十分相似。自富歇时代起，秘密警察便习惯于从受害者身上谋取私利，并通过某些非正规渠道补充官方授权预算。在赌博、卖淫等本应取缔的活动中扮演合作者角色，这些非法筹资手段，从友好接受贿赂到公然勒索，构成了其运作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些因素使得情报机构脱离公共权力机构，并强化了其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耐人寻味的是，用受害者收入资助警察活动的做法历经所有变革仍得以延续。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几乎完全依赖奴役劳工的剥削，这种剥削似乎别无他用，其唯一目的就是为庞大的秘密机构提供资金[104]。希姆莱最初通过没收犹太人财产为其党卫军部队（纳粹秘密警察的骨干力量）提供资金；随后他与农业部长达雷达成协议，每年从达雷以低价在国外采购农产品、再以固定价格在德国销售所获的数亿马克中分得份额[105]。当然，这一稳定收入来源在战争期间消失了；1942年，托特继任者、德国最大劳动力雇主阿尔伯特·斯佩尔向希姆莱提出类似交易：若希姆莱同意将效率极低的进口劳工从党卫军管辖中解放出来，斯佩尔机构将按利润一定比例向党卫军拨款。除上述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外，希姆莱还沿用了情报机构在财政危机时惯用的敲诈手段：党卫军在社区内组建“朋友”团体，他们被迫“自愿”提供资金以满足当地党卫军成员的需求[107]。（值得注意的是，纳粹秘密警察在各类金融运作中并未剥削囚犯。唯有战争最后几年，当集中营中的人力资源使用权不再由希姆莱单独决定，集中营劳作“除了加重不幸囚犯的负担和折磨外，毫无合理目的”[108]）。

然而，这些非法敛财手段仍是秘密警察传统留下的唯一痕迹，且并不重要。它们之所以保留下来，是因为极权政权普遍轻视经济与金融事务，从而在正常情况下视为非法、且让秘密警察与其他更体面的行政部门区分开来的手段，如今已不再表明这是一个享有独立性、不受其他权力机构控制、生活在不正规、不体面和不安全氛围中的部门。相反，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地位已完全稳定，其职能全面融入行政

体系。该组织不仅未凌驾于法律之上，反而成为法律的化身，其正当性无可置疑。它不再主动策划谋杀，不再煽动危害国家与社会的罪行，反而严厉打击各类贿赂、敲诈及非法财务收益。伴随着非常具体的威胁，希姆莱在战争期间对部下进行道德训诫：“我们拥有道德权利……要消灭这个一心想要消灭我们的（犹太）民族，但我们绝无权利以任何形式中饱私囊，无论是裘皮大衣、手表、一枚马克，还是香烟”[109]，这其中表达的想法在秘密警察的历史中堪称绝无仅有。如果秘密警察仍关注“危险思想”，这些思想也绝不是嫌疑人自认为危险的；对所有知性与艺术生活的管制，要求不断重建与更新标准，这自然伴随着反复清除有“危险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危险思想”通常在前一天还是完全符合正统的。因此，当秘密警察的功能已经在一般意义上变得多余的时候，其经济功能虽然有时会被认为是取代了前者，但它实际上更为可疑。诚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定期逮捕一定比例的苏联民众并将其送往集中营，尽管他们被冠以“强制劳动营”这个虚伪美名的；虽然这很可能是苏联解决失业问题的手段，但众所周知这些劳改营的产量远低于普通苏联劳动力，几乎难以支付警察机构的开支。

秘密警察的政治职能既非可疑也非多余，作为极权体制权力机器中“组织最严密、效率最高”的政府部门[111]，它构成了政府真正的行政执行机构，所有命令皆通过此渠道传递。极权统治者透过特工网络，创造了一条执行其意志的传输带，这条传输带有别于表面层级的洋葱式结构，它与所有其他机构完全割裂隔绝。在此意义上，秘密警察是极权国家唯一公开统治的阶级，其标准与价值尺度渗透于极权社会的全部肌理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秘密警察某些特殊品质实为极权社会普遍特征而非其专属属性，这或许不足为奇。在极权主义条件下，“嫌犯”这一范畴便涵盖了全体民众；任何偏离官方规定且不断变动路线的思想，无论出现在人类活动的哪个领域，都已然可疑。仅仅因为人类具备思考能力，他们便被定义为嫌犯，而这种怀疑无法通过模范行为来消除，因为人类有思考能力同时也有改变自己想法的能力。更何况，在这种语境下，人永远无法确知他人内心真实，这种内心煎熬不过是徒劳无功的绝望挣扎，试图达成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当社会现实（区别于单纯心理层面）既缺乏价值共同体，又无利己动机的可预测性时，怀疑便永无消弭之日。因此，相互猜疑渗透于极权国家的所有社会关系，即便在秘密警察的特殊管辖范围之外，也营造出无所不在的压抑氛围。

在极权统治下，挑拨煽动曾经仅属于秘密特工的专属手段，如今已成为所有人被迫遵循的邻里相处之道，无论情愿与否。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成了挑拨煽动者；很显然，如果连普通友好的“危险思想”（或此时已成危险思想）交流，都会引起

当局的注意，那么每个人都会自称是挑拨者。民众参与告发政治对手、自愿充当告密者，这绝非前所未有，但在极权国家里，这些行为组织得如此严密，以至于专家的工几乎变得多余。在无所不在的监视体系中，人人皆可成为警察线人，每个个体都深感时刻处于监控之下；更何况在职业生涯极度不稳定、惊天动地的兴衰更迭已成日常的境况下，每句话都变得模棱两可，随时可能被事后“解读”。

极权社会渗透着秘密警察的手段和标准，最鲜明的例证莫过于职业生涯问题。在非极权体制中，双重间谍为其本应对抗的事业所做的贡献，几乎与当局相当，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类间谍常怀有双重野心：既想在革命党派中晋升，又想在情报机构里爬升。为在两条战线上都获得提拔，他只需采用某些手段，而这些手段在正常社会里，不过是依赖资历晋升的小职员暗自幻想的手段罢了：通过与警方的关系，他完全能清除党内竞争对手和上级；而借助革命者的人脉，至少有机会摆脱警察系统的上司[113]。若考察当代俄罗斯社会的晋升机制，其与上述手段的相似性令人震惊：不仅几乎所有高官都因清洗前任而上位，各行各业的晋升都通过这种方式加速。大约每十年，全国性清洗就会为新毕业、渴望职位的新生代腾出空间。政府自己创造了这些晋升条件，而过去警察特工必须亲自创造这些条件。

这台庞大的行政机器定期进行暴力更迭，虽然阻碍了能力的培养，却具有诸多优势：它确保了官员队伍的相对年轻化，避免了稳定状态的形成，因为这种状态在和平时期，对极权统治而言充满着危险；通过消除资历和功绩制度，它阻断了通常维系年轻职员忠诚度的纽带发展。这种定期的暴力更迭，虽然阻碍了能力的培养，却具有诸多优势：它确保了官员队伍的相对年轻化，避免了在和平时期对极权统治构成威胁的稳定状态；通过消除资历和功绩制度，它阻断了年轻干部通常依附于前辈的忠诚关系，因为他们的晋升往往取决于前辈的意见和善意；它彻底消除了失业风险，并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与其教育背景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因此，1939年苏联大规模清洗结束后，斯大林欣慰地指出：“党已能将五十多万年轻布尔什维克提拔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114]。一个人要想获得工作，就得要靠不公正手段清除前任，这其中蕴含的羞耻感就跟德国人清除犹太人来获得职位一样，具有去道德化的效力：它使每个职位持有者都成为政府罪行的自觉共犯，无论其意愿如何都成为受益者，结果是受辱者越是敏感，就越会竭力捍卫该政权。换言之，这种制度是领袖原则在全部含义上的逻辑延伸，也是忠诚的最佳保障。它使每一代人的生计都依赖于发起“创造就业的清洗”的领袖当前政治路线。它还实现了公私利益的统一，苏联捍卫者曾为此引以为傲（纳粹版本则是消灭私人生活领域），因为任何重要人物的存在都完全依赖于政权的政治利益；当这种利益实质性统一被打破，下一轮清洗将他扫出权力场时，政权便确保他从人间彻底消失。以类似方式，双重间谍不仅

与秘密警察同谋，更与革命事业绑定（否则将失业）；同样在该领域，显赫一时的高升终将以无名之死而收场，毕竟双重游戏不可能永远持续。当极权政府在所有的职业都设下先前流行于社会弃民中的晋升条件时，它在社会心理领域引发了极为深远的变革。双重间谍为了拥有数年得志满意的巅峰生活，而甘愿付出短暂的生命为代，这种心理必然成为整个俄国革命后世代在个人事务中的生存哲学，这种情况在战后德国也出现，虽程度较轻却仍极具危险性。

在这个充斥着标准、奉行着曾为秘密警察所垄断的手段的社会，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就在其中运作。唯有在权力斗争仍在进行的初始阶段，其受害者才是那些可能被怀疑为反对派的人。极权主义秘密警察以迫害客观敌人来开启它的极权事业：这些客观敌人可能是犹太人或波兰人（如纳粹所为），或是所谓“反革命分子”，这种指控在苏联早已确立，甚至在任何关于被告行为的质询出现之前便已成立，而这些“反革命分子”可能包括任何时候拥有店铺或房屋者，或“父母祖辈曾拥有此类财产”者[115]，或恰巧隶属红军占领部队者，或波兰裔俄罗斯人。唯有在极权主义的终极阶段，“客观敌人”与“逻辑上可能有的罪行”这些概念才被彻底抛弃，受害者完全随机选定，甚至未经指控便被宣告不配生存。这类新型“不受欢迎者”可能包括纳粹时期的精神病患或肺心病患者，亦或苏联境内的那些恰好被纳入该百分比的人群，尽管他们在各省比例不同，但却被勒令驱逐出境。

这种一贯的专断比任何暴政都更能有效地剥夺人的自由。至少暴政会惩罚那些反对它的人。对于那些敢于冒险而死的人，言论自由并未被废除。理论上，极权体制下仍存在反对的选择权；如果一个人自愿做出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会招至其他所有人都必须承受“惩罚”，那么这种自由便几近失效。在这个体系中，自由不仅萎缩至其最后且看似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可能性），更丧失了其独特印记，因为行使自由的后果要让完全无辜者共同承担。倘若希特勒有时间实现其《德国全民健康法案》的梦想，肺病患者将与纳粹政权初期被选中的共产党员、后期被选中的犹太人遭受同样命运。同样，在俄罗斯，政权反对者与数百万被选入集中营以完成特定配额的人民承受相同命运，这仅是减轻了警察任意选择的负担。无辜者与罪犯同样不受欢迎。

犯罪与罪犯概念的转变，决定了极权主义秘密警察采用的手段是新颖而可怕的。罪犯受到惩罚，不受欢迎者从人间消失；他们留下的唯一痕迹，是那些认识并爱过他们的人的记忆。而秘密警察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连这些痕迹也会随被判刑者一同消逝。

据称沙俄时期的俄国秘密警察（俄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前身）发明了一套档案管理制度：每名嫌疑人的信息都记录在一张大卡片上，其姓名被红色圆圈标注于卡

片中央；其政治盟友以较小的红色圆圈标记，非政治性熟人则用绿色圆圈标注；棕色圆圈则标注与嫌疑人友人有联系但嫌疑人本人不认识者；嫌疑人政治与非政治友人及其友人之间的交叉关系，则通过各圆圈间的连线标示[116]。显然，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仅取决于档案卡的尺寸，理论上，一张巨型单页便可呈现全体民众的关联与交叉关系。这正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乌托邦式目标。他们已放弃传统警察仍寄望于测谎仪实现的旧梦想，不再试图辨明“谁是谁”或“谁持何种思想”。（这种幻想对所有警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测谎仪或许就是这种吸引力最写实的例子；很显然，这套复杂的测量设备除了能测出受测者的冷血或神经质气质外，几乎无法确立任何实质结论。实际上，这种机械装置背后那套拙劣的推理逻辑，只能用人类内心深处非理性的渴望来解释，即渴望获得某种形式的读心术。）这种古老的梦想早已够可怕了，而且它自古以来只会导致酷刑和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它唯一可取之处在于：它要求的是不可能之事。现代极权警察的梦想，凭借其现代技术手段，要可怕得多。如今警察梦想着：只需瞥一眼办公室墙上那幅巨型地图，就能随时确定谁与谁存在何种亲密关系。尽管技术上执行必然存在困难，但理论上这个梦想并非不可实现。倘若这张地图真的存在，纵使记忆也无法阻挡极权统治的索求；这般地图或将使人彻底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

如果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报告可信，那么俄罗斯秘密警察已令人不安地接近了这种极权统治的理想状态。警方为这个广袤国度里的每个居民建立了秘密档案，细致记录着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从偶然相识到真挚友谊再到血缘亲属；因为唯有通过审讯才能揭露这些关系，而被告的“罪行”早在逮捕前就已被“客观”认定。最后，对于记忆这种对极权统治构成威胁的天赋，外国观察家们认为：“如果象群确实切莫忘记，俄罗斯人于我们而言，恰似大象的对立面苏联俄罗斯的心理特质，似乎真能使人遗忘。

在某些案例中，由于各种原因，体制要面对幸存者的记忆时，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受害者的彻底消失，对于全面支配的机器来说有多么重要。战争期间，一位党卫军指挥官曾犯下致命错误：他向一名法国妇女透露她丈夫死于德国集中营的消息；这一失言引发了一场小型雪崩式的命令与指令。他们被转发给所有集中营指挥官，旨在警告他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118]。关键在于，对那位法国寡妇而言，她的丈夫在被捕瞬间便被视为停止了生命，或者说根本从未存在过。同样，苏联警察自出生起就习惯于这一系统，因为他们会惊讶地发现，波兰占领区的人民会不顾一切试图探知他们被捕的亲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119]。

在极权国家里，所有由警察统治的拘留场所都被设计成真正的遗忘之穴，偶然落入其中的人不会留下尸体和坟墓这类存在过的正常痕迹。与除掉一个人的最新

发明相比，无论是政治谋杀还是刑事杀人的旧式手段，都显得效率低下。凶手总会留下尸体，即便竭力抹去自身身份痕迹，却无力消除受害者的身份从幸存者的记忆中抹去。相反，秘密警察的运作却奇迹般地确保受害者从未存在过。

秘密警察与秘密社团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前者建立时，总是需要并利用后者存在所引发的危险作为借口。而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则是历史上首个既不需要也不使用这些暴君们陈腐借口的机构。其受害者的匿名性，他们既不能被称为政权的敌人，其身份在政府任意裁决将其从生者世界抹除、从死者世界消灭记忆之前，对实施迫害的人而言始终是未知的。这种匿名性超越了所有秘密，超越了最严密的沉默，超越了阴谋社团纪律曾强加于成员的双重生活掌控力。

权主义运动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模仿某些秘密社团组织特征，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成立，但只有在掌权后才真正形成秘密社团。极权政权的秘密社团就是秘密警察；在极权国家里，唯一被严密守卫的秘密，唯一存在的玄奥知识，就是有关警察的运作方式和集中营的状况[120]。当然，普通民众和党内成员都清楚知道所有一般性事实，即集中营的存在、民众的失踪、无辜者的逮捕；与此同时，极权国家中的每个人也都深知，谈论这些“秘密”乃是至高无上的罪行。由于人类的认知依赖于同伴的认同与理解，这种普遍共享却各自守秘、永不传扬的信息便丧失了现实质感，沦为纯粹的噩梦。唯有掌握着关于新类别“不受欢迎者”及干部运作方式的严格秘传知识者，才能彼此交流关于所有人共同现实的真相。唯他们能确信自己所知为真。这是他们的秘密，为守护此秘，他们自成秘密组织。即便该组织逮捕他们、逼供他们、最终处决他们，他们仍属成员。只要守护秘密，他们就属于精英阶层，通常即便身陷监狱与集中营，他们也不会背叛[121]。

我们已指出，诸多令人反感的悖论之一在于非极权世界普遍认为，极权主义对阴谋手段的运用看似不合常理。表面遭受警察迫害的极权主义运动，在争夺权力时极少采用阴谋手段推翻政府；而掌权后的极权主义，在获得各国政府承认并看似超越革命阶段后，却发展出真正的秘密警察体系作为其政府与权力的核心。似乎官方承认对极权运动的阴谋本质构成更大威胁，这种威胁源于内部瓦解的风险，而并不是非极权政权敷衍了事的警察手段。

问题的真相在于，极权主义领袖们虽然坚信必须始终遵循他们在夺权斗争中确立的虚构世界及其规则，却只是逐渐发现这个虚构世界及其规则的全部含义。他们对人类全能的信仰，他们坚信一切皆可通过组织实现的信念，驱使他们进行着人类想象或许曾勾勒却从未付诸实践的实验。他们在可能性领域所作的骇人发现，源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被证明比前科学、前哲学时代最狂野的幻想更不受理性约束，也更不愿承认现实。他们建立起秘密社团，如今不再公然活

动的秘密警察组织、政治军人团体或意识形态训练的战斗者联盟，只为实施那些对可能性进行的卑劣实验性探究。

另一方面，极权主义对非极权世界的阴谋，即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在极权统治下依然如极权运动中那般公开且毫无遮掩。这种阴谋论以“全世界都在密谋反对本国”的形式，被强加于协调一致的“同情者”群体之中。极权主义的二元对立通过两种手段得以传播：其一，要求每位海外国民像秘密特工般向祖国汇报；其二，将每位外国人视为本国政府的间谍[122]。铁幕将极权国家居民与世界隔绝，其本质在于实现这种二元对立，而非出于军事等具体机密。其真正的秘密在于集中营，这个绝对统治实验的实验室，被极权政权严密遮蔽，既不让本国人民知晓，也绝不让外界窥见。

相当长时期内，正常世界的常态正是掩盖极权主义群体罪行的最有效屏障。“正常人不知道万事皆有可能”[123]，他们拒绝相信。面对怪诞时，他们充当了独裁政权的耳目，正如大众在正常现实中不信任自身时所做的那样，在那种现实里，他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124]。极权主义政权之所以能如此深入地实现虚构的颠倒世界，是因为外部非极权主义世界，它本身就包含极权主义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他们沉溺于一厢情愿的幻想，面对真实的疯狂时逃避现实，正如大众面对正常世界时所做的那样。这种拒绝相信荒诞之事的常识性抗拒，不断被极权统治者本人强化，他确保绝不公布可靠统计数据，不允许可控的事实与数字，使得关于行尸走肉之地的报道永远停留在主观、失控且不可靠的层面。

正因如此，极权主义实验的结果仅被部分认知。尽管集中营的报告足以让我们评估绝对统治的可能性，窥见“可能”的深渊，但我们仍不清楚极权体制下人格改造的程度。我们更无从知晓身边多少普通人会甘愿接受极权生活方式，即为确保职业梦想的实现而付出寿命大幅缩短的代价。极权宣传乃至某些极权机构如何迎合新的无家可归的大众需求并不难以理解，但几乎无法预知：当持续失业威胁笼罩时，其中多少人会欣然接受定期清除冗余人口的“人口政策”？当彻底意识到自己日益无力承担现代生活重负时，又有多少人会甘愿投身于这个连同自发性一同扼杀责任感的体系？

换言之，尽管我们了解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运作机制及其具体职能，却无从知晓这个秘密组织的“秘密”程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迎合了当代大众的隐秘渴望与暗中勾结。

第三节

绝对统治

极权政权的集中营与灭绝营，正是验证极权主义核心信条（万事皆有可能）的实验场。相较于此，其他所有实验在重要性上皆属次要，包括那些在对第三帝国医生的审判中被详细记录下来的种种恐怖医学实验，尽管这些实验室曾被用于各种各样的实验。

彻底统治，即企图将人类无限的多元性与差异性组织起来，仿佛整个人类仅是一个个体。若想实现这种企图，就只有让每一个人都被化约为由各种反应构成的永恒不变的同一性，进而这些反应束中的每一束，都能随机与其他任何一束替换。问题在于制造某种不存在的事物，即一种类似其他动物物种的人类物种，它唯一的“自由”就是“保存物种”[125]。极权统治试图通过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的绝对恐怖来实现这一目标；精英阶层被无情利用所犯下的暴行，仿佛已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实践应用（亦意识形态灌输必须在此证明自身价值），而集中营本身所呈现的骇人景象，则为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据。

这些集中营不仅旨在灭绝人类、践踏人性，更服务于一项骇人听闻的实验：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消除人类行为中自发性的表达，将人格转化为一个纯粹的物件，甚至转变成连动物都不是的物件；正如我们所知，巴甫洛夫的狗被训练成不再因饥饿进食，而是在铃声响起时进食，这不过是种被扭曲的动物。

在正常情况下，这永远无法实现，因为自发性永远无法被彻底消除，因为这种自发性不仅与人的自由紧密联系，更与生命本身息息相关，即单纯地维持生存。唯有在集中营中，这样的实验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集中营不仅是“迄今实现的最极权的社会”（大卫·鲁塞尔语），更是绝对统治的普遍社会理想。正如极权政权的稳

定性依赖于将虚构的运动世界与外部世界隔绝，集中营中绝对统治的实验同样依赖于将后者与所有其他人的世界、与普遍生存的世界、甚至与极权统治下的外部世界彻底割裂。这种隔绝状态解释了为什么来自集中营的见证都具有独特的虚幻感、都缺乏可信度，也构成了理解极权统治的一大困难，这种理解与集中营及的存在与灭亡息息相关；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这些集中营才是极权组织真正的中枢机构。

如今来自幸存者的报告不胜枚举[126]。这些报告越是真实，就越不能传达那些超越人类理解与经验范畴的东西，就是把人转变为“毫无怨言的动物”的苦难。这些见证中没有一份会引发愤怒、同情，这类曾推动人类为正义而行动的激情。相反，任何谈论或撰写集中营经历者仍被视为可疑；即便讲述者已重返人间生活，其真实性常遭质疑，仿佛他将噩梦误作现实[128]。

人们对自己及自身经历真实性的怀疑，恰恰印证了纳粹分子始终深谙的道理：决心作恶者总会发现，最好是以最浩大、最不可思议的规模来组织这些罪行。不仅因为这使法律体系提供的所有惩罚都显得荒谬且不够；更因为罪行本身的巨大也会为杀人犯提供保护，让他们用各种谎言宣称自己清白无辜，而且他们还会比讲述真相的受害者更容易取信于人。纳粹甚至不屑将此发现藏于心底。希特勒散布数百万册著作宣称“谎言要成功就必须足够巨大”，但这种口号这并未阻止人们相信他；同样，纳粹一再宣称犹太人将会像臭虫一样被消灭（即用毒气），这种令人作呕的宣言也使无人敢于质疑其真实性。

通过大方的合理化手法，来搪塞解释本质上难以置信之事，这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很诱人的做法。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潜伏着这样一位自由主义者，用常识的声音哄骗着我们。通往极权统治的道路需经历诸多中间阶段，我们能找到大量类比与先例。极权统治初期的极端血腥恐怖确实只为一个目的：消灭对手并彻底扼杀所有潜在反抗；但全面恐怖统治的实施，恰恰是在初始阶段被攻克、政权不再畏惧反对力量之后。在此背景下，人们常言手段已成目的，但这终究只是以悖论形式承认“目的正当化为手段”的法则不再适用，因为恐怖已丧失其“目的”，不再是威慑民众的手段。将恐怖主义归咎于革命吞噬其子嗣的解释（如法国大革命）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当所有称为革命子嗣的势力（无论是俄国各派系、党内权力中心、军队还是官僚机构），早已被吞噬殆尽，而恐怖统治仍持续不止。许多当今专制政府惯用的手段，在历史研究中早已司空见惯。侵略战争几乎贯穿人类史；罗马人通过“怜悯战败者”原则稍微缓缓战后屠戮敌方民众的暴行；美洲、澳洲、非洲的殖民进程始终伴随着原住民的灭绝；奴隶制是人类最古老的制度之一，所有古代帝国都依靠国家奴隶的劳力建造公共建筑。集中营也非极权运动的发明。它们首次出现于本世纪初的布尔战期间，此后在南非和印度持续用于关押“不受欢迎分子”；“保护性监禁”

这一术语亦源于此，后被第三帝国沿用。这些拘留营在诸多方面与极权统治初期的集中营相呼应，它们关押着罪证不全、无法通过常规司法程序定罪的嫌疑犯。所有这些都清晰指向极权统治手段；所有这些是极权主义者基于“一切皆可为”的虚无主义原则所继承、发展并固化的统治要素，该原则对他们而言已是理所当然。但当这些新型统治形式真正形成其极权主义结构时，它们便超越了仍受统治者功利动机与私利束缚的上述原则，开始涉足一个迄今完全陌生的领域，即“万物皆可能”的领域。其典型特征在于：这个领域既不受功利动机的约束，也不受私利内容的限制。

与常识处于对立面的，并不是“一切皆可为”的虚无主义原则，这种观念早在十九世纪功利主义的常识概念中就已存在。常识与“正常人”都拒绝相信的是万物皆有可能[129]。我们试图以当前或回溯的经验来理解的某些元素，这就超出了我们自身的理解力。我们试图将某种事物归类为犯罪，而我们都深知，这种分类本没法涵盖此类行径。当面对尸体的大规模制造时，谋杀的概念还有何意义？我们试图从心理层面理解集中营囚犯和党卫军的行为，却必须认识到：即使肉体未被摧毁，精神也可能被彻底摧毁；事实上，精神、性格与在某些情况下，个体的特质似乎仅能通过其崩解的快慢速度来展现[130]。无论如何，最终产物都是一些行尸走肉，即那些在心理学上无法理解的人，他们重返到心理上或心智上的人类世界方式，类似于拉撒路的复活⁸所有基于常识的陈述，无论涉及心理还是社会层面，都只会助长那些认为“沉溺于恐怖”实属“肤浅”之人的气焰[131]。

倘若集中营确实是极权统治最具决定性的制度，那么“沉溺于恐怖”似乎是理解极权主义不可或缺的途径。但回忆录与目击见证同样无力承担此任。这两类文本都存在逃避经历的内在倾向，无论受难者是出于本能还是理性，他们都深知在外部世界的普通人与集中营的活死人之间横躺着可怕的深渊，因此只能提供一系列记忆中的片段，这些片段对讲述者和听众而言同样难以置信。唯有那些被见证所触动、但自己的肉身并未遭受此等打击的那些人，那些因此得以摆脱兽性、绝望的恐怖之人（一旦经历真实出现在当前的恐怖，这种恐怖会顽固地寄生在当事人所有不完全是条件反射的行为上），他们的想象力才有办法持续思考恐怖。这些思考仅对洞察政治语境与调动政治激情方面发挥作用。思考恐怖跟真实体验恐怖一样，不会引发人格的各种改变。将一个人化约为一连串反应所产生的隔绝效果，就跟精神疾病将人与他的内在个性或性格等一切特质隔绝开一样。当他像拉撒路般死而复生时，他发现自己的个性或品格依然如故，未曾改变分毫。

⁸ 译者注：约翰福音第 11 章记载拉撒路死后第四天，耶稣将其从坟墓中唤醒复活的神奇迹，这象征着耶稣拥有战胜死亡的权柄，是“复活与生命”的体现。

正如恐怖本身，或对恐怖的沉溺，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也不能使人向善或向善，因此它也无法成为狭义政治共同体或政党的基础。想要通过建立在共同的欧洲集中营经历之上的欧洲相互理解工程，来培养欧洲精英的尝试，其方式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要从前线世代的国际经验中，导出政治结论的尝试。这两种尝试都证明，经验本身所传递的不过是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而已[132]。例如战后和平主义这样的政治产物，源于对战争的普遍恐惧，而非战争经历本身。比起缺乏现实感的和平主义，对现代战争结构的洞察，这种战争由恐惧驱动并动员起来，或许已经导出一种认知，即判断战争不可避免的唯一标准就是反抗人类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而我们对极权主义集中营地狱般折磨的切身体验，早已将此类生存困境的可能性昭示得淋漓尽致[133]。因此，对集中营的恐惧及其引发的对极权统治本质的洞察，让从左派到右派过时的政治划分，都失去意义。在这些区分之外、之上引入了评判当代事件最重要的政治标准：即这些事件是否服务于极权统治。

无论如何，上述对恐惧的想象力具有巨大的优势，它可以瓦解那些诡辩-辩证式的政治诠释；这种诠释都是建立在一种迷信之上，即认为邪恶可能孕育善果。只要一个人施加于同胞最恶的行径还只是谋杀，那么这种辩证法把戏至少在外表上还具有某种正当性。但正如我们今日所知，谋杀不过是有限的恶。杀死一个注定要死之人的凶手，仍游走于我们熟悉的生命与死亡领域；二者确有必要联系，辩证法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即使它未必总能意识到这一点。凶手留下尸体，不会假装受害者从未存在；若他抹去痕，也仅是消弭自身身份的印记，而非抹去爱者对逝者的追思与哀恸；他摧毁生命，却无法摧毁存在本身的事实。

纳粹分子有自己特有的精准性，他们曾经以“夜幕与迷雾行动”为名从事集中营屠杀⁹。这些将人被视为从未存在过、使其在字面意义上被彻底抹掉的极端措施的产物，往往初看并不显眼，因为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的体系都非统一运作，而是由一系列分类构成，其中人们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在德国集中营中，不同类别囚犯虽共处一地却互不相见；其隔离之严苛，往往甚于与外界的隔绝。例如基于种族方面考量，二战期间德国人对待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公民的方式，与对待其他民族的方式差异极大，即使他们是纳粹公开的敌人¹⁰后者又被划分为三类：一类是犹太人那样被立即列入“灭绝”议程的群体；一类是波兰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那样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面临灭绝的群体；还有一类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那样尚未被纳入整体“最终解决方案”指令的群体。在俄罗斯境内，则需区分三类相对独立的体系：其一为真正的强制劳动营，囚犯享有相对自由且服刑期有限；其二为集中营，

⁹ 译者注：这是希特勒一项旨在大规模处决囚犯的秘密行动。

¹⁰ 译者注：斯堪的纳维亚人被视为纯种的雅利安人。

囚犯遭受残酷剥削且死亡率极高，但本质上以劳役为目的；其三为灭绝营，囚犯通过饥饿与疏于照料被系统性消灭。

集中营与灭绝营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囚犯们即便侥幸存活，也比死亡更彻底地与生者世界隔绝，因为恐怖催生人们的遗忘。在这里，杀人如同碾死一只蚊虫般冷酷无情。有人可能死于系统性酷刑或饥饿，也可能因营地超员而遭清算，这些多余的人就这样被无情地消灭了。反之，当新运送的人口短缺时，营地面临人口锐减的危机，此时便会下令不惜代价降低死亡率[134]。大卫·鲁塞尔在其关于德国集中营时期报告中题为命名为《死亡的重负》，这恰似死亡过程本身被赋予了永恒性，形成一种死亡与生命同样被彻底阻断的状态。

正是某种我们先前闻所未闻的根本恶的出现，终结了发展、转化人格特质的观念。此处既无政治标准，亦无历史标准，更非单纯的道德标准，按照我们以往的理解，这种事物本不该出现在政治领域，这种就是“全有”或“全无”的极端选择，“全有”意味着人类共同生活形态那种不可确定的无限可能，“全无”意味着集中营系统的胜利将为人类带来无可改变的厄运，正如同氢弹的运用对整个人类种族意味着的毁灭般。

不存在任何可与集中营的生活相类比的例子。其恐怖程度永远无法被想象力完全涵盖，因它游离于生死之外。它永远无法被完整记录，正因幸存者重返人间，使他完全无法相信自己曾经历过的苦难。这如同讲述另一个星球所发生故事，囚犯们在人间的存在状态，如同无人知晓其生死，仿佛他们从未降生于世。因此所有这些类比只会制造混乱，并分散人们对事情本质的注意力。监狱与流放地的强制劳役、流放、奴隶制，这些看似能提供有用的对比参照，但若仔细审视，则有无法得出什么结论。

作为惩罚的强制劳动在时间和强度上均有限制。罪犯对其身体仍保有权利；他不会遭受绝对的折磨，也不会被绝对地支配。流放只是将人从世界的某处驱逐到另一处，那里同样有人类居住；它并未将人彻底排除在人类世界之外。纵观历史，奴隶制始终是社会秩序中的制度性存在；奴隶不同于集中营囚徒，他们并未被隔绝于同胞的视线之外从而丧失保护；作为劳动力工具，他们具有明确的价码；作为财产，他们具有明确的价值。集中营囚徒却毫无价值可言，因其随时可被替换；无人知晓其归属，因其永远不为人所见。从正常社会角度看，他完全是多余的，尽管在劳动力极度短缺时期（如战争时期的俄罗斯和德国），他可能被用于强迫劳动。

集中营作为一种制度，其建立并非为了获取任何可能的劳动力收益；这些营地唯一的永久性经济功能，就是为其自身的监管机构提供资金；因此从经济角度看，集中营的存在主要为其自身而存在。在其他条件下，任何已完成的工作都本可更高

效、更低廉地完成[135]。尤其在俄罗斯集中营多被称为劳改营，因苏联官僚体系刻意赋予其此名号，最清晰地揭示了强制劳动并非核心问题；强制劳动实为全体俄罗斯劳动者的常态：他们丧失行动自由，随时可能被任意征召至任何地点劳动。这些暴行的荒谬性与其经济上的无用性紧密相连。纳粹将这种无用性推向反功利主义的极端：在战争期间，尽管建筑材料短缺，他们仍坚持建造集中营。为运送囚犯，他们建立了庞大而昂贵的灭绝工厂，并往返运输数百万人[136]。在严格功利主义的世界观中，这些行为与军事权宜之计之间明显有矛盾，这使得整个行动变得疯狂而虚幻。

这种由表面上的无目的性所营造的疯狂与虚幻氛围，才是真正遮蔽所有集中营形态、使其隐匿于世人视线之外的铁幕。从外部观察，这些集中营及其内部发生的种种，只能来自死后世界的意象来描述，即脱离尘世目的的存在。集中营恰如其分地可分为三类，对应西方关于死后世界的三大基本观念：冥界、炼狱与地狱。冥界对应那些相对温和的集中营形式，这些集中营曾流行于非极权国家，用于清除各类不受欢迎的群体：难民、无国籍者、反社会分子及失业者。难民营不过是为了那些多余且麻烦人群而设的场所。炼狱则体现在苏联的劳改营中，那里既存在疏于管理的状况，又伴随着混乱的强迫劳动。最接近原本字面意义的地狱，则是那些由纳粹建立的完善集中营，它们以施加痛苦折磨为最大目标，让囚犯们的整个生活都被彻底而系统地组织起来。

这三种类型有一个共同点：被隔绝其中的民众仿佛已不复存在，仿佛他们的遭遇已无人关心，仿佛他们早已死去，而某个发狂的恶灵正以将他们悬于生死之间片刻为乐，才肯让他们进入永恒的安息。

真正令人发指的并非带刺铁丝网，而是在那些被铁丝网围起来的人群中，精心构筑出一个虚幻世界。正是这种虚幻催生了骇人听闻的暴行，最终使灭绝手段显得理所当然。集中营里的一切行径，都如同出自病态而邪恶的幻想世界。难以理解的是，这些骇人罪行如同幻想般发生在虚幻世界，却又仿佛具象化为一个拥有完整感官现实数据的世界，只是缺失了因果与责任的结构，而没有这种结构，现实对我们而言终究只是难以理解的数据堆砌。结果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场所，在其中人们被施虐和屠戮，与此同时，无论是施虐者还是受虐者，或者是所有局外人，都未能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残酷的游戏或一场荒诞的梦[137]。

战后盟军在德国等地放映的影片清楚地表明，这种疯狂而虚幻的气氛无法通过纯粹的新闻报道来消除。对无偏见的观察者而言，这些影像的可信度无异于降神会上对神秘灵体拍下的快照[138]。面对布亨瓦尔德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有常理的人都会提出貌似合理的质疑：“这些人究竟犯了何等罪行，竟遭此等对待！”；

而在饥荒肆虐、人口过剩、仇恨弥漫的德国和奥地利，人们甚至会感叹：“他们不该停止毒气杀死犹太人了”；面对这种到处这种徒劳无益的宣传，许多人只是耸耸肩表示怀疑。

倘若说真相宣传因为内容过于穷凶极恶，而未能让普通民众信服的话，那么真正的危险则是那些通过自己想象力来了解能够做什么的人，是那些完全愿意相信自己所见者具有真实性的人。霎时间，人们再明显不过地看到，千百年来早已被人类想象力放逐到超出人类能力领域之外的事情，竟能在此尘世被制造出来，而且藉有最现代的破坏方法与疗法，人们还可以建立起地狱与炼狱，乃至它们持久的幻影。对这些人（他们在大城市的数量比我们所愿承认的程度还要多）而言，极权主义地狱不过证明了人类的力量比他们想象的更伟大，而且人类无需天崩地裂便能实现地狱般的幻想。

这些类比一再出现在许多垂死者世界的见证中[139]。它们似乎不仅仅是一种想要说出人类言说领域之外的绝望尝试。或许没有什么能像丧失末日审判信仰那样，如此彻底将现代大众与数百年前的大众截然区分开来：最恶劣者失去了恐惧，最优秀者失去了希望。由于无法不带着畏惧与希望生活，这些大众就被各种尝试所吸引，这些尝试看似是建造他们渴望的天堂和他们畏惧的地狱。正如马克思式无产阶级社会那广为人知的特征，与弥赛亚¹¹有着诡异的相似之处，集中营里的现实，也与中世纪地狱图景再相似不过了。

有一件事使人们能够忍受传统的地狱观，如今这种事情已无法再现，这就是末日审判：一种绝对正义标准与无限恩典可能相结合的观念。因为在人类认知中，没有任何罪行能与地狱永恒的折磨相称。由此常识陷入困境：这些人究竟犯了何等罪孽，竟要承受如此非人的苦难？由此亦可知受害者的绝对无辜：世人皆不配承受此劫。最终更暴露出集中营受害者在恐怖统治下的荒诞随意性：这种“惩罚”既能施加于任何人，亦能以同样的公正与不公降临于任何人。

比起最终形成的疯狂结局（集中营社会），人类为这一结局所做的准备过程，以及个体适应这些环境的方法，都显得清晰而合乎逻辑。大规模制造尸体的疯狂行径之前，是历史与政治层面可理解的活尸准备工作。推动这种前所未有状况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对此的默许，源于政治解体时期突如其来的事件：数十万人瞬间沦为无家可归、无国籍、被通缉的弃儿，同时数百万民众因失业沦为经济冗余和社会负担。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人权的缺失。这种从未在哲学上确立、仅被提出；

¹¹ 译者注：弥赛亚一词源于希伯来语，原意指受膏的先知、祭司、王和救世主，圣经中弥赛亚就是基督，现代语境下指的是带来希望、解救困境的领袖和救星。这里阿伦特有反讽的意味，马克思看似大救星但确是引发地狱图景的恶魔。

从未在政治上保障、仅被宣示的权利，在其传统形态下已丧失全部效力。

通往绝对统治之路的关键第一步，是消灭人身上的法律人格。这个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实现。一方面，通过将特定人群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再使用剥夺国籍的方式，迫使非极权主义世界承认无法无天；另一方面，将集中营置于常规惩戒体系之外，并通过绕开常规司法程序（即明确罪行对应可预见刑罚的程序）来筛选囚犯。基于其他缘故而进入集中营的罪犯，通常需服完刑期后才会被送入营地。在任何情况下，极权统治都会确保被关押者早已丧失正常行动或犯罪的能力，这些人包括犹太人、传染病患者、垂死阶级的代表等。宣传层面，这意味着“保护性监禁”被当作“预防性警方措施”来操作，也就是剥夺人行动能力的一种措施。在俄罗斯，偏离上述规则的现象，应归因于监狱的灾难性短缺，以及一种尚未实现的、将整个惩罚系统转化为集中营系统的欲望。

为了使运动的宣传有关集中营是为反社会分子所设置的主张听起来合情合理，有必要将罪犯也纳入其中[142]。这样罪犯本不该被关进集中营，完全是因为要消灭一个犯罪者的法律人格，要比消灭一个完全无辜者的法律人格更为困难。若将罪犯作为囚犯中的永久类别对待，这只是极权国家对社会偏见的妥协，此举最易使民众习惯集中营的存在。另一方面，为维持集中营体系的完整性，只要国内刑罚制度存在，就必须确保罪犯仅在刑满释放时，也就是他们实际获得自由之时，才被送入集中营。无论如何，集中营绝不能成为对特定罪行可量刑的惩罚场所。

此外，将罪犯与其他类别的囚犯混合关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所有新来者震惊地意识到自己已坠入社会最低层。他们无疑很快就会基于各种理由羡慕最底层的小偷和杀人犯；但与此同时，最底层也是个不错的起点。此外，这也是一种有效的伪装手段¹²：这种事只发生在罪犯身上，他们本该就收到此等处罚，仅此而已。

这些罪犯构成了集中营的精英阶层。（在战时德国，他们的领导地位被共产党人所取代，因为在罪犯管理阶层所创造的混乱条件下，连最基本的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这仅仅是暂时把集中营转变为强迫劳动营，属于持续时间有限的极端特例。）使罪犯占据领导地位的原因，与其说监管人员与犯罪分子之间有亲缘性（在苏联，监管人员显然不像党卫军那样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犯罪精英），不如说因为罪犯与某种明确活动相关联，才会被送进集中营。他们至少知道自己为何身处集中营，因而尚存一丝法律人格的残余。对政治犯而言，这种权利仅在主观层面成立；只要是真正行动，而不是意见或他人模糊的怀疑，或偶然从属于某个在政治上被取缔的团体，他们的行为通常无法被常规法律所涵盖¹³，也无法在法律上界定[145]。

¹² 译者注：伪装只是对外界而言。

¹³ 译者注：政治犯的定罪不取决与成文法的规定，而是取决于政府当局的命令。

在苏联和德国集中营初期混杂的政治犯与罪犯群体中，很早就加入了第三类人，他们很快构成了集中营囚犯的主体。这个最大的群体始终由这样的人组成：他们无论在自身意识中还是在集中营的认知体系里，都未曾犯下任何罪行。在 1938 年之后的德国，这些人以大批犹太人为代表；在苏联，则由任何因与自身行为无关的原因而招致当局不满的群体为代表。对于这些在任何意义上都无辜的群体，最适合进行剥夺公民权和摧毁法律人格的彻底实验，因此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他们都是集中营人口中最关键的类别。这一原则在毒气室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仅凭他们庞大的数量，就注定无法对个别囚犯实施迫害，只能用于群体性处决。以下对话概括了个人处境：“请问毒气室存在的目的何在？”，“那么你出生的目的又何在？”正是这完全无辜的第三类群体在集中营中过着最糟糕的生活。罪犯和政治犯会被同化为此类，他们进而被剥夺了那种源自他们所犯之事的保护性区分，从而完全暴露于专制暴政之下。在苏联最终目标已部分实现，而在纳粹恐怖统治末期清楚显现的最终目标，就是让整个集中营人口都由这类无辜者组成。

与选择囚犯时完全的任意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抵达时通常会被划分为若干类别，这些类别本身毫无意义，但在组织管理层面却颇具实用价值。在德国集中营中，囚犯被划分为罪犯、政治犯、反社会分子、宗教罪犯和犹太人，各自佩戴不同标识。西班牙内战后法国设立集中营时，立即效仿极权主义惯例，将政治犯与罪犯及无辜者（此处指无国籍者）混杂关押。尽管经验尚浅，法国人却在创造毫无意义的囚犯分类体系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147]。设计这一制度，起初只是用来防止囚犯之间发展出团结的意识，但它被证明格外有效，因为没有人能知道自己的类别究竟是比别人的好还是更糟。在德国，即使组织结构上过于迂腐，这种永久变动的机制事实上获得了一个坚固的外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犹太人都处于最低的类别。其骇人听闻又荒诞之处在于，囚徒们竟将自身认同于这些等级，仿佛它们代表着其法律人格最后的真实残存。即便忽略所有其他因素，我们会看到一位 1933 年的共产主义者从集中营出来时比进去时更坚信共产主义，一位犹太人更像犹太人，而在法国，一位外籍军团士兵的妻子，则更坚信外籍军团的价值，这些现象都不难理解。这些类别仿佛承诺着某种可预见的待遇残余，仿佛它们体现了某种最后的、最根本的法律身份认同。

虽然按类别对囚犯进行分类仅是战术性组织措施，但对受害者的任意挑选却揭示了该机构的核心原则。倘若集中营的存在依赖于政治敌人的存在，它们在极权政权初创阶段便难以存续。只需回顾 1936 年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数量，便可明白无辜者的存在对维持营区运转是何等重要。“若盖世太保在制定政策时仅考虑反对派原则，集中营早该消亡”[148]。1937 年末，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不足

千人，濒临消亡边缘，直至十一月大屠杀又带来了超过两万名新囚犯[149]，情况才有所改观。1938 年以后的德国，这种无辜者以数量庞大的犹太人为代表；在俄罗斯，则是由在某些与自身行为完全无关的缘由而蒙受耻辱的随机人群构成[150]。如果说德国是直到 1938 年，才建立起包含大量完全“无辜”囚犯的真正集中营的话，那么在俄罗斯，这种集中营可追溯至 1930 年代初期，当时绝大多数集中营人口仍由罪犯、反革命分子和“政治犯”（此处指分裂主义派系成员）构成。由于集中营中有如此多的无辜者，难以将他们归类，这些人曾与外国有过某种联系、是波兰裔俄罗斯人（尤其在 1936 至 1938 年间）、因经济原因遭村庄清算的农民、被流放的民族、复员的士兵来自的红军（他们恰巧隶属于驻扎海外时间过长的占领军团，或在德国沦为战俘等）。但对集中营体系而言，政治反对派的存在不过是个借口，即使在最骇人的恐怖统治下，民众或多或少自愿地协调行动，以及他们放弃政治权利的做法，使得该体系的目的也未能实现。这种任意挑选囚犯机制的目标在于摧毁全体民众的公民权利，使他们最终在本国沦为与无国籍者、无家可归者同样的法外之民。摧毁人的权利，扼杀其法律人格，是实现完全统治的先决条件。这不仅适用于早期实验对象，如罪犯、政治异见者、犹太人、同性恋者等特殊群体，更适用于极权国家中的每个居民。自由同意与自由反抗同样阻碍着绝对统治[151]。任意逮捕无辜者摧毁了自由同意的有效性，正如不同于死亡的酷刑摧毁了反抗的可能性。

对这种任意迫害进行限制，哪怕是最暴虐的限制，若将这种任意迫害局限于某些宗教或政治观点、某些知性或情欲的社会行为模式、某些新近编造的“罪行”，都将使集中营变得多余，因为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态度和观点能承受如此恐怖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它将催生一种新的正义体系，无论该系统是否具有稳定性，都必将在人身上塑造出新的法律人格，从而逃脱极权统治的掌控¹⁴纳粹所谓“人民利益”的不断变动（因今日之益明日即成害），以及苏联永无定数的党派路线，由于具有追溯效力，几乎每日都为集中营输送新的人群；它们才是集中营得以延续的唯一保障，也是人类持续遭受彻底剥夺权利的根源。

制造行尸走肉的下一个关键步骤，是扼杀人性中的道德人格。其主要手段在于首次使殉道成为历史绝响：“此地还有多少人相信抗议具有历史意义？”这种怀疑主义正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是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已败坏了人类所有团结意识。未来已在此刻陷入永远的黑夜。当见证者尽数消亡，便再无证言可言。当死亡不可避免时，抗争的举动便是赋予死亡意义的尝试，是超越自身死亡的行动。要使抗争

¹⁴ 译者注：一旦迫害的标准被定下来，就无法大规模抓捕无辜者送入集中营，所以纳粹和苏联不断变换意识形态和路线。

成功，这个举动必须具有社会意义，而我们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全都生活在绝对的孤独中¹⁵。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服的原因” [152]。

集中营与政治对手的谋杀，不过是有组织遗忘的一部分。这种遗忘不仅吞噬了言论与文字等公共舆论载体，更蔓延至受害者的亲友。悲痛与追忆皆被严禁。在苏联，当一位丈夫被捕后，他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以保全子女性命；若丈夫侥幸归来，她将愤然将其逐出家门。西方世界即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始终承认被杀害的敌人拥有被铭记的权利，这本是理所当然的承认，承认意味着我们皆为人（且仅仅为人）。正如阿基里斯曾参加赫克托尔葬礼一样，因为最专制的政权亦尊崇阵亡敌军，因为罗马人允许基督徒撰写殉道者名录，因为教会让异端者永存于世人记忆，人类文明才未至灭亡且永不灭亡。集中营通过使死亡本身变得无名（使人无法得知囚犯到底是死是活），剥夺了死亡作为圆满生命终点的意义。某种意义上，他们夺走了个体自身的死亡，证明从此他不再拥有任何东西，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亡仅仅印证了一个事实：他从未真正存在过¹⁶。

这场对道德人格的攻击，本可被人类的良知所抵御，但良知却告诫人们：宁可作为牺牲者死去，也不要活成谋杀的官僚。极权恐怖的终极胜利，在于它彻底切断了道德主体的个体逃生通道，使良知抉择沦为绝对的可疑与暧昧。当一个人面临谋杀他朋友时，他是选择承担照顾朋友妻儿的全部责任，还是当即杀戮他全家，他该如何抉择？抉择的两端已非善恶之分，而是谋杀与谋杀的抉择。当纳粹允许一位母亲选择杀害三个孩子中哪一个该被杀死时，谁又能解开希腊母亲的道德困境¹⁷[154]？

通过创造使良知不再存在的条件，且充分行善变得完全不可能，所有人在极权政权罪行中的有意识组织性共谋，被延伸至受害者身上，从而真正实现了全面性。党卫军通过让集中营囚犯（罪犯、政治犯、犹太人）承担大部分管理职责，将其卷入罪行。这迫使他们陷入绝望的两难境地：要么将同伴送上死亡之路，要么协助屠杀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扮演杀手的角色[155]。关键不仅在于仇恨被从那些真正有罪责的人身上转移了（承担管理职务的集中营囚犯比党卫军更遭人记恨），更在于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凶手与受害者之间的分界线，不断变得模糊[157]。

一旦道德人格被扼杀，那唯一能阻止人类沦为行尸走肉的东西，就是个体差异性及其独特身份。在某种僵化的形式中，这种个性可通过顽固的坚忍得以维持。诚

¹⁵ 译者注：当抗争属于群体时，才被赋予社会意义；而当集中营囚犯被彻底隔绝，抗争无法产生社会意义。

¹⁶ 译者注：极权主义要把一个人的存在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掉，在西方文化看来，这是何等狂妄的想法。

¹⁷ 译者注：纳粹看似给人选择，但这些选择都是恶的选择，因为任何选择都已经超出良知的范畴了。

然，许多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人们，至今仍每日躲藏于这种绝对孤立的状态中，他们属于一个既无权也无良知的共同人格。毋庸置疑，人类人格的这一部分，恰恰因为它本质上依赖于自然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是最难摧毁的¹⁸（而一旦被摧毁，又最容易修复）[157]。

对付人类个体独特性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在此一一列举。这些方法始于运送至集中营途中那令人发指的境遇，如数百人赤身裸体被塞进牲口车厢，彼此紧贴着，在乡间被来回推搡数日之久；抵达集中营后，精心设计的初始冲击仍在延续：剃光头发，穿上怪诞的囚服；最终则演变为精心设计的酷刑，这些折磨绝不致人于死地，至少不会迅速致死，其残忍程度超乎想象。所有这些手段的全部目标，就是要以痛苦的无限可能性来操控人的身体，乃至要操控它去毁灭人的人格，就像消除某些器质性精神疾病一样冷酷无情。

正是在此处，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性已经显露无遗。酷刑无疑是整个极权警察和司法机器的核心特征；它每日被用于逼供。此类酷刑因追求明确的理性目标而存在特定限制：囚犯要么在规定时间内供出，要么被处决。在纳粹最初的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地牢里，有另一种非理性的、虐待狂式的酷刑。这种酷刑主要由冲锋队实施，既无明确目标也缺乏系统性，完全取决于那些极度病态的施暴者的个人意愿。这种酷刑造成的死亡率之高，致使 1933 年入营的集中营囚犯中仅有极少数人熬过最初几年。此类酷刑似乎与其说是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不如说是政权对犯罪分子、变态份子的纵容（这些暴徒因此类酷刑获得对政权效忠的回报）。冲锋队盲目的兽性背后，往往潜藏着对所有社会地位、智力或体格优越者的深刻仇恨与怨恨。那些曾经比自己更强大的人，如今落在他们手里，就仿佛实现了他们最疯狂的梦想。这种怨恨在集中营中从未完全消失，它以人类能够理解的最后一种情感的面貌，震惊了我们[158]。

然而真正的恐怖始于党卫军接管集中营管理之时。昔日自发的野蛮行径让位于绝对冷酷而系统化的人体毁灭，其目的在于摧毁人的尊严；死亡被无限期地避免或延迟。集中营不再是人形野兽的游乐场，那些本该关进精神病院和监狱的疯子¹⁹，他们把这里变成了“训练场”，将完全正常的人训练为成熟党卫军成员[159]。

抹杀人类的个性，抹杀由平等的自然、意志与命运共同塑造的独特性，乃是所有人类关系中不言自明的前提。即便是完全相同的双胞胎也会引发某种不安；对这个个体的抹杀所产生的恐怖，远比司法政治主体的暴行与道德主体的绝望更令人

¹⁸译者注：阿伦特这里强调人格中的这部分比较难以摧毁，但在集中营也可被彻底粉碎，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大群无辜者毫无反抗地排队进入毒气室，体现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惊人的力量。

¹⁹译者注：疯子主要指那些心理变态，有虐待狂、性虐待倾向的党卫军军官。

窒息。正是这份恐怖催生了那些虚无主义的概括性论断，似乎颇具说服力地宣称本质上所有人类皆为野兽[160]。然而集中营的惨痛经历确实表明：人类确实可能沦为兽（human animals）样本，而人的本性之所以存在于人类，恰恰在于它为人类开启了成为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的可能性，即成为真正的人²⁰。

在道德人格被抹杀、法律人格被消灭之后，对个体性的毁灭几乎总是成功的。可以想象，某些群体心理规律为什么可以用来解释数百万人任人驱赶，毫无抵抗地走进毒气室，即使这些规律所揭示的不过就是个体性的毁灭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单独判处死刑的人很少试图与行刑的人同归于尽，也很少出现认真的反抗，甚至在解放时刻，都很少有人自发屠杀党卫军士兵的事件。因为摧毁个性即摧毁自发性，那是人类凭借自身资源开创新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用对环境与事件的反应来解释[161]。剩下的只是带着人脸的恐怖傀儡，它们全都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就算走向死亡也全都会可靠的做出完美反应，他们除了反应之外什么都不会做。这才是该体系真正的胜利：“党卫军的胜利在于，要求受折磨的受害者不作抗争地走向绞刑架，要求他彻底放弃自我认同直至消亡。而这一切绝非徒劳。党卫军士兵渴望看到他的崩溃，并非出于纯粹的虐待狂。他们深知，一个能在受害者走上断头台前彻底摧毁其意志的体系……才是将整个民族奴役于屈服之下的绝佳工具。没有什么比这些如木偶般走向死亡的人类队伍更令人毛骨悚然。目睹此景的人会暗自思忖：“他们竟沦落至此，主人手中必定隐藏着何等力量，”然后他会转身离开，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挫败感[162]。

倘若我们认真看待极权主义的野心，并拒绝被那些不过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常识性想法所误导，就会这样想：在集中营建立的垂死社会，乃是有可能彻底支配人类的唯一社会形态。那些渴望绝对统治者必须消灭一切自发性，正如个体存在本身必然滋生的自发性，必须一路追查其它各种最隐秘的形态，不管这些形式看似多么无害且与政治无关。巴甫洛夫的狗，被简化为最基本反应的人类标本。那些随时被消灭并被其他行为模式所替代的生物，正是极权国家的模范“公民”；而这样的公民在集中营之外，不可能被完美地制造出来²¹。

集中营的无用性，连同它们那被以犬儒的方式认可的反功利性，都不过是表象而已。实际上，它们对维系政权的必要性远超其他任何体制。如果没有集中营，没有它们引发的模糊恐惧，没有它们提供的极权统治训练（这种训练唯有在此能充分展现其最极端的可能性），极权国家既无法激发核武部队的狂热，也无法使整个民族陷入彻底麻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将迅速沉沦回“旧式资产阶级日常惯例”；在

²⁰ 译者注：有人性的人，才配得上称为人类；拥有人性，才让人类成为真正的人。

²¹ 译者注：只有集中营的环境才能造就出巴甫洛夫的狗和极权国家的模范公民。

初期“过激行为”后，他们终将屈服于遵循人类法律的日常生活；简言之，他们的发展方向恰如所有观察者凭常识所预言的那般。这些预言的悲剧性谬误都源自于一个仍然安全的世界，它们假定存在某种恒久不变的人性本质，将人性等同于历史，进而宣称绝对统治的理念不仅不人道，更缺乏现实基础。而今我们已知，人的力量如此强大，他确实能够成为自己所愿成为的模样²²。

极权政权的天性就是要求无限权力。唯有当所有人类毫无例外地在其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受到可靠控制时，这种权力才能确立。在外交领域，必须不断征服新的中立领土；而在国内，则需在不断扩大的集中营中掌控新的群体，或在形势需要时予以清除，为其他群体腾出空间。无论在外交还是内政领域，反对派问题都无关紧要。任何中立立场，甚至任何自发建立的友好关系，从极权统治的视角看，其危险性与公开敌对无异。正因自发性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它成为阻碍人类彻底臣服的最大障碍。那些被召唤或逃往莫斯科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员，都通过惨痛经历认识到：他们对苏联构成了威胁。在此意义上，忠实的共产党人（若此时还有可能存在的话）对于俄罗斯荒唐可笑程度和威胁程度，就如同罗姆派系的忠实分子之于纳粹一样。

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信念与观念之所以显得如此荒谬且危险，在于极权政权体制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无需依赖它们，也无需任何方式、任何人的帮助。只要人类超越动物式反应与功能式执行，就会被极权体制视为完全多余。极权主义追求的并非对人类的专制统治，而是构建让众人变得多余的体系。只有在一个充满条件反射、在毫无自主性的傀儡世界里，才能实现并维系绝对权力。正因人类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如此伟大，唯有将其降格为“人类物种”标本，方能彻底支配他。

因此个性会构成威胁，甚至连最不公平的法律规则也是障碍；而个体差异，任何区分人的特质，皆不可容忍的。唯有当所有的人类被同样地消灭，极权统治的理想才能实现。但这一切在集中营就可以实现，虽然未获得完全胜利，极权国家仍不断努力建立人的多余性：任意挑选不同群体投入集中营、持续清洗统治机构、实施大规模清算等手段。常识极力抗辩：民众本已顺从，如此庞大的恐怖机器实属多余。如果极权统治者能坦诚相告，他们会这样回答：这种机器在你们看来是多余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变得多余。

极权主义试图使人变得多余的尝试，反映出现代大众在拥挤不堪的地球上感受到的自身多余性。在垂死的世界里，人们通过一种与罪行毫无关联的惩罚方式、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剥削行为、一种不产生产品的劳动实践，被灌输着自身多余

²² 译者注：集中营彻底重塑了人的本质，生产了无数行尸走肉，体现了极权主义可怕的破坏力。

的观念，这个世界每日都在制造新的荒谬。然而在极权意识形态的框架下，一切都显得合乎逻辑：如果囚犯是害虫，那就该合情合理用毒气消灭；如果他们是堕落者，那就不允许他们污染民众；如果他们拥有“奴隶般的灵魂”（希姆莱语），那就不值得耗费精力进行再教育。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审视，集中营的麻烦总在于它们制造太多意义，而教条的执行也太过于彻底。

当极权政权如此坚决而犬儒地剥夺世间唯一符合常识功利期待的意义时，它们同时强加了一种“超感”（supersense），这就是意识形态假装找到历史钥匙或宇宙谜题的答案时，总是意指这种超感。超乎极权意识形态无意义之上、且备受尊崇者，乃是对荒唐的超感官意识形态的迷信。意识形态只有在不被严肃信奉时，才不过是无害、不批判且任意的观点。一旦其绝对有效性的主张被当成真的，它们便成为逻辑体系的核心，正如偏执狂的体系，只要首个前提成立，一切便随之合乎逻辑甚至必然地展开被接受。此类体系的荒谬之处不仅在于其最初的前提，更在于其构建过程所展现的逻辑性本身。在所有主义的奇特逻辑性中，在它们罔顾各种具体因素，对顽固奉献救赎价值的简单信任中，都包含着极权主义蔑视现实与事实的最初病原体²³。

由功利主义思维中训练出来的常识思维，面对意识形态的超感便束手无策，因为极权体制建立了无意义的、且运作良好的世界。意识形态对事实性的蔑视仍暗含着人类主宰世界的傲慢假设；毕竟，正是对现实的蔑视才使改变世界、造就人为的事物成为可能。摧毁极权主义对现实蔑视中的自负成分（因而使其与革命理论和态度截然不同）正是超感，它赋予这种蔑视以说服力、逻辑性和一致性的超意识。布尔什维克宣称现行俄罗斯制度优于一切制度，而使真正的极权手段从这种主张中产生的则是如下事实：极权统治者从这一主张中得到了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结论，若无此制度，人民便不可能建造地铁这般伟大的事物；由此他再推导出另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任何知晓巴黎地铁存在的人都是可疑分子，因为他可能诱使民众怀疑是否只有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才能达成此种壮举。这还会导出一个结论：为了继续保持布尔什维克忠诚，就必须摧毁巴黎地铁。除了逻辑一致性之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²⁴。

凭借这些新结构，依托超感的力量，并在逻辑性的驱动下，我们确实已步入资产阶级利润与权力的终结时代，帝国主义与扩张的终结时代。极权主义的侵略性并非源于对权力的渴求，即便它疯狂扩张，也并非为了扩张本身或谋取利益，而纯粹

²³ 译者注：极权主义者对某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崇拜，使这种意识形态获得某种神秘的超感，仿佛找到了历史与宇宙的终极法则，正如中共死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宇宙唯一真理一样。

²⁴ 译者注：极权主义者以蔑视事实的方式建立意识形态的超感，从一个意识形态观点出发，按照逻辑原则推导出其他结论。他们只关心逻辑的一致性，完全罔顾事实。

出于意识形态动机：使世界趋于一致，证明其至高理念的正确性。

为了实现这种超感，为了达到完全的逻辑一致性，极权主义有必要摧毁我们通常所称的人类尊严的一切痕迹。因为尊重人的尊严，就意味着承认我的同胞或我们同胞的民族是主体，承认为世界的创造者、或共同世界的共同建立者。任何企图解释过去所有历史事件并规划未来所有事件进程的意识形态，都无法承受源于人类创造性的不可预测性：人类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

因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并非改造外部世界或革命性地重塑社会，而是改造人性本身。集中营是测试人性改变的实验室，因此其可耻之处不仅关乎囚徒与那些按严格“科学”标准管理的人，更是全人类的关切。苦难，这世间本就过多的苦难，无论是痛苦还是受害者数量，都不是此处的关键所在。人性本身正面临考验，尽管这些实验看似未能改变人类，而是通过构建并彻底实现一个“人皆为狼”的虚无主义的平庸社会而毁灭了人类。但我们仍需记住：这一实验的必然限制是，它必须掌控全球，才有办法揭示出最终结果²⁵。

迄今为止，极权主义者宣称“万事皆有可能”的信念，似乎只证明了“万物皆可毁灭”。然而，在竭力证明万事皆有可能的过程中，极权政权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现：有些罪行既无法惩罚，也无法宽恕。当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它便蜕变为无法惩罚、不可宽恕的绝对邪恶，这种邪恶已无法用自私、贪婪、嫉妒、怨恨、权力欲望或懦弱等恶意动机来解释，因而愤怒无法复仇，仁爱无法包容，友情无法原谅。正如死亡工厂或遗忘深渊中的受害者在刽子手眼中已不是“人类”，这最种最新的罪犯物种已经超出了人类全部罪孽加起来的规模之外²⁶。

在我们整个哲学传统中，我们无法现象一种“根本的恶”，无论是基督教神学还是对于康德来说，皆是如此。基督教神学勉强承认魔鬼本身具有天使起源；而康德创立这一词，至少暗示了此类邪恶的存在，但却立即将其合理化为“扭曲的恶意”概念，认为可以用可理解的动机来解释它。因此，面对这个以压倒性现实冲击我们、摧毁所有既定标准的现象，我们实际上毫无退路可循。唯有一点似乎可辨：或许可以说，根本恶的出现，与一种让所有人都变得多余的系统有关。操控这一系统的人相信他们自身是多余的，亦认为其他人也是多余；而极权杀人犯们尤其危险，因其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也不在乎是否曾活过或从未诞生。死尸工厂与遗忘深渊的危险在于：当人口膨胀与流离失所问题遍及全球之际，如果我们仍以功利主义视角审视世界，便会有大量的人口不断变得多余。各地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事件，正与

²⁵ 译者注：极权主义者通过彻底改造人性而建立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虚无社会，集中营就是进行“社会实验”的理想场所。但若要把这种实验推广至全球，其实验结果永远无法得到。

²⁶ 译者注：“万事皆有可能”的信条铸就了万事皆可毁灭的现实，绝对的恶是这种毁灭现实中所有一切事实，它指向着把人变成行尸走肉的一切犯罪行为。

那些制造人类过剩的极权工具形成无声共谋。具有功利主义常识的民众都会洞悉这种隐含的诱惑，在多数国家，人们已绝望到无暇畏惧死亡。纳粹与布尔什维克们可以确信的是，那些解决人口过剩、经济冗余与社会无根人群最快捷方案就是灭绝工厂，这种方案既是警示也是诱惑。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很可能在极权政权垮台后以强烈诱惑的形式存续：每当政治、社会或经济苦难无法以符合人性的方式缓解时，这种诱惑便会卷土重来。

本章注释

- [1] 纳粹分子完全意识到夺取政权可能导致专制统治的建立。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并非为了陷入专制泥潭、重蹈覆辙而率先发起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维尔纳·贝斯特，《政治游戏》，第 20 页）此处表达的警示，正如无数其他场合所言，旨在反对国家的专制要求。
- [2] 托洛茨基的理论最初于 1905 年提出，其内容自然与所有列宁主义者的革命战略并无二致，在他们眼中，“俄罗斯本身不过是国际革命的首个阵地、第一道堡垒：其利益必须服从于战斗性社会主义的超国家战略。然而当时，俄罗斯疆域与社会主义胜利是重合的。克·德斯蒂尔，《斯大林：政治传记》，纽约与伦敦，1949 年，第 243 页）。
- [3] 1934 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颁布了新的党章，其中规定“应定期进行……清洗，以系统地净化党的队伍”。（引自 A. 阿夫托尔哈诺夫《党内社会分化与矛盾》，载于《苏联研究所通讯》，慕尼黑，1956 年 2 月），俄国革命初期的党内清洗，与后来将其扭曲为制造永久性动荡的极权工具毫无共同之处。最初的清洗由地方控制委员会在公开论坛上实施，党内党外成员均可自由参与。这些行动被设计为对抗官僚主义的民主监督机制，党内官僚腐败现象，“旨在替代真正的选举”（德意志，同上，第 233-234 页）。阿夫托尔哈诺夫近期发表的文章对清洗运动的发展历程作了精辟的简要考察，同时驳斥了“基洛夫遇刺引发新政策”的传说。全面清洗早在基洛夫遇害前就已启动，其死亡不过是“为清洗增添动力的便利借口”。鉴于基洛夫遇害案中诸多“难以解释且充满谜团”的细节，人们不禁怀疑这个“便利借口”实为斯大林精心策划并亲手实施。参见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讲话》，《纽约时报》，1956 年 6 月 5 日。
- [4] 德意志，同上，第 282 页，将托洛茨基“永久革命论”首次遭受攻击以及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反论，视为政治权谋中的偶然事件。1924 年，斯大林的“直接目的是诋毁托洛茨基的声誉。……在梳理托洛茨基的过往时，三人执政团发现了他在 1905 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正是在这场论战中，斯大林最终形成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公式。
- [5] 1934 年 6 月罗姆派系被清算前，曾出现过短暂的稳定期。年初时，柏林政治警察局长鲁道夫·迪尔斯曾报告称：冲锋队已不再实施非法（革命性）逮捕，此类旧案正在调查中。（《纳粹阴谋》，美国政府，华盛顿，1946 年，卷五，第

205 页) 1934 年 4 月, 纳粹老党员、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以“国家局势趋于稳定”为由, 颁布法令限制“保护性拘留”的实施(同上, 卷三, 555 页(参见《档案》1934 年 4 月刊, 第 31 页)然而该法令从未公布(《纳粹阴谋》第七卷, 第 1099 页; 第二卷, 第 259 页)。普鲁士政治警察曾于 1933 年为希特勒撰写关于冲锋队暴行的特别报告, 并建议起诉报告中列名的冲锋队领导人。

希特勒通过不经法律程序处决这些冲锋队领导人, 并开除所有反对冲锋队的警察来解决这一局面。(参见鲁道夫·迪尔斯的宣誓证词, 同上, 第五卷, 第 224 页。)通过这种方式, 他彻底规避了所有法律化与稳定化的风险。在众多热忱效忠“国家社会主义理念”的法学家中, 真正洞悉事态本质者寥寥无几。其中尤以特奥多尔·曼茨为代表其论文《整体即权利即警察》(汉堡, 1943 年)一书, 即便像保罗·维尔纳这样隶属于党卫军高级领袖团的作者也对其表示赞同。

- [6] 罗伯特·莱伊,《通往秩序之路》(无日期, 约 1936 年)。“特别版专供党领袖团使用……禁止自由销售。”
- [7] 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队》,载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组织与经济秩序》,国家出版,第 7 号。种族甄选原则的持续激进化贯穿于纳粹政策的各个阶段。因此, 首批被灭绝的是纯种犹太人, 随后是混血犹太人与四分之一血统犹太人; 或是先消灭精神病患者, 继而清除不治之症患者, 最终波及所有存在“不治之症患者”的家庭。“永不停歇的筛选”在党卫军内部同样毫不留情。1943 年 5 月 19 日颁布的元首法令规定: 凡与外国人存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或友谊关系的男性, 均须清除出国家、党、国防军及经济领域; 此令波及 1200 名党卫军领袖(参见胡佛图书馆档案馆, 希姆莱档案, 第 330 号文件夹)。
- [8] 众所周知, 在俄罗斯“随着国家局势趋于稳定, 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也随之加剧”(安东·西利加,《俄罗斯之谜》, 伦敦, 1940 年, 第 244 页)。德意志在《德文著作》第 218 页认为,“革命的自由主义精神”在当时消逝的原因在于, 胜利的迹象可从农民态度的转变中窥见: 他们越是确信地主和白军将领的势力已被摧毁, 就越坚决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考虑到 1930 年后恐怖统治的规模, 这种解释显得相当牵强。它还忽略了恐怖统治并非在二十年代全面爆发, 而是在三十年代, 当农民阶级的反抗已不再构成有效阻力时, 才真正肆虐开来。赫鲁晓夫同样指出“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斗争中, 并未对反对派采取极端镇压措施”, 但“对他们的镇压开始于”他们早已被击败之后的很久。

纳粹政权的恐怖统治在战争期间达到顶峰，当时德国民族实际上处于“团结”状态。其准备工作可追溯至 1936 年，那时所有有组织的国内抵抗力量已荡然无存，希姆莱提议扩建集中营。这种不顾抵抗的压迫精神，在希姆莱 1943 年于哈尔科夫对党卫军首脑的演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只有一项任务，……就是毫不留情地推进种族斗争……我们绝不会让致命且恐怖的声望这一杰出武器衰退，它在哈尔科夫战役是优先于我们的，虽已逐渐淡去，却将不断赋予它新的意义。（《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572 页）。

- [9] 参见西奥多·曼茨，同上著作，第 5 页及第 49 页。纳粹分子如何看待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与条例，这些法规由 W·霍赫定期以《希特勒内阁立法集》（柏林，1933 年起）为题出版，可从其宪法学家的一句随口之言窥见一斑。他认为尽管缺乏全面的新法律体系，但仍已发生“全面改革”（参见恩斯特·R·胡贝尔《德国警察》载于《全德社会科学杂志》第 101 卷，1940/1 年，第 273 页起）。
- [10] 同上著作，据我所知，曼茨是纳粹时期唯一一位提及这一情况并充分强调其重要性的作者。唯有通过查阅五卷本《法令、公告》（战争期间由马丁·博尔曼的指示下由办公室收集、印刷的）方能了解详情。据序言所述，这些卷册“仅供党内工作使用，须视为机密文件”。其中四册显然极为罕见，相比之下，霍赫收藏的希特勒内阁立法文集不过是门面功夫，文献现存于胡佛图书馆。
- [11] 这是元首 1933 年对法学家的“警告”，引自汉斯·弗兰克《国家社会主义主义者为新德国刑法制定的纲领》第二卷，1936 年，第 8 页。
- [12] 德斯泰尔，同上，第 381 页。此前曾于 1918 年和 1924 年尝试制定宪法。1944 年的宪法改革允许部分苏维埃共和国拥有自己的外交代表和军队，这是为了确保苏联在联合国获得更多投票权的战略部署。
- [13] 参见德斯泰尔，同上，第 375 页。仔细研读斯大林关于宪法的讲话（即 1936 年 11 月 25 日向苏维埃第八次特别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就会很明显发现该文件从一开始就并非旨在成为最终定稿。斯大林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宪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框架。因此新宪法草案既是既往历程的总和，也是现有成就的总和。换言之，宪法在颁布之日便已过时，仅具历史研究价值。莫洛托夫在宪法演讲中呼应斯大林观点并强调其临时性质，证明此非主观臆断：“我们仅实现了第一阶段，即基础阶段…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至今尚未完成；目前仅建立出其骨架结构。（参见《工人与农民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斯特拉斯堡普罗米修斯出版社，1937 年，第 42、84 页）
- [14] 德国宪政生活因此呈现出彻底的无形状态，与意大利形成鲜明对比（弗朗

茨·诺伊曼，《巨兽》，1942年，附录，第521页）。

- [15] 引自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判性考察》，纽约1939年版，第695页。
- [16] 斯蒂芬·H·罗伯茨，《希特勒建造的宫殿》，伦敦，1939年，第72页。
- [17] 罗伯特·H·杰克逊法官在纽伦堡审判的开场陈述中，始终基于“德国存在两个政府，即真实的与表面的（政府）”这一观点来描述纳粹德国的政治结构。德国共和国的形式曾一度得以维持，它构成表面可见的政府。但国家真正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掌握在纳粹党领导层手中”。（《纳粹阴谋》，第一卷，第125页）另见罗伯茨在《纳粹阴谋》第101页对政党与影子国家的区分：“希特勒显然倾向于扩大职能的重复设置”。

研究纳粹德国的学者普遍认为，该国政府仅具表面权威。唯一例外见于恩斯特·弗兰克尔的《双重国家》（纽约与伦敦，1941年），他主张“规范性国家与特权性国家”并存，二者作为“德意志帝国中相互竞争而非互补的组成部分”始终处于摩擦状态。弗伦克尔指出，规范性国家由纳粹维护以保障资本主义秩序和私有财产，在所有经济事务中拥有绝对权威；而党权特权国家则在所有政治事务中占据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 [18] 对于那些国家社会主义者无法用本国人占据的权力职位，他们就在党内组织中设立相应的影子职位，以此在现行体制旁建立起第二个国家……（康拉德·海登，《元首：希特勒的崛起》，波士顿，1944年，第616页）。
- [19] O. C. 吉尔斯，《盖世太保》，世界事务系列小册子第36号，1940年，描述了政党与国家部门之间持续重叠的现象。
- [20] 内政部长弗里克的一份备忘录对此现象进行了描述。希姆莱作为党卫军的领袖，理应拥有至高权力。参见《纽伦堡阴谋案》，卷三，第547页。关于此点，罗森堡在1942年与希姆莱讨论时的笔记尤为重要：罗森堡战前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却属于希姆莱核心圈内成员。如今他虽出任东部占领区帝国部长，却不断遭遇全权代表（多为党卫军成员）的“直接行动”，这些官员因其隶属帝国行政机构而无视其职权。参见同上，第四卷，第65页及后续。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遭遇如出一辙。仅有两例部长级官员未因晋升而丧失权力与威望：宣传部长戈培尔与内政部长希姆莱。关于希姆莱，我们掌握一份据推测写于1935年的备忘录，它揭示了纳粹党在规范党与国家关系时系统性的执着。这份显然源自希姆莱在希特勒核心圈的备忘录，被发现存于元首与盖世太保的帝国司法部往来信函中，备忘录警示称，若任命希姆莱为内政部国务秘书，他将“无法继续担任政治领袖”，并“与党派产生隔阂”。此处同样提

及规范党与国家关系的技术性原则：“党务官员不得服从于帝国部长（国家高级官员）”。（该无日期、无签名的备忘录题为《党务与国家事务》，存于胡佛图书馆档案库 P·维德曼文件夹中。）

- [21] 参见《1933 至 1943 年间帕里党罗森伯格外交部活动简报》，同上，第三卷，第 27 页及后续。
- [22] 依据 1942 年 8 月 12 日元首法令。参见《法令、指示与公告》德文版，编号 A54/42。
- [23] “表面政府背后存在着真正的政府”维克多·克拉夫琴科（《我选择了自由：一位苏联官员的个人生活》，纽约，1946 年，第 111 页）将此现象归因于“秘密警察体系”。
- [24] 参见亚瑟·罗森伯格《布尔什维克主义史》，伦敦，1934 年，第六章：“俄罗斯实际上存在着两座并行耸立的政治建筑：苏维埃的影子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政府。”
- [25] 德斯泰尔，同上，第 255-256 页，总结了斯大林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其担任总书记第一年人事部门工作的报告：去年工会地区领导人中仅有 27% 是党员。如今这一比例已达 57%。合作社管理层中的共产党员比例从 5% 提升至 50%；武装部队指挥系统中的共产党员比例从 16% 上升至 24%。斯大林称之为连接党与群众的“传动带”的所有其他机构中，都出现了同样的变化。
- [26] 亚瑟·罗森伯格，前引书，同上。
- [27] 曼茨，前引书，同上。
- [28] 作为法学家兼国家秘密警察上级，R. 霍恩教授曾如此阐述：“还有一件事，外国人乃至德国人不得不习惯的是：即秘密国家警察的任务…已经被一群源于该运动并始终扎根于其中的成员所接手，并且持续扎根其中。关于国家警察这一术语实际上并未承认这一事实，只能在此简要提及一下。（格罗尔夫·耶尔克伦《警察法报告》：德国法学院警察法委员会成立会议纪要，1936 年 10 月 11 日，汉堡。1937 年，弗兰克·希姆勒与霍恩合著）。
- [29] 例如，汉斯·弗兰克在 1939 年《在维也纳的讲话》中，以及 1941 年题为《德意志民族的命运》的演讲中，都曾试图划分各自的责任范围，以对抗“权威无序状态”。他宣称“法律保障并非自由政府体系的特权”，主张行政体系应继续遵循帝国法律，如今这些法律现已由国家社会主义党纲领所启迪和指引。正是出于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新法律秩序建立的意图，希特勒始终拒绝承认纳粹党纲领。对于提出此类建议的党员，他惯常以轻蔑的口吻评价，称其为“永远被过去束缚的人”，是“无法跨越自身阴影的人”（费利特·克斯特恩，《忠

诚与背叛》，汉堡）。

- [30] 32 个格勒特区……既不与行政区划或军事区划重合，也不符合党卫军的两个军区划分、党卫军的十个地区划分，或是希特勒青年团的 23 个区域划分……这些差异尤为显著，因为它们毫无存在理由（罗伯茨，同上，第 98 页）。
- [31] 该文件为纽伦堡文件集 PS 3063 号，现存于巴黎犹太文献中心。此乃最高党法院关于“1938 年 11 月 9 日反犹示威事件及相关党法院审判程序”的报告。根据警方及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最高法院得出结论：“帝国宣传部长的口头指示必然被所有党内领导人理解为：对外必须避免使党成为示威活动的煽动者，但实际上应组织并实施该活动对指挥层的重新审查表明……在夺权斗争中活跃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凡是党不愿以组织者身份露面的行动，其指令都不会明确到事无巨细。因此他习惯于理解：命令可能蕴含超出字面内容的深意，正如下令者为维护党之利益……往往不言明全部意图，仅暗示命令需达成的目标。由此，命令，例如，不仅是犹太人格林斯潘，而是整个犹太民族都该为党同志冯·拉斯之死负责，携带手枪每位冲锋队队员此刻都该明白自己的职责，这些话被若干中级领袖解读为：为复仇之血，犹太人的血必须流淌，冯·拉斯同志……。报告结尾尤为关键，最高党法庭在此公然为这些手段开脱：“在纪律执行过程中，是否允许故意模糊指令，即预判接收者将领会指令意图，这又是另一回事了，下令者与行动者绝不能沦为历史尘埃。此处同样存在着某些人，用希特勒的话说，他们是“无法跨越自身阴影”，执意要求立法措施，只因他们未能领悟：最高法则并非命令本身，而是元首的意志。此处，精英部队与党务机构的思维模式差异尤为显著。
- [32] 贝斯特（见注 31）如此阐释：“只要警察执行领导层的意志，其行为即属合法；若领导层的意志遭到违背，则并非警察整体，而是警察中的某个成员犯下了违法行为。”
- [33] 参见该书脚注 31。
- [34] 1933 年国会纵火案后，冲锋队领袖的权力甚至凌驾于党区领袖之上，他们同样拒绝服从戈林的命令。参见鲁道夫·迪尔斯在纳粹阴谋案中提交的宣誓证词，第五卷，第 224 页；迪尔斯时任戈林麾下的政治警察首脑。
- [35] 党卫军冲锋队显然对自身在纳粹体系中地位与权力的丧失心怀不满，并竭力维持表面威仪。在其刊物《冲锋队之声》中，诸多明示或暗示的迹象都揭示了他们与党卫队之间这场徒劳的竞争。更有趣的是，即便在 1936 年冲锋队已然失势之际，希特勒仍会在演讲中向他们保证：“你们的一切成就皆因我而存在；而我的存在，亦唯凭你们而立。”参见恩斯特·拜尔《冲锋队》柏林，1938

年，译自《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782 页。

- [36] 对比罗森堡 1941 年 6 月的演讲：“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任务将包括……将这些民族组织成特定类型的政治团体……并将其培养成对抗莫斯科的力量”，与《占领东区行政备忘录》（未注明日期）：“随着苏联战败解体，东部领土上已不存在任何政治实体，因此……当地居民亦无公民身份可言”（《主要战犯审判》，纽伦堡，1947 年，第二十六卷，第 616 页 与第 604 页）。
- [37] 《希特勒的密友》，波恩，1951 年，第 213 页。通常，希特勒所指的是某些对毫无顾忌地屠杀所有异己者心存疑虑的高级纳粹官员，他将这些人称为“人类垃圾”（参见第 248 页及后续内容，以及全书多处）。
- [38] 关于各种重叠的党内组织结构，参见《纳粹党等级与组织体系》（斯图加特，1947 年）及《纳粹阴谋》第一卷第 178 页，该文献将主要组织划分为四大类：1. 纳粹党基层组织，即该党掌权前已存在的基层单位；2. 纳粹党附属联合会，即经协调整合的各类社团；3. 纳粹党指导组织；4. 其他民族主义组织、民族主义组织。几乎每个类别中都存在不同的学生组织、妇女组织、教师组织和工人组织。
- [39] 这个由托德特领导、后来由阿尔伯特·斯佩尔接管的庞大公共组织，是希特勒在所有党内等级制度和派系关系之外建立的。该组织本可能被用来对抗党内甚至警察组织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斯佩尔竟敢在 1942 年的一次会议上向希特勒指出，在希姆莱统治下组织生产根本不可能实现，甚至要求获得对奴工和集中营的管辖权。详见《纳粹阴谋》第 1 卷，第 916-917 页。
- [40] 例如，像 NSKK（1930 年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汽车兵团）这样看似无害且无关紧要的组织，在 1933 年突然被提升为精英部队，与冲锋队和党卫队共享作为党内独立附属单位的特权。此举并未引发纳粹等级体系的后续动荡；回望历史，这更像是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虚张声势。
- [41] F. 贝克与 W. 戈丁，《俄罗斯大清洗与供词的提取》，1951 年，第 153 页。
- [42] 上述书第 159 页，根据多份报告，苏联警察机构呈现出令人震惊的扩张态势，尤其体现在地方和区域层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分支机构上。这些机构各自独立运作，其职能与地方及区域层面的党务代理人网络相互对应。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苏联境内的状况了解远不如对纳粹德国的了解，尤其在组织细节方面更是如此。
- [43] 据其前雇员证言（《纳粹阴谋》，第六卷，461 页），希姆莱曾下令“特别指示两人执行同一项任务”。
- [44] 在前述演讲（见脚注 29）中，汉斯·弗朗克表明他希望在某些方面稳定局势，

而他作为波兰总督期间的诸多抱怨恰恰证明当地缺乏对纳粹政策的理解，并刻意其反犹倾向的本质。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被征服的民族没有被剥削，而是被灭绝。在希特勒眼中，罗森堡在种族问题上不可靠，因为他打算在征服的东部领土上建立殖民地，并且不理解希特勒的人口政策旨在使这些领土人口减少。

[45] 关于将权力划分为“众多小王国，形成以元首为顶点的非法权力金字塔”的观点，出自罗伯特·H·杰克逊。参见《纳粹阴谋》第二卷，第1章。为避免建立此类权力结构，《纳粹阴谋》第十二章，第二卷，第116页。为避免此类体系的建立极权国家，希特勒早在1934年便颁布了以下党规：“我的元首”这一称谓仅限于元首本人。兹此禁止纳粹党所有下级领导人在口头或书面中允许他人称呼其为“我的帝国领袖”等称谓。正确称谓应为同志或州领袖等。详见《指令、指示、公告》（德文版），1934年8月20日法令。

[46] 参见《纳粹党的组织结构》。

[47] 参见《纳粹阴谋》第八卷图表14。

[48] 党内及精英部队的所有宣誓均以阿道夫·希特勒为对象。

[49] 希姆莱在此方向上的第一步举措发生于1944年秋季，他擅自下令将灭绝营中的毒气装置被解除武装后，屠杀才停止。这是他启动与西方列强和平谈判的方式。有趣的是，希特勒显然从未被告知这些准备工作；似乎无人敢告诉他，其最重要的战争目标之一已被放弃。参见乌拉·波利亚科夫《布尔什维克的战争》1951年版，第232页。

[50] 关于斯大林死后的事件，见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纽约的美国人》，纽约，1955年。

[51] 参见《纳粹阴谋》中对纳粹警察体系的精辟分析，第二卷，第250页起，尤其第256页。

[52] 参见上述书第252页。

[53] 弗朗茨·诺伊曼在《德国政治》一书第521页及后续章节中提出质疑：“德国能否被称为国家？”它更像一个帮派，其首领们在争执后总被迫达成一致。康拉德·海登关于纳粹德国的著作代表了“小集团统治”理论。关于希特勒周围小集团的形成，特雷弗-罗珀出版的《博尔曼书信集》颇具启发性。在医生审判案（美国第11号，卡尔·布兰特等人，1947年5月13日开庭）中，维克多·布拉克作证说，早在1933年，博尔曼就无疑是奉希特勒之命，开始组织一个凌驾于国家和政党之上的团体。

[54] 参见作者对德国罪责问题讨论的贡献：《组织化的罪责》，载于《犹太前沿》1945年1月刊。

- [55] 在 1939 年 11 月 23 日的演讲中，引自《主要战争罪犯审判记录》第 26 卷第 332 页。希姆莱 1944 年 3 月在波兹南市长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存于胡佛图书馆档案，希姆莱档案卷宗 332 号）表明，此番宣言绝非偶然引发的歇斯底里失常。其中写道：“我们能将何种价值置于历史的天平之上？我们民族自身的价值其次，我几乎要说，更为崇高的价值在于我们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非凡人格……这位两千年来首次降临日耳曼民族的伟大领袖。”
- [56] 希特勒对此问题的论述见于《希特勒的教义演讲》，第 253 页及后续内容。新元首须由“元老院”选举产生；选举元首的指导原则必须是：在选举程序进行期间，参与选举的各界人士不得进行任何讨论。在三个月内，武装部队、政党及所有公务员都将进行重组。宣誓就职时，他深知在选举帝国最高元首的过程中，执掌帝国的未必总是杰出的领袖人物。但这并不构成威胁，只要整体机制运转正常。
- [57] 希姆莱亲自制定的党卫军指导原则之一写道：“任何任务都不为其自身而存在。参见冈特·达伊肯《党卫军：历史、任务、组织结构》，载于《政治学院文集》，1939 年。
- [58] 参见大卫·J·达林与鲍里斯·I·尼古拉耶夫斯基合著的《1947 年俄罗斯的强制劳动》，该书还指出战争期间因动员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劳改营死亡率曾高达 40%。总体而言，他们估计劳改营工人产量仅为自由劳动者产量的 50% 以下。
- [59] 托马斯·雷维尔在《欧洲的战利品》（1941 年）中估计，德国在战争第一年就足以支付 1933 至 1939 年间全部的战争准备开支。
- [60] 威廉·埃本斯坦，《纳粹国家》，第 257 页。
- [61] 上述书第 270 页。
- [62] 这一观点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在战争爆发当日便颁布了屠杀所有不治之症患者的法令，但更具说服力的是希特勒在战争期间的言论，戈培尔在《希特勒的演讲集》（路易斯·P·洛克纳编，1948 年）中引述了希特勒的表述，称“战争使我们得以解决一系列原本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希特勒日记》（路易斯·P·洛克纳编，1948 年），其中称“战争使我们得以解决一系列在和平时期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并强调无论战争结果如何，“犹太人必定是输家”（第 314 页）。
- [63] 当然，国防军曾多次试图向各党派机构阐明，在完全无视军事、民用及经济必要性的情况下发布命令的战争行为所蕴含的危险（参见波利亚科夫，同上著作，第 321 页）。但即便许多纳粹高层官员也难以理解这种对战时客观经济

与军事因素的漠视。他们不得不反复被告知“解决犹太问题时，经济考量原则上应不予考虑”（《纳粹阴谋》第六卷第 402 页），却仍抱怨波兰大型建筑工程的中断“若非数千犹太劳工被驱逐，本不会发生”。现在已下令将犹太人撤离军备项目。我希望这个命令能尽快撤销，否则局势将更加恶化。”这位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期望，与他后来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实施更合理军事政策的预想一样落空。他的抱怨颇具深意（见《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902 页及其后续内容），因为他唯一恐惧的正是这种反功利主义的纳粹战争政策的一个方面。“一旦我们赢得战争，那么就别管我都无所谓，把波兰人、乌克兰人以及所有其他乱窜的家伙都剁成肉馅……”

[64] 最初，集中营仅部署了党卫军特别部队：死亡敢死队。后来由武装党卫军师团接替。自 1944 年起，正规武装部队的单位也开始参与，但通常编入武装党卫军序列。（参见新甘梅集中营前党卫军官员的宣誓证词，载于《纳粹阴谋》第七卷第 211 页。）国防军在集中营中的实际存在感，已在奥德·南森的集中营日记《日复一日》（伦敦，1949 年）中有所描述。遗憾的是，该日记揭示这些正规军士兵的暴行程度至少与党卫军相当。

[65] 德斯泰尔，同上，第 326 页。此引文具有分量，因为它出自斯大林最宽容的非共产主义传记作者之手。

[66] 纳粹分子尤其热衷于以千年为单位进行计算。希姆莱宣称党卫军成员只关注“其重要性以数十年乃至数世纪为单位衡量的意识形态问题”，并声称他们“效忠的事业两千年来仅出现一次”，这些论调在党卫军总部的全部思想灌输材料中反复出现，仅有细微差异。至于布尔什维克版本，最佳参考当属斯大林早在 1928 年莫斯科党代会上制定的共产国际纲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对苏联的评价：“它是世界运动的根基，国际革命的中心，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力量。在苏联，世界无产阶级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国家……”（引自 W. H. 张柏林，《征服世界的蓝图》，1946，该纲领在第三共产国际逐字复印下来）。

[67] 此官方座右铭变更可参见《纳粹党组织手册》第 7 页。

[68] 参见海登，同上著作，第 722 页。希特勒在 1937 年 11 月 23 日于松特霍芬军官学校向未来政治领袖发表的演讲中宣称：不是“可笑的微小部落、渺小的国家、城邦或王朝……唯有种族才能成为世界征服者”。然而，至少在意识层面，我们仍需成为这样的种族”（见《希特勒文集》第 445 页）与这一绝非偶然的措辞完全契合的是 1941 年 8 月 9 日的一项法令，希特勒在其中禁止继续使用“日耳曼种族”一词，因为这将导致“牺牲种族理念本身，转而奉行单纯的民族原则”，这将摧毁我们整个种族与民族政策的重要概念基础

（参见《希特勒文集》，安纳德利安出版社，公告卷）。显然，德国种族的概念将阻碍对德意志民族内部不良部分进行渐进式“筛选”与灭绝，而这正是当时为未来所规划的行动。

[69] 希姆莱因此“很快就在各国组建了日耳曼民族的党卫军”，他对他们宣称：“我们不指望你们出于机会主义而成为德国人。但我们确实要求你们将本民族的理想服从于更宏大的种族与历史理想，服从于日耳曼帝国”（海登，同上）。其未来使命是通过“最繁盛的繁衍”形成“种族上层阶级”，在二十至三十年内“向整个欧洲展示其统治阶层”（希姆莱 1943 年在波兹南党卫军少将会议上的讲话，《纳粹阴谋》卷四，558 页注释）。

[70] 希姆莱，同上，第 572 页。

[71] 德斯泰尔，德文原著中描述斯大林对所有心理暗流的非凡敏感性……他自诩为这些暗流的代言人（第 292 页）。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名称本身，对疲惫的一代人而言，如同不祥的警钟斯大林直接诉诸于许多布尔什维克心中根深蒂固的风险恐惧与不确定性”（第 291 页）。

[72] 因此，希特勒在开始灭绝犹太人之后，仍能理直气壮地使用“体面的犹太人”这一惯用套话，具体而言，是在 1941 年 12 月的《餐桌谈话》第 346 页中。

[73] 因此，希特勒在 1937 年 11 月向总参谋部成员（布隆贝格、弗里奇、雷德尔）及高级文官（纽拉赫、戈林）发表讲话时，竟能公然宣称自己需要“人口稀少的空间”，并驳斥征服异族人民的构想。而这种主张必然导致灭绝这些民族的政策，显然未被在场任何听众察觉。

[74] 这始于 1944 年 7 月的一项命令，该命令将党卫军提升为纳粹党内的独立组织；并通过 1945 年 8 月的一项绝密法令完成，该法令宣布党卫军特种部队、骷髅敢死队、冲锋队，它们既不隶属于军队也不隶属于警察；骷髅敢死队需“执行特殊警察性质的任务”，而冲锋队则是“为党卫军提供后勤保障的武装力量”。既不隶属军队也不隶属警察系统；骷髅敢死队需“执行特殊警察性质任务”，而冲锋队则是“一支完全由我支配的武装部队”（《纳粹党章》卷三，第 459 页）。1939 年 10 月及 1940 年 4 月的两项后续法令确立了所有党卫军成员在一般事务上的特殊管辖权（同上，卷二，第 184 页）。自此，党卫军内部办公室印发的所有小册子均标注“仅供警察使用”、“不得公开”、“专供领导及意识形态教育负责人阅览”等字样。值得编纂一份纳粹时期印制的庞大秘密文献目录，其中包含大量立法措施。耐人寻味的是，此类文献中竟未见任何冲锋队手册，这或许是最确凿的证据，它证明 1934 年后冲锋队已不再是精英部队。

- [75] 参见弗朗茨·博尔克瑙，《新共产国际》，载《德意志月刊》，柏林，1949年第4期。
- [76] 实例过于明显且数不胜数，难以逐一列举。然而，这种策略不应简单等同于所有希特勒与斯大林传记作者所记载的、作为其性格突出特征的极度不忠实与不诚实。
- [77] 参见1939年1月外交部致驻外德国当局的通函，载于《纳粹阴谋》第六卷第87页及后续页码。
- [78] 1940年，纳粹政府颁布法令，将从危害帝国的高级叛国罪到针对德国领导人的恶意诽谤等罪行纳粹党及其同伙在所有德国占领区都应受到报复性惩罚，无论其罪行是由德国人还是当地人实施的。参见吉尔斯，同上著作。关于纳粹“饥饿政策”在波兰和乌克兰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参见特里乌尔，同上著作，第26卷和第29卷。
- [79] 此术语出自克拉夫琴科，同上，第303页，他在描述1936-1937年大清洗后俄罗斯状况时指出：“倘若外国征服者接管了苏联生活的机器，这场变革几乎不可能更彻底、更残酷……”。
- [80] 希特勒在战争期间曾考虑引入《国民健康法案》：经过全国X光检查后，元首将获得一份病患名单，特别是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者。依据新颁布的《帝国健康法》……这些家庭将不得继续留在公众之中，且不得再被允许生育子女。这些家庭的处置方式将将由元首后续命令裁定。无需太多想象便可知，猜猜看：后续的命令本该是什么。那些不再被允许“留在公众之中”的人数，本会构成德国人口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德国人口的相当一部分（《纳粹阴谋》，第六卷，第175页）。
- [81] 俄罗斯在四年战争中的死亡总人数估计在1200万至2100万之间。斯大林仅在乌克兰一地就于一年内消灭了约800万人（估计）。参见《共产主义在行动》。美国政府，华盛顿，1946年，众议院文件第754号，第140-141页。与纳粹政权对受害者人数有相当精确的记录不同，俄罗斯体制下被杀害的数百万人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然而苏瓦林在同上，第669页引用的以下估算具有一定可信度，因其源自直接接触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档案信息的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据此数据，苏联1937年人口普查显示实际人口仅1.45亿，远低于苏联统计学家预期的1.71亿。这意味着人口损失达2600万，且该数字尚未包含前述伤亡数据。
- [82] 德斯泰尔，同上，第256页。
- [83] B. 苏瓦林，同上，第605页，引述斯大林在恐怖统治高峰期所言：1937年：

“你们必须认识到，在世界上所有珍贵的资产中，最珍贵、最关键的是干部。”所有报告都表明，在苏维埃俄罗斯，秘密警察必须被视为党的真正精英力量。这种警察性质的特征在于：自二十年代初起，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并非自愿招募”，而是从党内队伍中选拔。此外，“内务人民委员部不能作为职业选择”（参见贝克与戈丁，同上，第160页）。

[84] 引自海登，同上，第311页。

[85] 根据上次会议的报告，希特勒在得知党卫军部队已不可再信任后决定自杀。参见H·R·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最后日子》，1947年，第116页。

[86] 希特勒经常论及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并始终强调首要地位的“不是国家，而是种族，即“团结的民族共同体”（参见前引演讲，该演讲作为《提斯德格演讲》附录重印）。在1935年纽伦堡党代会的演讲中，他对此理论作了最精辟的阐述：“不是国家指挥我们，而是我们指挥国家。”显然，这种指挥权力的行使，唯有在党的机构保持独立于国家机构的前提下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86a] 奥托·高韦勒，《帝国党卫队领袖与德国警察首脑的特殊地位》，1939年，明确指出希姆莱作为帝国党卫队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的特殊地位，根植于警察行政体系实现了“党与国家的真正统一”，这种统一在政府其他部门甚至从未被尝试过。

[87] 据称在二十年代俄国农民起义期间，伏罗希洛夫拒绝红军支援；此举导致国家政治保卫局惩罚部队的组建。参见希利加，同上著作，第95页。

[88] 1935年，盖世太保海外特工经费达2000万马克，而国防军常规情报机构仅有800万马克预算。参见皮埃尔·德希洛特《盖世太保》，普里西出版社，1940年，第11页。

[89] 参见《纳粹阴谋》第四卷第616页译文。

[90] 参看注解62。

[91] 莫里斯·拉波特在《巴黎警察史》（巴黎，1935年）中，将挑衅手段恰当地称为秘密警察的“基石”（第19页）。

在苏联俄罗斯，挑衅行为远非秘密警察的秘密武器，而是该政权广泛宣传的公开手段，用于探测公众舆论的动向。民众对恐怖统治中周期性出现的“自由派”间歇期所发出的批评或回应邀请不为所动，恰恰表明这类姿态已被视为大规模挑衅。挑衅行为确实已成为极权主义版本的民意调查。

[92]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纳粹政府官员曾试图削减盖世太保的职权范围和人员编制，理由是国家已完成纳粹化改造。正因如此，希姆莱，这位恰恰希望在此刻（约1934年）扩张秘密机构的头目，不得不夸大来自“内部敌人”的威胁。

参见《纳粹阴谋》第二卷第 259 页；第五卷第 205 页；第三卷，547 页。

- [93] 参见加利耶-布瓦西埃，《法国秘密警察的奥秘》，1938 年，第 234 页。
- [94] 1880 年俄国秘密警察机构“御前密探”的成立，终究并非偶然地开启了俄国革命活动空前高涨的时期。为证明自身价值，该机构时而不得不策划暗杀行动，其特工们“在不知不觉中竟成了他们所告发者的思想仆从”，无论传单由警察特工散布，还是部长遇刺由阿泽夫策划，结果并无二致”（M. 拉波特，同上著，第 25 页）。更关键的是，重大处决似乎皆出自警方之手，斯托雷平与普列维皆是如此。决定性的在于革命传统在于，在平静时期，警察特工必须“重新激发革命者的能量，刺激他们的热情”（同上，第 71 页）。另见伯特兰·D·沃尔夫《造就革命的三巨头：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1948 年），该书将此现象称为“警察社会主义”。
- [95] 后来成为波兰总督的汉斯·弗兰克，曾对“危害国家者”与“敌视国家者”作出典型区分。前者指一种客观属性，既不取决于意志与行动；纳粹不仅关心敌意行动，更关心“所有企图，无论其目的为何，若其后果危及国家”。参见第 420-430 页。译文引自《纳粹阴谋》，第四卷，第 88 页起。据曼茨在《国家安全法》第 44 页所述：“通过清除危险分子，安全措施旨在抵御对民族共同体的威胁，无论这些人员是否曾实施具体罪行。”（此乃）防范客观危险之举。
- [96] 纳粹法学家、党卫军成员 R·霍恩在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撰写的悼词中如是说，此人在统治捷克斯洛伐克前，曾是希姆莱最亲密的同谋之一：他视反对者“非为个体，而是危害国家的思想载体；故其已超出民族共同体的容忍范围。”引自 1942 年 6 月 6 日《国防军报》，转引自 E·科恩布兰斯莱德，《独裁与政治警察》，伦敦，1945 年。
- [97] 早在 1941 年，希特勒总部的一次参谋会议上就有人提议对波兰民众实施那些为犹太人准备的、通往灭绝营的规制：若姓名源自德语则强制改名；对德国人与波兰人通婚判处死刑；强制佩戴类似犹太人黄星的 P 字徽章。参见《纳粹阴谋》第八卷第 237 页及汉斯·弗兰克日记（见前引文献第三卷第 683 页）。自然，波兰人很快开始担忧：当纳粹完成对犹太人的灭绝后，自己将遭遇何种命运（《纳粹阴谋》第四卷，916 页）。关于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计划，参见注释 80。
- [98] 贝克与戈丁在同上著作第 17 页提及苏联境内引发逮捕的“客观特征”，其中包括曾任职于国家保安部的经历（第 153 页）。对于前秘密警察成员而言，要使其主观上认识到逮捕与认罪的客观必然性最为容易。一位前内务人民委员

部特工如是说：“我的上级充分了解我和我的工作。既然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要求我供认这些罪行，他们必定有充分理由。作为忠诚的苏联公民，我的职责就是不隐瞒被要求供认的内容”（同上，第 231 页）。

[99] 众所周知，在法国，大臣们始终生活在对警方秘密“档案”的恐惧之中。关于沙皇俄国的状况，参见拉波特著作第 22-23 页：“最终，俄国秘密警察将掌握远超正规当局的权力。俄国秘密警察只会向沙皇汇报其选择的内容。

[100] 与作为国中之国的俄国秘密警察局不同，国家政治保卫局是苏联政府的一个部门；其活动独立性大大降低（罗杰·N·鲍德温，“政治警察”词条，载于《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101] 关于“嫌犯”概念的典型例证，可见于 C·波比耶-多诺斯特采夫在《俄国专制政体：政治回忆录、官方通信及档案文件……1881-1894》一书中的记载（巴黎，1927 年）：当反对派雇佣犹太律师时，有人请求奥赫拉纳的谢列维金将军为即将败诉的女士出面干预。将军答道：“当晚我便下令逮捕这个可恶的犹太人，将其作为所谓‘政治嫌疑犯’拘押。”毕竟，我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朋友和一个卑鄙的犹太人吗？他今天或许无辜，但昨天曾有罪，明天也可能有罪。

[102] 莫斯科审判中的指控“基于……对可能事态发展的荒诞扭曲的预判。（斯大林）的逻辑推演或许如下：他们可能趁危机之际图谋篡位，我便指控他们图谋不轨，政府更迭可能削弱俄罗斯的战斗能力；若他们得逞，或许被迫与希特勒签订停战协议，甚至同意割让领土我将指控他们早已与德国缔结了背信弃义的同盟。”这是伊·德斯泰尔对莫斯科审判的精辟阐释，见《莫斯科审判》一书第 377 页。

纳粹对潜在罪行的诠释可参见汉斯·弗兰克的著作（见前引文献）：“所谓‘危害国家’的企图清单永远无法完整列举，因为根本无法预见未来何时会出现危及领导层与人民的行径。”（引文见《纳粹罪行》第四卷，88 页）

[103] 秘密警察的犯罪手段当然并非法国传统所独有。例如在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时期令人畏惧的政治警察，便是由卡尼茨从所谓“贞洁专员”的骨干中组建而成，这些专员昔日靠勒索为生。详见莫里茨·贝曼《玛丽亚·特蕾莎与约瑟夫二世：维也纳-莱比锡，1881 年》。此处引文得益于罗贝尔·皮克的推荐。约瑟夫二世》，维也纳-莱比锡，1881 年。此文献引自罗贝尔·皮克。

[104] 这个庞大的警察机构由奴役劳动的利润供养是确凿无疑的；令人惊讶的是，警察预算甚至未能完全由其覆盖；克拉夫琴科在其著作中提及内务人民委员

部对那些继续在自由中生活和工作的定罪公民征收的特别税。

[105] 参见弗里茨·蒂森《我付钱给希特勒了》，伦敦，1941年。

[106] 参见《纳粹阴谋》第一卷，第916-917页，党卫军的经济活动被整合至经济与行政事务中央办公室。党卫军向财政部及税务局申报其财务资产时，均标注为“党派财产，专款专用”。（引自1943年5月5日信函，摘自M.沃尔夫森《纳粹组织内部文件》，1947年12月）

[107] 参见科恩公-布拉斯特迪，同上著作，第112页。若我们注意到此类募捐活动始终由驻地当地的党卫军单位组织实施，勒索动机在此显露无遗。参见党卫军总部财务局（无日期）发布的《党卫军财务条例》，第14页。

[108] 同上，第114页。——在此方面，针对营地维护及党卫军个人需求的相关要求作出了某些妥协。参见沃尔森，同上，1941年9月19日奥斯瓦尔德·波尔（经济管理署长）致帝国物价管制专员的信函。集中营内的所有这些经济活动似乎仅在战争期间且在严重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下才得以发展。

[109] 希姆莱1945年10月19-13日的演讲，见波兹南审讯记录军事审判。纽伦堡，1945-46年，第29卷，第146页。

[110] 贝克·布拉特（前苏联教授笔名）得以研究北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这些文件明确显示，1937年6月大清洗达到顶峰时，政府要求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特定比例的居民该各省比例不一，在最不忠诚的地区达到5%。整个苏联的平均比例约为3%。摘自戴维·J·达林1949年1月8日发表于《新领袖》的报道。贝克与戈丁同上，第239页，得出一个略有差异且相当合理的假设，即逮捕行动按以下方式策划：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几乎覆盖了全体居民，每个人都被归入特定类别。因此每个城镇都有统计数据，显示当地居住着多少前白军成员、反对党派成员等。所有收集到的指控材料并汇集囚犯供词的内容也被记录在档案中，每人的档案卡上都标注着其危险等级，这取决于档案中可疑或罪证材料的数量。虽然统计数据被重新整理以解决失业问题，但众所周知，这些劳改营的产量远低于普通苏联劳动力，甚至难以支付警察机构的开支。由于人们相互举报的现象日益普遍，当局随时可能发动清洗行动，且对各类人员的确切数量了如指掌。

[111] 鲍德温，同上。

[112] 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门与党卫军冲锋队同样处于斯大林的“个人支配”之下，正如后者完全听命于希特勒。两者即便在战时被征召入伍，仍受特殊司法管辖。希姆莱接管党卫军重组时，首先制定的便是将党卫军与普通民众隔离的特殊“婚姻法”，这是最根本的规章制度。早在希姆莱颁布婚姻法之前的1927

年,党卫军就曾通过官方法令被要求“不得参与会员大会的讨论”(杜威格达)。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也有类似的报道,他们刻意保持距离,尤其避免与党内其他贵族阶层的成员来往(贝克与戈丁,前引书,第163页)。

[113] 典型的例子是警察马林诺夫斯基辉煌的职业生涯,他最终成为议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副手。参见伯尔林·D·沃尔夫《俄国革命史》第31章。

[114] 引自弗拉基米尔·哈诺夫,同上 著作。

[115] 见《月之暗面》,纽约,1947。

[116] 见拉波特,同上,第39页。

[117] 贝克与戈丁,同上,第234,127页。

[118] 见《纳粹阴谋》,第七卷,第84页及注释。

[119] 见《月之暗面》。

[120] 党卫军内部几乎没有秘密。最大的秘密是集中营里的行径。即便盖世太保的成员也未经特别许可不得进入若无特别许可不得进入集中营(欧根·科贡,《党卫军法庭》,慕尼黑,1946年,第297页)。

[121] 贝克与戈丁,同上,第169页,记载了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如何“极尽谨慎之能事,绝不泄露任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密”。

[122] 以下对话颇具代表性,出自《月之暗面》的报道:“当有人承认曾离开过波兰,下一个问题必然是:‘你为谁当间谍?’……有位男士反问:‘但你们也有外国访客啊。’‘难道你以为他们全是间谍?’……回答是:‘你觉得呢?难道你以为我们天真到对此浑然不觉?’”

[123] 大卫·鲁塞尔,《奥森·金特洛姆》,纽约,1947年。

[124] 纳粹分子深知,他们实施暴行的行动始终被一堵难以置信的保护墙所环绕。一份关于1943年屠杀5000名犹太人的秘密报告明确向罗森堡陈述:“试想若这些事件被对方知晓并加以利用。此类宣传很可能毫无效果,因为听闻者与读者根本不会相信这些内容”(《纳粹阴谋》,第一卷,第1001页)。

[125] 在《人类历史》中,希特勒多次提到人类“生来就处于一种状态,即每个人都深知自己为维护物种存续而生而死”(第349页)。参见上文第347页:“一只雌蜂产下数百万卵,其中所有卵都将死亡。唯有我们的雄蜂得以存续。”

[126] 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最佳报告有:大卫·鲁塞尔《死亡之屋》(巴黎,1947年);欧根·科贡,同上著作;布鲁诺·贝特海姆《论达豪与布痕瓦尔德》(1938年5月至1939年4月),载于《纳粹阴谋》第七卷,第824页。关于苏联集中营,可参阅波兰幸存者撰写的优秀报告集《月之暗面》,以及戴维·J·达林的著作(同上),尽管其报告有时缺乏说服力,因其引述对象多为“显赫人

士”。另参见戴维·J·达林前引著作，但其报告因引述“知名人士”证词而时有说服力不足之处。那些执意起草宣言和起诉书的人物。

[127] 《月之暗面》，导言同样强调了这种奇特的沟通缺失：“他们阅读却不交流。”

[128] 参见布鲁诺·贝特海姆，前引书，“我似乎确信这些可怕而屈辱的经历并非发生在‘我’这个主体身上，而是发生在‘我’这个客体身上。其他囚犯的陈述印证了这种体验……仿佛我只是旁观者，对发生的一切仅有模糊的参与感……‘这不可能是真的，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囚犯们不得不说服自己，这一切是真实的，正在发生，而非一场噩梦。他们从未完全成功。另见鲁塞尔，同上，第 213 页。“……亲眼未见者难以置信。你自己来此之前，是否认真对待过毒气室的传闻？”“没有”，我回答道。“……你看？他们全都和你一样。巴黎、伦敦、纽约的那些人，甚至在比克瑙，就在焚尸炉外……临被送进焚尸炉地窖前五分钟……依然难以置信……”

[129] 最早洞悉此理的是鲁塞尔在其 1947 年著作《集中营纪事》中。

[130] 见大卫·鲁塞特，第 587 页。

[131] 参见乔治·巴塔耶在《批判》杂志 1948 年 1 月刊第 72 页的论述。

[132] 鲁塞尔的著作中充斥着诸多此类关于人类“本性”的“洞见”，其核心论点在于：经过一段时间后，囚犯的心理状态几乎与看守营的守卫们毫无二致。

[133] 为避免误解，或许有必要补充说明：随着氢弹的发明，整个战争问题又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变。当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超出本书的主题范围。

[134] 此事发生于 1942 年末的德国。希姆莱随即下令所有集中营指挥官“不惜一切代价降低死亡率”。因为事实证明，在 13.6 万名新收容者中，有 7 万人抵达营地时已死亡或抵达后立即死亡。参见《纳粹阴谋》第四卷附件 11。后来苏联集中营的报告一致证实，1949 年之后，即斯大林在世时期，集中营死亡率（此前曾高达囚犯总数的 60%）被系统性降低，推测原因在于苏联普遍存在严重劳动力短缺。这种生活条件的改善不应与斯大林死后政权危机相混淆，但颇具象征意义的是，该危机首先在集中营中显现。参见威廉·施塔林格《苏联权力的边界》，维尔茨堡，1955 年。

[135] 参见科贡。同上著作。第 58 页：集中营中完成的工作成果毫无价值。要么纯属虚构，要么计划得如此糟糕，这活儿得干上两三遍才行。阿布·贝勒海姆在上述引文第 83-132 页中写道：“新来的囚犯尤其被迫做些荒唐的劳动他们感到人格被贬损宁愿干更累的活儿，只要能做出点有用的东西……”。就连达林，这位在整部著作中都坚持认为俄罗斯劳改营旨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劳改营劳动力的低效性，见前引文 105 页。当前关于俄国劳改营

体系作为廉价劳动力供给经济措施的论调，若近期关于大规模逃亡及集中营关闭的报道属实，则将遭到彻底驳斥。因为倘若集中营曾发挥过重要的经济功能，纳粹政权绝不可能在不引发整个经济体系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允许其迅速瓦解。

[136] 除纳粹运往灭绝营的数百万人外，他们还不断尝试新的殖民计划：将德国本土或被占领土的德国人向东迁移以实现殖民目的。这当然严重阻碍了军事行动和经济掠夺。关于这些议题的诸多讨论，以及纳粹在东部占领区文职体系与党卫军体系间的持续冲突，可参阅《主要战争罪犯审判记录》第二十九卷（纽伦堡，1947 年）。

[137] 贝勒海姆，同上引文，指出，在营地中，士兵们对氛围的态度与囚犯们自身截然不同。

[138] 所有集中营的照片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展现的是营地被盟军部队攻入时的最后状态。德国本土根本不存在死亡集中营，且当时所有灭绝设备早已被拆除。另一方面，真正引发盟军公愤并成为影片特殊恐怖元素的，即人类“活体”的景象，这在德国境内绝非典型现象。集中营的灭绝行动主要通过毒气而非饥饿手段实施。集中营状况是最后一个月内集中营运作的结果：希姆莱曾下令疏散所有东部的灭绝营，导致德国境内的集中营严重超员，他已无力确保德国境内的食物供应。

[139] 鲁塞尔强调集中营里的生活简直就是一场被拖延的死亡过程，《人类时代》，平装本。

[140] 曼茨在其著作第 50 页中强调，绝不应将罪犯送往劳改营服完其原判刑期。

[141] 在俄罗斯，监狱的拥挤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在 1925-26 年间，所有法院判决中仅有 36%得以执行。参见达林，同上著作，第 58 页及后续。

[142] 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始终高度重视在集中营中实施分类管理。在任何集中营中，囚犯都未曾被严格划分为单一类别（科贡，同上，第 19 页）。

在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将政治犯与普通罪犯混监也是惯例。在苏维埃政权的前十年间，左翼政治团体享有相当大的特权；直到二十年代末极权体制完全确立后，政治犯才被正式视为“低于普通罪犯”（达林，第 177 页）。

[143] 卢梭的著作存在一个缺陷，即他高估了德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力，这些人在战争期间主导了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内部管理。

[144] 例如，布伯-诺伊曼夫人（德国共产党人海因里希·诺伊曼的前妻）的证词便可佐证，她曾历经苏联与德国的集中营折磨：“俄国人从未……显露出纳粹那种施虐的本性。我们的俄国看守都是正直的人，并非虐待狂，但他们忠实

地执行了这个非人制度的要求。”（《两个独裁者》）

[145] 布鲁诺·贝特海姆在《异常与社会心理学杂志》1943年第36卷第4期发表的《极端情境中的行为》一文中，将罪犯与政治犯的自尊水平与未犯罪者进行了对比，发现后者“最难以承受最初的冲击”，最先瓦解。贝特海姆将此归咎于他们的中产阶级出身。

[146] 鲁塞尔，同上，第71页。

[147] 关于法国集中营状况，参见阿瑟·科特勒《地球上的渣滓》，1941年。

[148] 科贡，同上，第6页。

[149] 见《纳粹阴谋》，第五卷，800页。

[150] 雷克与戈丁在著作中明确指出：“反对者仅占（俄罗斯）监狱人口的相对小部分”（第87页），且“个人监禁与任何罪行之间毫无关联”（第95页）。

[151] 布鲁诺·贝特海姆在《达豪与布亨瓦尔德》一书中，谈及多数囚犯“与盖世太保的价值观达成和解”时强调“这并非宣传的结果……盖世太保本就坚持要阻止他们表达真实感受”（第834-835页）。

希姆莱明确禁止在集中营内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教育在于纪律，绝非基于意识形态的任何教导。引自《关于党卫军与警察的组织与义务》，载于《国防军政治培训课程》，1937年。引自《纳粹阴谋》，第四卷，第616页及后续。

[152] 鲁塞尔，同上，第464页。

[153] 参见谢尔盖·马拉霍夫在达林著作中的报告，同上，第20页。

[154] 参见阿尔贝·加缪《一年两次》，1947年。

[155] 鲁塞尔著作（同上）主要由囚犯们对这一困境的讨论构成。

[156] 贝特海姆在其著作中描述了看守与囚犯如何逐渐适应集中营生活，并畏惧重返外界的过程。因此，鲁塞尔坚持认为真相是“受害者与行刑者同样卑劣；集中营的教训是卑贱者的兄弟情谊”（第588页）。

[157] 贝特海姆在前引著作中描述道，新囚犯们“似乎最关切的是保持人格完整”，而老囚犯的问题则是“如何在集中营里尽可能地活下去”。

[158] 鲁塞尔，同上引文，第390页记载一名党卫军士兵训斥教授如下：“你曾经是个教授。现在你什么都不是。你不再是大人物了。现在你不过是个小矮子，矮得不能再矮。现在我才是大人物。”

[159] 科贡，同上引文，第6页提及维持营地的可能性，这是党卫军的训练与实验基地。他还详细描述了早期由冲锋队管理的集中营与后期由党卫军接管的集中营之间的差异：“这些早期集中营的囚犯人数从未超过千人……营内生活惨不忍睹。少数幸存老囚均证实，冲锋队成员几乎施尽了所有虐待狂的变态

行径。但这些皆属个人兽行，尚未形成覆盖大批囚犯的系统性冷酷暴行。这种暴行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党卫军的成就（第 71 页）。

这个新机制尽可能减轻了人的责任感。当每天要处决数百名俄国战俘时，屠杀是通过射击一个孔洞完成的，行刑者根本看不到受害者。（参见恩斯特·费德尔《论恐惧心理：论恐惧》，载于《科学》杂志，布鲁塞尔，1946 年。）另一方面，正常男性却被人为诱发心理变态。鲁克引述一名党卫军看守的供述：“通常我会持续杀戮直至射精。我在布雷斯劳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我曾经完全正常。他们把我变成了这样。现在当他们给我放假离开这里时，我不回家。我不敢直面我妻子的脸”（第 273 页）。希特勒时期的文件中包含大量证词，证明当时的普通民众确实参与了执行希特勒灭绝计划的任务。相关资料可参见约翰·波利尔所著《反犹太主义的武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55 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三世界评论》中收录了大量此类案例。参与此类行动的部队成员大多并非自愿者，而是从普通警察队伍中征召而来执行这些特殊任务。但就连党卫军军官也认为这种任务比前线作战更令人难以承受。在描述党卫军大规模处决的报告中，目击者盛赞这支部队如此“理想主义”，竟能“在无需酒精助兴的情况下完成全部灭绝任务”。

在“灭绝行动”期间，为消除一切个人动机与激情，将残酷行径降至最低，有一组负责操作毒气装置的医生和工程师持续改进设备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些改进不仅旨在提高尸体处理效率，更旨在减轻死亡痛苦。

[160] 这种现象在鲁塞尔的作品中尤为突出。“集中营中的社会生存条件，已将绝大多数囚徒转化为堕落的暴民，完全屈从于动物本能的反射。无论德国人还是被驱逐者，无论其先前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如何，他们皆如此”，第 183 页。

[161] 在此背景下，集中营中自杀现象的惊人罕见性亦值得关注。自杀事件在遣送前及遣送途中远比在营区内更为常见，这固然部分源于当局竭力阻止自杀行为（毕竟自杀属于自发性行为）。根据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统计资料（《纳粹阴谋》，第四卷，1100 页及后续）的统计资料表明，自杀致死案例仅占总死亡人数的 0.5% 左右，且年均自杀数常不足两例，即便在同年总死亡人数达 16,560 人的情况下亦是如此。苏联集中营的报告同样记载了此现象。参见：斯塔林格，同上著作，第 57 页。

[162] 鲁塞尔，同上，第 525 页。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恐怖主义： 一种全新的政体

前几章我们已反复强调，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更为严酷，而且极权主义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如专制、暴政和独裁，在本质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无论它在何处掌权，都会建立全新的政治体制，摧毁该国所有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无论其意识形态源于何种特定的民族传统或精神根基，极权政府总将阶级转化为群众，用群众运动取代政党体系（而非通过一党专政）；将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至警察系统；并公开制定以支配全世界为目标的外交政策。当前极权政府均源于一党制体系；当这些政权真正走向极权时，便开始遵循一套与其他体系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运作，以致我们传统的法律、道德或常识性功利主义范畴皆无法再帮助我们适应、评判或预测它们的行动路线。

如果追溯历史并分析我们通常所称的本世纪危机的政治含义，真能从中找到极权主义的各种元素，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得出如下结论：这场危机绝非来自外部的威胁，也绝非德国或俄罗斯某种侵略性外交政策的产物；它不会因斯大林之死而消失，正如它不会因纳粹德国的覆灭而消失。甚至可能，唯有当极权主义成为历史尘埃时，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困境才会显现其真实形态，尽管未必是最残酷的形态。

在这样的思考脉络中，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源于危机、同时又是危机最清晰且唯一明确征兆的极权政府，是否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的安排？它是否只是从众所周知的暴政、专制和独裁的政治武器库中，借用了威慑手段、组织方式和暴力工具？专制和独裁统治的著名政治武器库中，其存在仅归因于传统政治力量，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共和派或君主派、威权主义者或民主派，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极权主义掌权后都遭到了可悲却或许偶然的失败？抑或恰恰相反，存在着某种名为极权主义“本质”这样的东西，即极权政府是否具有自身本质，能否像西方思想自古希腊哲学时代以来所认知和界定的其他政体那样可以比较和下定义呢？若真是如此，那么这种全新且前所未有的极权组织形式与行动轨迹，必然植根于人类共同生活并参与公共事务时所经历的少数基本经验之一。倘若存在某种基本经验在政治层面体现为极权统治，那么鉴于极权政体的新颖性，这必定会是一种基于不知何种缘由从未成为政治共同体基础的经验。就算它的普遍基调或许在其他方面有点让人觉得熟悉，但这种基调绝对从未渗透到公共事务中，也从未指导公共事务的处理。

若从思想史角度审视，这种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人类所经历的政体形态极为有限：它们在早期就被发现，由希腊人归类，并展现出非凡的持久性。尽管政府形态存在诸多变体，其基本思想从柏拉图至康德的两千五百年间始终未变。若将这一发现加以运用，我们便会立即倾向于将极权主义解读为某种现代暴政形式，即权力由一人掌控的无法无天之政府。我们整个传统中暴政的标志性特色是：一方面，任

意权力不受法律约束，为统治者利益服务，与被统治者利益相悖。另一方面，恐惧成为行动准则，即统治者畏惧民众，民众畏惧统治者。

与其说极权政府是史无前例的，不如说它彻底颠覆了政治哲学中所有关于政府本质的定义所依据的根本对立，即合法政府与非法政府、专制权力与合法权力的对立。在合法政府与合法权力，以及非法状态与专制权力，二者本属一体不可分割，这点从未被质疑。然而极权统治向我们展示了截然不同的政府形态。诚然，它藐视一切成文法²⁷甚至极端到违背自身制定的法律（1936年苏联宪法，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或对未废除的法律置若罔闻（如魏玛宪法，纳粹政府从未废止）。但其运作既非脱离法律指引，亦非恣意妄为，因其宣称严格且明确地遵循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极权主义所有成文法皆被认为源于这两个原则。

极权统治提出了一个荒谬却看似无可辩驳的主张：极权政府远非不守法，而是通达了威权之源，那正是成文法获得合法性之处；极权政府也远非独断，反而比任何政府都更服从于这些超人类的力量；同时极权政府远非为某个人谋取利益而行使权力，而是完全准备牺牲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以执行它所认定的历史法则（law of History）或自然法则（law of Nature）。它蔑视成文法，宣称自己具有更高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源于法源本身，因而能摒弃琐碎的法律条文。极权主义的合法性谎称自己已找到了在人间建立正义统治的途径，而成文法的合法性则永远无法达成这种道路。合法性与正义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弥合，因为成文法将其自身权威来源（统治整个宇宙的自然法则，揭示在人类历史的神圣律法，抑或承载全人类情感共鸣的习俗传统）转化为对错标准，这些标准必然具有普遍性的，必须适用于无数不可预见的情况，如此一来，每个具体个案及其不可逆转的特殊情境，终究能从成文法的规制中游离而出²⁸。

极权主义的合法性，既蔑视法律又假装在人间建立正义的直接统治，执行着历史法或自然法，却不将其转化为规范个人行为的善恶标准。它直接将法则施加于人类，毫不顾及人的行为。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若得以正确执行，终将孕育人类作为其终极产物；而所有极权政府宣称全球统治权的背后，正是这种期待。极权政策宣称要将人类转化为某种积极而可靠的法则载体，否则人类只能消极且不情愿地臣服于这种法则。若说极权国家与文明世界的纽带确因极权政权的骇人罪行而断裂，那么同样确凿的是：这种罪行并非源于简单的侵略性、冷酷无情、战争与背叛，而是有意识地打破“法理共识”的行为；根据西塞罗（罗马共和国晚期哲学家）所言，

²⁷ 译者注：成文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根据法定程序制定、颁布，以文字条文表现的规范性文件，其特点具备明确性、体系性和最高权威性。

²⁸ 译者注：成文法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弥合正义性与合法性的鸿沟，而极权主义政府避开这个鸿沟，谎称寻求更高层次的合法性。

正是“法理共识”构建起一个“民族”的本质，而这种共识在现代国际法中更构成了文明世界的根基，即便在战争状态下它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道德审判与法律惩罚皆以此共识为前提；罪犯唯有因他参与了法理共识，才能获得公正的审判；甚至上帝启示的律法，也唯有在众人倾听并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在人间发挥作用²⁹。

此时，极权主义与其他所有法律概念之间的根本差异便显现出来。极权主义政策并非用一套法律取代另一套法律，不建立自己的法理共识，不通过一次革命创造新的合法性形式。它对所有法律，甚至自身成文法的蔑视，暗示着它自认为无需任何法理共识即可运作，却又不甘屈从于暴政状态下的无法无天、专横跋扈与恐惧统治。它能摆脱法理共识的束缚，因为它承诺将法律的实现从人类一切行为与意志中解放出来；它承诺实现人间正义，因其宣称要使人本身成为法律的化身³⁰。

这种将人与法律等同的观点，看似消解了自古以来困扰法律思想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之间的矛盾，却与自然之光或良知之声毫无关联。自然或神性被视为权威的源泉，无论是自然法则还是上帝历代启示的诫命，都应在人自身中彰显其权威。这种权威并没有使人成为法律的活的化身，相反，它始终与人保持着分离，要求自身同意与服从的权威。自然或神性作为成文法的权威源泉被视为恒久永存；成文法虽随情境变迁而变化，但相较于人类瞬息万变的行动仍具相对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源自于其权威源泉的永恒性。因此成文法首要功能在于为人类永不停息的运动提供稳定的基石。

在极权主义的诠释中，所有法律都已成为运动的法则。当纳粹谈论自然法则，或当布尔什维克谈论历史法则时，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都已不再是凡人行为的稳定权威源泉；它们本身就是运动。纳粹将种族法奉为人类自然法则的体现，其根基在于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不过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且这种发展未必止步于现存的人类物种；正如布尔什维克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规律的体现，其根基正是马克思的社会观，这种观点把社会视为巨型历史运动的产物，遵循自身运动规律奔向历史终点，届时它将自我消亡。

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与达尔文的自然主义方法之间的差异常被指出，这通常是拜马克思所赐。这使我们忽略了马克思对达尔文理论所怀有的巨大而积极的兴趣；恩格斯认为，对马克思学术成就的最高赞誉莫过于称他为“历史界的达尔文”[1]。若考察二人思想的本质而非具体成就，便会发现历史运动与自然运动终究同出一源。达尔文将发展概念引入自然界，坚持至少在生物领域，自然运动并非循环往复

²⁹ 译者注：“法理共识”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但极权政权否认这种共识，声称从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寻求其执政的合法性。

³⁰ 译者注：极权政权声称自身的合法性就是正义性的来源，民众需支持它的政权才能获得人间正义。

而是单向线性，它朝着无限进步的方向前进。这意味着自然界本质上始终处于发展状态，正如人类社会始终处于进步之中。被历史洪流裹挟，自然生命被视为具有历史性的。“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同样是历史法则，种族主义者同样能将其奉为主臬，正如马克思关于最进步阶级生存法则的论断。反观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作为历史驱动力，不过是人类社会进步性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其根源在于人的“劳动力”。马克思认为，劳动并非历史产物，而是自然生物学意义上的力量，这种劳动观认为通过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得以释放，这种代谢既维系个体生命，又实现物种繁衍[2]。恩格斯深刻洞察到二人基本信念的内在关联，因为他理解“发展”概念在两套理论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上世纪中叶发生的巨大思想变革，在于拒绝以“现状”视角看待或接受任何事物，而坚持将万物视为某种进一步发展的阶段。这种发展的驱动力究竟被称为自然还是历史，其实相对次要。在这些思想体系中，“规律”一词本身也发生了意义转变：它不再指代人类行为与运动得以发生的稳定框架，而成为运动本身的表征³¹。

极权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配方，揭示出上述运动发展过程根本不会有终点，也就揭穿了这些运动的真实面目。如果消除一切有害和不适于生存的事物是自然法则，那么当无法发现新的有害和不适于生存的事物时，自然本身也将走向终结；如果说在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消亡”实为历史法则，那么当原始新阶级还未能成型的时候，就反而在极权统治者手中轮流“消亡”，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本身的终结。换言之，极权运动夺取并行使权力的杀戮法则，即便它们成功将全人类置于统治之下，仍将作为运动法则永存。

我们把合法政府理解为这样一种政治实体：在其中，成文法需要将不可改变的自然法或上帝永恒诫命转化为是非标准。唯有通过这些标准，即各国成文法体系，自然法或上帝诫命才能获得政治现实性。在极权政府的政治体制中，成文法的地位被全面恐怖所取代，其目的在于将历史或自然运动的法则转化为现实。正如成文法虽界定违法行为却独立于它们（任何社会中犯罪的缺失并非使法律多余，反而昭示其最完美的统治）；同样地，极权统治中的恐怖亦非仅为镇压反对派的手段（尽管它也用于此目的）。当恐怖脱离一切反对力量而独立存在时，它就成为全面恐怖；当无人能阻挡其脚步时，它也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政府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构成了极权统治的精髓。

恐怖是运动规律的实现；其首要目标是让自然或历史的力量得以自由穿行于人类之中，不受任何自发的人类行为阻碍。因此，恐怖旨在“稳定”人类，以释放

³¹ 译者注：极权意识形态认为自然或历史发展并不需要稳定的框架，而是强调运动的永恒性。唯有不断运动，才能将自然和历史推到更高的阶段。

自然或历史的力量。正是这种运动甄别出人类的敌人，并向其释放恐怖。任何反对或同情的自由行动都不得干涉对历史或自然的“客观敌人”，即对特定阶级或种族的清除。有罪与无罪成为无意义的概念；凡阻碍自然或历史进程者即为“有罪”，而这进程早已对“劣等种族”、“垂死阶级与衰败民族”作出审判。恐怖执行这些判决，在其法庭上所有相关者皆属主观无罪：被害者无辜，因为他们未曾反抗体制；而凶手无辜，因为他们并未进行真的进行谋杀，只是执行某种更高于法庭宣布的死亡判决。统治者们并不自诩公正或睿智，只声称在执行历史或自然法则；他们并非适用法律，而是遵循运动内在规律推动进程。如果法律是某种超人力量（自然或历史）运动的法则，那么恐怖即为合法性。

作为运动法则的执行者，恐怖的终极目标并非人类福祉或个人利益，而是人类的重塑，执行该法则这意味着为物种存续消灭个体，为整体利益牺牲局部利益。自然或历史的超人力量自有其起点与终点，因此唯有每个个体生命所代表的新起点与终结，方能阻碍其运行。

宪政政府中的成文法旨在为人类社群筑起边界，开辟沟通渠道，因为这个社群时刻面临新生者的威胁。每一次诞生都孕育着新的开端，潜藏着新世界的可能。法律的稳定性与人类事务的永恒运动相呼应，只要生老病死持续，这种运动就永无终结。法律既围困每个新生起点，又保障其运动自由，这种保障完全新颖且有不可预测的潜在性。成文法的边界之于人的政治存在，正如记忆之于其历史存在：它们确保共同世界的预存性（pre-existence），确证某种超越各代个体生命周期的连续现实性，吸纳所有新的起源并受其滋养。

全面恐怖之所以会被这样轻易误认为暴政统治的先兆，是因为极权政府在最初阶段必定表现得如同暴政，会摧毁人定法律的边界。但极权恐怖不会留下任意妄为不守法的痕迹，其暴虐并非出自于某种独断的意志，亦非为一人凌驾众生的专制权力，更非为了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它用铁链代替个体间的边界与沟通渠道，将人们捆绑得如此紧密，仿佛人类已消融于一个巨人的躯体之中。废除人与人之间法律的藩篱，正如暴政剥夺人的自由一样，这种做法将摧毁作为鲜活政治现实的自由；因为法律所围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正是自由的生存空间。全面恐怖统治沿用着暴政的古老手段，却同时摧毁了暴政遗留的、充满恐惧与猜疑的无法无天、无边无际的荒原。这片荒原固然不再是生机勃勃的自由空间，却仍为它的居民提供了某种空间，让他们得以展开受恐惧驱使的行动、受猜疑支配的行动。

通过将人们相互挤压在一起，极权恐怖摧毁了他们之间的空间；与铁链之中的境况相比，甚至连暴政的荒漠（只要它仍算某种空间）也仿佛成了自由的保障。极权统治不仅剥夺自由权利，或取消基本自由；而且至少就我们有限的认知而言，它

也未能从人心深处根除对自由的热爱。它摧毁的乃是所有自由的根本前提，而自由就是一种没有空间就无法存在的运动能力。

极权统治的本质在于全面恐怖，既非为人类而存在，亦对抗对人类。其存在旨在为自然或历史的力量提供无与伦比的加速器。这种遵循自身规律的运动，长远来看无法被阻挠；最终其力量必将证明，远比人类行动与意志所催生的最强力量更为强大。但这种运动可以被延缓，且几乎必然地被延缓，而延缓它的正是人类自由。这种自由连极权统治者都无法否认，尽管他们可能认为它无关紧要且任意妄为，但这种自由本质上等同于人类不断诞生的事实。正因如此，每个新生命都是新的开端，某种意义上重新开启了世界。但从极权主义视角看，人的生与死不过是干扰更高力量的烦扰。因此，恐怖作为自然或历史运动的忠实奴仆，必须从进程中清除的不仅是具体意义上的自由，更是自由的根源，而这种根源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存在于世，存在于人创造新开端的能力之中。恐怖的铁链摧毁了人的多样性，并用众人制造出单一之人（the One），他将永恒地以自身为历史或自然进程的组成部分行事。这种机制不仅释放了历史与自然的力量，更将其加速至自然状态下永不可能达到的速度。从实际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恐怖立即执行了自然对“不适于生存”的种族或个体，以及历史对“垂死阶级”所作的死刑判决，无需等待自然或历史自身更缓慢、更低效的进程。

在这个概念中，当政府本质本身已转化为运动时，政治思想中一个古老的问题似乎找到了与先前所指出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之间矛盾相似的解决方案。倘若将政府本质定义为合法性，如果人们已经明白法律是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量（正如自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援引边界之神宙斯以来，法律始终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那么接着出现的是政治共同体的运动及其公民行动的问题。合法性为行为设立了限制，但却不激发行为；自由社会中法律的伟大之处，亦是其困境所在，因为它们仅告诫人不可为之事，却从不指明当为之举。政治共同体的必然运动本质上永远无法被发现，仅因这种本质自柏拉图以来始终以永恒性为视角被定义³²。持久性曾被视为衡量政府优劣的最可靠标尺。对孟德斯鸠而言，暴政的恶劣性仍以至高无上的方式昭示于世：唯有暴政会自毁于内，自行衰亡；而其他所有政体皆因外部环境而覆灭。因此，政府定义始终需要孟德斯鸠所称的“行动原则”，但这种原则因政府形式而异，它既能激励政府与公民的公共活动，又能超越单纯合法性的消极标准，成为评判公共事务行动的准则。根据孟德斯鸠的说法，这种指导原则和行动标准在君主制中是荣誉，在共和制中是美德，在暴政中则是恐惧。

³² 译者注：极权政权界定的永恒性在于自然和历史运动；而自由社会定义的永恒性在于人类事务，它们界定的对象不同。

在一个完美的极权政府中，当所有人都已化为一，所有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或历史的运动，每一行为皆是执行自然或历史所宣告的死亡判决。换言之，在此状况下，完全可以依靠恐惧维持该运动在持续运转，不需要任何与政府本质有所区别的行动原则。然而，只要极权统治尚未征服地球，只要恐怖的铁链没有把每个人都变成单一之人，恐怖作为政府本质和运作原则（非行动原则）的双重功能，就无法完全实现。正如在宪政政府中，守法性不足以激发和引导人的行动，同样，在极权政府中，恐怖不足以激发和引导人类的行为。

在当前条件下，极权统治仍与其他政体共享公民在公共事务中行为的指导需求，但严格来说，它不需要甚至无法使用行动原则，因为它恰恰要消除人类行动的能力。在全面恐怖的环境下，恐惧本身也无法再充当行为原则的顾问，因为恐怖选择牺牲对象时，完全不考虑个人行为或思想，而仅依据自然或历史进程的客观必然性。在极权的条件下，恐惧可能是更普遍比以往任何时候；但恐惧已失去其实用性，当行动由恐惧引导时它再也无法帮助人类避免其恐惧的危险。同理也适用于对政权的同情或支持；因为极权恐怖不仅依据客观标准选择受害者，更会精心挑选行刑者，其选择标准尽可能忽视候选人的信念和立场。自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大清洗以来，彻底消除信念作为行动动机的事实已成铁证。极权主义教育的目标从来不是灌输信念，而是摧毁形成任何信念的能力。希姆莱在党卫军部队的选拔体系中引入纯客观标准，堪称其伟大的组织创举，因为他仅凭种族标准从照片中筛选党卫军候选人。自然本身不仅决定了谁将被淘汰，更决定了谁将被培养成刽子手。

对于一个不再以恐怖作为威慑手段、其本质就是恐怖的政治体而言，任何源于人类行为领域的行为准则，这些与美德、荣誉、恐惧相关的行为准则，既非必要，亦无用武之地。作为替代，极权政体在公共事务中引入了全新原则，它完全摒弃人类的行动意志，转而诉诸运动法则有所洞察的需求，这正是恐怖据以运作的运动法则，且所有个人的命运都取决于此。

极权国家的臣民被抛入并困于自然或历史进程之中，其目的在于加速该进程的运转；因此，他们只能成为其内在法则的刽子手或牺牲品。这个进程或许会裁定：今日消灭种族与个体、消灭垂死阶级与衰败民族的人，明日就将成为必须被牺牲的对象。极权统治为规范臣民行为所需的，是使每个人同样适配刽子手与受害者双重角色的准备。这种替代行动准则的双重准备，正是意识形态。

为了满足追随者，意识形态及各种主义³³通过单一前提的演绎来解释一切事物与事件，实为近现代的产物，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未曾扮演重要角色。唯有

³³ 译者注：英文中各种主义均是以-ism结尾的单词。

借助后见之明(hindsight), 我们才能在其中发现那些为极权统治带来令人不安的用处的元素。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前, 尚未有人发现这些意识形态当中巨大的政治潜能。

意识形态以其科学性著称: 它们将科学方法与具有哲学意义的成果相结合, 并自诩为科学哲学。“意识形态”一词似乎暗示着, 思想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 正如动物是动物学的研究对象; 而意识形态中的后缀“-logy”, 如同动物学中的后缀, 仅指代关于该对象的科学论述。若此论成立, 意识形态实为伪科学与伪哲学, 同时逾越了科学与哲学的边界。例如自然神论, 便是将哲学所探讨的上帝观念, 以神学那种将上帝视为启示现实的科学方式加以处理的意识形态。(若神学不以启示为既定现实为基础, 而将上帝视为理念, 其荒谬程度将如同不再确信动物实体存在的动物学。)然而我们知道这只是部分真相。自然神论虽否认神圣启示, 却并非仅对作为“观念”的上帝作出“科学性”陈述, 而是借助上帝观念来阐释世界运行规律。各种主义的“理念”, 如种族主义中的种族、自然神论中的上帝等, 它们从未成为意识形态的研究对象, 而“学说”(-logy)后缀也绝非单纯指代“科学”论述体系。

意识形态的本质恰如其名所示: 即“理念的逻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 即“理念”施展的场域; 这种施展的结果并非关于既定事物的陈述体系, 而是持续演变的进程展开。意识形态将事件进程视为遵循其“理念”逻辑阐释的相同“法则”。意识形态假装洞悉神秘整个历史进程(包括过去的奥秘、当下的复杂性、未来的未知性), 因为这个进程的逻辑本就在于它的理念当中。

意识形态从未对存在的奇迹产生兴趣。即使它们试图用某种“自然法则”来解释历史, 它们仍是历史性的, 关注的是生成与消亡, 关注文化的兴衰。种族主义中的“种族”一词, 并非表示对人类种族作为科学探索领域怀有任何真诚的好奇, 而仅仅是藉以将历史运动解释为一个首尾一贯之过程的“理念”而已。

意识形态的“理念”既非柏拉图所言用心灵之眼捕获的永恒本质, 也不是康德式的理性的规范原则, 而已成为一种解释工具。对意识形态而言, 历史并非在理念之光中显现(这意味着历史被置于某种超越历史运动的理想永恒视角之下), 而是成为可被其计算之物。使“理念”适应这一新角色的, 正是其自身的“逻辑”, 即一种源于理念本身的运动, 无需外部因素推动。种族主义正是相信种族理念本身蕴含着内在运动, 正如自然神论相信上帝概念本身就具有内在运动性。

历史运动与这一观念的逻辑过程被假定为相互对应, 因此无论发生什么, 都遵循一个“理念”的逻辑来发生的。然而, 逻辑领域中唯一可能的运动, 是从前提进行演绎的过程。辩证逻辑通过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过程, 进而成为下一个辩证

运动的正题，其原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旦这个理念被意识形态所掌控，最初的正题便成为前提。这种辩证手法对于意识形态解释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将事实层面的矛盾冲突，解释为同一且一贯运动中相互关联的阶段作为搪塞。

当逻辑作为思想运动（而非思维活动的必然控制）被应用于某个理念时，该理念便转化为前提。意识形态对世界的解释早在为极权思维带来卓越成果之前，就已经开始操作这样的过程。纯粹消极的逻辑强制性（即禁止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或事实出现在逻辑推演中），竟变得“富有成效”，以致于整条思想脉络得以启动，并通过纯粹论证式的推演强加于思维。这种论证过程既不会因新观念（那将构成另一组前提与结论）而中断，也不会因新经验而中断。意识形态总是假定：一个理念就足以在从该前提发展出来的过程中解释一切，而且任何经验都无法提供新知，因为万物皆被纳入这个始终一贯的逻辑演绎体系之中。若用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的完整解释来替代哲学思考必然伴随的不确定性，其危险性甚至不在于陷入某种通常庸俗、永远不加批判的假设，而在于用逻辑的束缚取代人类思考能力固有的自由，这种束缚能使人近乎暴力地强制自己，其强度几乎可与外部强力相媲美³⁴。

十九世纪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本身并非极权主义的，尽管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已成为二十世纪的决定性意识形态，但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其他意识形态“更具极权主义色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最初所依据的经验要素，即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种族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以及各国阶级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逐渐胜出，最终在政治上比其他意识形态更具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所有主义中取得意识形态胜利的局面，早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控这些意识形态之前就已注定。另一方面，所有意识形态都包含极权主义元素，但唯有极权运动才能将其充分发展，这便造成了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极权特征的错觉。真相实则在于：所有意识形态的本质唯有在极权统治体系中发挥作用时才得以显现。从这个方面看，所有意识形态思维都具有三种特定的极权元素。

首先，意识形态在追求全面解释时，往往倾向于阐释的不是当下的存在，而是正在形成、诞生的未来与消逝的过去。它们始终只关注运动的要素，即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意识形态始终面向历史，即便如种族主义看似立足于自然的前提，此时自然仅被用作解释历史事务的工具，将其还原为自然范畴。这种全面解释的诉求承诺阐明所有历史事件：既要完整阐释过去，又要通晓当下，更要精准预言未来。其次，意识形态思维由此脱离一切经验，即便面对刚刚发生之事，它也无法从中汲取新知。

³⁴ 译者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了一种强迫性逻辑推演模式，它拒绝相互冲突的观点，拒绝现实出现的新鲜事物，拒绝哲学式思考带来的不确定性，拒绝从其他角度思考问题，以单一的理念出发推演出一套理念体系，它不仅要求它的臣民接受该理念推导出来的所有结论，而且强迫他们接受这种固定的推演模式，从而取消他们的思考自由。

于是意识形态思维摆脱了我们五种感官所感知的现实，执意追求隐藏在所有感知现象背后的“更真实”的现实，并从这个隐蔽之处支配着它们，并要求我们用“第六感”才能察觉到它的存在。这种第六感恰恰由意识形态所提供，即那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灌输，由专门为此目的建立的教育机构传授，旨在训练纳粹的“政治士兵”，或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情报局的学校所培养的对象。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同样致力于将思想从经验与现实解放出来；它总是试图在每个公开的、可触摸的事件中注入隐秘的意义，并在每个公开的政治行为背后怀疑存在秘密意图。一旦这些运动掌权，它们便着手根据其意识形态主张改变现实。敌对论被阴谋论所取代，由此催生一种思维模式：现实（如真正的敌意或友谊）不再按照它本来的面目被感知或理解，而是自动被赋予其他隐含意义³⁵。

第三，由于意识形态本身不具备改变现实的能力，它们便通过特定的论证方法实现思想对经验的解放。意识形态思维将事实纳入绝对逻辑的程序：从公理化接受的前提出发，由此演绎出所有其他结论；换言之，它以一种在现实领域中根本不存在的首尾一致性展开运作。这种演绎可遵循逻辑或辩证法进行；无论哪种方式，都涉及一个始终一贯的论证过程，正因为它以过程为思考模式，故自诩它能够把握超越人类自然或历史进程。理解的达成，要依靠心灵以逻辑或辩证的方式，来模仿科学地构建出来的运动规律，而通过模仿这个过程，它得以融合了运动法则。意识形态论证始终属于逻辑演绎范畴，它对应两个先前提到的意识形态元素（运动元素，以及从现实经验中解放出来的元素）：首先，它的思想运动并非源于经验，而是自我生成；其次，它将从经验现实中汲取并接受的唯一元素转化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此后论证过程便彻底脱离任何后续经验。一旦确立前提与出发点，经验便不再干涉意识形态思维，现实亦无法对其施加教化³⁶。

两位极权统治者将各自意识形态转化为武器的手段，使臣民被迫步调一致地追随恐怖运动，这种手法看似简单而不起眼颇具欺骗性：他们极为认真地看待意识形态，一边希特勒为他的“冰冷理性”的至高天赋为荣，另一边斯大林为他的“辩证法的无情”为傲，继而将意识形态推向逻辑一致性的极端，这种极端在旁观者看来，显得原始、荒谬可笑：“垂死阶级”由被判死刑者组成；“不适生存者”的种族则应被灭绝。凡认同此论者所谓“垂死阶级”之说，却未推演至屠杀其成员的结论；或宣称生存权与种族相关，却未推演至消灭“劣等种族”的结论，那么他显然不是蠢人就是懦夫。这种严苛的逻辑性作为行动准则，贯穿于极权运动与政府的整个体

³⁵ 译者注：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被赋予了多种含义和多样观察视角，但极权主义只接受从其意识形态出发的视角，而拒绝承认其他多种视角和多样含义，这就是每个公开的行为背后总被怀疑藏着阴谋。

³⁶ 译者注：极权意识形态从现实经验中提炼出一个前提，以此为出发点演绎出整个逻辑体系，一旦思维运动开始，它就脱离了经验和现实的束缚，体现它对这两者的极端蔑视，而专心构建首尾一致的意识形态体系。

系。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功绩在于：尽管他们未曾为运动理念与宣传口号增添任何新思想，但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成为举足轻重的思想家³⁷。

这些新出现的极权主义思想家与前辈的区别在于，他们不再被意识形态的“理念”本身所吸引，无论其内容是阶级斗争与工人剥削，还是种族斗争与日耳曼民族关怀，它只是专注于该理念推导出的逻辑演进过程。斯大林指出，真正征服听众的既非理念本身也非雄辩辞令，而是“逻辑的不可抗拒之力彻底征服了列宁的听众”。马克思认为当理念抓住群众时便会诞生的力量，被发现并非存在于理念本身，而是存在于其逻辑推演过程中，这个过程“如同强大的触手从四面八方将你牢牢钳住，你无力挣脱其掌控；你只能选择投降，或做好彻底失败的准备”[3]。唯有当意识形态目标（无阶级社会或优等民族的实现）危在旦夕时，这种力量才会显现。在实现过程中，意识形态最初吸引群众的实质性基础（如对工人的剥削或德国的民族诉求）逐渐消亡，仿佛已被实现过程本身吞噬殆尽：完全符合“冰冷理性”与“逻辑不可抗拒之力”的逻辑，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甚至丧失了沙皇压迫时期所享有的权利，而德意志民族承受的战争，对民族生存的最低要求毫不顾忌。意识形态政治的本质，不在于单纯私利或权力欲望的背叛，而在于最初催生“理念”（阶级斗争作为历史法则或种族斗争作为自然法则）的意识形态实质内容（工人阶级或日耳曼民族），终将被实现该“理念”的逻辑所吞噬。

极权主义取代孟德斯鸠行动原则的受害者与行刑者准备，并非意识形态本身（无论是种族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其内在的逻辑性。关于此点最具说服力的论据，来自于希特勒与斯大林所推崇的一种观点：若不承认 B 和 C 等后续推论，便无法成立 A，如此推演直至杀戮字母表的终点³⁸。此处，逻辑性展现出它的强制性力量。这种恐惧似乎有其根源；它源于我们害怕自相矛盾。布尔什维克清洗之所以能强迫受害者承认从未犯下的罪行，主要就依赖于这种基本恐惧，其论证逻辑如下：我们都认同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前提，也认同党在斗争中的作用。因此你们应当明白，从历史角度而言，党永远是正确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言：“我们唯有依靠党才能正确，因为历史未曾提供其他正确的途径。”）。在这个历史节点，即遵循历史法则之时，必然会发生某些罪行，而深谙历史法则的党必须予以惩处。为惩治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或许党虽知罪行却未必知晓罪犯；但惩治罪行比锁定罪犯更

³⁷ 译者注：极权领袖制定的口号实际上代表了最高路线，也是元首意志和法律精神的体现，在极权社会中，凡是不追随、质疑和反对该路线的即被认为与整个社会为敌，这是将意识形态化为武器的重要表现。

³⁸ 译者注：极权意识形态的逻辑思维链条是：A 推出 B，B 推出 C，C 推出 D，直至字母 Z。这是一种单向线性逻辑推演过程，你若承认 A 前提，B, C, D 依次也应该承认；你若拒绝 A 前提，你无法推出其他结论。例如，你若接受中国共产党是永远正确的，你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它在文化大革命没有犯错误，习近平的千年大计没有错等等。

为重要，因为若无惩罚，历史进程不仅无法推进，甚至可能受阻。因此，你已经犯下罪行，或被党召唤扮演罪犯角色，无论哪种情况，你客观上都已成为党的敌人。若你不认罪，便停止通过党来推动历史进程，而成为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述的强制性在于：若你拒绝认罪，便陷入自我矛盾，这种矛盾将使你整个生命失去意义；你所宣称主宰你生命的 A，实则通过其逻辑衍生的 B 与 C 的后果来支配着你的人生。

极权统治者依赖于我们自我强迫的能力，以此实现对民众的有限动员，即便他们仍需这种动员；这种内在强迫力正是逻辑性暴政的体现，唯有人类开创新事物的巨大能力能与之抗衡。逻辑性暴政始于心灵臣服在永不停息的逻辑推演过程，这一过程本是人类赖以催生自己思想的东西。通过这种臣服，他放弃了内在自由，正如屈服于外部暴政时放弃行动自由。自由作为人的一种内在能力，等同于开启新事物的能力；正如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实，等同于人际间的行动空间。没有任何逻辑、任何严密演绎能对开端施加权力，因为它们逻辑链条本就需要开端为前提。正如恐怖统治的必要性在于防止每个新生人类带来新的开端并向世界发出声音；强调逻辑的自我强制力，则是为了防止任何人开始思考，而思考作为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自由、最纯粹的一种，构成了演绎性强迫过程的对立面。要确保极权政府的安全无忧，就需要动员人类自身的意志力量，来迫使他进入那场历史或自然的浩瀚洪流中，这场运动把人当做材料来使用，且不知何为人的出生、死亡。

一边是全面恐怖的强制力用它的铁链把一大群孤立的众人强行捆绑在一起，并将他们维持在已成为荒漠的世界。另一边则是逻辑演绎的自我强制力量，它让每个个体处在对抗其他所有人的孤立之中。这两者相互呼应、相互需要，以便发动并维持着恐怖支配的运动。正如仅凭尚未完全极权化、仅具暴政形态的统治，恐怖也已经摧毁众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意识形态思维的自我强制同样摧毁了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当人们既丧失与同类的联系，又脱离周遭现实时，这种准备工作便告完成；因为连同这些联系，人类同时丧失了体验与思考的能力。极权统治的理想臣民，并非坚定的纳粹分子或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些已然丧失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现实）之辨别能力，以及真伪（即思维标准）之区分能力的人³⁹。

我们现在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这就是：当一种政府以恐怖为本质、以意识形态思维的逻辑性为行动原则时，渗透其中的是人类何种基本共同生活经验呢？很显然，这样的组合在各种政治统治形式中未曾使用过。然而支撑它的基本经验必然是人类所熟知的，即使这种政体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具原创性的，它也是由人类设计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人类的需求⁴⁰。

³⁹ 译者注：恐怖使人失去体验能力；意识形态的强迫性使人失去思考能力，因此无法辨别上述两者。

⁴⁰ 译者注：极权政府以恐怖和意识形态为要素而建构，其外在形式是全新的，但内容确是熟悉的，因为这两

人们常观察到，只有对那些彼此孤立（isolation）的人，恐怖才能施加绝对的统治。因此，所有暴政政府的首要关切之一便是制造这种孤立的状态。孤立或许是恐怖的开端；它无疑是恐怖最肥沃的土壤；它也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堪称前极权主义状态，其标志在于无力感，因为权力永远源于人类的共同行动、“协同行动”（伯克语）；被孤立的个体在定义上是无权力的。

孤立与无力感，即根本性的行动无能，始终是暴政的特征。在暴政统治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联系被切断，人类行动与施展权力的能力遭到扼杀。但并非所有联系都断绝，并非所有能力都毁灭。私人生活领域及其蕴含的体验、创造与思考能力得以保全。我们深知，恐怖统治的铁腕扼杀私人生活的空间，而极权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与思考能力，其程度就如同它摧毁人的行动能力一样明确。

我们在政治领域所称的孤立，在社交领域则称为孤弃（loneliness）。孤立与孤弃并非同义。我可能处于孤立状态（在此情境中我无法行动，即因无人与我一起行动）而同时不孤弃；而我也可能孤弃（在此情境中我作为个体，虽未被孤立，却感到自己被所有人类伙伴所抛弃）而同时不孤立。当众人的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关切的政治领域被摧毁时，孤立正是人们所被驱入的境地。虽然孤立会摧毁力量与行动能力，但它不仅能保全人类所有所谓生产性活动，而且还是这些活动的必要条件。人作为“制造者”（homo faber），往往通过劳动实现自我隔离，即暂时离开政治领域。制造（poiesis，即事物创造）不同于行动（praxis）与单纯劳动，它总是在某种隔离于共同关注的方式进行，无论其成果是匠艺之作还是艺术杰作，都是如此。在孤立状态中，人仍以人类技艺的形式与世界保持联系；唯有当人类创造力的最基本形式（即向共同世界注入自我创造的能力）遭到摧毁时，孤立才变得完全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以劳动为最高价值的世界里，即所有人类活动都被转化为劳动的世界。在这种境况下，唯有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纯粹劳动努力尚存，而作为人类技艺与世界的联系则已断裂。当孤立的人丧失了政治行动领域的立足点时，物理世界也会抛弃他，因为如果他不再被视为“制造者”（homo faber），而仅被当作“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其与自然的必要“新陈代谢”便无人问津，由此孤立转化为孤弃。基于孤立的暴政通常保留人的生产能力；但对“劳动者”的统治（如古代奴隶制度），则必然成为对孤弃者（而非仅孤立者）的统治，并趋向极权主义⁴¹。

孤立仅涉及政治生活领域，而孤弃则关乎人类生活的整体。就像所有暴政一样，

译者注：阿伦特认为劳动仅具有生存价值，不是解放人类的唯一途径，极权政权通过劳动将大众孤立起来，使其无法进入政治领域关注个人的权利与福祉。

极权政府只有摧毁公共生活领域，也就是通过隔离个体来消解其政治能力，才能够生存。但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具有新颖性，它不仅满足于这种孤弃，更进一步摧毁私人生活。它将自身建立在孤弃之上，建立在不属于世界的体验之上，这堪称人类最极端绝望的生存体验。

孤弃既是极权政府本质的共同根基，也是行刑者与受害者的意识形态或逻辑性的基础；它同时与现代大众自工业革命伊始陷入的失根感（uprootedness）与多余感（superfluousness）紧密相连，这种境遇在世纪末帝国主义兴起时愈演愈烈，更因当代政治制度与社会传统的崩解而急剧恶化。失根感意味着在世间失去他人认可与保障的立足之地；多余感则意味着彻底不属于这个世界。失根感可能成为多余感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能（但并非必然）成为孤弃的先决条件。若撇开其近代历史成因与政治新角色，孤立本身既违背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但也是每个生命不可或缺的体验。我们感知周围物质与感知周围世界，依赖于我们与他人的联结，也依赖于我们藉以调节和控制所有感官的共通感（common sense）。如果没有这种共通感，我们每个人都将被困于自身特殊的感官材料所包围，而这些材料本身既不可靠又充满欺骗性。完全是因为我们拥有共通感，也就是世间并非仅存一人，而是复数的众人栖居于此，我们才能信任我们的直接感觉经验。然而我们要提醒自己：终有一日我们将离开这个共同的世界，它将照常运转，而我们对它的延续不过是多余的存在。如此便能领悟孤弃，即被万物与众人所遗弃的体验⁴²。

孤弃不等于孤独（solitude）。孤独要求独处，而孤弃则是在他人的陪伴下最尖锐地显现出来。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误导性的言论。例如，加图的名言（据西塞罗《论共和国》第一卷，第17章）说道“他最不孤独的时刻莫过于独处之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唯有独处时，孤弃才最淡薄”。似乎古希腊解放奴隶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最先区分了孤独与独弃。他的发现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其核心关切既非孤独也非孤弃，而是绝对独立意义上的独处（monos）。在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第三卷，第十三章）看来，孤弃者（eremos）即使身处人群，却无法与周围人建立联系，甚至暴露于敌意之中。而孤独者恰恰相反，他是独自一人，因此“能够与自己相伴”，因为人们都拥有“与自己对话”的能力。换言之，在孤独状态中，我凭借“与自我相伴”，实为合二而为一；然而在孤弃中，我实际上是一个人，是被众人所遗弃了。严格来说，所有思考皆发生于孤独之中，是自我与自我的对话；但这种二合一的对话并未与人类世界断绝联系，因为对话对象是自我，它已将他人具象化了。孤独的

⁴² 译者注：共通感是我们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极权政府却要以恐怖和意识形态取代众人的共通感，丧失与他人、与现实世界联系的个体将被抛入孤弃的绝望之地，如同个体面临死亡时，被万物与众人遗弃的体验一样。

困境在于：这种二合一的状态需要他人才能重归统一：成为不可替代的个体，其身份永不与他人混淆。因为我的身份（同一性）的确证完全依赖他人；而伴侣关系则是对孤独者的最大救赎，正在于它使人重获“完整”，使他们脱离始终含糊不清的思想对话，恢复那份能让他们以不可替代之人的单一声音说话的身份认同⁴³。

孤独可以成为孤弃；这发生在当我独自一人，被自我遗弃时。当孤独之人再也寻不到同伴的救赎恩典，把他们从二元性、模棱两可与疑虑的桎梏解脱出来，他们始终面临着孤弃的威胁。历史上，这种危险似乎直到十九世纪才严重到引起他人注意并被史册载记。当哲学家们（唯独对他们而言孤独是生存之道与创作之境）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少数人之事”的现状，开始宣称无人“理解”他们时，这种危险便昭然若揭。在这方面，非常典型的轶闻就是黑格尔临终前留下的遗言说：“除一人外无人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而在此前鲜有伟大哲学家能有此等遭遇。相反，孤独者总有机会在自我寻觅中开启思想的对话。尼采在希尔斯玛利亚（尼采出生地）构思《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似乎正经历着这样的蜕变。在两首诗作（《希尔斯玛利亚》与《在高山之上》）中，他诉说着孤弃者的空虚期待与渴盼守候，直至忽然间：“正午时分，独行者化作双生……；/胜券在握，共庆盛宴之巅；/智者查拉图斯特拉降临，贵宾中的贵宾！”。

孤弃之所以难以忍受，是丧失了一个人的自我；自我可以在孤独中获得，却唯有通过与平等者的互信相伴才能确证其存在。在这种境况下，人丧失了对自身作为思想伙伴的信任，也丧失了体验世界最基本的信心。自我与世界、思考能力与体验能力同时消逝。

人类心灵中唯一无需自我、他人或世界即可安然运作，而且是独立于经验也独立于思考的能力，也是基于不证自明前提的逻辑推理能力。即使在绝对孤弃的境况下，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基本规则（如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也无法被颠覆。当人类失去了相互保障、失去了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体验、失去了生存与认知方向的共通感时，人类就丧失了这唯一可靠的“真理”。但这种“真理”是空洞的，或者说根本不是真理，因为它什么也没揭示。（像某些现代逻辑学家那样把一致性定义为真理，就等于否认真理的存在。）因此，在孤弃的处境中，不证自明不仅仅是一种知性的手段，而是开始变得有生产性，能产生自己的“思想”脉络。路德（他在孤独与孤寂现象中的体验恐怕无人能及，并曾大胆宣称上帝必然存在，因为人类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存在）在解读《圣经》“人不宜独居”的经文时，曾作出鲜为人知的评注：孤独者总将一件事推演至另一件事，凡事都往最坏处想”[4]。极权主义运

⁴³ 译者注：只有忍受过孤独的人，才能产生与自我对话的能力。但需要借助与他人沟通交流，才能向外界展现这种“合二为一”的身份认同感。

动著名的极端主义，与真正的激进主义完全没有丝毫关系，但它确实包含这种“凡事往最坏处想”的思维模式，这种总是得出最坏结论的推演过程。

在非极权世界中，为人们实现极权统治所做的准备，存在于如下事实：孤弃感曾经仅在某些边缘社会状态（如老年）中出现的临界体验，如今已成为我们这个世纪日益膨胀的群体日常经历。极权主义驱使并组织大众投入的无情进程，恰似一场逃离现实的自杀式逃亡。在无人可信赖、万物皆不可靠的世界里，辩证法的“冰冷理性”与“钳子般的大力触手”，竟然成了最后的依靠。似乎这种内在强制性（其唯一内容就是严格避免矛盾），能在人际关系之外确证个体的身份认同。它将人嵌入恐怖的铁环，纵使独处亦不例外；极权统治竭力避免人处于独处状态，唯独在严酷的单独监禁中例外。通过消灭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空间，将人相互挤压，连孤立状态的创造性潜能也被扼杀；在孤弃的逻辑论证中，人深知一旦放开启动整个过程的最初前提，就会彻底迷失；而孤弃转化为孤独、逻辑升华为思想的微小可能性也被抹杀。若将这种做法与暴政相比较，仿佛找到了让沙漠本身移动的方法，释放出足以覆盖人类居住区所有角落的沙尘暴⁴⁴。

当今政治领域中我们所处的生存状态，确实正遭受这些毁灭性沙尘暴的威胁。其危险性并非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久的世界。极权统治如同暴政，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恐惧及其催生的无力感构成反政治原则，因为它将人推入悖离政治行动的境地；而孤弃以及源自于孤弃的逻辑-意识形态的最坏的推理思维，则构成了反社会原则，因为它利用该原则摧毁了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情境。然而，有组织的孤弃远比那些受单一人专横意志支配者的无组织无力感更为危险。其危害在于：它企图摧毁我们所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看似走向终结之时，它却在新生力量尚未从终结中崛起之际便将其吞噬殆尽⁴⁵。

从预测的角度来说，上述这些考量无多大用处，更难带来慰藉。除此之外还存在于下述事实：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及其核心体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态，它作为潜在威胁与永恒危险，极可能从此与我们相伴，正如其他在不同历史时期诞生、基于不同基本经验的政体（如君主制、共和制、暴政、独裁与专制）一样，即使它也遭遇过暂时性挫败，但极权主义却始终伴随人类发展历程。

但也存在这样一种真理：历史终结之处必然蕴含着新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人

⁴⁴ 译者注：极权主义把所有人紧紧捆绑在一起，不给他们独处的空间，不给他们思考的时间。这种做法似乎成为大众获得安全感的最后依靠，许多人宁愿顺从这种虚伪的安全感，也不愿独自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去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

⁴⁵ 译者注：恐怖是反政治的，因为它不帮助人类走向自由而是使之沦为极权主义的奴隶；孤弃是反社会的，因为它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世界，极权主义是建立在遗弃众人 and 使众人恐惧的心理基础之上，其天生自带自我毁灭的种子。

与人之间的承诺，是终结所能产生的唯一的“讯息”。在一个新的开端在成为历史事件之前，创造开端正是人类至高无上的能力；在政治层面，它完全等同于人的自由。奥古斯丁曾说：“为产生这样一个开端，人被创造出来”[5]。这种开端被每一次新生命的降临而获得保障；这个开端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⁴⁶。

本章注释

- [1]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致辞时说：“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生命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恩格斯为1890年版《卡尔·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所作的序言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评论。在《家庭、公共和国家起源》序言中，他再次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列提及。
- [2] 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是一种永恒的、由自然强加的必然性。没有劳动，人与自然之间就不可能有新陈代谢，因此也就没有生命。”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一章和第五章。引文出自第一章第二节。
- [3] 斯大林1924年1月21日的讲话；引自列宁《全集》第1卷，第33页，莫斯科，1947年。第33页，莫斯科，1947年。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的“逻辑”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那篇毁灭性讲话中罕见赞扬的品质之一。
- [4] “当某人（即某位愚昧之人）如此推论时，他永远只会得出与他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是最坏的结论”。引自《劝诫性论文集》之《为何逃避孤独？》。
- [5] 《上帝之城》第十二卷第二十章。

⁴⁶ 译者注：尽管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府形态，会始终伴随人类的发展历程。但上帝也赋予了人类对抗极权主义的终极武器，这就是人类开创新事物的能力（创生力）。这种能力蕴含在每一个人身上，它随着每个人的诞生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有责任使用这种上帝赋予的能力，去开创一个我们共同拥有的新世界。

参考文献

(鉴于参考文献阅读价值不大,译者只把原书英文参考文献列出,方便感兴趣读者继续挖掘。)

- Abel, Theodore, *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an Answer Bas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Six Hundred of His Followers*, 1938.
- Adler, H. G., *Theresienstadt 1941-1945*, Tübingen, 1955.
- Alquen, Gunter d', *Die SS. Geschichte, Aufgabe und Organisation der Schutzstaffeln der NSDAP* (Schriften der Hochschule für Politik), 1939.
- Anweiler, Oskar, *Die Räte-Bewegung in Russland 1905-1921*, Leiden, 1958; "Lenin und der friedliche Übergang zum Sozialismus," in *Osteuropa*, 1956, vol. VI.
- Armstrong, John A., *The Soviet Bureaucratic Elite: A Study of the Ukrainian Apparatus*, New York, 1959; *The Politic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61.
- Avtorkhanov, A.,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Par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Munich, February, 1956; *Stalin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 Study in the Technology of Power*, New York, 1959; (pseudonym Uvalov), *The Reign of Stalin*, London, 1953.
- Bakunin, Michael, *Oeuvres*, Paris, 1907; *Gesammelte Werke*, 1921-24.
- Balabanoff, Angelica, *Impressions of Lenin*, Ann Arbor, 1964.
- Baldwin, Roger N., "Political Police,"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 Bataille, George, "Le Secret de Sade," *La Critique*, vol. 3, nos. 15, 16, 17, 1947; "Review of D. Rousset, *Les Jours de notre mort*," *La Critique*, January, 1948.
- Bauer, R. A., Inkeles, A., Kluckhohn, C., *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 Cambridge, 1956.
- Bayer, Ernest, *Die SA*, Berlin, 1938.
- Bayle, François, *Psychologie et Ethique du National-Socialisme. Etude Anthropologique des Dirigeants SS*, Paris, 1953.
- Beck, F., and Godin, W., *Russian Purg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onfe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51.
- Beckerath, Erwin von, "Fascism,"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Wesen und Werden des faschistischen Staates*, Berlin, 1927.
- Benn, Gottfried, *Der neue Staat und die Intellektuellen*, 1933.
- Bennecke, H., *Hitler und die SA*, München, 1962.
- Berdyayev, Nicolas, *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 1937.
- Best, Werner, *Die deutsche Polizei*, 1940.
- Bettelheim, Bruno, "On Dachau and Buchenwald," in *Nazi Conspiracy op. cit.*, vol. 7; "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no. 4, 1943.
- Black, C. E., editor, *Rewriting Russian History*, New York, 1956.
- Blanc, R. M., *Adolf Hitler et les "Protocoles des Sages de Sion"*, 1938.
- Boberach, Heinz, editor,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Neuwied and Berlin, 1965.
- Bonhard, Otto, *Jüdische Geld- und Weltherrschaft?*, Berlin, 1926.
- Borkenau Franz, *The Totalitarian Enemy*, London, 1940;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1938; "Die neue Komintern," *Der Monat*, no 4, 1949.
- Bormann, Martin,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Christianity," in *Nazi Conspiracy, op. cit.*, vol. 6; *The Bormann Letters*, ed. by H. R. Trevor-Roper, London, 1954.

- Boucart, Robert, *Les Dessous de l'Intelligence Service*, 1937.
- Bracher, Karl Dietrich,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55; 3rd ed., Villingen, 1960.
- , Sauer, Wolfgang, and Schulz, Gerhar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Köln & Opladen, 1960.
- Bramsted, Ernest K., *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 1925-1945*, Michigan, 1965.
- Brecht, Bertolt, *Stücke*, 10 vols., Frankfurt, 1953-1959; *Gedichte*, 7 vols., Frankfurt, 1960-1964.
- Broszat, Martin,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60.
- , Jacobson, Hans-Adolf, and Krausnick, Helmut, *Konzentrationslager, Kommissarbefehl, Judenverfolgung*, Olten/Freiburg, 1965.
- Brzezinski, Zbigniew,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1962; *The Permanent Purge—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1956.
- Buber-Neumann, Margarete, *Under Two Dictators*, New York, 1951.
- Buchheim, Hans, "Die SS in der Verfassung des Dritten Reiches,"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April, 1955; *Das Dritte Reich*, München, 1958; *Die SS und totalitäre Herrschaft*, München, 1962; *Die SS—das Herrschaftsinstrument—Befehl und Gehorsam*, Olten/Freiburg, 1965.
- Bullock, Alan,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rev. ed., New York, 1964.
- Camus, Albert, "The Human Crisis," *Twice a Year*, 1946-1947.
- Carocci, Giampiero, *Storia del fascismo*, Milan, 1959.
- Carr, E. H.,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7 vols. New York, 1951-1964; *Studies in Revolution*, New York, 1964.
- Céline, Ferdinand, *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 1938; *L'Ecole des cadavres*, 1940.
- Chamberlin, W. H., *Blueprint for World Conquest*, 1946;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35), 1965.
- Childs, H. L., and Dodd, W. E., editors, *The Nazi Primer*, New York, 1938.
- Ciliga, Anton, *The Russian Enigma*, London, 1940.
- Clark, Evelyn A. "Adolf Wagner. From National Economist to National Socialis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40, vol. 55, no. 3.
- Cobban, Alfre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London, New York, 1945; *Dictatorship: Its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1939.
- Communism in Acti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ouse Documents, no. 754), Washington, 1946.
- Cranksbaw, Edward, *Gestapo, Instrument of Tyranny*, London, 1956.
- Curtiss, J. S., *An Appraisal of the Protocols of Zion*, New York, 1942.
- Dallin, David J., *From Purge to Coexistence*, Chicago, 1964; "Report on Russia," *The New Leader*, January 8, 1949.
- and Nicolaevsky, Boris I., *Forced Labor in Russia*, 1947.
- Daniels, Robert,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1960.
-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preface by T. S. Eliot), New York, 1947.
- Deakin, F. W., *The Brutal Friendship*, New York, 1963.
- De Begnac, Yvon, *Palazzo Venezia—Storia di un regime*, Rome, 1950.
- Dehillothe, Pierre, *Gestapo*, Paris, 1940.
- Delarue, Jacques, *Histoire de la Gestapo*, Paris, 1962.
- Deutscher, Isaac,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1949;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1954;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1959;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1963.
-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vol. I.
- Dobb, Maurice, "Bolshevism,"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l. IV.
- Domarus, Max, *Hitler-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2 vols., 1963.

- Doob, Leonard W., "Goebbels' Principles of Propaganda," in Katz, Daniel *et al.*,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New York, 1954.
- Drucker, Peter F.,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New York, 1939.
- Ebenstein, William, *The Nazi State*, New York, 1943.
- Ehrenburg, Ilya, *Memoirs: 1921-1941*, Cleveland, 1964; *The War: 1941-1945*, Cleveland, 1965.
- Engels, Friedrich,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90; introduction to the *Ursprung der Familie*; Funeral Speech on Marx.
- Erickson, Joh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1918-1941*, New York, 1961.
- Eyck, Erich, *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Cambridge, 1962.
- Fainsod, Merle, *How Russia Is Ruled*, 1963;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1958.
- The Fascist Era*, published by the Fascist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ialists, Rome, 1939.
- Feder, Ernest, "Essai sur la Psychologie de la terreur," *Synthèses*, Bruxelles, 1946.
- Feder, Gottfried, *Das Programm der N.S.D.A.P. und seine weltanschaulichen Grundgedank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ibliothek, no. 1).
- Fedotow, G. P., "Russia and Freedo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8, no. 1, January, 1946.
- Fest, J. C., *Das Gesicht des Dritten Reiches*, München, 1963.
- Finer, Herman, *Mussolini's Italy*, New York (1935), 1965.
- Fischer, Louis,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London, New York, 1930; *Life of Lenin*, New York, 1964.
- Flammery, Harry W.,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Fascism," *Free World*, September, 1943.
- Florinsky, M. T., *Fas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tics of the Totalitarian State*, New York, 1938.
- Forsthooff, Ernst, *Der totale Staat*, Hamburg, 1933.
- Fraenkel, Ernst, *The Dual State*, New York and London, 1941.
- Frank, Han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itsätze für ein neues deutsches Strafrecht*, Berlin, 1935-1936; *Die Technik des Staates*, München, 1940; (editor) *Grundfragen der deutschen Polizei*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Hamburg, 1937; *Recht und Verwaltung*, 1939; *Die Technik des Staates*, München, 1942;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München, 1953; editor,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Handbuch für Recht und Gesetzgebung*, München, 1935.
- Freyer, Hans, *Pallas Athene, Ethik des politischen Volkes*, 1935.
- Friedrich, C. J., editor,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54.
- , and Brzezinski, Z. K.,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1956.
- Gallier-Boissière, Jean, *Mysteries of the French Secret Police*, 1938.
- Gauweiler, Otto, *Rechtseinrichtungen und Rechtsaufgaben der Bewegung*, 1939.
- Geigenmüller, Otto, *Die politische Schutzhaft im nationalistischen Deutschland*, 2nd ed., Würzburg, 1937.
- Gerth, Hans, "The Nazi Pa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1940.
- Gide, André, *Retour de l'URSS*, Paris, 1936.
- Giles, O. C., *The Gestapo* (Oxford Pamphlets on World Affairs, no. 36), 1940.
- Globke, Hans, *Kommentare zur Deutschen Rassegesetzgebung*, Munich-Berlin, 1936.
- Goebbels, Joseph, *Wege ins Dritte Reich*, München, 1927; "Der Faschismus und seine praktischen Ergebnisse," *Schriften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 für Politik*, vol. I, Berlin, 1935;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19. ed., München, 1937; "Rassenfrage und Weltprogramm," *Pädagogisches Magazin*, Heft 139, 1934; *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1943*, Louis Lochner, editor, New York, 1948; *Wesen und Gestal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1935.
- Goslar, Hans, *Jüdische Weltherrschaft. Phantasiegebilde oder Wirklichkeit*, Berlin, 1918.

- Grauert, Wilhelm, "Die Entwicklung des Polizeirechts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in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39, 1934.
- Griffith, William E., editor, *Communism in Europe, Continuity, Change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Cambridge, 1964.
- Gross, Walter, *Der deutsche Rassengedanke und die Welt* (Schriften der Hochschule für Politik, no. 42), 1939; "Die Rassen- und Bevölkerungspolitik im Kampf um die geschichtliche Selbstbehauptung der Völk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no. 115, October, 1939.
- Guenther, Hans, *Rassenkunde des jüdischen Volkes*, 1930; *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olkes*, 1st ed., München, 1922.
- Gul, Roman, *Les Maîtres de la Tcheka*, Paris, 1938.
- Gurian, Waldemar, *Bolshevism: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1932; *Bolshevism. An Introduction to Soviet Communism*, Notre Dame, 1952.
- Hadamovsky, Eugen, *Propaganda und nationale Macht*, 1933.
- Hafkesbrink, Hanna, *Unknown Germany*, New Haven, 1948.
- Hallgarten, Georg Wolfgang F., *Hitler,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 Zur Geschichte der Jahre 1918-1933*, Frankfurt/M., 1955.
- Hamel, Walter, "Die Polizei im neuen Reich," in *Deutsches Recht*, vol. 5, 1935.
- Hammer, Hermann, "Die deutschen Ausgaben von Hitlers 'Mein Kampf,'"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 (1956).
- Hartshorne, Edward G.,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Cambridge, 1937.
- Hayek, F. A.,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Economics*, vol. 8, 1941.
- Hayes, Carlton J. H., *Essays on Nationalism*, New York, 1926; Remarks on "The Novelty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Symposium on the Totalitarian State*, 1939.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82, Philadelphia, 1940;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New York, 1941.
- Heiden, Konrad, *Der Führer. Hitler's Rise to Power*, Boston, 1944; *A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35; *Adolf Hitler. Das Zeitalter der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Eine Biographie*, vol. 1, Zürich, 1936;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arriere einer Idee*, Berlin, 1932; *Geburt des Dritten Reiches. Die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is Herbst 1933*, 2nd ed., Zürich, 1934.
- Hesse, Fritz, *Das Spiel um Deutschland*, Munich, 1953.
- Heydrich, Reinhard, "Die Bekämpfung der Staatsfeinde," in *Deutsches Recht*, vol. 6, 1936.
- Hilberg, Rau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hicago, 1961.
- Himmler, Heinrich, "Männerbund auf rassistischer Grundlage," *Das Schwarze Corps*, 38. Folge; *Die Schutzstaffel als antibolschewistische Kampforganisation* (Aus dem Schwarzen Corps, no. 3), 1936; "Organization and Obligation of the SS and the Police," published in *Nationalpolitischer Lehrgang der Wehrmacht vom 15.-23. Januar 1937*. Excerpts translated in *Nazi Conspiracy*, op. cit., vol. 4; English edition: *Secret Speech by Himmler to the German Army General Staff*,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Anti-Nazi Literature, 1938; *Grundfragen der deutschen Polizei*, Hamburg, 1937; "Denkschriften Himmlers über die Behandlung der Fremdvölkischen im Osten" (May 1940),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 Jg. (1957); "Die Schutzstaffel," *Grundlagen, Aufbau und Wirtschaftsordn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es*, Nr. 7b.
-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1925-1927. Unexpurgated English edition, New York, 1939; *Reden*, ed. by Ernst Boepfle, München, 1933; *Hitler's Speeches, 1922-1939*, ed. by N. H. Baynes, London, 1942; *Ausgewählte Reden des Führers*, 1939; *Die Reden des Führers nach der Machtübernahme*, 1940; *Der grossdeutsche Freiheitskampf*, Reden Hitlers vom 1.9.1939-10.3.1940; *Hitler's Table Talks*, New York, 1953; *Hitler's Secret Book*, New York, 1962; *Der grossdeutsche Freiheitskampf—Reden Adolf Hitlers*, vols. I and II, 3rd ed., München, 1943.
- Hocke, Werner, ed., *Die Gesetzgebung des Kabinetts Hitler*, vol. 1, Berlin, 1933.
- Hoehn, Reinhard, *Rechtsgemeinschaft und Volksgemeinschaft*, Hamburg, 1935.

- Hoettl, Wilhelm, *The Secret Front: The Story of Nazi Political Espionage*, New York, 1954.
- Holldack, Heinz, *Was wirklich geschah*, 1949.
- Horneffer, Reinhold, "Das Problem der Rechtsgeltung und der Restbestand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99, 1938.
- Höss, Rudolf,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New York, 1960.
- Hossbach, Friedri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934-1938*, Wolfenbüttel-Hannover, 1949.
- Huber, Ernst R., "Die deutsche Polizei,"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101, 1940/1.
- Hudal, Bischof Alois, *Die Grundla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7.
- Inkeles, A., and Bauer, R. A.,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1959.
- Jetzinger, Franz, *Hitlers Jugend*, Wien, 1956.
- Jünger, Ernst, *The Storm of Steel*, London, 1929.
- Keiser, Guenther, "Der jüngste Konzentrationsprozess," *Die Wirtschaftskurve*, vol. 18, no. 148, 1938.
- Kennan, George F., *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oston, 1961.
- Khrushchev, N.,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Boris Nicolaevsky,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1956.
- Klein, Fritz, "Zur Vorbereitung der faschistischen Diktatur durch die deutsche Grossbourgeoisie 1929-1932,"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Jg, 1953.
- Kluke, Paul,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uropaideologie,"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8. Jg. (1960).
- Koch, Erich, "Sind wir Faschisten?," in *Arbeitertum* 1, H. 9 (1.Juli 1931).
- Koellenreuter, Otto, *Volk und Staat in der Weltanschau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5; *Der deutsche Führerstaat*, Tübingen, 1934.
- Koettgen, Arnold, "Die Gesetzmässigkeit der Verwaltung im Führerstaat," *Reichsverwaltungsblatt*, 1936.
- Kogon, Eug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 1956.
- Kohn-Bramstedt, Ernst, *Dictatorship and Political Police; the Technique of Control by Fear*, London, 1945.
- Koyré, Alexandre,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Modern Lie," *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 June, 1945.
- Kravchenko, Victor, *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ial*, New York, 1946.
- Krivitsky, W.,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s*, New York, 1939.
- Kuhn, Karl G., "Die Judenfrage als weltgeschichtliches Problem," in *Forschungen zur Judenfrage*, 1939.
- Laporte, Maurice, *Histoire de l'Okhrana*, Paris, 1935.
- Latour, Contamine de, "Le Maréchal Pétain," *Revue de Paris*, vol. 1.
- Lebon, Gustave,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
- Lederer, Zdenek, *Ghetto Theresienstadt*, London, 1953.
- Lenin, V. I.,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Imper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7.
- Leutwein, Paul, editor, *Kämpfe um Afrika; sechs Lebensbilder*, Luebeck, 1936.
- Lewy, Guente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and Toronto, 1964.
- Ley, Robert, *Der Weg zur Ordensburg*, no date.
- Lösener, Bernhard, *Die Nürnberger Gesetze*, Berlin, 1936.
- Lowenthal, Richard, *World Communism. The Disintegration of a Secular Faith*, New York, 1964.
- Luedecke, Winfred, *Behind the Scenes of Espionage. Tales of the Secret Service*, 1929.
- Luxemburg, Rosa,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n Arbor, 1961.

- Martin, Alfred von, "Zur Soziologie der Gegenwart," *Zeitschrift für Kulturgeschichte*, vol. 27.
- Massing, Paul W.,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New York, 1949.
- Mathias, Erich, and Morsey, Rudolph, editors,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üsseldorf, 1960.
- Maunz, Theodor, *Gestalt und Recht der Polizei*, Hamburg, 1943.
- McKenzie, Kermit E., *Comintern and World Revolution 1928-1934*, New York, 1964.
- Micaud, Charles A., *The French Right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 1943.
- Moeller van den Bruck, Arthur, *Das Dritte Reich*, 1923; English edition *Germany's Third Empire*, New York, 1934.
- Moore, Barrington, *Terror and Progress USSR: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Cambridge, 1954.
- Morstein Marx, Fritz, "Totalitarian Politics," *Symposium on the Totalitarian State, 1939.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82, Philadelphia, 1940.
- Mosse, George J.,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64.
- Muller, H. S., "The Soviet Master Race Theory," *The New Leader*, July 30, 1949.
- Müller, Josef, *Die Entwicklung des Rassenantisemitismus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des 19. Jahrhundert (Historische Studien, H. 372)*, Berlin, 1940.
- Mussolini, Benito, "Relativismo et Fascismo," *Diuturna*, Milano, 1924; *Four Speeches on the Corporate State*, Rome, 1935; *Opera Omnia di Benito Mussolini*, vol. IV, Florence, 1951.
- Nansen, Odd, *Day after Day*, London, 1949.
-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ef of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U. S. Government, Washington, 1946.
-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edited by Raymond James Sontag and James Stuart Beddie, Washington, 1948.
- Neesse, Gottfried, *Partei und Staat*, 1936;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Gestaltung der Ein-Partei,"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98, 1938.
- Neumann, Franz, *Behemoth*, 1942.
- Neusüss-Hunkel, Ermenbild, *Die SS*, Hannover-Frankfurt a.M., 1956.
- Newman, Bernard, *Secret Servant*, New York, 1936.
- Nicolaevsky, Boris I., *Bolsheviks and Bureaucrats*, New York, 1965; *Power and the Soviet Elite*, New York, 1965; (—), *Letter of an Old Bolshevik*, New York, 1937.
- Nicolai, Helmut, *Die rassengesetzliche Rechtslehre. Grundzüge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chtsphilosoph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ibliothek, H. 39), 3rd ed., München, 1934.
- Nomad, Max, *Apostles of Revolution*, Boston, 1939.
- Olgin, Moissaye J., *The Sou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17.
- Organisationsbuch der NSDAP*, many editions.
- Orlov, A., *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 New York, 1953.
- Ortega y Gasset, José,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1932.
- Paetel, Karl O., "Die SS,"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anuary, 1954; "Der schwarze Orden. Zur Literatur über die 'SS,'" in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3, 1958.
- Parsons, Talcott, "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the Fascist Movement,"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Glencoe, 1954.
- Pascal, Pierre, *Avvakum et les débuts du raskol* (Institut Français de Leningrad, Bibliothèque, vol. 18), Paris, 1938.
- Paulhan, Jean, "Introduction" to Marquis de Sade, *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 Paris, 1946.

- Payne, Stanley G., *A History of Spanish Fascism*, Stanford, 1961.
- Pencherlo, Alberto, "Antisemitism," in *Encyclopedia Italiana*.
- Petegroski, D. W., "Antisemitism, the Strategy of Hatred," *Antioch Review*, vol. 1, no. 3, 1941.
- Pfenning, Andreas, "Gemeinschaf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96.
- Poliakov, Léon, *Bréviaire de la Haine*, Paris, 1951; "The Weapon of Antisemitism,"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55, UNESCO.
- , and Wulf, Josef,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Juden*, Berlin, 1955.
- Poncins, Léon de, *Les Forces secrètes de la Révolution; F. F. M. - Judaïsme*, revised ed., 1929 (translated into German, English, Spanish, Portuguese); *Les Juifs Maîtres du Monde*, 1932; *La Dictature des puissances occultes; La F. F. M.*, 1932; *La mystérieuse Internationale juive*, 1936; *La Guerre occulte*, 1936.
- Rauschnig, Hermann, *Hitler Speaks*, 1939; *The Revolt of Nihilism*, 1939.
- Reck-Malleczewen, Friedrich Percyval, *Tagebuch eines Verzweifelten*, Stuttgart, 1947.
- Reitlinger, Gerald, *The Final Solution*, 1953; *The SS—Alibi of a Nation*, London, 1956.
- Reveille, Thomas, *The Spoil of Europe*, 1941.
- Reventlow, Graf Ernst zu, *Deutschlands auswärtige Politik. 1888-1914*, 1916; *Judas Kampf und Niederlage in Deutschland*, 1937.
- Riesman, David, "The Politics of Persecu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 1942; "Democracy and Defam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1942.
- Riess, Curt, *Joseph Goebbels: A Biography*, New York, 1948.
- Ripka, Hubert, *Munich: Before and After*, London, 1939.
- Ritter, Gerhard, *Carl Goerdeler's Struggle against Tyranny*, New York, 1958.
- Roberts, Stephen H., *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 London, 1939.
- Robinson, Jacob, and Friedman, Philip, *Guide to Jewish History under Nazi Impact*, a bibliography published jointly by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and Yad Washem, New York and Jerusalem, 1960.
- Rocco, Alfredo, *Scritti e discorsi politici*, 3 vols., Milan, 1938.
- Roehm, Ernst,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aters*, Volksausgabe, 1933; *Die Memoiren des Stabschefs Roehm*, Saarbrücken, 1934; *Warum SA?*, Berlin, 1933; "SA und deutsche Revolution,"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Nr. 31, 1933.
- Rollin, Henri, *L'Apocalypse de notre temps*, Paris, 1939.
- Rosenberg, Alfred, *Die Protokolle der Weisen von Zion und die jüdische Weltpolitik*, München, 1923; *Der Mythos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1930.
- Rosenberg, Arthur, *A History of Bolshevism*, London, 1934;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publik*, 1936.
- Rousset, David, *Les Jours de notre mort*, Paris, 1947; *The Other Kingdom*, 1947.
- Rush, Myron,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New York, 1965; *The Rise of Khrushchev*, Washington, 1958.
- SA-Geist im Betrieb. Vom Ringen um die Durchsetzung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edited by Oberste SA-Führung, München, 1938.
- Salisbury, Harrison E., *Moscow Journal: The End of Stalin*, Chicago, 1961; *American in Russia*, New York, 1955.
- Salvemini, Gaetano, *La terreur fasciste 1922-1926*, Paris, 1938; *The Fascist Dictatorship in Italy (1927)*, New York, 1966.
- Schäfer, Wolfgang, *NSDAP,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der Staatspartei des Dritten Reiches*, Hannover-Frankfurt a.M., 1956.
- Schapiro, 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60;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1965.
- Schellenberg, Walter, *The Schellenberg Memoirs*, London, 1956.
- Schemann, Ludwig, *Die Rasse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Studie zur Geschichte des Rassengedankens*, 3 vols., München, Berlin, 1928.

- Scheuner, Ulrich, "Die nationale Revolution. Eine staatsrechtliche Untersuchung," in *Archiv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1933/34).
- Schmitt, Carl, *Politische Romantik*, Munich, 1925; *Staat, Bewegung, Volk*, 1934; "Totaler Feind, totaler Krieg, totaler Staat," *Völkerbund und Völkerrecht*, vol. 4, 1937;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 Materialien zu einer Verfassungslehre*, Berlin, 1958.
- Schnabel, Raimund, *Macht ohne Moral.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die SS*, Frankfurt/M., 1957.
- Schumann, Fr. L., *The Nazi Dictatorship*, 1939.
- Schwartz, Dieter, *Angriffe auf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 (Aus dem Schwarzen Korps, no. 2), 1936.
- Schwartz-Bostunitch, Gregor, *Jüdischer Imperialismus*, 5th edition, 1939.
- Seraphim, Hans-Günther, *Das politische Tagebuch Alfred Rosenbergs aus den Jahren 1934/5 und 1939/40*, Göttingen-Berlin-Frankfurt/M., 1956; "SS-Verfügungstruppe und Wehrmacht," in *Weh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 5, 1955.
- Seraphim, P. H., *Das Judentum im osteuropäischen Raum*, Essen, 1938; "Der Antisemitismus in Osteuropa," *Osteuropa*, vol. 14, no. 5, February, 1939.
- Seton-Watson, Hugh, *From Lenin to Khrushchev*, New York, 1960.
- Simmel, Georg, "Sociology of Secrecy and of Secret Socie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 no. 4, 1906;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lated by K. H. Wolff, 1950.
- Six, F. A., *Die politische Propaganda der NSDAP im Kampf um die Macht*, 1936.
- Smith, Bruce, "Police,"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 Souvarine, Boris, *Stalin. A Critical Surve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1939;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Staline, Aperçu historique du Bolshévisme*, Paris, 1935.
- Spengler, Oswal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1928-1929.
- SS-Hauptamt-Schulungsamt, *Wesen und Aufgabe der SS und der Polizei; Der Weg der SS; SS-Mann und Blutsfrage. Die biologischen Grundlagen und ihre sinngemässe Anwendung für die Erhaltung und Mehrung des nordischen Blutes*.
- Stalin, J. V., *Leninism*, London, 1933; *Mastering Bolshevism*, New York, 1946;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Short Course*, New York, 1939.
- Starlinger, Wilhelm, *Grenzen der Sowjetmacht*, Würzburg, 1955.
- Starr, Joshua, "Italy's Antisemites," *Jewish Social Studies*, 1939.
- Stein, Alexander, *Adolf Hitler, Schüler der "Weisen von Zion"*, Karlsbad, 1936.
- Stein, George H., *The Waffen SS: 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 1939-45*, Ithaca, 1966.
- Stuckart, Wilhelm, and Globke, Hans, *Reichsbürgergesetz, Blutschutzgesetz und Ehegesundheitsgesetz (Kommentare zur deutschen Rassengesetzgebung)*, vol. 1, München, Berlin, 1936.
- Tasca, Angelo (pseudonym Angelo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1918-1922* (1938), New York, 1966.
- Thyssen, Fritz, *I Paid Hitler*, London, 1941.
- Tobias, Fritz, *The Reichstag Fire*, New York, 1964.
- Trevor-Roper, H. R.,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1947.
- The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42 vols., Nürnberg, 1947-1948.
-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15 vols., Washington, 1949-1953.
- Trotsky, Leo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32.
- Tucker, Robert C., *The Soviet Political Mind*, New York, 1963.
- , and Cohen, Stephen F., editors, *The Great Purge Trial*, New York, 1965.
- Ulam, Adam B., *The Bolsheviks: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 New York, 1965; *The New Face of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1963.
- Ullmann, A., *La Police, quatrième Pouvoir*, Paris, 1935.

- Vardys, V. Stanley, "How the Baltic Republics Fare in the Soviet Uni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66.
- Vassilyev, A. T., *The Ochrana*, 1930.
- Venturi, Franco,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1952), New York, 1966.
- Verfassung, Die, des Sozialistischen Staates der Arbeiter und Bauern*, Strasbourg, 1937.
- Volkman, Erich, Elster, Alexander, and Küchenhoff, Günther, editors, *Die Rechtsentwicklung der Jahre 1933 bis 1935/6*, Handwörterbuch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l. VIII, Berlin, Leipzig, 1937.
- Warmbrunn, Werner, *The Dutch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Stanford, 1963.
- Weinreich, Max, *Hitler's Professors*, New York, 1946.
- Weissberg, Alexander, *The Accused*, New York, 1951.
- Weizmann, Chaim, *Trial and Error*, New York, 1949.
- Wighton, Charles, *Heydrich: Hitler's Most Evil Henchman*, Philadelphia, 1962.
- Wirsing, Giselher, *Zwischeneuropa und die deutsche Zukunft*, Jena, 1932.
- Wolfe, Bertram D., *Three Men Who Made a Revolution: Lenin—Trotsky—Stalin*, New York, 1948.
- Wolin, Simon, and Slusser, Robert M., editors, *The Soviet Secret Police*, New York, 1957.
- Zielinski, T., "L'Empereur Claude et l'idée de la domination mondiale des Juifs," *Revue Universelle*, Bruxelles, 1926-1927.

译者后记

极权主义进行全球征服与全面支配的企图，乃是从所有绝路中产生的一条毁灭性道路。它的胜利恐怕会同时伴随著人性的毁灭；一旦它进行统治，就会开始摧毁人的本质。况且要想背向本世纪的这些毁灭性力量，对其视若无睹，终究也是无济于事。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序言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该领域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也是一本事关当代每个人命运的读物，我已经读过三遍，仍然爱不释手。该书的中译本早已为中文读者所熟知，市面流传有多个中文译本，如林骧华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蔡英文译本（台湾经联出版社，1982）、李雨钟译本（台湾商周出版社，2022年）。从学术交流的角度，上述译本对相关领域研究者已经足够了。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上述译本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林译本对原著中复杂的表达翻译不准确，一些政治敏感的表述被删除。蔡译本并不完整，李译本繁体中文排版有一定阅读困难等，且译文表达不够精炼。事实上，上述译本对中文读者了解极权主义还做得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更清晰、更简明、更多观点呈现、可读性更强、更忠于原著的译本。因着这些迫切的需求，本人以自己粗浅的学识尝试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译本。

与上述三个译本相比，本译本有如下特点。首先，我为译本精心挑选了李雨钟的全书导读和英国知名学者卡诺凡对极权主义的评述文章，为普通读者在阅读第三部分做好知识上的铺垫。读者可跳过关于前面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直奔第三部分，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去梳理极权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各種思想流派的庞杂脉络。当然，读者也可以在阅读完第三部分，再回头梳理前两部分将会受益匪浅。其次，该译本聚焦于第三部分极权主义（英文版第三部分有单独成书），我采用机器翻译与人工校对进行翻译。借助某人工智能公司强大翻译平台产生出机器译本，然后对照原书手稿进行反复打磨校对，后期还吸收上述三个译本优秀之处进行修改，尽量忠实原作表达同时兼顾中文读者阅读习惯。最后，在译稿编排上，我把原书手稿的注释逐一校对并安排在每章末尾（阿伦特花费大量精力撰写注释，值得仔细钻研），这样做既不影响主要内容的阅读，又不妨碍读者对重要细节深入挖掘。另外，该书很多观点晦涩难懂。我在一些重要的段落（尤其第三章）添加译者

注，帮助读者理解阿伦特的观点。在但对于初次阅读该书的读者，建议多读几次或先去阅读阿伦特其他著作，再回头阅读本书。

本译稿的所有努力回归到一个初衷，即理解极权主义是历史赋予这个时代每个人的“重任”。借着李雨钟和卡诺凡文章，读者将对极权主义将会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许我还不配不上为这部伟大的作品写导读或评介，但我还是希望借着这篇后记粗浅谈谈当下中国的现状，为中文读者理解极权主义提供一点个人的反思。同时，我也乐意接过阿伦特捍卫民主自由的思想大旗，帮助更多的中文读者学会运用极权主义的视角去思考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怪异的社会现象。

在1966年再版序言中，阿伦特以敏锐的洞察力警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在掌权后显露出极权主义特征，因为它致力于取代苏联共产党领导共产国际，建立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展现出全球性政治抱负。阿伦特注意到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出现的高层官员大清洗、人口出现一定下降等现象。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和史料的支撑，加上新中国体制确立不久，尚未全面展示的极权主义的特征，将中共归为极权主义政体似乎结论过于草率。对于阿伦特严谨的学术态度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把中共建立政权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展开，就可以看到中共的极权主义残暴行径已经显露无遗：镇压反革命运动（27万人被杀害）、土改运动（450万人被杀害）、公私合营运动（32万民族资本家被杀害）、肃反运动（10万反革命分子被杀害）、反右运动（200万知识分子被杀害）、大饥荒（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773万人丧生）。民间学者估算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死亡人数高达八千万（尽管学界对统计数字尚有争议）。如果阿伦特熟知毛泽东当政这段血泪斑斑的屠杀历史，肯定有兴趣研究毛泽东时代极权主义。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极权主义泛滥的高峰期，在多个方面体现了阿伦特所谈到的极权主义的显著特点。许成钢⁴⁷指出，文化大革命其其他历史上的极权群众运动有三个重要相似点。其一，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场运动中，毛的地位完全不受到任何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制约，毛的最高指示和路线成为活的法律，党内其他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只能完全服从毛的意志，稍有不服从，就会有灭顶之灾。其二，在领袖推动的群众运动中，把煽动、仇恨和暴行紧密结合。为了揪出混入党内和人民群众之中的“客观敌人”（如阶级敌人、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资产阶级份子等），毛煽动阶级对立情绪，利用群众的仇恨心理，让整个国家弥漫弥漫相互告发的恐怖氛围。一旦无辜受害者被贴上这些标签，等待他们的是批斗、游行示众、人身侮辱、非法关押、酷刑等，令受害者饱受身心摧残，直至精神崩溃和发疯上吊

⁴⁷ 许成钢：《文革：极权制下的群众运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年9月16日）。

而死。其三，对整个社会实行大清洗。如同苏联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文革中清洗对象包括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其打击面之宽，世界历史都属罕见。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及老百姓留下了深深的伤害。它使中国错过了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 1970 年代黄金期，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极权主义风暴肆虐之下，毛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法律制度被完全摧毁、人民生活水平倒退、经济与社会生活极度混乱、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和接班人制度被破坏、除了领袖崇拜普通百姓的精神极度空虚。这种伤害如此之深，以至于任何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都不愿在有生之年再次经历文化大革命。但很多人还是很担心文革运动会卷土重来，丁学良⁴⁸指出，文革是否再次爆发取决于三个指标。第一个边界是社会管制性质的，如果中国大陆持续地、越来越多方面压缩中外之间的往来交流，文革再来一次的可能性显著上升。第二个指标是经济体制性质的，如果中国大陆经济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少连接交流，相互依存度大幅降低，文革再来一次的概率大幅上升。第三个指标是权力运作性质的，如果中国大陆发生了以武装力量为直接手段、对数量众多的高层文职官员进行规模清洗的情况，那么，文革再来一次的可能性就急剧上升。但丁学良最后下结论，认为文革某些要素确实回潮，但是文革整体并没有再来。

丁学良在 2016 年结论过于乐观，但如果把这个结论放在 2026 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文革再来一次的可能性已显著提升了。其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国际交往正在悄悄减少，具体现象包括在中国旅游、工作和生活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显著减少（非洲的情况除外），中国居民办理护照难度悄悄增大，普通居民出国安检手续繁琐。其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明显减少，自从 2018 年特朗普时期的中美贸易战仍在继续，发达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趋势明显。其三，尽管中国尚未发生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习近平从 2013 年一直对中共高层官员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各地有规模群体抗议事件相当普遍，中共面临社会维稳的压力增大。

对“文革是否会再来”这个问题再往前推进一步就是，极权主义运动是否会再来？习近平管治下的中国是否已经进入极权主义时代？或许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清晰的结论。但是，我们悲观的看到，普通民众开始以“躺平主义”表达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他们不再沉迷于官方宏大虚假的叙事，而选择不工作、不结婚、不生娃、不给资本家当牛马、不给权贵续命、不给体制当人矿等做法。同时也涌现了白纸运动对中共在疫情期间的极端镇压手段的反抗，更有北京五通桥横幅、长沙大学城反共标语这些个人抵抗事件。从宏观层面，普通中国百姓正在面临经济下滑、年轻人大规模失业、各地欠薪维权事件频发、体制内公务员裁员降薪、房地产业几乎崩盘、

⁴⁸ 丁学良：《判别“文革”是否再来的三个路标》，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 年 5 月 9 日）。

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各地商铺大规模关闭、居民消费降级、对外贸易疲软、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停建、各行各业疯狂内卷。这些现象在昭示着极权主义或文革 2.0 版在悄悄逼近普通中国百姓。

李雨钟在本书导读中为中文读者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何识别我们时代的极权主义元素？尽管斯大林和希特勒式的极权主义已经消解在历史尘埃中，但极权主义思想和极权主义统治形式尚留存于世。卡诺凡警告我们，它极有可能卷土重来。因为政治巨变、社会游民、失业与人口过剩，都会鼓励极权主义解决方案的出现。它如同恶魔一直躲在现实世界的某个阴暗的角落，时刻等待极权者或独裁者的魔性召唤。尽管极权主义并非建立在稳固的政治基础之上，为维持其动力，它会不断征服世界，直到以失败告终并崩溃。但在当代社会，极权主义更像一个幽灵，它会以各种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通常会被贴上各种标签如法西斯主义、绝对统治、独裁统治等，这些思想标签一定程度混淆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某种主义，从而放松了对极权主义的警惕。

李雨钟所提出的问题，帮助我们跳出某种思维标签的束缚，认识到极权主义的元素如何渗透到当代社会中，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思想的行动，如何塑造我们对自由、民主和权利的认识。就中文读者而言，习近平掌权的当代中国是否存在极权主义元素？这个关键问题一直为国内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所忽视。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说这个问题被有意忽略掉了。中共一直害怕其统治被贴上法西斯军国主义、斯大林大整肃的标签，损坏其良好的国际形象（尽管其人权、宗教、言论自由等多方面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在如今毫无言论自由的国内氛围谈论这些问题无异于自寻死路，更别奢望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尽管如此，少数学者还是谈到了这个问题。如中国人民大学陈伟教授在一书的序言非常隐晦的谈到，极权主义元素还在支配着某个东方大国的国民生活，意识形态、秘密警察、集中营、这些事情尚未成为历史。新型监控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数据分析有个人信息精准结合、政治力量对个人的全面支配的威胁依然存在。这个“东方大国”让中文读者自然联想到如今的中国大陆。海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直接。哈佛大学许成钢教授警告我们，习近平掌权的当代中国并非社会主义，而是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教授探讨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经历五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为何在习近平时代回归极权主义体制。

自习近平掌权以来，一直热衷于反腐运动，在其盟友王岐山的支持下，从中央副国级官员到地方小官吏均在大清洗的范围，这种系统性的清洗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26 年 1 月，习近平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长刘振立的双规，把这种清洗推向了高潮。无论习近平怀有何种动机，对军方高

层的持续清洗，表明权力博弈的重心正在从军队转移到秘密警察（执行这种秘密清洗任务通常涉及掌管国家机密的中央警卫局、中纪委和国家安全局）。阿伦特认为，秘密警察凌驾于军方机构是暴政的标志之一。在极权主义政权，秘密警察不仅不仅仅满足镇压国内任何反抗的要求，更契合起全球统治的意识形态主张。这种意识形态主张，让我们联想到习近平武力统一台湾的野心，这是中共领袖们梦寐以求的国家统一的宏伟蓝图，而军方在武统台湾扮演重要角色。通过这种党内权力斗争，习近平把张又侠移出中央军委，不仅巩固自己了作为军队最高指挥官的地位，而且确保其统一台湾的野心无人能阻挡。该事件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新一轮军队清洗即将开启，一旦军方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被全部扑灭，习近平可以确信自己无需惧怕任何人，这种恐怖氛围将会蔓延整个国家。正如阿伦特所说，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清洗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恐怖制度化的产物。习近平在权力斗争中操控秘密警察的手段，恰似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通过秘密警察把朱可夫将军移出苏维埃主席团和党中央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习近平掌权期间，各种政变的传闻一直不断，若习近平连续若干天消失于新闻联播的画面，国外观察家和民间机构对政变的预期就陡然增大。这种政变包含不同的版本，例如习近平忠心部下的反叛、红二代与退休中共元老联手、以及军方高层的阴谋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各种政变的传闻均未实现，习近平仍牢牢掌控权力。阿伦特认为，极权体制下没有成功的“宫廷政变”，领袖的地位依然无法撼动。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身边的亲信对领袖怀有一种“自杀式忠诚”。他们清醒认识到，没有领袖，属于他们的一切（权力、地位、金钱等）将立即崩溃。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习近平身边亲信，拼尽全力阻止一切政变发生，正是要保护属于他们拥有的一切。其二，原子化的个体不仅构成了极权统治的基础，更是贯穿于整个权力结构的顶端。如同斯大林和希特勒，习近平通过不断调动权力与职位，频繁更换身边亲信来阻止派系或利益集团形成，其身边的亲信同样是丧失凝聚力的原子化个体，习近平正是运用权力将这种共谋关系从顶层延伸到民众，使所有利益集团丧失凝聚力，确保任何层面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与整个极权体制相对抗。

2018 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标志性事件，不仅意味着习近平向全面长期执政迈进了关键的一步，而且暗示他对现行一切成文法（包括宪法）的藐视。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者藐视成文法宣称自己具有更高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就源自法源本身，因而能排除琐碎的法律条文的束缚。他们声称政权自身即是法律，无需获得众人的共识，所有的法律化为运动法则。习近平一直执着于“两个百年”乌托邦梦想，声称 2021 年（中共建党 100 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在 2049 年（中国建国 100 年）实现全面社会主义强国。

习近平认为两个百年目标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为了实现这个共识，所有的法律都应服务于这个宏伟的目标。习近平用这种虚伪的意识形态为其长期执政提供辩护，此做法不仅打破了党内民主、强化了个人崇拜、否定了邓小平关于国家领导人的接班制度；更让普通百姓沦为无法无天、专横跋扈与恐惧统治的暴政中，而它却能摆脱法律的束缚。极权主义不守法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2018 年新疆再教育营的信息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报道。2019 年纽约时报⁴⁹ 发布报道，曝光 403 页中共内部文件，展示出当局在过去几年如何开始和升级新疆少数民族拘禁和监控政策。2022 年英国 BBC 广播公司披露了一份来自新疆警方内部的《新疆公安文件》，该文件显示了当地大规模监禁和背后政策动机，文件还泄露了五千多张维吾尔人照片，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新疆集中营内部资料外泄。这些外媒报道控诉习近平通过集中营在新疆实施大规模种族灭绝政策。阿伦特把集中营统治称为极权主义者实施绝对统治的“实验室”：在与世隔绝的集中营世界中，把人变成行尸走肉，不仅剥夺其法律和道德人格，甚至把人类的个体性和任何自发行动都完全消灭。集中营统治创造了一种类似人的物种，将个体推向“孤弃”的绝望边缘，实现对人性的彻底改造。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疆集中营发生的事件正是把维吾尔人转化为这种生物，让其彻底放弃反抗，成为中共统治下的顺民。这种对民族性格的改造乃是对整个民族的灭绝。

新疆集中营似乎跟大部分民众的支配统治并无关联，但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它是习近平对整个社会全面控制的“预先演练”。自 2018 年以后，中国大陆大多数城市开始引进数字监控系统，大街小巷遍布各种高清监控摄像头加上人脸快速识别系统，能短时间追踪定位任何公民的行动，这种大规模监控系统首先在新疆投入使用。2019 年，为应付突发的新冠疫情，中共在整个社会采取了极端隔离和封锁措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把一种极端控制模式熟练地运用于社会危机管理，这不是把新疆集中营管理模式向全国推广的例证吗？尽管仍缺乏实质性证据，但我们确信新疆集中营的管理模式不单是维护所谓的民族地区稳定，而是帮助习近平实现全面恐怖积累经验。

习近平实施绝对统治的另外一个明显迹象，就是知识界对当局的批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看不到，这说明当局对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打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大批自由知识份子或被监禁或流亡海外（许章润、滕彪、贺卫方、张鸣、吴强、蔡霞、张展等）。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犬儒化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许多在高校任职的学者、专家和教授，已经丧失了公

⁴⁹ New York Times: Absolutely no mercy: leaked files expose how China organized mass detentions of Muslims on November 21, 2019.

共文化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沦为习近平极权统治的共谋者。他们多数人已放弃真理的追求，完全依靠政府拨款进行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活动乃是为了获取学术名声、捞取学术资源、为政府撰写咨询报告、为政府开发监控和管理系统、公开为政府政策失误辩解、在大学课堂给学生洗脑给当局唱赞歌。在他们眼中，知识和真理不再是大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公共产品”，而是为领袖服务的“私人定制产品”，他们的犬儒学术态度已经暴露无遗。阿伦特指出，极权运动中各阶层普遍存在轻信与犬儒的混合心态，地位越高，犬儒的比重越大。或许对位高权重的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信念不是真理，而是领袖永远是正确的，即使多数人知道政治的本质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游戏。这如同纳粹三十年代夺权之后，德国大多数知识份子并没有认真抵抗，而是选择与纳粹政权合作（阿伦特的启蒙导师海德格尔正是如此）。

习近平执政初期，在体制之外建立了十多个高层领导小组，并亲自负责全面深化改革、信息与网络安全、军队改革、中央财经、中央外事小组。外界观察家解读此举是习推行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极权主义的视角看，有意识围绕重叠、重复和并行的职能构建权力的架构，实质上是习近平以这些小组削弱了国家行政权力，而把真正的权力集中于政府之外的政党权力之中，让他绕开政府权力的束缚去推动极权运动。阿伦特认为，国家与政党的权力关系本质上是表面权力与实质权力的关系，政府机器通常被描绘成无力的外壳，用来掩护并守护政党的实际权力[17]。在此，习近平以政府表面权力为合法外衣，掩盖他以政党实际权力推进极权统治的野心。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卸任对其同僚发表演讲：“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正是李克强对习近平架空其权力表达不满。

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如同暴政，天生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与其他政体不同，极权政体只能从内部摧毁。这种统治是建立在不稳定原则之上，无法建立持久的政治体系，又必须推进征服世界的势头，极权运动的停止就意味着它的消亡。除了留下精疲力竭的民众、经济社会混乱、政治真空和精神上的空白，什么也没有留下。习近平已掌权超过十年，有海外评论家描述习近平为“败家子”，把中国五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家底都耗光了。与毛时代同样，给中国留下一个烂摊子，体现在一堆烂尾工程上：雄安新区（第一鬼城）、一带一路（引发沿线国家债务陷阱）、亚洲投资银行（运作规则不透明成员国纷纷退出）、孔子学院（海外推行中共意识形态被抵制）、千人计划（成为盗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渠道）、芯片国产化（天量投资换来细微进步）、国产飞机（延期交货无法跨越技术屏障）、海南自贸区（面子工程）、扶贫工程（中国仍6亿人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这些工程之所以称为烂尾工程，是因为它没有实质上推动经济发展，也没有给百姓带来多少经济实惠。除了粉饰习近平政绩之外，一无是处。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绝对统治的系统性标志是实质权力让

位于组织权力，即国家的物质力量与福祉始终是为了组织力量而牺牲，正如所有事实真相都为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要求所牺牲。这意味着习近平对事实的极端蔑视，他只关心“两个百年”目标是否与其宣称的意识形态一致，而工程是否真能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给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的事实则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塑造了一个胜利者的形象。

以上思考，是本人运用阿伦特极权主义视角分析当下中国政局的一些看法，仅代表自己一些不成熟的非学术观点。本人无意挑战任何学术权威，也不想跟小粉红、爱国脑残党、爱国愤青开展无意义的论战。如果说当代中国正处于极权主义风暴中过于危言耸听，但我们至少有如下共识——习近平管治下的当代中国正在向极权主义的道路上加速狂奔，极权主义元素正在悄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回到阿伦特的初版序言，如果我们对当下中国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不去认识这些毁灭性力量，那么它不仅摧毁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家园，而且将个体降格为被剥夺法律人格、道德人格和个性的人兽。这将把每一位普通的中国人推到人格极度扭曲的地步，或被置于“孤弃”的绝望边缘。可以说，借助阿伦特书中谈到的极权主义思想去分析当下中国各种社会现象，依然不过时。

鉴于当前中共残酷思想镇压和言论迫害，本人采用太乙真人（假名）发表这部译稿，这并非规避译者责任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校对翻译过程中，本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弃了个人爱好和家人共度好时光的机会，力求提供一份高质量且可读性很强的译作给读者。然而，本书翻译的初衷并非单纯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探讨极权主义的本质，帮助普通大众学会用阿伦特的思想去认识极权主义的危害，避免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受害者。限于本人知识能力经验不足，译稿出现各种问题在所难免，若读者诚恳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本人将感激不尽！

考虑到国际版权法律相关规定，本人声明：该译稿版权归某人工智能公司和本人共同拥有，本译稿不用于商业目的，仅用于学术交流，未经本人同意对该译稿进行任何改动或出版均属侵权行为。尽管如此，本人期待有朝一日该译稿能在中国正式发售，这将见证中共极权主义的崩溃，中国民众迎来民主自由新天地的那一天。

太乙真人 2026 年 2 月于美国